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分析马克思

## ——道德、权力和历史

[美] R. W. 米勒

( Richard W. Miller ) 著

张伟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

【美】阿莉森·贾格尔 著

孟鑫 译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

【美】莉丝·沃格尔 著

虞晖 译

马克思主义与道德

【英】史蒂文·卢克斯 著

袁聚录 译

田世璇 校

分析马克思

——道德、权力和历史

【美】R.W. 米勒 著

张伟 译

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

【美】R.G. 佩弗 著

吕梁山 李 旸 周红军 译

ISBN 978-7-04-026375-6



9 787040 263756 >

定价 24.50 元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 分析马克思 ——道德、权力和历史

[美]R. W. 米勒  
(Richard W. Miller) 著  
张 伟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8-2625号

Richard W. Miller

*Analyzing Marx*

*Morality, Power and History*

Copyright © 1984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析马克思:道德、权力和历史/(美)米勒( Miller, R. W. )  
著;张伟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9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段忠桥主编)  
ISBN 978-7-04-026375-6

I. 分… II. ①米…②张…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90026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000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5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6375-00



## 译丛总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sup>①</sup>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

<sup>①</sup>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植根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积极回应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最后还要强调指出,我们翻译这套丛书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原作者的所有观点和主张,因为它们之中有不少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因此,读者阅读这套丛书时还应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它们的得失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我最常引用的马克思著作源自下述版本：

-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844), in T. B. Bottomore, ed.,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1964).
-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1846), ed. C. J. Arthur (New York, 1980).
-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1848), in Marx and Engels, *The Marx-Engels Reader*, ed. Robert C. Tucker, 1st ed. (New York, 1972).
- Marx, *Wage-Labor and Capital* (1849), in *Marx-Engels Reader*.
-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in *Marx-Engels Reader*.
- Marx, *Grundrisse* (1857 - 1858), trans. M. Nicolaus (New York, 1973).
-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59), in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Three Volumes* (Moscow, 1973), vol. I.
- Marx, *Wages, Price and Profit* (1865), in *Selected Works*, vol. II.
- Marx, *Capital* (1867, etc.), (Moscow, n. d.)
- Marx,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1871), in *Marx-Engels Reader*.
-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1875), in *Marx-Engels Reader*.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n. d.)



**本书译文采用的中文版本：**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译者注



**我**在本书中的一些著述是在年假中完成的,这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人文学科基金的资助。书中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章的内容取自我的下列文章,并得到出版商的许可:

《马克思和道德》,载于《马克思主义:法 XXVI》(J. Roland Pennock 和 John W. Chapman 合编),纽约大学版权,1983 年。

《生产力及其变化》,载于《哲学评论》,1981 年,第 90 页。

《生产变化》,载于《马克思之后》(Terence Ball 与 James Farr 合编),剑桥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	I
致谢 .....	I
导论 .....	1
尊重马克思,尊重哲学 .....	2
对马克思的两种说明 .....	5

## 第一部分 道 德

第一章 反对道德 .....	13
道德的特殊性 .....	15
平等 .....	17
平等分配 .....	18
平等权利 .....	20
一个关于马克思和权利的错误 .....	24
平等关心 .....	27
功利主义 .....	28

一位功利主义的马克思 .....	33
普遍性 .....	39
普遍理性 .....	41
意识形态 .....	43
<b>第二章 取代道德</b> .....	48
普遍福祉和社会目标 .....	50
变革进程 .....	57
一种性格模式 .....	59
一个非道德的结构 .....	71
艾伦·伍德的选择 .....	73
一个诱人的结论 .....	90

## 第二部分 权 力

<b>第三章 统治阶级的概念</b> .....	95
导论 .....	95
指责忽略 .....	98
什么是统治阶级? .....	99
国家与革命 .....	107
检验性 .....	119
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 .....	121
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 .....	128
<b>第四章 政治理论中的权力问题</b> .....	133
多元论及其反对者 .....	133
多元论的命运 .....	143
统治阶级和权力集团 .....	148
功能主义和社会利益 .....	150
方法论的束缚 .....	151
更好的权力理论 .....	154

## 第三部分 历 史

<b>第五章 生产力与生产力变革</b> .....	159
----------------------------	-----

导论 .....	159
作为技术决定论者的马克思 .....	162
赌注是高昂的 .....	169
马克思不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 .....	175
一个新的词汇 .....	182
生产方式解释 .....	191
一个更宽泛的观点 .....	200
马克思的模式和马克思的背景 .....	204
<b>第六章 生产方式与历史 .....</b>	<b>208</b>
一些异议 .....	208
整体论 .....	208
唯物主义 .....	213
名副其实的理论 .....	217
证伪 .....	222
内部还是外部 .....	226
历史是那样的吗? .....	238
外部,再次 .....	252
<b>第七章 取代实证主义 .....</b>	<b>254</b>
实证主义的阻碍 .....	254
实证主义的一个选择:解释 .....	265
原因 .....	266
充分描述 .....	268
因果关系深度 .....	271
实证主义的一个选择:证实 .....	273
实证主义和政治学 .....	284
<b>索引 .....</b>	<b>293</b>
<b>译后记 .....</b>	<b>304</b>



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说明马克思应当成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回答了那些由所有哲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二是要发展一种对马克思的更加政治化的解释,这种解释使权力关系典型地发挥着主要作用,而不是技术或者在工作单位之外的权力斗争。现在,读者们不得不在经济决定论和折衷主义解释之间做出选择,前者低估了政治结构和冲突,后者忽视了马克思对经济进程显而易见的、令人信服的和独一无二的强调。取而代之,我将会做出第三种选择。

这两个目的之间关系紧密。虽然一些经济决定论者以宏大的形而上学声音阐明观点,但是对马克思更加政治化的解释反而能使马克思在哲学上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当代哲学的风格和技艺使得对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哲学家们的解读更加清晰,也更具灵活性。这对于马克思的解读是必需的,它既避免使我们局限于狭隘的经济论,也不至于使其变得支离破碎。我希望我探讨得越多,这些目的

的相互依赖与紧迫性越能清晰地渐次呈现出来。

## 尊重马克思, 尊重哲学

4 如果本书的讨论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就应该在所有风格的哲学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我对马克思的说明最明确地诉诸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即“分析的哲学”,这一名称来自于它的实践者,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也被它的反对者所利用。这种方法在英语国家是研究哲学的主流,但是因为它将马克思看作边缘人物的最重要方法,所以它也最难以证明马克思应该处于哲学的核心地位。

我从事的这种哲学亚文化研究不是通过它们的基本信条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而是依赖于两者共同的成功实践之标准。尤为重要的是,清晰地阐明需要人们相信的观点并给出其明确的论证应该成为重中之重,即使不能让所有人相信,也应该为多数人所接受。就历史的角度而言,起初源于英国经验论继而被逻辑实证主义强化了实体性哲学预设,在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那些预设也经常以分析的方式受到置疑。本书将要推进这些质疑,因为当分析哲学的方式与实证主义的实体相分离时,马克思得到了最为合理的解读和最充分的应用。

当分析哲学家们着眼于哲学的这段历史时,他们所关注的经典人物与其他哲学家通常并无二致。休谟(Hume)之于各个主题的观点和穆勒(Mill)之于道德的观点是两个无可争议的经典。作为经典,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是最准确的,而是说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代表了一种哲学家所应该参考的标准观点。当这位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时,他就会去支持它、修正它、解释它,或者攻击它。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应该是包括分析哲学在内的现代哲学中的一个经典。

然而,恰恰相反,在英语国家中马克思和哲学之间几乎完全是敌对的关系,甚至直到最近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分析哲学家——如果他们沒有忽视马克思的著作——都试图说明马克思在其明晰

性、可信性、科学合理性和解释适当性上都不具备适当的标准。从经验上考察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去探究其哲学含意简直是浪费时间。“形而上学”对马克思来说已经是一种礼遇了。

应该通过两者之间至少三种重要的合作来取代这种敌对性的论调。首先,马克思的一些观念有助于加深对那些最主要的哲学问题的理解,加深对那些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于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的论题的理解。比如在本书的前两章,我将试图说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及其关于正义、公平和道德的观点作为评判社会安排的基础,应当成为伦理学的标准立场。他的观点和他的问题同样处于核心地位,这个问题是“怎样评判制度?”在第七章,我将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为模型,在其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后实证主义的,但又是非相对主义的科学哲学的纲要。当然,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是不承认这一模型理论的合法性的。

其次,哲学家们能够利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为社会科学作出积极的贡献。社会政治哲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由于打破了学科上的分类,现在已经从社会科学家中分离出来。现在的哲学家们完全不像他们最为显赫的前辈们,他们没有适当的培训、没有足够的信息,也得不到相应的专业奖赏,在关于社会现实之本质的实际争论中,他们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也发现,由于一些简单的预设及其混乱的关系,各种可能的分析和解释正在被忽视,而这些预设和混乱本该受到哲学反思质疑的。作为主流之外最强有力的解释框架,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如果以当代分析哲学的清晰性和概念资源加以重构的话,那么它将会给出不同的选择。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将以此种精神运用马克思的著作去说明:除非以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权力概念作为准绳,否则对政治权力的评估就是不全面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类似分析也会在别处发挥作用——比如,在打破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之间的僵局中发挥作用,或者在决定经济理论的范围和限度时发挥作用,在均衡论越来越空洞而国际政治对经济进程的影响越来越普遍深入的世界中发挥作用。



最后,英语哲学中细致的、抽象的而又富于想象力的分析传统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提出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的解释者们要面对两条差异极大的解释途径:总体性的系统描述或者对具体现象进行个别探讨。前者是高度精炼的、不完整的或者隐喻性的,经常三者兼而有之;后者足够细致、相当可信,与前者的文献也完全不同。多数解释者面对它们相应的诱惑,或者屈从于前者,或者迁就于后者。有人能够从孤立吸收的总体性陈述中引申出基础理论;也有人鉴于许多具体探讨的多样性和可信度,将马克思弱化为纯粹的常识。这些诱惑在我将要考察的三个领域即道德、政治理论和历史中也都是强有力的。马克思是提出了反对道德的总观点,认为道德由社会利益决定,因此属于意识形态,还是只简单地宣称当代道德太过于强调财产权和社会和谐了?马克思是认为政治只是对经济需求的消极反映,还是他仅仅在提醒我们要注意经济利益群体对政治决策的影响?马克思是把更有效的生产欲望作为历史的驱动力,还是认为应该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巨变的重要的但经常被低估的方面?人们对马克思的忽视,部分原因在于这一事实,即这些选择支配着大家都能认可的对马克思的解释。在反思社会变化的现实时,大多数人发现宏大叙事并不可信,谨慎的陈述才无可置疑。

从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的角度来看,其文本令人沮丧的状态就可以理解了。它部分地反映了不断驱动其写作的各种政治兴趣,也部分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的性质,因为对社会进程总的类型的陈述只能是具有模糊的真实性,也必然会在种种不可预见的条件、要求和限制的情况下应用于特殊事件。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回避这种模糊性,也不去把它提升到一种特殊逻辑的地位,那么我们仍能从马克思那里获益匪浅。我们能从这些文本中提炼出各种可信而又与众不同的理论。这里,分析哲学提供了一种大有可为的解释方式,因为它要求明晰性,容许抽象性和复杂性,它也能对文本给人们的影响做出回应。我希望表明:马克思对道德的说明(及其对政治中的道德观点的取代),他的国家理论及其历史理论,都能以这种方式做

出最准确且最有趣的解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证主义解释的适当性概念和证实概念——直到最近，在分析哲学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却主要歪曲了对马克思的解释。我将在第七章中指出，解释者们倾向于赞同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发展成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其他解读能够赋予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以解释力，并使它们经受经验的检验。如果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阐明了实证主义的暗昧之处，那它倒是惩恶扬善了。

毫不夸张地说，从这些解释中呈现出来的马克思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将要描述的对马克思的分析哲学的运用——前两种“合作”——并不依赖于他那更有争议的现实诉求。而马克思对政治中道德观点的不适当性的论证，依赖于对社会冲突和历史多样性的评价，这倒是出人意料了，非马克思主义者才最有可能如此。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工具去测量政治权力的分配，它甚至对那些没有找到马克思本人的测量方法的人来说也是有用的。哲学和马克思之间的对立不仅仅遮蔽了事实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这一切——而且它还造成了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较少注意到他们自身世界观中哲学和社会学方法论之间的关联。

## 对马克思的两种说明

本书的第二大目标是要取代马克思的一种观点。按照通常的观点，可能也是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马克思在其晚年，从某种意义上当然也是重要的意义上说，是反政治的。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个人经济私利的追求改变和塑造了社会。这种追求就好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但这种作用有时造成大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保持社会平衡。相比之下，政治——对生产单位之外的权力的诉求——发挥着次要作用。在这种观点的说明中，经济条件就使得社会变化成为可能，而对旧的经济结构进行有

组织的暴力活动倒显得多余了。<sup>①</sup> 其他说明则认为,人们对于个人私利是否应该从属于社会忠诚的考虑并没有产生系统的影响。<sup>②</sup> 或者认为,权力关系要适应充分的物质生产的需求。<sup>③</sup>

认为马克思在其晚期著作中表现为一个经济决定论者,这种观点在许多重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尽管是一种误导,但马克思的如下历史观可能会被冠以“经济决定论”。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根本上由其生产方式,即统治关系、合作方式,以及控制物质生产的技术来决定。更具体地说,当社会稳定时,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以及主流思潮将维持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统治,这个阶级主要是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激进的变革通过其内部的社会发展进程爆发,那么它是由生产方式自我破坏的趋势产生的。根据生产方式的性质,起初维持旧的统治关系的社会进程,最终赋予了一个非统治阶级去破坏旧的关系系统的能力和动力,并统治一个新的关系系统。在随后的斗争中,关键性的联合取决于人们的阶级状况,以及他们在统治关系网络中的地位。

① 比如,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作为一种明确的政治手段,权力的运用也接受这一点,即,要发生变化,社会环境(意识也是其组成要素之一)尚不成熟……马克思的立场可以总结为,对马克思而言,物质的力量要么会失败,要么是多余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剑桥,1970,第218页)。在第三章中,我将详细讨论艾维尼里的观点,并结合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斯坦利·摩尔(Stanley Moore)的类似解释。艾伦·伍德(Allen Wood)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载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2年第1期)中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并且其在《卡尔·马克思》(伦敦,1981)中表明,这种倾向被证明对于马克思关于道德的说明是至关重要的。

② 参见比如,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革命的动机和道德》,载于《哲学和公众事务》,1979年,第9期。

③ 近年来最卓越的讨论见于科恩(Gerald 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普林斯顿,1980(中文版: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后同)。同时参见,威廉·肖(William Shaw)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斯坦福,1978(中文版: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和约翰·麦克莫奇(John McMurtry)的《马克思世界观的结构》,普林斯顿,1978。

既然物质生产方式是主要的,那么这种观点就可以被称为“经济决定论”。但是如果将经济与政治相比,那么这一称谓就完全是误导性的。生产方式部分是由其各方面的统治关系决定的,包括土地、劳动力和人。进而,一个具体的统治关系又部分地受其不同的统治手段和结果决定。自我破坏过程也许包含导致权力关系系统发生内部冲突的趋势,比如封建的生产关系,其趋势就是导致大地主之间的内部战争。当然,统治系统及其产生的冲突从广义上说就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所谓政治的“从属地位”只是说:独立的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要由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持其统治的需要来解释;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主要由阶级状况来解释。

我将会表明马克思在其他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不相信对直接的经济私利的追求会自发地产生激进的社会变革;不相信具有大的社会目标的政治组织是不重要的;不相信经济发展会使政治革命变得多余;不相信对社会忠诚的考虑在社会典范的意义上是不重要的;也不相信对更为高效的生产的追求是社会变革的基本机制。我将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最新的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总之,我将批判经济决定论者的解释,因为他们妨碍了人们去理解马克思在道德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洞见。

严格说来,本书三个部分的主题是相对独立的,它们是:马克思对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道德观的批判与取代;他的统治阶级概念及其在阐明政治权力性质时的作用;他的社会变革总理论的内容和科学地位。但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过分强调已经成为普遍状况,所以这些主题之间有时会相互补充,有时会相互依赖。第一章中对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道德的批判依赖于对相互冲突的各种需求所具有的深度和尖锐性的高度评估。这一评估在第三章中得到了强化,因为对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假说的阐释也使这一评估成为必要。同样,我将在第二章中表明,如果马克思被认为自觉的政治考虑从属于对直接物质利益的追求,那么马克思关于道德批判的性质就无法理解;而且如果马克思没有把追求物质效率看作是变革的动力,也就是我在第五章捍卫的反技术论的观点,那么后面

的假说将会是孱弱无力的。在第二章中,我从马克思那里提炼出的统治阶级概念,将会成为我后来对他的总体历史理论进行解释的基础。我在本书的中间部分勾勒出了检验统治阶级假说的方法,而更大的方法论问题将在最后一章得到最为详尽的探讨。因为对科学检验的性质的成见已经扭曲了读者们——无论是表示同情的读者,还是不同情的读者——对马克思的理解,这才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最为重要的事。简而言之,虽然三个部分在分开阅读时也是可理解的,但是正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作为总体时,它们才最强有力地限制了在马克思解读中的经济决定论。更加政治化的马克思作为一种解读会更加精确,作为社会科学会更加有用,作为一种哲学资源会更具启发意义。

除了伦理学、政治理论、历史和科学哲学之外,关于马克思的其他视角就暗示了对马克思文本的其他解释和使用,但我不会系统地发展它们。比如,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具有小于人们通常认为的经济决定论的性质。同情马克思的读者经常会以《资本论》来证明自发的经济进程相对于宽泛的政治过程的首要地位,虽然这种政治过程是大范围的、长期的和深思熟虑的集体行动。然而,如果剩余价值理论不是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运行取决于阶级斗争——经常是集体的、有组织的,并且伴随技术革新,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就不过是一个大型的记账器。而且,在这两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过程中,前者必然居于首要地位,因为不断增加的对劳动纪律的需求急剧地影响了相关的技术发展趋势。<sup>①</sup> 因此,马克思在数百页的《资本论》中并没有误入歧途,他在卷一讨论了权力斗争和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为工作日而斗争的历史,利用机械化来加强劳动纪律的描述,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说明,以及关于殖民主义的形式和经济意图的讨论。总之,如果本书的观点被扩展到其他地方,那么马克思的著作之间会变得更加一致。而现有的选择是,人们一直受到杂志、政

<sup>①</sup>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3章第3—5节,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2—479页。

治史或哲学的种种诱惑而分散地理解马克思,所以马克思要么是折中主义者,要么是经济理论家。

我希望这本书为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和解释马克思著作等工作的人所准备,为那些关注社会冲突和社会变革的来源及意义的人所准备。当然,本书的读者可以是任何人。我也希望读者能够容忍某个结论、容忍对某些立场和争论所作的快速的总结,毕竟它们对于那些相关领域的人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



# 第一部分

## 道 德







## 第一章 反对道德

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马克思是一位道德家，有时甚至是一位苛刻的道德家：他提出要为他人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准则。他所倡导的包括“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的行为，凝缩在他对“天国风暴”中的男人们和对保卫巴黎公社的妇女们的赞美之中。<sup>①</sup>当他在当代工人斗争的科学基础与过去以“幻想的”、甚至是“反动的”错误观念来支持工人斗争之间做出区分时，他对行为的合理性与博识性的关注就变得显而易见了。<sup>②</sup>

同时，马克思也经常明确地攻击道德和基本的道德观念。他接受“共产主义……废除……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的罪名。<sup>③</sup>唯物

<sup>①</sup>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路·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0页。

<sup>②</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及后面的内容。

<sup>③</sup> 同上，第292页。

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被认为是已经“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享乐道德,宣判死刑”。<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对“平等权利”和“公平分配”的谈论是“一种罪行”,它迫使“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sup>②</sup>

显然,将马克思称为道德家的宽泛用法,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是一种人为的夸大与误解。理论上,这没有任何问题。狭隘的利己主义与自然地被称为道德的东西之间,本来就还有很大的余地,只是经常被哲学家们忽视而已。例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时就为他的民族坚持他对世界权力的承诺——一种需要自我牺牲,并在某种程度上要以对行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理性反思为基础的承诺。韦伯承认他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均等地权衡每个人的利益,比如,他自己的利益,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以及那些德国人的利益——这些德国人宁愿处在“少数人”的状态,也不愿意“组成具有强大力量的人民”。<sup>③</sup> 当韦伯谈到他的民族主义承诺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的,并且对其关注的程度要高于一切道德承诺时,即使我们感到不快,我们也能理解他。同样,尼采的观点是非道德的,但丝毫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精英们为捍卫他们的普遍美德而奋力战斗。在日常生活中,对家庭或朋友的忠诚超出了道德要求的范围,但也处于自我中心主义和道德之间。

然而,马克思的观点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道德,这一点还不清楚。人们又是鉴于何种理由认为马克思违背道德,这也不清楚。在追问这些问题时,我将尝试公正地对待文本。但是我的主要兴趣是,为马克思激进地违背道德观提出貌似可信的论证,至少像其他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

②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③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两条法则之间》,载于《政治著作》(J. Winckelmann 编辑),图宾根,1971,第143页。

哲学家相信的那样。当这种违背的基础显露出来时,马克思对作为社会和政治选择基础的道德的反对就被证明是复杂的、有说服力的和人道的,虽然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是反人道主义的。而且,正是因为它以马克思社会理论的诸多方面为基础,所以它也为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无论马克思的观点是否最终有效,它都应该有一个目前还不具备的身份:一个在深思熟虑的道德讨论中必须加以陈述的标准选择。

## 道德的特殊性

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基础,即为解决这些政治问题而对社会工作与策略进行选择的基础,在狭义上不同于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或者纯粹的审美关系。然而我们最偏好将政治决策的基础归属于道德,这些基础易表现为三个特征:

1. 平等。人们将受到同等的关注或者尊重,或者被赋予平等的地位。在选择制度和政治策略的适当方式中,每个人都将被平等对待。当然,对于平等的适当形式是什么,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一些平等标准将是解决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终极基础。

2. 普遍准则。任何主要政治问题的正确解决,都是因为将有效的普遍准则应用到当前事件的具体实际中去。这些准则在所有社会中都是有效的——在这些社会中,有一种观点主张依靠道德诉求来解决政治冲突;概略地说,在这些社会中,合作几乎使所有人都受益,但是资源缺乏有可能产生冲突(休谟和罗尔斯[Rawls]的“正义环境”)。

3. 普遍性。任何理性地反思相关事实和观点的人都会接受这些准则,只要他(她)的情绪还属正常。

我把马克思描述成一位对政治上的道德观进行批判的人,意在说明他反对所有这三条原则,因为它们不适合用来决定人们追求何种基本社会制度。我已经说过,在广义上,马克思的确描述了一种道德观。他论证了那些可能需要自我牺牲的策略。在马克思看来,正派与下流、应当做的与不应当做的之间的差别是重要的。马克思

的论证——主要用于指导人们对政治经济系统的选择——可能会留下永久的用以约束个人行为的最普通的道德。但是,人们当然也会采用狭义的道德观,将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前卫的非道德论者。毕竟,这三条原则捕捉到了许多重要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选择的基础可以被看成是中立的,并表现出对所有人的关注。第一条原则要求在人们的利益之间保持中立;第二条原则要求公正地参考与道德有关的历史上所有社会境况;第三条原则要求公正地诉诸每个人的理性能力来进行讨论。正是道德中立才是我们在区分明显的道德观点与同样明显的非道德观点时所需要着重强调的标准。

诚然,有些乐于提出道德观的哲学家会抵制其中的某些原则,至少不会去严格地解释它们。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没有给出平等的最终前提(我大概在别的地方讨论过)。<sup>①</sup> 杜威(Dewey)以及在近期著作中表达观点的罗尔斯也都认为,政治道德适合于讨论相当特殊的社会。但是当我们提到抵制所有这三条原则的哲学家时,比如韦伯对国际关系的讨论,我们大多数人很自然地会认为这些哲学家已经背离了道德观。

尽管有这些考虑,有些人可能也不愿像马克思那样将这样的道德观与对三个前提中的至少部分前提的承诺联系起来。毕竟,前提是高度抽象的,而“道德”是日常用语,它不是哲学反思的产物。除此之外,争论也仅仅是口头上的。重要的是,马克思抨击了流行的道德哲学假说,他的抨击使他与那些典型的道德哲学家区分开来,而且要远甚于这些道德哲学家之间的区分,马克思由此得出的关于基本社会选择的观点,也出乎意料地接近于被我们所有人都乐于称谓之“非道德”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就像我将要解释的那样,它将引导多数人认为它是公平的和人道的。这样看来,它不同于尼采或韦伯的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反思这三个前提之于政治决策的后果时,最

<sup>①</sup> 理查德·W·米勒(Richard W. Miller):《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一种结果主义》,载于《马克思与道德》,《加拿大哲学期刊》(K. Nielsen 编辑),1981年增刊第7卷。

初吸引我们考虑这些前提的动机应该会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反对这些前提。

## 平 等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提出的多数反对道德的观点都指向第一个前提,即平等的前提。然而,在逐步展开它们之前,我先要勾勒出事实真相,即马克思在要求平等的问题是明察秋毫的。否则,我的解释将是荒谬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他所倡导的社会安排,将使人们在权力与享受方面拥有比现在更多的平等。至少,最初这些安排应体现一些标准——马克思明确将其特征表述为平等权的标准——比如“按劳动量给予每个人”。<sup>①</sup> 马克思对这些安排与标准的说明是:它们将提升人们的生活,而不是去遵循某种关于平等的终极标准。然而,在马克思强调的生活维度中,有两个维度尤其与平等相连。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情况下,大多数人更少受到支配,而更多地拥有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能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发展他们的能力。而且,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受到彼此的祝福与关心的支配,其支配程度也要大于今天。在马克思看来,当人们为自己制造的“平等”呐喊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真正渴望的是这些自由和互惠的善。总之,平等的终极标准虽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错误的,但它却常使人们置身于正确的方向;它常常片面地或令人困惑地表达人们的合理愿望,而这些愿望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sup>②</sup>

<sup>①</sup>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6页。

<sup>②</sup> 参见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致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325页;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我在《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一种结果主义》和《权利或结果》(载于《中西方哲学研究》,1982年第7期——《社会政治哲学》)两篇文章中更详细地说明了平等和公平的作用,它们作为手段常为马克思制造出重要的“善”。

平等的终极要求有四种：分配的平等，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财产、资源或机会；权利的平等，要求所有人平等地享有某些权利；态度的平等，要求对所有人平等地关心与尊重；以及公正的标准，要求提高普遍的福利，毫无偏见地对待人们的利益。在面对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所有这些要求都不足以作为决策的终极基础。在某些情况下，制度应以某种特殊方式平等地对待人们，但是制度不应该以此来迎合平等的标准。确切地说，一个好的平等形式是一个好的工具，它能产生某些后果，而评价这些后果是不需要这种平等标准的。

## 平等分配

由于分配理念通过蒲鲁东(Proudhon)和巴枯宁(Bakunin)的议案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影响，所以它对马克思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认为，如果分配标准普遍要求同等的福祉与权力，那么它就不适合基本的社会选择。而且，如果采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更加具体的平等标准，那么它将是乌托邦式的。

普遍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财产、资源和机会，这不适宜作为判断社会安排的主要标准，因为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与福利，而不是这种平等分配。在理论上，当把每个人的财产、资源和机会都降到一个共同低的水平时，平等是可以实现的。马克思将这种观点——如果人们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称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他指出“粗陋的共产主义”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断恶化，因为它以妒忌为动机；而且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它不关心人们的满足感与权力的增长。<sup>①</sup>

在马克思对剥削的强调中，他提出一个类似于不平等分配的观点。剥削产生的不平等与许多非剥削情况产生的不平等一样

<sup>①</sup>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以及《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多,比如由独立的家庭田产具有的不同生产率造成的不平等。然而,剥削的存在为变革社会提供了更加急需的基本原理。总之,最基本的社会选择应以相互关心和尊敬、对物质福利与文化福利的追求,以及避免剥削为指导,而不应以分配平等之类的标准为指导。

当这些批判涉及要求绝对普遍地实现分配平等时,它们就不可能公正地对待蒲鲁东和巴枯宁头脑中的平等分配要求。对他们而言,平等可能意味着资源与机会的充分平等,并以此来保证所有人能够完全平等的独立。这种完全且平等的独立,既有别于那些为他人工作以维持生活的人的经济从属地位,又不同于那些服从国家干预的人的政治从属地位。这种平等独立的理想,引导着蒲鲁东和巴枯宁去追求由独立的生产者构成的政治权力分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源占有实现了充分平等,没有人能在经济上控制他人。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理想是乌托邦式的。生产资源上的充分平等是短暂的,它充其量只能在人们相互依赖地进行物质生产的现代体系中实现。生产网络如果由许多独立的单位来运行,那么这个网络一定受市场机制支配。即使生产资源的分配最初是平等的,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运气也会很快制造出一些不平等。市场机制会因为富有者通过规模经济、以较雄厚的基础对抗灾难、更容易获得信贷以及较强的改革能力而变得越来越富,从而放大第一个不平等。对许多人来说,最后的结果是破产和一无所有,而且他们还要服从那些握有生产工具的极少数人。“交换价值……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与不自由。”<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页。



这些分配平等的问题使以权利为基础的标准更加吸引人。因为当财产被划分成各种各样的变化形式时,一个社会才可能尊重权利。但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平等遇到了它自身特有的问题。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太多的权利,所以不同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使平等的基本权利处于冲突中。但这些冲突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恰当解决:将权利看作是提高人们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终极标准。

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实现每个人按照他或她的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但是仅以此为依据,它就违犯了按照他或她的需要进行分配的共产主义标准,因为身体虚弱且需要抚养孩子的工人并不比强壮的且无子女的工人得到的更多。“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sup>①</sup>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也违背了权利——这些权利应当引起那些把权利作为基础的道德家的关注。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工厂是通过努力工作和诚实交易建立起来的,但它们被没收了,就像强盗贵族们的工厂被没收一样。人们被禁止向私有工厂和农场投入难得的资源。简言之,按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之所以能够被保留下来,是因为违背了由非掠夺性劳动和诚实贸易而获利的权利。

有人会说:社会主义权利是一个更高的权利,而共产主义标准又是广义上较之更高的权利。但是,在何种尺度上来衡量这些权利?对权利的衡量就算分析到最后,也不能以更大的超级权利尺度来衡量。任何权利都是“不平等的权利”在需要解决的意义上总与人相冲突。<sup>②</sup>这些冲突可以通过将权利视为提高生活的手段而得到

<sup>①</sup> 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sup>②</sup> 同上。

解决,如果将这些冲突具体到人们正在讨论的那个时期的社会中,就是选择那些最能提高福利的权利来解决这些冲突。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权利冲突的详尽探讨以收入权利为其关注点。但同时,政治权利间的类似冲突也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所有人的平等权利都不受政府控制,而且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去有效地参与政府管理——这样的权利是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平等所具有的独立且重要的方面。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这样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在没有实现集体所有制——它受由劳动者建立的国家的支配(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力量就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最终控制有效的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然而,要求国家不进行干预,这种要求并没有在总体上误导人们,它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个性与独立性才是人们的真正需要。<sup>①</sup>

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所有权利冲突一样,对多数接受干预自由资本主义的人而言,类似的冲突也会发生,即使他们抵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也必须在参与权和不干涉权之间做出权衡。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既希望不处于从属地位又希望不受干预,而唯一合理地保证这两项权利的办法就是将这两者看作是工具,并且找到最能提高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制度与策略。

多数冲突反映了以权利为基础的平等标准之间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分歧。一方面,人们有权平等分配利益、权力和基本社会安排中的负担——这些负担控制着他们的生活,并且他们如果想要全部避免这些负担,就必须以巨额花费为代价。在经济上,对合作的平等条件的要求,导致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标准;在政治上,这种经济要求导致了对平等地影响政治进程的要求。另一方面,人们拥有和平地追求他们的利益的独立权利而不受干涉。这意味着在经济

<sup>①</sup> 参见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1页。

领域中的投资、保留和遗赠的权利,以及在政治领域中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权利。在人们相互依赖着进行生产的现代系统中,权利的这两个维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仍将社会选择建立在权利之上,并且否认这两个维度具有本质上的优越性(马克思的论证并不意在说服那些不计后果地赞同不干涉权的人)。存在于不干涉和公平的合作条件之间的这种冲突,为人们提出下述假设提供了普遍的但却是非决定性的理由:以权利为基础的平等产生的冲突,只能由无权利的选择基础来解决。马克思的具体且明确的论证继续说明了每个权利都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些论证意在说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提出的权利,即使在没有遭遇到与其相反的、并且同样基本的权利的情况下,也不能解决冲突。尽管历经数世纪的努力,这个普遍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哪怕是大概的解决,这就使得该问题成了一个好的赌注,直到马克思的时代也没有得到解决。

对马克思抨击道德的现代评价,必须是时代错置的,并且要考虑到20世纪人们解决这个普遍问题的种种尝试。我仅提出这个深远评价的一个方面。罗尔斯的正义论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揭示人们对于平等的一个最重要的看法,即平等可以用来选择基本制度。但是,如果我正确地提出了关于权利的问题,那么在没有回避问题实质的情况下,罗尔斯的理论就似乎过于偏激地对待了权利的一个维度,以至于无法解决问题。

在罗尔斯看来,我们拥有受某些原则支配的基本的平等权,在我们对基本制度的评价原则进行公平的考虑之后,我们会选择这些支配性原则。要使这种评价合理,考虑者就一定不能使用他们有关现实社会状况的知识。如果人们知道了实际资源,那么结果可能会反映出一些人的强制能力。甚至让考虑者知道他们的才能,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基本制度选择的规则,而基本制度将决定什么样的能力是才能,即有价值的才能。公平的考虑被证明是在“无知之幕”下发生的,如同一个人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优势或生活计划的情况下追求私利那样。人们偏爱与这种推理结果相

矛盾的权利标准,就是以不公平的方式选择了原则。人们既然要求实现正义,要求应该按照相应的权重给予所有人权利,那么他们就应该理性地抵制相互矛盾的标准。同样,一个人采用这种“原初状态”作为有利的选择图景,反映了这个人想要自治的愿望,即是说,希望人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没有被那些构成基本制度结构的偏见所束缚,希望人能做出自己最基本的道德选择而不受由偶然环境形成的偏好的限制。<sup>①</sup>

事实上,受原初状态中出现的原则支配的制度,可能违背了独立有效的平等权利标准,并产生了许多冲突,而罗尔斯的选择程序不能以一种逃避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即使原初状态确实是人们考虑制度时的唯一公平的基础,那么情况也还是如此。假设大多数人都同意:罗尔斯的经济原则比洛克的经济原则在分配平等方面存在更大的偏见,“将他或她诚实苦干和交换的结果给予每个人”。(如果这不是事实,那么受原初状态支配的权利将会用某些相对平均主义的原则来代替冲突,比如“根据他或她的劳动时间给予每个人”的原则来代替冲突。类似的问题也将会产生。)诚实的、非暴力的、怀有资本主义偏好的人们,即潜在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的人们,将会被拒绝使用由自我牺牲换得的所有成果去建立、发展工厂和农场。当他们抱怨对诚实苦干的劳动成果享有的平等权利受到侵犯时,没有答案能够告诉他们,为了公平考虑他们必须接受相关的限制。当然,他们实际上并不同意这些限制。罗尔斯的合同纯属假设。而且,诚实苦干原则从假设的公平考虑中获得了它的全部道德力量,这不是事实。通过思考实验,我们甚至能够想象:人们公平选出的原则通过违背诚实苦干原则,会导致如此多的对不公平现象的合理指责,以至于人们设立这些原则是不道德的。假设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根据人们公平选出的原则来确定的,然而大多数人却想

<sup>①</sup> 尤其要参见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剑桥,马萨诸塞州,1971年(中文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3、40节;以及《主体的基本结构》,载于《美国哲学季刊》,1977年第14期,第159—166页。

建立小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他们选择的形势——在考虑了对他们的技术知识、财富或特殊偏好不能心存指望时做出的——阻碍了他们这样做。这里,伤害普遍存在,以至于公平选择的社会安排变得普遍不公平了。

人们抱怨不公平的条件限制,对这些抱怨的相关反应是:在公平考虑中出现的受规则支配的权利,比诚实苦干的所得权具有更多的道德意义,至少当这些原则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时是这样。但是在何种尺度上来衡量那些权利?现在好像还没有更高的平等权利标准适合于这种平衡。毫无疑问,根据下述判断——当合作不可避免且赌注巨大时,人们有权在公平条件下合作——人们会更加偏爱由公平考虑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一判断与下述判断一样都不是明显的、基础性的判断:如果不打扰别人的话,人们有权对自身的能动性放任自然。而且,这种道德倾向有利于诚实苦干的所得权。当原初状态被用于回答关于竞争力的基本问题时,同样的问题似乎在更高的水平上被提出。至于对自治的诉求,原初状态也许最能满足罗尔斯描述的自治目标,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这样的目标。自治的一种情形是无干扰地追求一个人的任何愿望的自由。自治的这个维度必定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诚实苦干原则也最适合它。<sup>①</sup>

## 一个关于马克思和权利的错误

尽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抨击了对平等权利的诉求,但许多像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一样意见不同的读者,仅仅依靠这些根据就用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谴责资本主义。人们要忍受的资本主义是,典型的工作日必须有“无报酬”部分,“无报酬”即是指:挣工资的人在生

---

<sup>①</sup> 当然,对罗尔斯理论的有效批评必须要更加详细。我在《权利或结果》这篇文章中深化了这一描述,并且在《权利和真实》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其他的批评(载于《哲学评论》,1981年,第90页)——当前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想在尊重权利的基础上解决利益冲突。

产出与他的工资可以购买到的等价值的商品后还要继续生产。但是,马克思断言的论据推论出:“无报酬”意味着资本主义违背了平等交换的最重要原则,用来交换的商品应该等值。或者无论怎样,那些受交换统治其生活的人们,不应在一个框架中讨价还价——在这个框架中他们的一个重要商品尤其要低于其价值才能被交换。这对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在许多段落中讨论这一论点,因为它在那些将“用公平的日工资换取公平的日工作”作为工人运动的核心要求的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通常反对这一观点。有效的平等原则没有必要在典型的工资交易中被违反。对这些文本的充分研究,将再现具有决定性的文本事实——这些事实已经由艾伦·伍德(Allen Wood)在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中完成。<sup>①</sup> 我将专注于少数文本,这些文本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否定典型的工资交易是不公平的,这种否定并不仅仅是马克思的突发奇想,或是他对某种政治倾向的反感表达。马克思提出了具有竞争力的论据,这些论据以常识和他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方面为基础。讽刺的是,我在下一章对马克思原理的解读,将破坏伍德本人对这些段落的使用——伍德在对马克思的道德解释中使用这些段落。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不正义的。其理由之一是:拥护平等的人们在判断交换是否过于不平等以至于不正义时要含蓄地使用一些原则,而根据这些原则,剩余价值的产生不是不正义的。

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

---

<sup>①</sup> 他的文章《马克思的权力正义观》(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众事务》,1979年第8期),现载于《马克思、正义和历史》(M. Cohen等人编辑),普林斯顿,1980。这篇文章表达得特别简洁且引人入胜。

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当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sup>①</sup>

这是一个卓越的且有效的普通语言哲学。没有人会认为:如果租用的马创造的利润带来了丰收,并超过了租用这匹马所花费的租金,那么租用马的人是在不公正地获利。剩余仅仅说明了劳动力的购买者不是傻子,也不是不走运。那么为什么作为工资交易结果的剩余生产,能够说明购买者违背了平等权利呢?

马克思的另一个论证依靠他的部分经济理论,即劳动价值论,无论这个理论是利是弊,马克思始终明确而深刻地致力于此理论。根据能够用来判定经济学科学的目的合法性的价值尺度,同等价值的商品在典型的可以带来剩余生产的工资交易中被交换。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第219页。

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sup>①</sup>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更鲜明地表达了同一个观点，同样用马来说明。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一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sup>②</sup>

总之，如果工资体现或支配了用以维持所谈到的那个时期的工人生活的社会劳动，那么工资交易就是平等交换。而且马克思努力说明了这个劳动量将典型地少于在工资交易下消耗的劳动量。

马克思肯定认为，依靠导致剩余价值的工资交易进行生产的任何系统都将最终产生出普遍的奴役和苦难。这是他反对所有这种经济系统的原因。这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控诉，因为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系统本该是由于它破坏了平等交换的权利而被指控的。

30

## 平等关心

分配的平等和以权利为基础的平等无法实现，似乎都是由于它们刻板地依赖于抽象原则，而不是由于它们凝结了情感。平等和道德最终停留在对所有人都平等关心和尊重的人道主义情感上。

马克思通过将这种真诚的平等与在阶级社会中进行有效变革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3—194页。

<sup>②</sup>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8页。



所需要的态度进行对比,来批判这种真诚的平等。“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比如德国在19世纪40年代以此名义发起的运动]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sup>①</sup>考虑到马克思的社会现实观,这种对比是心理学常识。比如提高劳动阶级地位的奋起罢工损害了工厂主的重要利益,并且可能使一些人破产。然而,如同马克思常强调的那样,这些工厂主中的许多人本身是正派的。受到奋起罢工者们攻击的警察也是如此,有时他们受到的攻击相当猛烈。在马克思认为的社会变革之关键的敌我对决中,奋起罢工是最轻微的一种方式。让尖锐的敌我对决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要求罢工者立足于对所有人都平等关心的情感,这样做要么是伪善的,要么是自我欺骗的。除非人们提出的平等关心就是尊重分配、权利与公正原则,否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那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刻板而抽象的平等原则的混乱王国之中了。

这种对人道主义观点的普遍批判,关键要依靠马克思提议的具体变革策略。投票选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或讨论它们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些都是人道主义情感认可的行为。但是如果人道主义平等是不充分的,那么这是因为道德应该指导那些能够实现道德理想的行为。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可详细看到的那样,马克思认为,完全关注于投票和规劝的策略对他所提议的具体变革策略思想来说是缺乏这种有效性的。无论是此处还是在其他地方,马克思抽象的理论观点必须在他实践政治承诺的前后联系中来加以理解。

## 功利主义

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在原则上被功利主义加

<sup>①</sup>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7页。

以说明。在功利主义那里,只有一种平等是基础性的。普遍的幸福只有在对部分人的幸福毫无偏见的情况下才能确定下来。但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普遍幸福毫无偏见的决定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将普遍的幸福看作是一些组成幸福的同质材料,且其价值与其程度和广度相应,那么我们就“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sup>①</sup>。一个由疯狂自大的店主组成的社会,每个人在击败他人的日常胜利中感到极大的快乐,但也不因日常的失败而变得垂头丧气,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与由希望彼此过得好并能享受互相关心行为的人组成的社会相比,并不让人渴望。然而在这两种社会中,原则上人们可能“运用”他们的关系去制造同等数量的快乐。一些关系、行为和体验比另一些强烈且普遍的快乐更能得到发扬。同样,对强烈而普遍的标准的采用并没有真正地包含中立标准。只关心幸福的程度和普遍性,这样充其量是采用了一种相当明确的且异质的福利概念。当许多人(可能是所有人)拒绝将所有关系合并为一种关系——利用他人达到一个人快乐——并且理性地反思一个人可能会喜欢各种不同的关系时,这个概念会被他们拒绝。

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标准必须能够区分同等程度的快乐的不同情形。然而,我们无法毫无社会偏见地对此做出必要的辨别。所有重要福祉的分类,比如包括:空闲还是物质收入、享受竞争还是享受合作、把握在上流社会占有一席之地的机会还是保证过无虑的适度的舒适生活,这些都不能忠实于所有人的需要或者理性的欲望——这些人包括工业工人、农民、投资银行行长、家庭主妇、店主、教授等。如果我们要寻求一种按其相应数据所有人都可接受的等级分类的话,那么我们是在追求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我们采用了由那些实际上已经尝试过所有快乐的人做出的分类,那么我们就对那些能够鉴定此分类的上层人士存有偏见。简言之,穆勒建议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79页。

依靠那些经历过在讨论中提到的种种体验的专家来公平地衡量不同体验,这个建议要么是有偏见的,要么是无效的。

这些在社会定位与心理结构之间的混乱联系,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攻击功利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一攻击是重要的,但却被人们忽视了:

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至于他们享乐的方式和内容始终是由社会的整个制度决定的,而且要受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影响,则已经不用说了;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资产阶级却把这些话普遍化了,并且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每一个人,于是资产阶级使享乐理论脱离了个人的生活条件……每一个时代的个人的享乐同阶级关系以及产生这些关系的、这些个人所处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的联系,迄今为止还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内容脱离的并且和这种内容相矛盾的享乐形式的局限性,任何一种享乐哲学同呈现于它之前的现实的享乐形式的联系,这种不加区别地面向一切个人的哲学的虚伪性,——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只有在可能对现存制度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进行批判的时候,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才能被揭露。这就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还是享乐主义道德,宣判死刑。<sup>①</sup>

后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边沁的犀利短评中再次指责功利主义忽略了社会进程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影响。马克思谈到的部分内容如下: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9—490页。

……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的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sup>①</sup>

最后,马克思在其晚年,在他关于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笔记中重申了人类需求的社会相对性:

“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sup>②</sup>

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的理论发展与更大的争论有关。现代经济学提出了普遍福利的构想——它依赖于对个人偏好的排列。实际上,古典功利主义的经验总结被理想的投票方案所取代。然而,经

34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注释(63)。

<sup>②</sup> 马克思的粗体部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4页。一些其他文章断言了社会需求的相对性,这些文章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页;《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以及《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页。

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远不如边沁或穆勒的理论更适合于选择基本制度。即使某个人被剥夺的程度可能会合理地影响到我们对其社会中不平等社会安排的评价,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强度对比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即使基本制度本身在决定偏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幸福多寡的偏好集合也不受批判的支配。最后,根据阿罗(Arrow)的著名理论,与传统的选择不同,偏好功利主义被证明缺少了精确性和普遍性这两个最吸引人的优点,而这两个优点恰好是使偏好功利主义具有吸引力的首要优点。

相矛盾的福祉划分不可能通过有效而公正的方法得到调解,但它在基本制度的选择中又极其重要。比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为每一个人提供他或她想要的任何教育或工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选择常受财政或家庭背景的限制。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实际主张,那么他们将更愿意在社会主义框架里解决这些选择问题。但是并非每个明智的人都会这样做。由于某些自身和他人的缘故,一些人执著于即使资源的匮乏常使前景暗淡,他们也要努力改善个人生活并且不会受到直接的干预。同样,马克思无阶级的社会制度对纯粹私利的竞争几乎不留余地。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行为是一件重要的积极的好事。当然,马克思不希望任何人拖延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进程,直到没有人再有这种个人主义的想法为止。如果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这个否定的力量将与关心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对立。此外,不同的幸福观一定是协调一致的。

35 如果不同福祉之间的差别特别大,那么就不存在可行的折中办法,因为可行的经济系统要么违背善的一种概念,要么违背善的另一种概念。大多数人的偏好可以通过马克思所赞同的社会安排而得到满足,但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原则上极度贫困的少数人不会考虑大多数人的满足感的。我们必须衡量不同的幸福观从而将辩论者分类。而且在这里,根据马克思在引文中所描述的原因,似乎也没有任何平等的标准是可行的。边沁的标准是片面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不合理。穆勒的程序不能将正义实施于“任何特定

时期的个人享受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阶级关系之间的联系”(这里,像在别处一样,几乎所有那些反对马克思具体社会目标的人都将发现:当他们在自由资本主义和带有更多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自身的观点也会受到类似冲突的影响)。

一般说来,当我们考虑实际的背景、寻求变革社会的手段时,马克思的理论批判就获得了其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逐渐通往社会主义的斗争通常是危险的和不确定的。它们有时失败,甚至使情况更糟。一个参与这项运动的人能够理性地相信,如果运动成功,那么它将极大地改善这个世界。因此,当所有事实被证实时,即使善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差别不足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偏好,那么这些差别也将影响到人们对为社会主义而战的理性选择,影响到人们对进入一个不确定且危险的世界中的理性选择。

## 一位功利主义的马克思

尽管马克思有着明确的反对功利主义的许多段落,但是近年来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无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德雷克·艾伦(Derek Allen)是持这种观点的最博学的且最不遗余力的代表。德雷克·艾伦写到:“支持他们的[即马克思的和恩格斯的]道德判断的论据是,除了名字以外的彻底的功利主义者。”<sup>①</sup>这种功利主义之所以由人们的偏好选择构成,其唯一原因在于这些偏好选择能够满足人们的利益——这些偏好选择是指如果人们被充分地告知,那么他们将会产生的选择愿望。

艾伦对功利主义马克思的理解依据两个主要主张。我认为尽管第一个主张并不依赖于艾伦的理由,但它是对的。艾伦认为,马克思主张“将一切利益,无论是谁的利益,都看做是值得满足的最基

36

<sup>①</sup> 德里克·艾伦(Derek Alle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载于《美国哲学季刊》,1973年第10期,第189页。

本的利益(Prima facie)”<sup>①</sup>。艾伦的论据由一些例证构成——在这些例证中,马克思支持的政策既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又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比如,废除高额的英国谷物关税。但是这一点与功利主义的核心观点相比,似乎是认为一个人应该接受下述事实,即,某人的利益是这个人做出选择的一个内在原因。一个非功利主义者可能不关心资本家们的利益满足,但却选择了使资本家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政策,而这一选择只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满足。毕竟,当农民们用有营养的食物喂绵羊以便得到更多的蹄肉时,他们不能说明人们对绵羊的利益的内在关心。

再举一个合理的例子:马克思确实把满足任何人的利益作为最基本的利益,而不在乎他或她碰巧所处的阶级。在马克思关于印度的著作中,他谴责殖民者对非无产阶级殖民的伤害是“野蛮的”、“残忍的”、“深深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sup>②</sup>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满足比资本主义更多人的利益: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③</sup>

在马克思与他最好的朋友——身为纺织品制造商的恩格斯——的交流中,他赋予了由资本家拥有的福利以相当大的权重。从这些情况中,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在马克思看来,对任何人的利益、利益本身以及最基本的利益进行阻挠的行为都会使世界变得更糟。

<sup>①</sup> 德里克·艾伦(Derek Alle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载于《美国哲学季刊》,1973年第10期,第189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页、第30页、第80页。

<sup>③</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但是,所有这一切依然与功利主义相距甚远。功利主义者们忠实于对平等前提的一种说明,即“赋予每个人的利益以同等的权重”;而不仅仅忠实于相对薄弱的原则——使每个人的满足成为某种最基本的利益。更精确地说,在毫无偏见地对待某些人的愿望或者对待具有某种内在满足性质的愿望的情况下,功利主义者们想权衡愿望的满足度。这就是穆勒在应对挑战时,即穆勒被要求说明某种“快乐品质”具有的更大权重时,他会感到困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极力证明他的权衡程序是唯一明智的正统程序,但却与预先的价值承诺差距很大的原因。“……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白痴。如果说傻子或者猪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事物摆在他们眼前的一面,而上述比喻中的另一方看到的是则是事物的两面。”<sup>①</sup>再者,韦伯举出的民族主义例子相比之下使平等的作用更加鲜明。韦伯证实了:人们反对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这个政策阻碍了法国人和俄国人获得满足。但是在韦伯的个人价值系统中,尽管法国人的愿望被同样深切地感受着而且也不损害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但是满足德国人成为世界权力公民的愿望要比满足法国人的不一致的愿望更重要。这肯定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观点。

艾伦案例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必要的,就像他当时一定意识到的那样。他宣称:当马克思赋予某些需要和生活方式的权重多于其他方面时,“总体上马克思似乎在推理”,马克思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将某种需要和生产方式置于更高的等级,而仅仅因为如果人们被充分地告知的话,那么他们将喜欢这样做。这里,任何一个问题都是“他分享……功利主义”的基础,而不是他拒绝功利主义的基础。<sup>②</sup>这就是我所否定的。

艾伦无法举例说明,马克思证明了运用他本人所描述的穆勒方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功利主义》,印第安那波利斯,1971(中文版:叶建新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② 艾伦(Alle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第199页。



式来划分一种愿望是正确的。当然,马克思从未说过这样离谱的事情。艾伦进行这种推理的摘要如下:“如果事实上人们喜欢闲散而不喜欢教育,那么这种闲散就是‘更高级的行为’。”<sup>①</sup>与认可这种衡量满足度的功利主义方法相去甚远的是,马克思强调需求的差异性和社会的决定性。并且,在前文引用的两个长篇段落中,马克思强烈地谴责功利主义忽视了这些事实。<sup>②</sup>《资本论》中的一段以称杰里米·边沁为“一个阻碍资产阶级愚蠢行为的天才”结尾。请注意,问题既不在于马克思认为某个人被迫受到“再教育”以适应更高的目标是件好事,也不在于马克思认为强迫某个人走比他想选择的人生道路更高级的道路在本质上是件好事。<sup>③</sup>马克思极力强调要实现自由发展而不要像上述情况那样发展。<sup>④</sup>但是马克思指出不同的人具有相互矛盾的需求——至少这些需求中的一部分在有利他人时,必须通过所有可行的社会安排被忽略掉。我们在社会安排中的偏好必须是需求中的偏好,而且不能以穆勒的方式取消偏见。这是对些段落的合理重构。

如果艾伦要说明,当马克思看上去把对需求差异性的忽略当作功利主义的致命问题时,马克思的本意并非如此,那么艾伦需要找到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根深蒂固的相反的方面。艾伦的著作包括一个这样的主张,它是对我所提到的马克思观点的重大背离:“但是,它可能会更多地被反对,多数人……并非每个人……穆勒和边沁提倡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不只是多数人的幸福。但这种反对既不能实现……马克思坚持‘普遍的人类解放’——资产阶级和无产

① 艾伦(Allen):《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第199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69页;《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

③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第198页。

④ 参见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262页。

阶级一样的解放——在废除私有财产中身处险境。”<sup>①</sup>如果每个人真正地受益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那么我就错误地把下述观点归于马克思:我们需要辨别人们的不同幸福观,并以此来决定基本社会选择。马克思把满足这样的人类利益作为己任,他把他的例证建立在被资本主义反对、但却被社会主义满足的利益之上;他将他的例证看做是没有必要在实际的社会选择中,凌驾于他人之上来实现一些类型的满足。因为每个人都会通过社会主义获得更多的幸福;或者,如果每个人的偏好都以充分的思考和信息为基础,那么这种更多的幸福将会实现。只有在真实世界中将道德视为指导行为的手段 of 马克思,才可能会选择功利主义。

艾伦引用的两个段落不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关于“普遍人类解放”的评论出自 1844 年的手稿,并且由马克思直接注释如下:“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sup>②</sup>所以马克思不认为:最贪婪的和渴望权力的曼彻斯特工厂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会更幸福,如果他们被充分地告知的话。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地位概括了所有奴役状态,而且共产主义社会要尽可能终结这种奴役和统治,包括终结被工厂主完全享受甚至是需要的统治。《资本论》中的另一篇文章只说了“反对……以统治生产者来取代被生产者统治”。毫无疑问,工厂主希望他能控制市场力量,诸如此类。总的说来,这不意味着工厂主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会更幸福。

另一方面,有哪些文本提出:当社会变革按照马克思赞同的策略发生时,一些人的根深蒂固且急切的需求会被侵犯?除了对心理学和我所引用的功利主义的普遍思考之外,决定性的思考在于对改变政治基础的陈述。利益冲突是如此深刻,以至于革命必将普遍地带来社会主义。“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利主义》,第 194 页。

②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2—63 页。

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sup>①</sup>这并不是某个人的陈述:所有对社会主义的抵抗都是因为错误信息。抛开革命的变革观不谈,马克思对根本矛盾的强调,出现在主张国家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的声明之中,“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②</sup>在马克思的信中,他指出这篇论文是对社会理论三个独特贡献之一,<sup>③</sup>而且这样一个国家必然关注“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sup>④</sup>。但马克思根本没有说清楚用高压政治的何种形式刚好可以支持阶级独裁的言论。当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点补充了具体说明时,其结论总是不尽如人意。但是一般的、非具体的陈述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是重要的。这些陈述肯定不能由持有下述观点的某个人提出,即认为没有任何人的利益能被社会主义深深地并且从整体上侵犯。在马克思的核心政治思想中,他不是艾伦论证所需要的那种普遍解放的信仰者。

我只是把一个争论与其他争论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将其与马克思学识中已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尽管有引用的陈述,但许多解释者还是认为马克思或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不是真的相信普遍而正常的革命必然性,而且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是纯粹的夸张。我将在第三章详细地讨论非革命的解释。至于现在,我希望已经说明:变革政治就像马克思构思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传统论题存在着策略上的异议——对马克思关于道德观的似乎完全抽象的评价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艾伦不主张资产阶级受益于社会主义,那么他将毫无偏见地为马克思攻击功利主义而辩护。但是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②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马克思的粗体部分。

③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J. Weydemeyer)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④ 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致斐·多·纽文胡斯(F. Domela-Nieuwenhuis)的信,出处同上,第643页。

艾伦将马克思的目标描述为世界性的,在这个非常强大的意义上,这种描述意味着他为马克思的文本段落辩解,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肯定革命的普遍必然性。我要加紧补充的是:即使马克思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也可能充分地质疑社会主义将会有利于每个人。多数非革命者怀疑这一点,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同马克思一样敏锐地知道需求的社会决定性。

## 普 遍 性

在平等之后,道德的第二个典型特征是作为道德基础的准则的普遍性。我们通过将现有规则运用于特殊事实——在道德诉求能够有理有据的任何时候,这些规则都是有效的——能够评价任何社会安排。至少,无论在紧急情况下出现什么样的困境,关于稳定的社会特征的主要问题都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解决。

但是,马克思也承认,应用于相关事实的普遍准则并不能评估所有社会,其基本理由是,人们现在所追求的福祉与过去社会中的福祉明显存在着深刻而又不可调和的冲突。马克思以古代雅典作为这一冲突的范例。他说,在希腊,“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sup>①</sup>。在这种免除背后存在着一个现实。古希腊的技术能力使文化发展立足于一些以奴役他人为基础的闲暇。在这里,处于竞争中的福祉是如此的重要且不同,以至于不存在任何能够决定希腊制度是否可取的原则。历史进程解决了这种困境,而不是道德推理解决了这种困境;人类力量的发展依赖于服从、乏味和暴力。“‘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8页。

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sup>①</sup>在马克思对善的构思中,社会生活的整体提高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评价以往社会的一种标准。马克思从不认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即古希腊成为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商品的奴隶社会,与它仍旧延续以自给型农业为基础的村落社会相比是否会更好。用来指导现在或指导将来的准则不适合用来判断过去。而马克思的非道德主张“只不过是指引了现在和未来。

因为缺乏一般准则,马克思在政治制度上的观点存在着一个与道德理论不同的逻辑结构,至少像哲学家们通常构思的那样。当根据事实应用道德理论时,道德理论能够提供许多准则,这些准则可以产生一系列的其他制度。这些准则的有效性不能依靠那些处于极大争论中的经验要求。相比之下,对制度的实际提议在道德理论中可能是尝试性的,也可能是遗漏的。因为这些提议依靠关于事实的承诺,而这些承诺在经验上是有争议的。因此对功利主义来说,只要能扩大普遍福利,就是最好的。但是他或她可能宣称自己不知道什么可以真正地扩大福利。关于制度和策略的实际问题如果不是全部属于道德理论之外的某个领域,那么也是大部分属于这些领域——在政治、社会理论或社会工程学领域中。

马克思用各式各样的福祉代替了普遍准则。这些福祉不能保证会制造出一系列主要的制度选择。实际上它们不能保证会制造出大量的制度选择。追求被推荐的福祉是当前的一致目标——这是一个存在经验主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没有一个主要原则可以区别基本原则的正当性和政治程序的正当性。因为福祉为现在提供了一种内在一致并且可行的选择标准,这是一种经验论的观点,它证明了人们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追求是获得这些福祉的最佳方式。

这些与传统道德理论不同的逻辑差异,类似于科学理论,就像

<sup>①</sup>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财富”在这里显然是指真正有利的资源。

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理解的那样。一个科学理论因为它在许多不同范围内的成功运用而被选择,比如完全符合数据、不存在解释的不稳定结果、宽泛的范围和富有成效。这种混杂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一个理论可能在一些范围内是卓越的,但在另一些范围内是落后的。根据其他被权衡的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似乎不存在最权威的科学目标,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理论以及这个理论的论敌理论和数据时,我们总是在说这个理论是否最好。人们争论一个理论现在能被证实或不能被证实,这是一种经验主义争论,它要求真实的数据形式、过去的争论以及现在的背景理论。相比之下,传统的道德理论像传统的归纳逻辑一样,它试图在普遍的和推理的基础上证明下述准则是正确的,即每一种假设都能至少大体上确证给定的任一组数据。

## 普遍理性

典型的道德的第三个特征是一种认识论的平等。道德准则应该被任何一个能够理性地思考适当的争论、接受相应的实际要求,并且拥有正常的道德情感的人接受。

我已经提到了马克思反对这种普遍性要求的一个原因。不同的人将不同的重点与处于竞争中的福祉联系起来,因为这对他们自己和别人都是重要的——比如说,要求努力竞争而反对合作,要求物质收益而反对闲暇。制度不能在这些竞争中保持中立,每个人都不能通过理性的劝告而达成一致。<sup>①</sup>

此外,马克思一定对存在历史差异的事实印象深刻。他强调,在古希腊和罗马,每个人都认为奴隶使一个正常家庭运行。在中世纪的欧洲,每个人赋予惯例约束和血族关系义务以巨大的道德权重,远远多于今天的情况。所有聪明的、正常的、知道相关事实与争

<sup>①</sup> 比较:罗尔斯在《公平到美德》中评价了能够解决这种差异的说服力,载于《哲学评论》,1975年,第84页。

论的现代人,在他们各自的背景中都承认较早的规则在道德上是有效的——这一点完全不是真实的。无知或非理性是较陈旧的观点的基础,这也是不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如果意识到某种事实或争论不适合用来让我们理解他及他的同时代人,那么他将改变对奴隶制的看法。<sup>①</sup>

马克思就如我解释的那样是一个绝对的非认知主义者,即他认为社会选择的不同核心问题是不能通过原因和证据来解决的。而且理性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判断能受到这种非认知主义的影响,这是一个公开的问题。上述论证驳斥了某些重要判断中的普遍理性,这些论证不依赖于在道德演说和事实陈述之间的任何所谓的普遍区别。可能会存在许多需求和思考的愿望——这些愿望是所有拥有正常情感能力的理性的人都具有的。而相应的福祉和对这些福祉的需求将指导某些社会选择,这些选择也许会在一个现代生产背景中拒绝奴隶制。这些社会选择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下述各种情况:哪个社会选择是可行的,可行的选择结果是什么,被充分反映的需求与愿望的普及率有多大。在这个最后的范畴中,比如1844年手稿劝告许多读者: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而被人们选择的具有高普及率的不同工作,是由急迫的、普遍具有的需求决定的。

45

然而,在某种情况下马克思要求承诺是非理性的。如果他不要求这一点,那么他对道德的攻击将是完全不公平的。因为,他反驳功利主义要依赖于下述观点:他否认对目标的异议总是可以通过理性手段来解决。

马克思的非认知主义没有阻碍他不断地去论证政治选择的合理性。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他的观点不是面向普遍的听众,虽然表面上是如此。实际上,马克思的观点依托于一种期望,即他希望他的预期读者能通过最初观点和反思的愿望被他所提出的事实说服。那些依赖于某种空洞基础而献身公众事务的人会对自己提出

<sup>①</sup> 参见 M. I. 芬利(M. I. Finely):《希腊文明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吗?》,载于《古希腊经济与社会》(首次发表于1959年),纽约,1982。

疑问:是否确实过多依赖于现实的政治争论。事实上,为了在我们现时代从事政治的(或科学的)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诉诸更大的共同信仰和态度背景,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分享这一背景。有时我们会很惊讶。(在一个对战争的讨论中,有人曾显然真诚地告诉我,他认为在无知的人们之间的战争中死亡不是坏事。)尽管如此,惊讶是罕见的或不足以为我们的期待提供一个合理的讨论依据。马克思只是说这种期望在原则上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合理劝说的基础——它不仅仅在实践中是必然的,就像每个人允许的那样。

## 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陈述道德像宗教一样是意识形态时,有时会概括他对道德的拒绝。<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信仰和态度系统,它歪曲现实并由社会力量和阶级社会具有的特征产生,而不是根据现实提出的思想观念。

即便承认马克思用这种方式分析道德观念的起源,人们也没把握说清楚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是用什么理论补充了他对道德的批判。首先,“意识形态”的标签就预示了被研究过的论证——在这些论证中道德因为具有理智缺陷而遭到批判。意识形态是错误的意识。马克思的元伦理学与他的经济理论差不多,在元伦理学中论证观念系统就是意识形态,就必须论证这个观念系统是无效的。由此,这些论证才能独立于人们对社会起源的历史检验。

马克思将意识形态定义为歪曲事实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我只是做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声明,对它的辩护多少会偏离主题。意识形态歪曲现实,这一点在恩格斯的晚期著作中大致是清楚的。<sup>②</sup> 但

<sup>①</sup> 参见,例如,《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293页;《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sup>②</sup> 参见,例如,致施米特的信和致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714页、第726—728页。



是它在马克思的讨论中是不清楚的。尽管如此,我所描述的意识形态观最能说明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时的普遍特征。马克思常追溯观念和观点的社会起源。他有时将它们看作是歪曲的,有时却看作是有效的。举例来说,在《宣言》和《资本论》中,对无产阶级如何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解释属于后一种情况。然而马克思只在他认为是歪曲的观念和观点中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而且他常将这种用法与明显的贬义语言结合在一起。此外,通过使意识形态标志更具有倾向性,我们能够解释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普遍陈述中往往徘徊于不同的重点内容之间。有时他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稳定作用,有时他强调意识形态中的人们不知道他们的观念来自哪里的事实,有时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具体倾向是由观念在历史中的极端独立作用造成的。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节中,他就分别徘徊于第 52 页及其随后篇幅中的粗体部分、第 29 页中的粗体部分、第 55 页及其随后篇幅中的粗体部分。这些徘徊是人们所期望的,如果正如我建议的那样,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理论设计,它常用来回答一个紧迫的历史问题,“当有效的数据、合理的推论和科学的声明没有指导人们犯相应的错误时,为什么这么多的社会重要观念会歪曲现实?”那么每个重点内容都强调了阶级统治倾向的一个方面,因此就产生出意识形态的错误观念。

47

如果对道德是意识形态的指责具有我所描述的力量,那么问题就在于这种指责是否对道德批判进行了补充——这一批判没有被包含在我刚刚提到的更多的内部论证中。需要注意的是,对这个问题的甚至更为紧迫的说明,是由与歪曲事实毫无内在联系的解释提出的:认为道德是意识形态的主张,作为一种无效的社会选择立场,与道德批判有根本联系吗?

除了这些与攻击道德有关的问题之外,马克思对道德观念的社会起源的实际历史讨论本身是支离破碎的。分散的评论是引人入胜的。在马克思看来,平等、自由、正义和他所批判的普遍福利,这

些现代观念都是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束缚而得到的部分文化遗产。<sup>①</sup>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现代观念是一种在中产阶级背景下产生的痴心妄想的结果;它们是对在个人竞争系统中解决由大商业统治带来的负担的错误希望。<sup>②</sup>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现代观念产生于资产阶级媒体对限制和制止社会不满情绪的倾向性,比如说,通过把由雇主制定的公平待遇当作是工人行动的唯一适当目标,或者通过限制政府满足人民平等权利的适当作用。设想,比如传统保守势力通过将社会需求局限于行使权利来限制社会需求,如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最近的评论中所说的:“人们不明白的是有许多东西想要但却没有权利获得。”对马克思而言,这种评论仅仅揭示了权利没有许多假说重要。对于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来说,斯托克曼的评论强加了一个真正的论证负担。<sup>③</sup> 这些关于社会起源的推测与关于现代道德观念的所有当前假说一样令人信服。但是尽管如此,它们仍是不完整的推测。

由于马克思论题的有限作用和推测性身份,其独特的因果关系方面——道德是意识形态——对他反对道德有帮助吗?我认为是有帮助的。意识形态问题由于以另外一种方式解释了政治学中的道德观点对我们的诱惑,因而破坏了将这些诱惑作为论据的用法。

虽然许多人被理智地吸引到前文勾勒的反道德论证中,但是他们仍不情愿去欣然接受这些结论。我自己也感觉如此。这种感觉与决定是否接受马克思的反道德论无关。毕竟,一个人可能会发现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7—78页;《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197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及后面的内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1—202页。

③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强调对正义的要求常常预设了基本的社会关系,而他要求对这些社会关系进行重新调整:“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马克思的粗体部分。

社会选择应以平等关心所有人为基础,这一点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以至于马克思的论证仅仅使这个人确信:作为平等关心的充分抽象且灵活的基础还没有被描述出来。但是这个人可能会觉得一定存在某种这样的标准。而且人们对明晰性和难以置信性的感觉、对吸引与排斥的感觉在成为论据之前都需要被解释,包括因果关系解释。假设有一些至关重要的感觉认为所有人的利益都应被平等对待,这些感觉由某种文化背景产生,这种文化背景是最终根据资产阶级制服社会不满情绪的需要而形成的;这些感觉由个人缺乏对艰难社会现实的揭露产生;那么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些感觉,它们就不应该引导一个人去对抗马克思反道德的有力论证。而且,马克思主义解释至少与认为这些感觉以正确的道德感为基础的主张一样论据充分。通过分析这些感觉的来源,马克思使人们对道德情感的求助变得缺少竞争力,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方法非常一致。弗洛伊德根据人在童年时期的独立和恐惧,以及在较早的幼儿时期感觉到的自我与世界的统一,提出了对宗教情感起源的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破坏了人们对宗教情感的依赖。

49

从感受的起源到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的论证是一个谬误,这个谬误如此庞大,以至于它被称为“遗传的谬误”。让人产生谬误的地方是如下假设:仅仅通过将观念的来源追溯到社会利益来揭示这些观念。这种假设对于道德观念来说尤其令人难以置信。比如,要款待陌生人的强烈责任被传统的爱斯基摩人接受,因为半游牧社会中这种款待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这样的社会里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在与自然的持续战争中被打倒。这种解释不但不能指出谬误,反倒证明了假设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某些理由仍不适用于某些信仰,以至于如果在最后的分析中发现这种信仰是由于这种理由,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这种信仰。历史上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以及受到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同期成长,都不适于作为最终的因果关系基础来树立所有人都应被平等对待的信念。对于不适用的理由的类似争论,毕竟是科学批判的一个正常方面。如果来自实验室技术人员手上的污染引起了石盘中的链球菌菌落,并且引发了随之而来的信

念,即病人的咽喉被链球菌感染了,那么前者为取消这个信念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就算是病人的咽喉确实被链球菌感染了,人们仍可以毫无谬误地否定我们根据前者提出的信念,因为原因与结论是不匹配的。

在所有这些例证中,证据所具有的适当理由与不适当理由之间的界限,以下列方式被粗略地勾勒出来:认为某个现象是某种假说的证据的观点需要一种因果关系解释的支持,这种因果关系解释排除了例外——如果假说无效,那么这一现象也会出现——的发生。同样,证据的声明也不由这一因果陈述决定,无论假说是否有效,现象都会发生。因此,如果技术人员的脏手引起了链球菌菌落,那么无论病人的咽喉是否被猖獗的链球菌感染,链球菌菌落都必然存在。承认一个人被社会选择中的道德观所吸引,而且这种吸引力是由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一个受保护阶级的成长造成的,那么这种承认会使这种吸引作为一个证据,它对几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那些因果关系本身会促进人们正确理解如何做出选择。一方面,在因果关系说明有效的情况下,无论道德观是否有效,一个人可能都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另一方面,爱斯基摩人需要款待,根据这一点做出的解释并不推翻因果关系说明。因为坚守款待准则的信徒们相当充分地断言:在对互惠的需求中产生的感觉,能够揭示出一个人应该如何行动。

总之,如果对道德观的承诺感具有马克思所描述的终极来源,那么这个承诺感就为承诺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不利证据。如果马克思的分析和其他人的分析一样是一个好的因果关系分析,那么承诺感就不能用来假设人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确立对道德观的辩护性说明能够以某种方式被确立,并能够撤销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相反,一个人应该着手取代道德。



如果马克思不相信会有诸多准则能够指导每个历史状态中的人们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那么他当然希望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选择能由大规模的且长期的准则来指导,而不是由反复无常的或短期的利益来指导。“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sup>①</sup>如果他没有针对所有人的需求和基本愿望来提出他对指导原则的论证,那么他当然会针对劳动阶级整体来提出那些论证,同时也会针对那些由于其社会地位或个人承诺而与劳动阶级分享利益的人们提出。这些有意图的听众数量庞大,他们对马克思来说是重要的。在马克思的大量著作中,他认为共产主义的魅力在于:共产主义能够减少障碍从而实现合理的社会选择,它凭借对大多数人的真正利益的诉求,并且凭借建构这样一个社会,即当社会前景发展得越来越和谐时,这个

---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社会的基本选择最终由所有人的利益来决定。<sup>①</sup> 简言之,马克思向不计其数的听众倡议的原则,应当用来指导现今的社会政治选择,同样也应当用来指导政治道德。

我想勾勒出这一系列原则的纲要,最起码要把它们同马克思的常见主张和观点联系起来。我的勾勒通常是尝试性的和思索性的,但有时是对下述理论的一种构建:如果要求马克思去澄清或辩护他所说过话,那么马克思将会说些什么。然而,为了评价马克思对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道德观的实际攻击,我们需要研究马克思著作所暗含的准则系统。在放弃这种道德观之前,人们应该想好用来取代它。毕竟,马克思在选择各种制度、策略、行动时的总体风格可能会有其自身特有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也会为了某些问题去批判政治学中的道德观,在这两类问题中前一类问题更为严峻。

在最广泛的纲要中,马克思的非道德具有下列形态。马克思赞成某些社会安排,其论据部分建立在对不同类别的福祉的诉求上:自由、互惠、自我表达、避免痛苦与早亡,以及明显作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部分方案的相当常见的其他福祉。然而,当一系列福祉与马克思看到的社会事实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福祉不能完全决定人们对这种社会主义的选择。要使这些福祉的不同方面保持一致,必须进行更多的说明与分类。那些使社会主义选择成为必要的具体价值尺度,无法以不回避问题的方式加以定义或证明。马克思的观点是得体的,因为它受到这一系列福祉的约束。但是它不能证明通过应用这一系列福祉而使福祉的不同方面很快保持一致都是正确的。基本的社会选择有益于形成观点,而不仅仅是观点的结果。

对社会主义目标的采纳,并没有完成马克思关于社会选择的前提。马克思的观点要比这一点表达得更清晰。他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策略——它在一定程度上它被作为一种手段提出——只是

<sup>①</sup> 参见,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页及后面的内容、第55页;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第294页。

## 普遍福祉和社会目标

靠它具有的本质价值来支持,并通过它与普遍人类福祉之间同样复杂的联系而被评价。最后,关于是否以及如何参加运动的基本问题,由更多的且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标准、对应该赞美和培养人的何种性格特征的看法来决定。我将通过对更加简单的选择基础的一系列比较——这些比较常被归因于马克思——来填写这个观点高度明确的纲要。

马克思关于社会安排的选择基础,常被假定为在形式上相似于功利主义,如果不是在内容上相似的话。人们对社会安排的判断要依据这种社会安排具有的使某些有利的尺度或范围最大化的能力。在一些描述中,这个尺度是物质生产力。最好的社会安排是在当前或者长期发展中最能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安排。另外,选择的标准应当能够使人类经历的某些方面最大化:如果马克思被当作一位功利主义者,那么就最大化了快乐或幸福,或最大化了包括互惠、自我表达和自由在内的大量单独的福祉。

事实上,马克思的基本社会选择不是由任何在逻辑上优先的最佳标准决定的。首先,要考虑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作为对连续进化的社会形式之间关系的一种描述,它忠实于马克思关于历史变化的总体陈述。但是生产力标准作为一个评价标准,它与马克思著作中的若干方面都有矛盾。首先,如果马克思有生产力标准,那么他对暴力、痛苦和被过去的社会安排强加的苦役的反应将是谅解它们,因为它们对提高生产力是必要的。这一谅解的适当结果将是对雅典奴隶制的辩护,而不是马克思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判断。其次,马克思自始至终地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动性质具有的片面性和单调性,但却承认工业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增长的贡献。<sup>①</sup>而且他

<sup>①</sup>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第711页;《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认为,当人们选择闲暇来代替物质生产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偏好时,人们就能够选择闲暇,这是社会主义的优势。<sup>①</sup> 承认福祉的重要性与物质生产之间存在矛盾的人,如果认为物质生产力是评价社会系统价值的唯一尺度,那么这个人就是武断的。最后,生产力标准的片面性甚至不利于使人们的政治选择具有更多的确定性。那些抵制生产变化进程的人,比如英国的工人反对工业劳动的严格控制、某种早期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和印度兵里的叛徒,他们对历史作出的积极贡献就像马克思理解的那样,至少与那些发展生产力的人一样多。工人们通过抵抗生产变革来获取知识并组成联合体,以此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并控制革命之后的社会。工人阶级联合体是不断增加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联合体在某种程度上以抗拒这种发展为必要代价。<sup>②</sup> 因此,生产力标准不能告诉大多数人他们应该在基本的政治选择中做什么。

我已经讨论过把马克思描绘成功利主义者的某些特有問題。但是马克思可能仍被用于寻找大量独立福祉中的每一个福祉的最大值。这个多元的最大化标准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都有效或对每个人都合理。然而除了这个相对主义之外,马克思的观点将是“理想的功利主义”的例子,就像 G. E. 摩尔(G. E. Moore)在《伦理学原理》中认为的那样。

这种解释存在着一个问题,它对总体目标提出了一个承诺,却没有根据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获得绝对优先权——加以具体说明。当然,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这种理想的功利主义风格中提出他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对下述意图的批判——试图使最终的总体目标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并且分离的部分都具有决定性作用——暗含在马克思的实际论证中:一般来说,目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

<sup>②</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及后面的内容;《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479页。



标完全模糊则不能决定基本的社会选择；人们没有办法将这些目标适当地确定下来，除非根据那些部分地独立于总体目标的社会选择来重新定义这些目标。

比如，以自由这一目标为例。对自由的关注当然是下述问题的原因之一，即为什么人们应该认真对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的描述，以及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对比。对自由的关注给予社会学一个选择的意义。但是，如果有人赋予无干扰以足够的权重并将之视为自由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将其视为满足其欲望的资源，那么他也许会接受那些社会描述而同时又抵制社会主义。

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法能够具体说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选择所要求的资源自由的强调，在没有将这一强调定义成“鉴于马克思对现实的看法，强调是支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充分强调”的情况下。切不可认为：马克思的选择标准把资源自由看作总是在本质上比无干扰的自由更重要。有许多想象得到的情形，在这些情形中为了保持大多数人的资源自由而需要的干涉，对许多人来说是如此的普遍且令人生厌，以至于马克思本人和他的有意图的听众都选择了无干涉。设想，大多数工人是如此深深地效忠于资本主义的成功，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地干涉他们，才能阻止他们建立独立的工厂和农场。甚至在马克思所看到的真实世界中，社会主义方案不依赖于资源自由所具有的刻板的词汇上的优先权。对一些人而言，社会主义方案的一个决定性方面在于——资本主义容易产生直接的且残酷的镇压形式，马克思称这种形式为“君主政治”和“帝国主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法西斯主义”。这些人深切地关注着无干涉，并且需要一个具体的经验主义论证作为基础，来确定资本主义在这一维度上没有绝对优势基础。那些认为若离开无干涉因素社会选择将无法确定的人，当然不能被排除在马克思的有意图的听众之外。

在自由的诸方面中存在的绝对优先权可能过于严格。但是似乎没有其他的、更灵活的分类是普遍的并且能决定现今的基本社会选择，而且能准确地表达出人们运用于这些基本社会选择之上的标

准。尤其是,具体到足以使人们确定社会选择的量化,会因为太过具体而成为一种谬论。资源自由应该以六比一的差额比率换取无干涉吗?

马克思的社会选择应该在那些关注自由、互惠、避免痛苦和其他与福祉的人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他们对这些福祉不同方面的强调足以支持社会主义选择。对所需要的这些强调作出的更谨慎的定义,不会取消这个循环论证。这个循环论证在此符合正当的逻辑。那些常常关注自由、互惠、避免痛苦,以及其他相似目标的人们被提供了一个经验主义论证,它论证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变革的可行性。如果他们接受这些论证,并且相应做出了基本的社会选择,那么这个选择通常是选择社会主义。这个选择进一步定义了他们强调的目标。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认识论转向的特征中,理性的人们从一般(抽象的目标)转向特殊(把握实际的社会结果),同时又回到对一般的修正(对目标的更进一步的说明)。同样,根据马克思的选择确定下来的目标,符合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道德洞察力的说明:通过在逐渐具体的诸多选择中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意志改变自身并给予自身确定性(尤其参见导论)。

在重要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唯一鼓励的福祉必须作为社会主义本身的部分选择来被说明和被选择。因此,如果我说马克思根据社会安排具有的提高人们生活的趋势来推荐这些安排,那可能是一种误导。不同的提高标准导致社会安排的不同选择,它们被现实中的理性的人们拥有。没有任何标准是唯一合理的,就像没有任何标准是唯一公平的。

自由的不同方面中存在的矛盾对于今天人们对马克思和道德的哲学争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乔治·布伦科特(George Brenkert)对这些争论作出的有思想的且博学的贡献中,他已经把马克思描写成一位致力于道德理论的人,这个道德理论既不是以权利为基础,也不是功利主义:相反,马克思的标准是对自由的推动。“……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分析是……以自由为名的一

个批判……如果一个人因为‘道德理论’将允许我们提及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与全人类的基本的善有关——同时这个观点也是最重要的,那么毫无困难地说,马克思具有道德理论并且自由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自由的每个方面对全人类或者至少对明智的那些人来说,都很可能是一个本质的善。但是社会变革如此难以进行的一个原因是,不同的人对自由的这些方面进行了不同分类,而且社会安排如果有利于自由的一些方面的分类,那么就损害了自由的其他方面的分类。很可能,每个人都把拥有资源去追求目标视为对人的善,把协调人们的私利看作是善。<sup>②</sup>但是人们也关注无干涉和对竞争的热情。一些人具有极大的竞争热情,他们的竞争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当其他人的目标实现的时候,他们的自由目标有可能受到侵害。如果道德观是一种能够判断这些差别的观点,那么一定会有一个中立的办法在这些分类中做决定。我已经讨论过这个中立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而布伦科特没有反驳。

这些矛盾在布伦科特的著作中没有发挥作用,部分是因为他着重强调了马克思对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明。“真正的自由还需要结束利益的分离与冲突,这些分离和冲突是前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的特征。”<sup>③</sup>毫无疑问,我所描述的冲突将在某一刻消失,如果不是在一开始消失,那么就是在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消失。但是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在我们所处的前共产主义世界中要去做什么以及要改变什么。如果我们都被培养说世界语,那么可能每个人都会幸福;但这不意味着我应该学习世界语或培养我的孩子去学它,或者进行世界语转换时产

58

① 乔治·布伦科特(George Brenkert):《马克思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9年第8期),现载于《马克思、正义和历史》(M. Cohen等人编辑),普林斯顿,1980,第86页、第104页。

② 后者是布伦科特的自由的一个方面。参见同上,第99页;以及乔治·布伦科特:《马克思与功利主义》,载于《加拿大哲学期刊》,1975年第5期,第430页。

③ 《马克思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第99页。

生的费用会得到增值。终极目标对马克思而言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把对社会选择的原则性思考仅仅局限于对最好的未来社会的鉴别,这将是一种乌托邦,马克思谴责它是在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sup>①</sup>仅仅通过当前行动具有的有效性——对成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的社会的有效性——来判断这个行动,也是特别不人道的。最起码如果下一章的讨论是有效的,那么马克思认为冲突和强迫是这种变革的必要手段。所有为加速变革的强迫行为不能因此被证明是对的。人道的方案是人道地处理这些冲突的事实而不是忽略它们,而对政策的判断只是凭借它们具有的创造最终和谐的倾向。当布伦科特使他对马克思的说明与康德的道德相分离时,<sup>②</sup>正是这个分离回避了时代冲突——这一冲突是马克思消解康德的精华所在:“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由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sup>③</sup>

我强调的自由的目标,部分是因为这个目标在马克思的重要解释中发挥的作用,部分是因为我对自由具有的模糊性的相对熟悉。而其他的总体目标也有类似的不确定性,它们都需要通过研究具体的社会安排来校订。比如,无论社会主义何时建立,互惠都不可能以每一种方式被推动。在许多技术不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几乎必然要求某些官方的倾斜,这些倾斜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有利于劳动阶级家庭而不利于从前的资产阶级家庭。在这里,要求以互惠为基础对待从前的富家子女将是伪善的。同时,从前的富人追求昂贵的商品的愿望不会再被给予任何特殊的权重,即使这个愿望作为一

<sup>①</sup> 《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sup>②</sup> 《马克思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第104页。

<sup>③</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1—21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粗体部分。

种真正的需求是如此的急切且不易改变,而且即使特殊的需求在别的地方会被给予特殊对待。忽略甚至蔑视资产阶级的感受很难成为互惠的基础。当布伦科特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一个例子的时候,他将很难把社会主义的开端描述成“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希望完全的互惠成为一种规则。(参照《宣言》中对社会主义更高阶级的描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大多数人,如果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裂、社会分化和限制生活的说明,那么他们就会认同社会主义选择作为增加整个社会互惠的手段是完美的。但是肯定不存在互惠的微积分——它以先验的普遍标准为基础——能够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从一般到具体,再到对一般的修订,这在政治哲学与经济学领域中是不常见的。这个运动对于有关选择和做决定的学术理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它在现实生活的选择中是到处存在的。设想一个普通的例子,即在自然数不能测量的范围内做出多项选择来选一辆车。操纵、加速、燃料系统、外观、舒适度都是相关选项。让他或她提出希望遇到什么样的选择,一个有预期的买主通常能粗略地勾画出他或她在这些选项中的优先选择。但是一辆没有预期的汽车可能会有很好的操纵——按我们的话说——它值得弥补燃料系统的不足,即使后者似乎更重要。如果主张在每一个这样的情况中让有预期的买主从一个系列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系列目标,那么这个主张会造成糟糕的心态。然而买主们已经根据实际情况弄清了他们的需求。假设在没有参考特定的汽车模型的情况下,买主们总能表达出明确的选车目标,那么这是神话而不是科学。面对选择的复杂性,这样一种标准将不得不接受这种形式,“这种水平的操纵,一个单位的操纵损失如果联结着与其他选项的如下利益:三个单位的舒适度,……那么它开始被人们接受”。但是任何给选项的执行程度赋值的数字在这里都是武断的,一个数字面具掩盖了在众多特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定的模型中的真实情况。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对不同篮子中的商品的偏好的例子,说明了可以在一定数量的相同单位中找到的每一种商品,正被挤压进它们不属于的服务中。在选择中的真实世界中,决定某款雷诺而不是某款菲亚特可以由这样一种意愿做出,即牺牲一款特殊车型的更大的燃料系统来换取另一款车的更好的操纵,偏好选择没有在一个比较普通的条件中得到准确的具体说明。同样,在社会选择中的实质交换受一种意愿指挥,这种意愿是:为了获得只能根据特定的可行性选择加以具体说明的利益而作出牺牲。

## 变革进程

如果我对马克思逻辑的重构是有效的,那么对一系列普遍幸福的承诺,以及对马克思的经验主义论证的接受,都不能回答“目前什么社会安排是最好的”这一合理地要求每个人做出回应的问题。照此而论,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就是马克思观点的部分基础。有没有其他类似基础的、必要的、独立的承诺来解决同样基本的问题?或者,一旦社会目标被选择,那么另一些基本选择也会被合理地决定吗?特别是,在选择策略和行动时,社会主义取得的有效成就是现在唯一的考虑因素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吗?如果社会主义取得的有效成就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就在他的基本标准的形式中再次非常接近功利主义。最终标准是使一件善事得以实现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速度。

马克思从未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考虑到马克思对这些问题可能会有极其普通的态度,所以纯粹作为手段的标准是难以置信的。同时,考虑到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手段的信念,纯粹作为手段的标准也是不必要的。马克思在对论点的最佳改造中,介绍了他的工人运动概念,即工人运动既要有效地创建社会主义,又要发挥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积极价值。这两个特征发挥重要的、独立的作用。

62 在一个只认为目标是最重要的纯粹的工具性标准中,确保社会主义的完成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需要五代人的巨大的可避免的痛苦,并伴有广泛的有计划的野蛮行动和自我摧残,长远利益比短期利益受损更重要,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极端的工具主义。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包括在他的私人信件中,从未呼吁人们考虑:如果为社会主义作贡献那么每件事情都可以谅解,虽然他有时证明了受到报刊谴责的工人暴力是正确的。他似乎也参与了对极端工具主义的普遍拒绝。

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的非功利主义框架内,不存在这种工具主义的动机。功利主义者能将他们的工具主义建立在对理性选择的论证上:人们的经验是一个理性人在最后的分析中关心的全部内容;所以人们对可供选择的事物进行理性选择时,他们仅仅根据这个选择如何影响经验来做出决定;因此,一个手段与采用这个手段造成的经验结果一样不可取,或者一样可取。这个观点可能是错的,但它值得认真对待。这个观点从一个可行的、用于理性的利己主义选择的模式中被推断出来。一个使利己主义的合理性与社会责任的合理性一起延续的理论当然是诱人的,特别是这个理论是根据以权利为基础的不同的道德问题提出的。但是,使每一件事情都立足于推动具体的社会安排的工具主义没有这种诉求。根本不可能的是:由政治进程导致的制度的最终结果是一个理性人关心的全部内容。毫无疑问,政治进程对长期的制度结果的影响,是对人们选择行动过程的重要限制。但是对达到社会目标的可行性手段的思考,可能导致对社会目标的一个新的选择。在利己主义选择的模型中,没有任何证据能使这种思考看起来不合理。实际上,在类似水平的说明中,选择利己主义的人们在考虑了可行性手段之后常常会修改他们的目标。

公认地,在一个悲观的评价中,马克思可能会采用一种极端的工具主义作为他摆脱困境的方法:我们的兴趣吸引我们追求社会主义,它使任何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行性手段都令人厌恶。然而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们为了变革而指导重要的

战争,他们甚至将战争与长期目标连在一起。<sup>①</sup> 如果这样做不是为了那些变革而奋斗,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甚至不用考虑资本主义对战争的压力——将使大多数人“沦为—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sup>②</sup> 而且,除了变革获得胜利之外,马克思支持的工人运动还被说成是人性化的运动,因为它激励合作、国际主义、合理性及积极性。“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sup>③</sup>

当马克思构思革命时,革命包括破坏、暴力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sup>④</sup>。同时,革命进程总体来说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因为这种方式使团结和自重被提升和扩大了。这个全面评价不以对福祉和邪恶的普遍分类为指导。这个评价是对事件的实际复杂情况的回应,就像我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选择的例子那样。简言之,工人运动不仅因为它创造的社会或它带来的普遍福祉而得到支持,而且也因为它具有的内在的具体价值而得到支持。

### 一种性格模式

之前我讨论了,当合理地要求拥有适当证据的每个正常人进行讨论并将这些讨论作为补充说明时,马克思的总体目标不能指导人们对社会安排的选择。马克思的总体目标必须进一步被明确,以回应由经验主义讨论披露的事实。后来我讨论了社会主义偏好不能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②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③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④ 马克思1881年2月22日致斐·多·纽文胡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3页。



决定人们对达到目标的政治手段的选择。符合马克思的推理风格的某个人可能会适度地关心运动的本质特征,还关心运动推动社会主义的速度。现在,我想证明选择标准的全部目录仍是不完全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仍不能通过采取上述标准而得到解决,也不能通过合理地让忠实于这些标准的所有人补充讨论来解决。因为是否参加运动的问题,还没有在工人运动获取胜利所需要的方式中得到解决。

假设社会主义将改善每个工人的生活。社会主义依然能获得胜利并对他或她有利,即使他或她没有参加实际斗争,这些对每个工人来说都是真的。如果参加运动者的危险不严峻,那么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由的骑士并没有真正地接受前述介绍过的标准,没有真正接受建立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参加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人运动的愿望。但是社会主义的成功需要许多人中的一部分人的实际冒险。所以人们毫不伪善地说,“我认为目标和运动都是出于好意,但我将袖手旁观”。比如,在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著作中,他指出“英雄地自我牺牲”<sup>①</sup>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必要阶段,并谴责他的朋友库格曼(Kugelmann)庸俗地忽略了斗争的这个方面。<sup>②</sup> 直接的利己主义和对工人运动的赞同,对工人运动的胜利而言是狭隘的动机。公认地,如果工人们除了失去枷锁之外一无所失是真的,那么考虑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利益,就不需要用明确的观点去证明危险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他一定已经知道工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会失去其他东西。他们可能失去工作、被投入监狱或被杀,但不提革命者及他们的家庭的磨难,这在马克思的较温和时期的著作中非常罕见。也许,当马克思写关于一无可失的方针时,他受到了他那时坚持的工资理论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实际工资一定会降低到勉强维持生理需求的水平,甚至常常还会降到生存条件

①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页。参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第81页。

以下。<sup>①</sup> 假如那样的话,动机的一个新标准至少是马克思在后来所需要的,因为他最后抵制了1865年“铁的工资规律”。<sup>②</sup>

除非许多人接受风险,否则马克思的总计划不能成功,而对风险的承担不能以诚挚地渴望实现马克思的目标和策略作为充分的动机。马克思的政治理论需要更基本的约束,不是由别人来规定,而是需要一种特定类型的性格中固有的更深的约束。这是马克思联想到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具有的性格,并且马克思将这一性格看作是在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产生时就具有的性格,它包括人民宪章运动者、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参与者、巴黎工人、1848—1849年的柏林和维也纳,以及巴黎公社中的男人们和女人们。这种性格的发展是《宣言》中的现代工人阶级萌芽历史的核心。<sup>③</sup> 正如《宣言》描绘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历史蔓叶中,这种性格将压迫者的仇恨与被压迫者的忧虑相结合,将从根本上对抗利益的挑衅行为与在别处合作的积极愿望相结合,将处罚与创造力及对风险的忍受力结合。毫无疑问,马克思赞赏这些性格特征的结合并试图鼓励这种结合。在马克思看来,他的论证逻辑赋予这种赞赏与鼓励以独立的作用。

关于马克思取代道德的部分,最重要的问题涉及了这个性格模式。首先,当马克思批评“真正社会主义”的博爱态度时,他怎样要求并建议直接的利己主义应普遍处于次要地位? 在一个被广泛阅读的文章中,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论述了马克思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布坎南的观点,马克思没有细致地且可行地说明革命动机,而这一说明能够解决无产阶级“自由骑士”的问题,“马克思对非道德做出的声明,对资本主义严格科学的分析,看上去与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sup>②</sup> 参见《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94页、第97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6页;《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0页。

<sup>③</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284页。

他对革命动机的说明一致。然而……马克思关于革命动机的说明完全是薄弱的,而且……弥补它的错误可能需要有效修改他的社会理论”。<sup>①</sup> 如果对革命动机的充分说明能够在马克思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目标(布坎南质疑过其可行性)的一般框架中实现,那么第一步就是将“承认道德原则的重要作用”作为社会主义论证的基础。<sup>②</sup>

布坎南对马克思的反对,不在于被马克思视为意识形态的分化现象——比如种族和民族的对立——实际上导致了以阶级为核心的利益的无效性;也不在于他诉诸自马克思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恢复力,或者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改善趋势,或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失败。<sup>③</sup> 他的反对在于他宣称马克思没有说明工人们理性地承担必要风险的心理状态;他甚至还假设如果马克思说明了这种心理状态,马克思的观点就是正确的。<sup>④</sup> 因为布坎南的反对如此深深地削弱了马克思的理论,所以他的挑战直指本章的关注点,直指一个较大的计划——为取代作为社会选择基础的道德观提供合理的框架。

如果马克思取代了作为动机来源之一的道德,并且这种取代与他对道德的反对不一致,与他对适当的、合理的心理学观点的反对不一致,那么这就严重地违背了马克思消除政治学中的道德观的意图。确实,这种不一致会对批判道德观的整个计划提出质疑,而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个人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提出质疑。通常,这些批判道德观的努力都会引起一种怀疑:激进地违背道德观将避免野蛮或冷酷的行动,而仅仅以不一致为代价;同时这种激进的违背又依赖于被它正式批判的道德因素,或者它又默认地假设了被它正式否认的利益共同体的存在。由于马克思的政治观最人道地、全面地违背了道德观,因此它是一个有用的检验例证。如果马克思的观点按

① 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革命动机与合理性》(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9年第9期),现载于《马克思、正义和历史》(Cohen等人编辑),第264页。

② 同上,第286页。

③ 同上,第267页。

④ 同上,第268页。

照上述提到的方式是不一致的,那么对下述观点的质疑将会得到强有力地证明:野蛮或冷酷的行动将以不一致为代价而被避免。如果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么它将以对社会事实的略有不同的评价为基础,为其他的非道德提供一个有用的模式。因为,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根据事实来假定马克思批判道德的情况,这个假设相对没有争议(与马克思对道德的具体选择相比)。

马克思当然想同时拥有下述两种方式来定位革命动机,而不是用个人的利己主义或者平等关心所有人的利他主义来定位动机。这种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sup>①</sup>

在人们抵制道德时,他们将自我牺牲作为一种自我主张的合理形式,这并不存在逻辑矛盾。人们能做出牺牲不是因为对全人类利益的平等关心,而是因为要去履行对支持工人阶级利益或大多数人利益的承诺——这些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劳动阶级获得胜利。毕竟,当父母为子女做出牺牲时,他们不需要道德动机。尽管不存在任何逻辑矛盾,但是就如布坎南坚持的那样,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基本原理。当阶级利益需要如此多的自我牺牲时,马克思为什么应该认为变革的有效基础是阶级利益而不是道德兴趣?

部分原因在于马克思依赖下述思想的合理性。道德作为带来社会变革的自我牺牲的基础,对大多数人来说其有效性要低于关心一个团体时的有效性——在这个团体中每个人有共同的敌人并且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5页及后面的内容。

常在真正的和不断增长的互惠基础上合作。部分原因在于,当马克思把思想运用于同时代的社会中时,他通过指出这个思想正好适合同时代的事件——特别是1848—1849年革命——力求使这个思想更引人注目。在他对这些革命(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的说明中,他不断地将具有相对阶级意识的工人领导的起义中的那些英勇事迹与自由资产阶级同胞的胆怯相对比,这些同胞们的道德关心是忙碌的,但阶级利益是模糊的。

然而,他也需要比碎片式的历史描述更普遍的东西,比合理性论证更经验主义的东西。他需要在理论上说明现代工人的历史,这个历史描述了机械化特别适合生产出以阶级为中心的利害关系,而这些利害关系特别适于支持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最清晰地表达在马克思对工人团结发展的说明中——这个说明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主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创造并巩固了工人们以及与工人们有联系的中低层阶级团体之间的团结。在劳动阶级内部,资本主义打破了场所和身份的障碍;团结了处于广泛分布的相互依赖的生产中的人们——团结鼓励了人们相互依赖地进行反抗;而且资本主义集中并调整了被工人们反抗的资本。在此有一些细节描述,它们来自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如何“……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sup>①</sup>的长篇且复杂的解释。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被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sup>①</sup>

这不是一个关于在团结抵抗中存在的利己主义怎样最终出现在从不曾存在的地方的故事。为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而举行的全国性罢工,必然符合工业革命时期最早的牺牲者们的利益。虽然故事简短地提到了改进的交通工具,但这基本上不是一个调整新技术手段的故事。更确切地说,工业发展据说是在工人中创造了一种相互作用(联合)的新形式,从而导致了工人们在反抗活动中的更广泛且更坚决的合作,并最终导致“革命的联合”。心理学机制似乎如下所述:一开始,工人们反抗资本家克扣工资、加大工作量等等;人们首先通过个体的抗议捍卫自己的特权,并保留特殊技能。当工业化使那些特殊的技能和特权大部分过时的时候,合作成为更加有效的手段。一些工人让另一些人帮助他们进行反抗,至少让他们不接受罢工期间的工作。他们期待着并且经常收到那些希望从互惠帮助中受益的人的积极回应。当不同的工厂变得更加相互依赖时,当控制权变得集中于较大的公司时,当交通发展时,这种互惠的机会不断扩大。同时,在反抗活动中形成的合作日益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因为合作的范围不断扩大,以及在至关重要的工业中发生的工业冲突,造成巨大的经济影响。逐渐扩大的合作以及对其他无产者类似情况的逐渐认识,有助于强化工人们为他人承担危险以便能提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第284页。

升共同利益的愿望。这些终于导致了“革命联合”。这是关于以自我牺牲来关心他人的故事。其他人在造成社会分裂的冲突中是同盟者,而不是作为平等关心所有社会成员原则的对象。

《资本论》详细且大篇幅地说明了这个过程。前工业时期的无产者的经济斗争依靠保留特殊的个人技能。他们最终被工业设备的出现而打败。<sup>①</sup> 失败的直接结果是更强烈的、更长期的和更单调的劳动。但是工场划分体系的崩溃以及生产控制权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导致了工人团结——团结表现在他们要求十小时工作日的战斗中,并表现在普通行业工会主义随后的壮大中。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述的事例,工业革命强迫并促进劳动阶级的合作,同时它也增加了工作的压迫性。“无数孤立的小工业总体上转换成少数合并的大规模生产工业……资本和工厂系统的独有优势的集中……[破坏]资本的控制权部分地被隐藏在……生产的进程的社会规模的合并”所有提供了“伴随着使一个新社会形成的元素,使一个旧社会爆炸的力量”。<sup>②</sup>

承诺的特殊力量以历史发展的联系为基础,它对变革社会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相信,这种变革需要危险的行动,它包括众人中一部分勇敢和积极的人,来攻打装备良好的、善于协调作战的敌人。对每个人的人道主义同情不能为这个行动提供一个足够有力的动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章。马克思引用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话作为对这一过程的明确判断。“尤尔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资本家终于救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工人们签订的契约条件],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经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直接的背景是去分析,将工厂法扩展到一切社会生产中而产生的影响。然而,马克思清楚地描述了工业资本主义生长的普遍趋势,这些趋势被工厂法稍微地加速了,因为工厂法对小型的和边缘的雇佣者施加了破坏性影响。

机,而且没有历史进程能充分地增强这个动机。的确,如果这种人道主义太普遍,它就削弱了必要行动的基础。因此,共产主义与以道德为基础的类似对策相比,它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sup>①</sup>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求在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变革,符合由深化斗争产生的新形式和合作水平。<sup>②</sup>

谈到“他们在共同的战斗中经历的共产主义的善、友爱以及团结”时,布坎南说,“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提过:这种联合派生出的福祉是无产阶级革命动机的一个主要因素,而无产者瓦解系统的兴趣则不是主要因素。……马克思没有说明阻碍这些福祉的竞争与利己主义如何……最终能被克服。他也没有使它们具有重要的作用……”<sup>③</sup>事实上,工人团结的增强是马克思的两部最著名的著作中的主题,而且在这两部著作中它是革命动机中的一个主要因素。马克思也许不会说(无论如何他不应该说):人们在革命中冒险是因为团结的经历与他们破坏掉的福祉相比,得到了更高的评价。这并没有说明团结如何在社会诸阶级中、在家庭中,或者同样在快乐的学术部门中发挥作用。互相帮助的人们——可能以非自我牺牲的方式互相帮助——开始关心彼此并足以激发人们做出实质性的牺牲。做出牺牲的主要动机是这种关心,而不是渴望去做一件善事。换一种方式来说,在学术性的决策理论中,合理的商业模式会使马克思的观点难以置信并晦暗不明。至于竞争造成的障碍,马克思认为普通行业工会主义者正确地认为:集体经济努力获得成功,比个人的竞争努力更有可能影响一个工人的经济福利。团结对这种成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努力带来的甚至是有限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第40页;《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③ 布坎南(Buchanan):《革命动机与合理性》,第276页。



的成功,那么工人“就会沦为—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sup>①</sup>。马克思对市场的支配力量的否定可能是错的,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最本质的区别,而不是布坎南认为的马克思理论中的不一致。

在非常普通的条件下,马克思与道德心理学的类似之处有三个主要倾向:

1. 如果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并且团结起来反抗是减少团体的劣势和苦难的必要手段,那么一些成员将为反抗活动举行典礼,并希望从他人那里得到互惠。

2. 如果这个集团中的人们已经从这种积极性中获益,而且被呼吁去合作,那么如果大多数人作为自由的骑手而袖手旁观的话,他们将越来越感到无地自容。最终,当有着集团会从他们的行动中获益的合理前景时,一些人将进行互惠活动。

3. 过去更广阔的合作已经存在于集团中,合作的利益对于集团越重要,那么从扩大的合作中获得利益就越可能,随后合作会扩展得更大。

补偿和竞争的心理学倾向当然是存在的,比如竞争,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各集团的真正利益是对立的。马克思认为鉴于现代社会主义者的说服与领导,以及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有效合作所需要的资源,上述三种倾向实际上导致了工人的“革命联合”。就是这些理论,是马克思从工人反抗与起义的历史中推论出来的,是对普通心理学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补充。

马克思没有解释人们为什么会有普遍倾向。但是,当时也没有人否认它们的存在。如果马克思呼吁合作的倾向,而这些倾向使道德关心成为有效的变革基础,那么这将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但是,从阶级团结跳跃到道德的这种做法,忘记了对所有人的平等关心是部分特殊的道德动机。马克思对阶级团结的说明面临着经验

<sup>①</sup>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主义问题,而且他的革命预测可能是错的。尽管如此,团结理论对于任何一个要求在号召以自我牺牲来实现变革的同时又要避免道德观的观点而言都是一个有用的模式。

马克思在他的动机理论中提到了一位著名的前辈。讽刺的是,这个人休谟,他研究了人们尊重财产原则的思想来源。“我观察到,让别人占有他的财物,对我是有利的,假如他也同样地对待我。他感觉到,调整他的行为对他也同样有利。当这种共同的利益感觉互相表示出来,并为双方所了解时,它就产生了一种适当的决心和行为。……我们双方各自的行为都参照对方的行为,而且在作那些行为时,也假定对方要作某种行为。”<sup>①</sup>从这种合作自发产生的情感,使我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倾向于尊重财产,即在我们的私人利益被侵权的特殊情况下,甚至在我们保守秘密将会阻止侵权行为的特殊情况下。<sup>②</sup>将协调原则的内容归结到一点,它与马克思的主要区别在于休谟式的合作据说是有利于所有人,并且当我们深思这种合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因为人们对所有受害者的无私同情而感动并表示赞同;这就是为什么赞同是道德的原因。<sup>③</sup>如果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黑格尔式的基础,那么他的心理学在财产的讨论中就是休谟式的,这种心理学被排除在道德和稳定领域之外,并用于人们之间的合作来攻击现实。

对马克思道德观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在没有陷入道德观的情况下,马克思的道德观如何起作用?”使另一个问题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式的革命者们尊敬并关心那些没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局外人吗?我在针对德里克·艾伦(Derek Allen)所做的不公平的辩护中曾经论述过,对马克思来说每个人最起码都是某种关心的适当对象。但是这个观点本身可能看上去与马克思对阶级团结的强调相矛盾。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有多少关心是合适的。当

① 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30—531页,第538页。

② 同上,第520—521页。

③ 同上,第539—540页。

然,普遍的、严谨的,但非平均主义的原则,即“对无产阶级的 100 个单位的关心,对小农场主的 60 个单位的关心,对没有恶意的资本家 5 个单位的关心”,看上去既冷酷又愚蠢。

或许根据性格形成的模式,人道主义与狭隘之间的平衡通过一种因果关系方式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马克思建议的性格是一定的经验和相互作用的产物:爱与互惠足以使人们为了他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仇恨压迫并愤怒地蔑视压迫者的人,并且最终为了在反抗压迫的合作中产生的彼此美好的愿望,而做出自我牺牲的人。由这样的人生经历产生出的态度,当它通过人们对相关事实的认识而被人们获知时,它决定了人们会做出那些受到马克思赞同的各种关心。

在逻辑形式中,这种模式与理想化的观察者的道德理论类似。当那些在认识和动机结构中具有适当资格的人被完全告知的时候,他们做出的决定便是正确的。然而,选择资格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合理的,而且从毫无偏见的观点来看选择资格也不是合理的。尽管在给正确的决定下定义时存在偏见因素,但是来自于其他阶级的关心一定会被那些持有这种定义的人赋予一些权重。

当然,这种模式是一种推测,它试图去描述马克思对于赞同关心或者反对关心所做的各种具体陈述的基础。这个推测不是马克思本人断言的理论。重要的是,当马克思表现出对那些没有贡献于无产阶级斗争的人的关心时,他不必抛弃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对许多人来说,缺乏基本原则来指导适当关心的尺度,是马克思非道德理论中最麻烦的地方。没有等价词可以表达这些命令——将每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或者将所有人的幸福最大化;同时平等地同情每个人,或者采取原初立场。除非人们协商将这些普遍原则作为最终的限制原则,否则可能会使过多的报复和妒忌得到必然的鼓励。

我认为,这种担心依据被马克思攻击的而且今天几乎没有人接受的道德心理学。根据这种心理学,我们接受良心约束的倾向就有了根源,这个根源在类型上不同于爱与恨、合作与冲突的历史,却形成了我们成年的性格。道德自律建立在特殊的、天生的动机根源

上,比如康德要求尊重道德律令。事实上,反思社会和历史的差异,这种假设并不可信。在心理学和道德人类学领域进行的成果最丰盛的研究,就是立足于对这个假设的放弃。

假如我们在行为和情感方面遵守道德准则的倾向与其他比如暴脾气、好性情、胆怯、羞怯或者外向等性格特征具有相同的起源,那么道德对报复和邪恶的嫉妒的实际约束力量不必比下述力量大:爱与恨的混合力量、合作与冲突的混合力量。这些混合力量塑造了马克思的革命者。实际上,再经考虑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相信道德约束具有不可替代的力量。某种对排便或进食的深深厌恶,同时还有在父母和子女间的非道德联系,这些毕竟都最深刻地抑制了道德约束,即使他们不依据道德责任,而且可能与这道德准则无关。

当受人尊重的那些适当关心的普遍原则对马克思而言不是终极规则时,派生的原则才可能被采用。我们可能想强加给自己许多原则,以便在最激烈的时刻阻止我们违背基本承诺,调整社会预期,或者通过标准的合作程序来减少冲突。这些基本原理作为手段对于马克思的革命者来说是可行的,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可行。当然,它们将在理由正当的情况下被采用。比如某些在激昂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也有可能要比参照普遍原则做出的决定好。

总之,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式的性格类型是复杂且坚定的,至少像亚里士多德的勇敢的人类或卢梭的爱弥尔那样复杂且坚定。这不是说马克思式的革命者们同自由的人道主义者一样,只是两者的目标和策略不同。革命者们对在罢工和起义中袭击警察很少感到不安。他们很少被革命不可避免的真实的过激行为所困扰。但是他们整体上至少像其他人一样热情、友善,而且他们相当关心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福利。

## 一个非道德的结构

我对马克思的积极观点的描述现在已经完成。这一描述被视为中立的,但与介绍过程有关,它经历了从一系列普遍人类福祉到

对所追求的社会安排的描述,再到对实现这些社会安排的工人运动的描述,再到促使个人选择的性格特征的描述。一个较低水平的标准是局部的,但它并不完全由下一个最高水平的标准决定。多数的但不是所有的致力于更高水平选择的理性的人,如果他们接受马克思的论证和社会理论,那么他们将被引导着做出较低水平的选择。同样,更高的、更普遍的标准,将一部分论敌标准但不是全部的论敌标准,排挤到较低的且更具体的标准中去。致力于普遍福祉的某个人将不会选择尼采的精英目标,但他可能在理论上选择一种资本主义的民主形式。而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视为可取的某个人,不能就此指导天主教徒的生活。但是他或她可能会袖手旁观,希望工人运动成功但却没有参加工人运动。

77 这不是边沁的观点或穆勒的观点具有的结构;同样也不是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的理想的功利主义所具有的结构。普遍福祉在结合了他们鼓吹的命令之后,几乎什么也决定不了。而马克思的观点在形式上与他似乎最钦佩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类似。<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系列需要追求的福祉、不同人类能力的实际操练——这些能力在最后的分析中被划分成严格的等级秩序。尽管有这种划分,这一系列福祉却不能指导《政治学》中人们选择竞争中的宪法。这些福祉也不能指导人们对下述两种安排的选择:一种安排促进一些人的美德生活,但以大多数人的生活堕落为代价;另一种安排是为大多数人提供一种适度德行的生活。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系福祉,它们不能证明他对于奴隶主贵族统治农民的民主政体的偏好是对的。<sup>②</sup>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反思不同社会安

① 其他的比较可参见理查·W·米勒(Richard W. Miller):《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一种结果主义》,载于《马克思与道德》,(K. Nielsen 编辑),1981年增刊第7卷。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5页。对亚里士多德的贵族理想的讨论不仅仅是:奴隶是那些天生的白痴,他们天生就是奴隶。理想的贵族社会包括被低贱的人、非市民,还有像牲口一样从事农业的奴隶,但不包括非奴隶的工匠和商人。而且没有人天生就是工匠或商人。(参见《政治学》第27页、第119页、第244页。)

排的结果之后,指出贵族制的安排是最好的。同样,虽然这一系列福祉和政治建议对人的性格特征的等级划分设立了重要的限制,但它们很难支持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四卷中更加具体的理想——这一理想的表达程度与小说家的精确程度差不多。普通等级的才能把对那些喜爱饮食却没有创造积极性的人排除在外,但是它几乎不能指示如何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勇敢的人表现出的慷慨与冷淡结合,将其表现出的承担危险与理性深思结合。

在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中,他的观点比马克思的观点更接近于模范的道德观。因为他提出的标准是对所有人的理性的强制规定,而且是对所有社会情况的明确说明——理性的人们在这些社会中建立国体。但是在他们内部的结构中,亚里士多德的建议既离开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又离开了功利主义,这些方式与马克思的观点类似。

与哲学家们追求的较简单的标准相比,马克思的观点也有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思考相同的结构。这有助于解释马克思除了对道德进行攻击之外,他还总是攻击哲学,比如在其讽刺中最精彩的部分写道:“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sup>①</sup>

## 艾伦·伍德的选择

在英语哲学家中,当前对马克思道德观兴趣的复兴大部分源于艾伦·伍德的那篇充满睿智而又富于煽动性的文章,《马克思的正义批判》。在对马克思道德观的富有同情心的解释中,伍德的观点是现在严肃思考马克思反道德的论题中最有影响的观点。公认地,伍德主要关心的是正义以及平等、权利和公平这些同类概念,而不是整个道德。尽管如此,他对马克思的正义解释仍然与我所辩护的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2页。

对马克思的道德解释形成对比。不管怎样,在伍德回应批评家们时所写的《马克思的权利与正义观》一文中,以及在《卡尔·马克思》这本书中,他都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道德批判理论的说明。<sup>①</sup> 在讨论伍德的观点时,我将强调我的不同之处,并希望我与他在诸多领域中的共识是足够清晰的。这些不同将证明下述两个争论间的令人惊讶的联系:一个争论是关于马克思对道德和正义的批判,以及目前其他主要的解释性争论;另一个争论是关于马克思是或者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者的研究方法的争论。相对于伍德而言,我对马克思的正义和道德观所做的选择依赖于政治斗争所扮演的更为独立的角色。

根据伍德的解释,适合于一定社会的“权利和正义的标准,是那些实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作用的标准”<sup>②</sup>。标准“符合”社会生产,而且与社会生产“协调”。<sup>③</sup> 伍德对正义的作用的评论,支持了这种功能调试的下述概念:某物正好具有符合正义标准的优点,而且对它的普及和执行有利于稳定和防护现有的生产方式。如伍德在他的书中所言,“从现存秩序中产生的法律和道德原则,肩负着保护那个秩序的功能……”<sup>④</sup> 因此,如果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制度正义处于讨论中,那么适当的标准会包括契约的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但是这些适当的标准不包括经济资源的平等或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工作平等权;因为后一标准在经济上不能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相容。伍德推论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是正义的。当然,马克思不赞同这些制度。马克思将它们视为正义的,这反映了他的观点,即正义是社会管理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判断标准。

① 参见艾伦·伍德(Allen Wood),《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2年第1期)和《马克思的权利与正义观》(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9年第9期),现载于《马克思、正义和历史》(Cohen等人编辑);以及《卡尔·马克思》,伦敦,1981。

② 《马克思的权利与正义观》,第107页。

③ 同上,同样参见《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第15—19页。

④ 《卡尔·马克思》,第141页。

实际上,先前对马克思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观的讨论,是要反对将正义概念作为一种工具来对基本制度进行合理的且博识的道德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我抽取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伍德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的主张(我将很快挑战伍德提出的基本原理)。我以前没有说过但现在却想争辩的问题是:马克思将正义和同类概念看作是符合现实的东西,虽然这些概念与理性的认同无关。严格且公平地说,像“正义”这样的术语不是指基本制度中的任何一种现实财产,包括伍德式的马克思感兴趣的财产。如果马克思使用这样的术语,那么它一定是指人们的道德信仰,或者是指这些信仰迫使他们赞同的现象。但是马克思不承认制度的确是正义的,就像弗洛伊德不承认魔鬼的确存在一样。弗洛伊德声称人在中年时期着魔,是以婴儿时期的内疚和恐惧为基础的精神分裂症。

马克思使用诸如“正义”“权利”和“平等”这些术语的文本,是不能解决这种争论的。这些术语遵照一个人想要赞同的任何一种观点。通常,马克思攻击那些将这些术语用作计策来进行道德批判的人。这些术语常常用来作为引文评注放在文章的一侧,它们相对清楚地表述着生产方式或道德观,或者这些术语在段落中以略带讽刺的、至少是接近于讽刺的方式被使用。比如:“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sup>①</sup>“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sup>②</sup>没有一处文本可以绝对地、明确地声明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如果马克思不把正义看作是一个要么适合政治建议要么适合科学分析的范畴,那么这是一个人应该期望看到的。这个人仍将热衷于将自己的推理与更有代表性的论述结合,以此使正义概念显著地呈现出来。偶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尔,在这个人反驳那些谴责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人的时候,他将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与实践是正义的,他的精确意思是:如果这个正义对话的基本预设是有效的,那么这些资本主义制度和实践就不是不正义的,而是正义的。他在这里使用“正义”,就像无神论者对“上帝”的使用,当他说“上帝一定是邪恶的,因为他是全能的,却让小婴儿痛苦地死去”。

马克思在文本中的表述也几乎符合伍德的解释。即使马克思将正义看作是一个科学的范畴,他将充分意识到它的通常标准化的含义,同时他会发现这些含义是不合适的。马克思使用的引文评价和讽刺语气将常常作为一种警告,即参考正义的通常含义是不可取的。

在伍德的社会学解释和我的非正义解释之间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仔细察看使用原文的关键词来解决。我们还需要问:根据马克思整个社会理论的前后联系,对典型的道德论述的哪个评价,是马克思在道德批判中反对使用正义时所支持的?

我之前描述过马克思观点的大意是:考虑到社会冲突的实际性质,人们不能使用正义、权利或平等的标准来一贯地判断社会。如果这种论点是有效的,那么正义就不是一个判断制度的标准。因此在使用这个术语时的基本预设是无效的,这个基本预设是正义是值得称赞的。由此,应该合理地抛弃这个术语在批判与证明中具有的正常功能。有一种说法认为正义仍作为基本制度的一个特性存在,这种说法就如同承认燃素在燃烧中不起作用一样,或者就像热量存在却对加热现象不起作用一样,它现在似乎与燃素存在一样不合理。<sup>①</sup>

①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的话可能被用于同样的类比:“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或者如果像米尔柏格那样硬说燃素同氧气一样是十分确实的,这种混乱还会更加厉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但是恩格斯也许只是在批判一个特殊的由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正义的历史性概念(恩格斯通常称之为“永恒公平”)。我的解释或许只是表现了恩格斯的一个兴趣爱好,而没有表现出他在这里以及在《反杜林论》中对道德的存在矛盾的讨论。

公认地,当我们根据新发现评价旧范畴时,我们不能总抛弃它们。如果旧范畴的正确的相似之处被保留,那么我们就对符合这些旧范畴的事物做出新的解释,而不是否认符合旧范畴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和他同时代的人在深厚的理论背景下,一定会抵制现代化学家的假设,因为这一假设将亚里士多德等人所称的“budor”说成是氢分子与氧分子的结合物。但是与其否认“budor”指的是现代化学世界中的某种东西,不如说古希腊人指的是 HOH,但他们却不知道。同样,对于道尔顿(Dalton)来说,重要的是原子是不可再分的单位。从粒子物理和量子-力学化学的观点看,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承认道尔顿指的是由质子、电子和其他粒子在原子层级中结合而成的某种物质。对旧有的用法较宽容的评价原则大致就是这些:首先,应用旧范畴时的重要标志应该实际地、典型地反映出应用新范畴的实例。因此,流动性、透明性和其他标志引导着古希腊人使用“budor”这个词,而这些标志实际上是因为一批 HOH 分子的存在。其次,旧范畴有必要保留下来的重要属性,应该能描绘出应用新范畴的实例,至少近似地并且典型地描绘出这一实例。比如,粒子物理学中的新型原子,近似地且典型地作为化学反应单位进行活动,就像道尔顿的原子那样活动。最后,使用旧范畴的主要动机,不应被新理论完全破坏。旧用法中的观点应该是使用新范畴时能够满足的观点。对热量、燃素、魔鬼的保留,最明显地违背了这第三条约束。热量理论的整个基本原理是假设热量是流动的,以便标准的液体动力学能够被应用于热现象。燃素被假定在物体的物质构成与它们显而易见的属性之间保持了相对纯的相互关系。人们将怪异的行为归因于魔鬼,他们的动机是要说明这种行为是因为在行为非常古怪的人之外存在的邪恶力量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错误地说“热量存在,但不作为一种液体存在”;“燃素存在,而且它是氧”;或者“恶魔们存在,而且它们是人格错乱”的原因。

正义具有的“裁判”性质被伍德反复强调,它似乎提供了一座桥梁来沟通旧的用法与马克思的新理论。那些研讨社会主义正义的人在吸取马克思的经验之前,可能被视为是从事某项事业的

人——这项事业是决定制度是否适合最可行的一套原则,而这套原则能够通过裁定利益冲突来稳定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他们假定至少有一套可行的原则能发挥这种稳定功能,而且他们经常争论哪一套原则最好。在对马克思的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中——伍德赞同这一解释——伍德指出,人们对正义的争论要比人们通常假设的情况简单,因为一套稳定原则至多在一个时期是可行的。而且只有一个标准是可行的,所以不需要关于哪个原则最好的道德争论。更具体地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既定时期,只有一套社会生产关系适合这些生产力。如果这些生产关系在实际中支配生产,那么社会稳定是唯一的可能。就如伍德提出的,“这些生产力……符合,并且被表达为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些关系中,这些力量以它们的历史的特定形式被应用于自然。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因为在既定的历史阶段,人类不能自由选择他们掌控自然的水平,他们也不能自由选择这些生产关系的形式”<sup>①</sup>。一个系统的生产关系需要一套普遍认同的正义标准以达到稳定。对每个系统来说,只有一套正义标准可以承担这项工作。

有一种裁判功能可以通过裁定利益冲突来稳定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根据这个论点)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裁判功能是用于发现正义的一个基本标志;同时它也是正义具有的一个重要的本质属性;并且它也是唯一主要的动机——这一动机在于将正义作为政治学论述中的范畴来使用。这个裁判功能只能由符合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利标准和平等标准来执行。因此,我们应该将正义视为符合后者,即社会学范畴。而正义的其他标准化方面,应该作为混乱的来源而被拒绝。这一结果令大多数使用旧范畴的人感到惊讶,但是亚里士多德和道尔顿却同现代化学解释一样都不会为此感到震惊。

由于陈旧的生产关系依然控制、束缚着生产力,所以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对这种情形该说些什么?伍德式的马克思将会说什么还不清楚。但伍德的原文基本上是关于正义实现它的社会功

<sup>①</sup> 伍德:《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第7页。

能的情况。也许,在混乱的时代就没有正义。毕竟,许多人认为当没有和平时就没有正义,即使他们认为其他的道德约束——比如避免无意义的残酷——应当赢得尊重。或者也许,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变迁的来源的某些描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应该被看作是潜在于现存的生产过程中,潜在于生产关系的形式中——当生产力最终胜利的时候,这些生产关系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义可能在那时被等同于裁判原则,这些裁判原则适合这些迅速成长、进步的但仍未获胜的生产关系。毕竟,这些裁判原则在那时是最近乎有效的稳定社会的手段,但是这让传统的道德家感到不舒服。正义在那时也许会允许奴隶制的高压政治,或者也许会允许新生资本主义的堕落与破坏性。

很难看到,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会有哪些其他论点能够引导我们像评价“budro”一样去评价“正义”,而不是像我们评价“燃素”一样去评价“正义”。这个观点由伍德的著作扼要地提出。<sup>①</sup>然而,这个观点需要或者极度限制性地说明人们谈论正义的动机,或者对使社会选择得以确立的背景进行极端地限制。

假设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像伍德认为的那样,是使社会关系适应科技的限制作用的故事,那么尽管这种解释必然具有合理性并且很好地结合了各种文本,我仍要在第五章详细反驳它。然而,伍德对正义的说明需要比基本制度具有适应科技变化的长期趋势更多的论据。而且人们对是否要反对某个人的制度的持续而周密的考虑,必须被视为在发生基本变化的过程中不起重要因果关系的作用。

当人们谈论重大制度是正义的或是不正义的时候,一个主要的动机——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动机——是对如何在政治进程中担任代表的兴趣。动机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去保卫或反对某个人的制度。呼吁正义的主要目的是,在面对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是有效的,那么其他人将会受到伤害的事实时,要为做出这种行为提供一个基本原

<sup>①</sup> 尤其参见伍德:《卡尔·马克思》,第132页。

理,因为一些人在所有重要革命中都受到了损失。在变革最基本的制度的过程中,破坏或暴力活动急剧地伤害了一大批人。那些呼吁正义的人视这些伤害为代价,而这些代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辩护。他们把对不正义的纠正看成是特别适当的正义。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对这种变革情况的经典陈述是:洛克在回应极度的不正义、对政府托管制的侵害时对革命所做的辩护。对马克思而言,最急需的例子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努力主张社会主义革命来纠正经济的非正义,比如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草案中,小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因为多数票超过马克思而迫使马克思加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sup>①</sup> 无论这些正义的社会主义党人怎样头脑混乱,他们都没有幻想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找到可以调整利益冲突的一套标准。同样,蒲鲁东的大量的追随者相当明确地主张,通过呼吁正义标准来实现革命计划——正义标准即“革命的法的观念”,就像他们总是称呼的那样。<sup>②</sup>

如果人们谈论制度正义的主要动机是去考虑是否接受或反对制度,那么当用伍德的方法解释这种谈论时,这种谈论就失去了它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对基本制度中的正义的谈论,将在数代人中失去其主要观点,包括如伍德所看到的马克思的观点;对这数代人而言,政治选择是最急需的。在这数代人中,物质条件对激进的变革来说已经成熟,但是政治和意识中的障碍还在临时地发挥作用。这些障碍是否能被克服,取决于人们对是否要支持大规模变革的自觉的考虑结果。依靠这些考虑结果,这代人就会有不止一种可行的生产方式。(从长远来看只有一种方式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考虑这些考虑者们却是呆板的)。因此,对生产方式的可行性的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页。马克思在1864年11月4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对这个段落以及在《章程》中的一些类似段落,作了如下评论“我必须在《章程》引言中采纳[它们]……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对蒲鲁东主义者的著作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212页。

思——这种可行性应该能够支持伍德对“正义”的解释——不能保留“正义”在合理的政治考虑中的用法。

请考虑 1870 年大不列颠的一位工人的处境,并决定是否要批判或捍卫她的社会体系。至少在马克思看来,那时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合生产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可行的。<sup>①</sup>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互作用是稳定的;相互作用主要有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对立、工人阶级中的爱国主义、工会领导者士气消沉的合作,以及对早期工人阶级取得的成果的侵蚀。各种不同的稳定生产方式是可能的,这些生产方式依赖于她或者像她一样的其他人做出的是否去动摇现有生产方式的决定。她在做决定的时候,想知道资本主义是否不正义。对她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既不是正义的也不是不正义的,这样回答的唯一原因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合一定会渐渐地使社会不稳定,这就是说,在最需要对选择进行考虑的时候,正义不能成为选择的理论基础。有人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在当前是正义的,并且这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适合生产力,这种说法也使正义问题与相关的选择问题分离。当这位工人决定批判什么和攻击什么的时候,她当然有理由使生产力问题不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有人说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因为它现在是稳定的,这种说法导致了荒谬的保守主义,如果正义与她的选择有关系的话。毕竟,她在抉择是否要挑战这种稳定性。无论伍德对正义的证明怎样适应时代——包括马克思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在这些时代中马克思将变革看作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种证明都无法成为政治选择的合理基础。

前一章提到的反道德论证表明:这种激进主义者对在基本制度中的正义的谈论不符合任何情况,就像 18 世纪的化学家谈论的燃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是谈论“budor”。如果她确信那些负面考

87

<sup>①</sup>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 页、第 18 页;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9 日致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1—592 页。

虑,那么对正义的谈论就失去了主要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不一致不能依靠社会学解释来弥补。她对术语的实际使用没有客观地反映出那些用来协调社会利益的稳定标准的存在,并不像亚里士多德对“budor”的使用那样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HOH被发现。她所选择的措施易于在客观上造成动摇与不和谐。最后,她对政治考虑中的术语的全部用法,受到用来平衡利益的公平标准的支配;而且如果马克思是对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符合这种公平的性质。公平的概念不能作为整体运用于基本制度中。当她在政治考虑中使用“正义”时,“正义”在每个方面就像“燃素”一样。<sup>①</sup>

如果仍然要参照伍德的社会学性质来解释“正义”,那么这一定是因为我所描述的这类考虑是不重要的。这类考虑一定是太不重要了,以至于无法提供人们在谈论正义时的主要观点,或者无法提供人们谈论正义时的背景——这一背景能够决定正义的参照物与逻辑。显然,深思熟虑的人,即处在有可能发生激进的变革时期中的一名工人,对马克思来说是绝对重要的。马克思的观点一定是:这种考虑——即不断地反思选择何种政治行动——对实际的政治进程没有重要影响。唯一保留下来的对“正义”的用法,可能在当时预设了裁判功能。一个保留用法是社会工程学中的“正义”,在这里,稳定的零散的改革在基本的社会结构中被推行。另一个保

<sup>①</sup> 假设某个人有更保守的倾向。当他说到一个制度是正义的,那么这是一个可靠的标志来说明这个制度符合一个稳定社会的裁判标准。而且,他赋予了某些具体的道德标准以相当独立的权重——这些具体的道德标准是用来维持社会现状的。比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正义的自由主义原则。似乎有一种论点认为:“正义”作为他使用的术语,符合社会学的解释。那么,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即使不同的人说相同的语言,他们也使用带有不同参照物的相同的术语。人们的不同兴趣必然会产生分歧,比如鱼贩和海洋生物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使用“鱼”的概念时,“鱼”代表了略有不同的系列动物(从鱼的角度看,鲸是鱼,而鱿鱼和章鱼是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尽管如此,公平的利益权衡仍然是正义的基本属性,因为每个人在承认或者反对制度时都使用这个术语。而且马克思的论证表明,不会有任何一致的公平概念能被应用于制度之上。总而言之,“社会正义”对每个人来说就像“燃素”。

留用法可能是把社会抽象地分成正义的社会或不正义的社会,这种划分受到了一种自由的、神启的观点的指导(“雅典的奴隶制正义吗?”人们历经了两千年以后才追问这个问题)。

马克思深思熟虑的政治考虑所具有的因果关系被一些人否定了,这种否定是常见的对马克思的解释。斯坦利·摩尔(Stanley Moore)是近来一位足智多谋的支持这种解释的人。依照这种解释,马克思至少在他的成熟的且非乌托邦的著作中使激进的社会变革作为和平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这一活动以旧社会中的短期经济目标为动机,比方说封建制度中的资产阶级的商业活动,或者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合作与和平的工会主义。<sup>①</sup> 有组织的政治运动从事于斗争活动,它们拥有大规模的、长期的目标,但是这些政治运动充其量是不必要的,而且最糟糕的是它们会导致无意义的、血腥的以及残酷的失败。有人强调这些运动是自发的、经济的、不关心政治的运动,而伍德则受到了这种强调的诱导。对伍德的这种判断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否定而提出的,即否定我们在生产关系被涉及的地方拥有诸多选择并且能够塑造如下所述的政治领域:

因此政治行动对马克思而言是革命实践的次要时期。政治制度不会也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而只能与生产方式相协调,人类自身已经在创造生产方式了。<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例如,《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最初发表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5年第4期),现载于《马克思、正义和历史》(Cohen等人编辑),第222页、第226页、第233页。摩尔将这种科学的变革观与存在于马克思思考中的持久的“乌托邦”困境区别开来。在本章中,我将受限于这种观点的最极端的方面,即否认:那些大规模的、有长期目标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在马克思成熟的和科学的革命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讨论一个更有限的主张,即政治革命的主张。政治革命的主张是说:在国家控制之下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一定不会带来激进的变革。这个主张是摩尔的观点,实质上也是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和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共有的观点。

<sup>②</sup> 参见伍德:《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第28页。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把对大规模的选择的考虑——这种考虑被革命斗争和有组织的运动深化——看作是对激进的变革具有决定性作用,并在适当的环境中奏效,而且对任何既定年代的革命的来临都独立地发挥决定性作用。(迟早都会发生的有效考虑,也许逐一地由生产力的增长来决定。这是我在第五章将要面对的独立的问题。)我对1870年英国工人的思考背景的描述,是直接来自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取的,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在1870年4月9日致迈耶尔(Meyer)和福格特(Vogt)的信。在信中他写道: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sup>①</sup>

下述观点遍布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生产方式可能或者不可能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产生,这取决于政治进程的过程。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关于法国政治史的著作中是一个反复谈论的主题。在那里,法国的工人阶级被描绘成无法重建社会,其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障碍,比如拿破仑思想和城乡对立都没有被克服;其原因还在于工人阶级没有充分认识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sup>②</sup>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胜利的说明中,他认为持续很久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时期发挥着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592页。

<sup>②</sup> 查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683页;《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4页;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0页。

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有大规模的思考和劝说,特别是发生了英国内战和法国革命。<sup>①</sup>

有一位重要的历史理论家,他否认人们对社会系统的理性选择在实现这些社会系统时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位理论家不是马克思,而是黑格尔。对黑格尔来说,世界历史的变化总是理性的计谋,是人的生活方式的不可预期的结果,是英雄的自我决断。人们试图通过理性地思考可行的社会事实来建立更美好的社会,这个尝试注定是失败的。“智慧女神米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这个对未来的消极态度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部分遗产——马克思对此竭尽全力地反对。如果马克思接受“正义”的社会学解释,那么这样的马克思就是改装了的、符合黑格尔的马克思。<sup>②</sup>

我的研究对象至今仍是社会系统中的“正义”。然而,伍德对他的解释提出的许多论据,都首先与个人的经济交易中的正义有关。特别是,马克思被期望去相信典型的资本主义工资交易是正义的,因为这些交易符合正义交换的标准——这个标准在功能上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把这种“正义交换”解释为一个社会学范畴,并把它用于支持如下观点:正义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社会学范畴。

伍德文本中的论据反对将典型的工资看作是不正义的,这个论据在我看来是决定性的;与此同时,这个论据将这些工资交易描述成绝对的正义——依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这个证据至多是让人感到

91

<sup>①</sup>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同样的观点形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以及《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9页中的一段的末尾,“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sup>②</sup> 参见伍德:“对马克思来说,正如黑格尔所言,道德理性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卡尔·马克思》,第132页)。

混乱。“不是不正义”不意味着就是“正义”，这就如同一个无神论者对神的美德的反驳意味着对他而言恶魔确实存在。而且，马克思否定交易是不正义的——一旦我们看到了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我们就有了不得不同意的理由来假定：马克思的社会系统的正义观不能由他的交易的正义观推断出来。

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确实认为创造剩余的工资买卖合同有三个特点。第一，至少如果在交易中没有使用欺诈或暴力，那么劳动力的使用权被转让，从而使含有剩余价值的产品属于资本家。第二，在这个使用权转让中，对劳动力的出卖者没有不正义。第三，在通常情况下，等价商品被交换。因为，按照科学的方法，更可取的经济价值标准，即一天劳动力的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一劳动是在所讨论的社会中，按照当时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计算，能够满足工人一天的生理需要的劳动。而且平均来看，这是一天的工资商品的价值。<sup>①</sup>

伍德将讨论的段落作为一种声明，即声明资本主义工资交易很有代表性，而且通常来说是正义的。<sup>②</sup>但是马克思精确表达的全部内容：相关的工资交易转让了财产权，这不是不正义的，而是交换了经济等价物。简言之，这些交换不应作为欺诈或不平等交换的例子被批评。当然，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的两种论证只是支持了这个消极的结论。对“没有欺骗”的论证，构成了对平常事例的日常语言分析，这些例子包括购买某种能够进行生产的东西，比如一个葡萄酒商购买酵母，一个农民租一天马。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关心经济交易中的正义的人会相信，如果酵母的价格或马的租金少于它附加到产品中的价值，那么就会有不正义。马克思要求一些人指出工资与酵母的价格或马的租金之间的差别——这些人认为典型的工资交易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交易产生了剩余。这种要求就其自身

92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第219页、第193—194页，对财产权、不存在不公平、平等这三个观点举的例子。

<sup>②</sup> 参见伍德：《马克思的正义批判》，第19—26页。

而言不是要赞同：正义是在劳动力使用中的财产权转让的客观性质。另一个论证的大意是：根据对经济价值的科学的合理的测量，等价的商品在普通的工资交易中被交换。但是测量的合理性应该建立在它的独立的解释贡献上，即测量在解释价格、利润、增值和雇佣时作出的贡献。因为正义范畴没有作出这样的贡献，所以这些论证能够用来说明经济交易中的正义不是一个科学范畴，因为它在道德考虑中的使用与科学地合理地测量经济价值相冲突。

马克思应该至少有一个极好的理由来避免从对不正义的否定跳跃到对正义的维护。如果正义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意味着商品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进行交换，就像马克思的这些段落中的许多段落指出的那样，那么在商业循环的顶峰与低谷中，对劳动力的异常需求将使工资交易普遍的不正义——资本家蒸蒸日上，而工人每况愈下。虽然马克思讨论了违背“价值规律”的情况，但他从未做出关于循环的不正义的显著声明。

仅仅是“没有正义”的结论，对于马克思的明显的目的来说就已经相当充分了。在马克思的这些段落中，他想说明：对不正义的抱怨不能作为一种合理手段来激进地挑战资本主义，而且当以考茨基(Hodgskin)和其他左翼里卡多学派(left-wing Ricardians)的方式运用劳动理论时更是毫无用处。可取的结论不是工资交易常常是正义的，而是“他们应当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sup>①</sup>

即使马克思真的相信资本主义交易是正义的，那么从马克思有代表性的、通常的观点来看，也没有必要把这个判断转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或者转移到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上去。马克思的日常语言论证呼吁人们对个人交换行为进行相当具体的考虑。他的其他论证同样依靠等价值概念——这个概念能相当具体地分析资本主

<sup>①</sup>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义交换,以及成交的价格、利润和相关现象。没有相应的、大量的日常假设或科学的价值标准,能为整个经济系统提供一个合理的正义标准。

伍德的文章和他讨论马克思的书中也提议说:道德通常不只是正义和权利。这一提议最起码值得我们进行简短的讨论。根据伍德提出的尝试性假设,马克思对制度的判断要凭借这个制度具有的促进“非道德的善”的倾向——这些善包括自我实现、安全和身体健康。当马克思攻击道德时,他正是凭借制度具有的促进“道德的善”的倾向来攻击别人对制度的判断。伍德解释这两种善的差异如下:

[在]一个较狭窄的且我认为更加合适的“道德”意义上,……我们将道德的善和恶与非道德的善和恶区分开来。我们都知道在评价事情与做事情之间的差别,因为“道德律令”的良心告诉我们“应该”去做;而评价事情和做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满足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想要的、或者对我们而言满足我们的善的概念(或者对于我们想提高其福利的某个人来说——渴望非道德的善不一定是自私的愿望)。<sup>①</sup>

伍德对马克思的观点的这种塑造具有非常简单的优点。不幸的是,这种塑造使马克思的观点过分类似于传统道德的方式,而几乎没有其他方式。我们需要具有更复杂结构的道德概念,我将用这一概念来维护马克思观点的正义。

在伍德的技术意义上,对非道德的善的追求过于接近传统道德,因为它可能包括对正义的追求,如果这种追求建立在某种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这种心理学有时的确支持这种观点。多数人想与他们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处于正义的关系中,使人们的良心和道德规则达成一致。他们热切地期望在平等基础上的互惠——更多的

<sup>①</sup> 伍德:《卡尔·马克思》,第126页。

自然主义正义理论家,比如卢梭、罗尔斯、皮亚杰(Piaget)、科尔柏格(Kohlberg),他们都努力去描述这种平等互惠。如果使人们确信——也许是一位聪明的尼采主义者使人们确信——一个更高的规律使人们违背了正义关系,那么他们仍将重视这些关系,尽管他们感到内疚。他们将会喜欢哈克·费恩(Huck Finn),因为他决定要平等地看待黑人,而且他们承认这样做有些刚愎自用;另外还因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很难说有多少人以非道德的善的方式评价正义,这些人似乎包括许多支持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目标的人,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在技术意义上,对非道德的善的排除,不能将正义标准排除在他们的评价系统之外。然而如果马克思确实在攻击道德,那么拒绝正义并拒绝作为社会主义的荒谬基础的同类标准,当然是马克思思考的核心。

另一方面,“道德与非道德”的区别夸大了马克思的观点与传统道德观点的差距。如果社会主义被创立,人们一定被引导着出于对他人的关心而承担责任。这些其他人可能不局限于家庭和亲密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社成员,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家人和亲密的朋友会受益。如果公社被攻破的话,他们的家属和挚友更多地可能是过着流亡的生活或者生活在贫困中。事实上,马克思建议一种对人的高度关心,这种关心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它典型地反映在曼彻斯特的工人们支持联盟的联合封锁,反奴隶制的行动造成了长期的停工并使棉花的产量下降。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马克思鞭策人们去关心他人,这激励着人们去承担责任。

同样,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中,原则性地抵制追求直接的利己主义的诱惑,对马克思来说发挥着必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以“按劳动时间分配”的原则为基础,人们对被解雇的担心不再作为让人们拼命工作的刺激手段而存在。但是如果人们在能够避免工作的时候就不工作,那么经济就无法运行。甚至更明显的是,在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执行“从按劳动能力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原则,这个阶段意味着人们的承诺不再是成为一名自由骑士。当然,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将包括不断

高升的互相关心和以争取共同的善为基础的自尊心。但是,他强调第一阶段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个人的和直接的利己主义的影响。<sup>①</sup>同时他不认为:将狭隘的利己主义放在首位的诱惑,在社会主义的较高阶段不存在,甚至人们都感受不到它。总之,人们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行为进行尽职尽责的斗争,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兢兢业业的社会主义者们对共同的善的关心是对全人类的普遍的且平等的关心。在马克思看来,在社会主义比较初级的阶段中,阶级冲突的残余将阻碍这种关心。

当由直接的个人所得带来的诱惑被关心他人所抵制时,人们自然会说某个人被他或她的尽职意识所感动——尽职意识在于他或她认为这是应该做的。因此,在伍德的技术运用中,马克思是否谴责总体的道德动机,这一点还不清楚。

在这种异议中,最初自发性在社会选择中的作用可能是根本问题。假设在革命过程中,人们苦恼于如何使直接的利己主义与关心他人协调一致,但这个苦恼不起任何作用;变革是通过谨慎地追求经济上的利己主义——并有可能伴有这种利己主义的自发地且冲动地情感爆发——才得以发生;那么,马克思也许会把对这种协调一致的赞同与对应做什么的实际考虑联系起来,并且在他对道德的攻击中谴责这种实际考虑。社会变革要求不要为私人福利与集体福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苦恼。然而,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被马克思本人谴责为“庸俗的人”的观点。<sup>②</sup>

## 一个诱人的结论

在一个人被迫接受马克思对道德的批判之前,他必须陪马克思

<sup>①</sup>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sup>②</sup> 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库尔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0页。

走多远？我认为存在着四条拒绝道德的基本主张：

1. 大多数人的不同需要与少数人的不同需要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即平等的终极标准将使人们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2. 有效变革的策略需要阻碍而且有时需要暴力，这两者与主张平等关心所有人的明确观点不符。

3. 在历史进程中，正常的人们都有着深刻的道德差别，这些差别不是因为不理智或无知造成的。同样，在今天存在着相冲突的善的概念，它们不能通过合理的劝说而得到解决。

4. 在长期与短期之间的冲突、文化与所有人最小福利之间的冲突、生产与休闲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如此尖锐，以至于没有一套基本制度是最好的。只有历史变迁才能消除这种冲突。

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反思将承认这些前提都可能是有效的。然后，他们应该推论出道德不能作为政治行动和社会选择的适当基础。这是暗含在马克思著作中的反道德论证的部分魅力所在。对于人们对反道德这一结论发生的激进的声音来说，这个结论以一些少有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张为基础。当然，正派的人不能放弃道德，如果他们认为选择就是狭隘的利己主义、任性或残忍的权力政治。在此马克思也有一个特别的哲学贡献，那就是他描述了一个政治学观点，这个观点是正派的但却不是道德的，这超越了其他作家。





## 第二部分

# 权 力





### 第三章

## 统治阶级的概念

### 导 论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设法用马克思在社会冲突方面的著作来澄清哲学的标准问题。然而,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助的关系。分析哲学的概念具有的丰富性、清楚性以及对其抽象的涵盖限度,表明它们能够进行描述和解释,而这一解释在主流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的零散研究中被忽略。这不是说当政治哲学家们试图帮助社会科学家的时候,政治哲学家应该忘记社会现实。因为他们为所有历史社会设计的概念和解释方案不能用于所有社会,比方说在高级的工业社会里,所以这些概念和解释方案在检验现实时几乎没有用处。哲学家想方设法要帮助社会科学家,他们最好具有广博的知识以便能够判断出什么选择是最有可能值得进行经验主义研究的。如果哲学家们描述或阐明了需要解释的值得-问的问题,或者值得一试的解释方法,那么他们将会有所帮助。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的古典政治哲学家,都在纯粹的概念分析与经验观察之间以折中化的方式建构理论,并以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政治哲学作为与众不同的领域,它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项事业的复兴。否则,“政治哲学”将继续成为伦理学分支的一个标签,并且成为历史哲学的一个次要分支。

下面两章是对这种折中化的理论建构的运用。我希望说明:严谨地对马克思的解释框架进行哲学重构将提供许多分析工具,一旦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知道这些分析工具的用处时,他们将想要使用它们。尤其是,我将设法说明:一旦马克思的统治阶级概念被理解,那么“政治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这个问题对于分析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就是重要的工具,但它却被忽略了。

既然人们致力于政治科学要以对这种忽略的指责为根据,那么对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的完全压缩性的说明,应该帮助在这一领域之外的人们从事这方面的讨论。政治科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但却是经验主义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仍是20世纪6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多元论”。达尔(Dahl)对纽黑文(New Haven)政府的研究著作《谁在统治?》就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影响的例子。非常粗略地讲(稍后会有详细的分析),多元论者研究:占有不同资源不同的人,如何影响他们各自在政治游戏中获胜的机会。研究的结果总是:资源被较多地分散,成功率对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这些结论是运用某些行为标准的结果,那些行为标准不需要很多的应用理论。比如,在达尔的研究中,有利于某个特定委员会中的特定团体的不一致的投票比率数,是记叙纽黑文权力的重要标准。多元论者按照这种形式的讨论以及加入到讨论中的方法论预设,在政治研究中常将自己视为“行为革命”的领导者。

我把多元论称为最重要的方法,并不是说今天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是自我叙事的多元论者,虽然有许多人是这样的。我们将看到有许多其他的人,无论我们怎样将他们的理论与多元论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理论都会被最有效地界定,在这个意义上,多元论是最重要的方法。特别是最近几年,人们对多元论持有多种形式的异议。一开始最流行的是对“权力结构”的研究,体现在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

er)、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的著作中。事实上,多元论者曾经是评论亨特和米尔斯的人。权力结构理论家认为,政治权力通过描绘出影响政府的网络图示而被最好地记叙,它以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为基础。权力结构理论家们也接受了比多元论者的研究方法更广泛的方法。比如,亨特的亚特兰大研究,这项研究没有依靠成功行为的统计表或者不成功行为的统计表,而是依靠调查人们对其他人的影响的想法。

最后,结构功能主义者研究了政治系统和文化的政治方面对全部社会系统作出的贡献——这些系统使社会保持一致性与差异性。作为重要理论,帕森(Parson)的著作是个典范,而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的《公民文化》则最有影响地将结构功能思考运用于大量的政治数据之中。结构功能主义关注结构并避免推论数据的僵硬原则,尽管它们在原则上与多元论有很大差异,但是其方法从一开始就与多元论和平共处。最终我将为作为政治科学的政治学来研究这种和平共处的部分应用。

尽管有这种温和的术语,但读者们应该发现技术方法的集合相当接近于在非学术讨论中使用的不同方法,比如“我们真的生活在民主之中吗?”或“政府的基本管理是为少数人的巨大利益吗?”(在美国,对后一个问题回答“是”的人将近一半!)<sup>①</sup>同时,对现代科学

① 更精确地说,在1970年提问“你认为政府的管理是由少数人的巨大利益决定的,还是为了全体人民?”,答案是:少数人的巨大利益占49.7%,所有人的占40.5%,其他情况占9.6%。参见理查德·哈米尔顿(Richard Hamilton)和詹姆斯·怀特(James Wright):《新政治社会学指南》,印第安那波利斯,1975,第26页。数据来自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年度调查。此外,还有两个问题:“有多少政府管理者会说谎?几乎没有/不是很多/相当多。”“你认为你能有多长时间相信华盛顿政府做出正确的事情?总是/大多数时间/有时。”(“从不”常由人们自愿说出。)最消极地回答所有三个问题的人的比例是,在1972年白人占24%,黑人占31%,工业工人占34%,服务业工人占40%。因为只有11%的人感到舒适,即这些人在职业和技术这两类选项中选出了舒适的答案,所以似乎很有可能,大商业对于“少数人的巨大利益”来说是重要的——回答问题的人们对这些少数人心知肚明。参见罗伯特·吉尔摩尔(Robert Gilmour)和罗伯特·莱姆(Robert Lamb):《美国的政治隔离》,纽约,1975。

中的政治权力概念进行研究,在另一方面又具有普遍的重要性。随着20世纪大学的学科划分,哲学家们少有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我希望下述策略能提供有帮助的理论样式以作出更多的贡献:将具体与抽象、经验与概念、现在的领域结构与过去的适当结构相结合。

## 指责忽略

政治理论的中心任务在传统意义上是揭示政治权力存在于哪里。只要人们想改变情况(或阻止改变),而且只要政府所做的影响人们成功,那么这一传统就仍然是合理的。但是,不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许多个社会问题,可能表达在“政府权力在哪里?”这个句子中在这里,政治理论家不要认为自然科学家不重要,认为他们不想废除一切,而只是在说明“能量”、“波”或者“大脑中的信息储存”。更危险的是,政治理论研究者会忽视对政治权力问题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差别,并最终失去简单明了的重要问题。我的目的是要说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

今天政治研究中最重要政治权力问题大概是:“在何种程度上不同的人从政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通过哪些制度机构或非正式的机构,不同的社会集团能够影响政府?”“什么能使政府有效且稳定?”缺失的问题是(同样也是大概说来):“政府为谁的利益服务?”我希望说明被忽略的政治权力问题与力求解决的政治权力问题是怎样的完全不同,并指出这种忽略是因为过度僵硬的方法论和政治理论假说造成的,因此这一假说应该被质疑,而不应被假设。

社会科学危险地忽略了关于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被更加详细而明确地加以说明。因为最起码“政府为谁服务?”是一组问题的标志,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它们。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个人可能询问共谋理论的真相,或者一些其他假说——政府官员用这些真相和假说有意识地指导人们帮助某一社会集团,尽管这样做与其他人的利益冲突。对大多数现代社会包括美国来说,这些假说可以很充分地推论出:人们忽略对假说的研究并不危险。另一个极端的

情况是,利益问题可能作为实际花费需求的报表而被理解,并且作为政府为不同社会集团利益采取特别行动而被理解,而没有注意到在政府做的哪些行为与这些行为满足了哪些社会集团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过程。至少在政策研究上,利益问题没有被忽视。

我辩护的问题存在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即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符合一个特定模式的程度问题。根据马克思赋予这个短语的意义,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统治阶级?

## 什么是统治阶级?

马克思的政治学著作有一个特殊的形式。一方面,他提到的政治事件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中叶法国的动乱,具有巨大的且明显的力量。难怪恩格斯将非常详尽的文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视为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sup>①</sup>另一方面,马克思没有详细说明在这些著作中运用的政治理论。然而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资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是统治阶级,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从未有人以一种相当普遍的、详细的且精确的方式告知我们什么是统治阶级。这种情况部分地导致了富有同情心的解释家们对马克思的这部分意思的争论,现在这个争论则集中于所谓的“结构主义者”与“非结构主义者”之间日益减少的争论中。

马克思以普遍声明的方式提出一系列言辞激烈的且高度隐喻的声明。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sup>②</sup>。

<sup>①</sup>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583页。

<sup>②</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sup>①</sup>

人们对单独截取的这些段落有着通常的解释。这些段落对具体表现为唯一政治统治的管理委员会的谈论,暗示了一个共谋理论,这一理论引导政客们与商人们定期会面来决定政治方针,而当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后者向前者发号施令。这些对奴役和战争机器的谈论,暗示了国家不间断地使用公众力量将劳动增加到最大,将雇主们的花费减到最小。然而,根本没有一个理论是合理的,也没有一个是马克思的。与主张大商人要从事政治计划相去甚远的是,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的存在,这就典型地使商人们与直接参政分开。比如,路易·波拿巴帝国被直接描写成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多妓女和最后的国家政权形式”,并且“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sup>②</sup>的制度安排。马克思对于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唯一讨论,是在《资本论》中的英国工人为缩短工作日的战斗。他描写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取得国家干涉权的胜利。

107 面对所有这些适当情况,人们被诱惑着离开马克思尖锐的言辞去解释这些情况,并将马克思的理论变成多元论的形式:政府所做的事情受不同利益集团强有力的势力均衡的影响;大财富是大势力的源泉;大商业是最重要的一个利益集团。这个理论当然避免了非真实性。但是它在解释过程中近乎琐碎。因此很难找到一个不同意政治靠钱说话、

<sup>①</sup>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sup>②</sup> 同上,第54页。

并振振有词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当然,作为注释,如果其他办法都失败的话,那么乏味地承认存在着经济联系是唯一可试的办法。对马克思来说,根据对大权在握的政治统治、社会奴役和作为战争机器的国家的声明,能够完全充分地推论与归纳出利益集团的学说。

我们既要忠实于马克思的一般的且生动的陈述,又要忠实于他作为政治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的具体实践。当以这种方式重构马克思关于社会中存在统治阶级的声明时,就可以推导出三个主要方面:政府行为,产生这种行为模式的机制,打破这种模式的可能措施。概言之,如果政府行为以一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集团联合体的长期利益为指导,如果有明确的机制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政府行为与集团利益的联合,而且如果这种联合不会被政府允许的行为打破,那么这个社会集团或社会集团联合体在政治上是统治阶级。因此,国家采取的行动会带有某种障碍和差别,它就好像是管理资产阶级日常事务的执行委员会,只受资产阶级长期利益的指导(“大权在握的政治统治”),而且将继续这种被指导,除非它被自身所不允许的物质挑战打败(“资本反对劳动的战争机器”)。<sup>①</sup>

---

① 马克思如此定义的国家概念,与他对国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的实质主张相比,是韦伯(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国家概念的前身。对马克思而言,国家是组织起来的强制机构,它受到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系统的认可,这个观念系统控制着领土内的武力使用权,并独揽着这一权力;而且,国家能够非常充分有效地使用这一权力,以便官员们——那些在机构中执行公务的官员——下达的命令都能就这样被服从。由于这个机构具有的分散性、集中性和强制性,马克思认为“真正所谓的政治权力”以阶级对立为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它与无阶级社会不相容——在这个无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也可参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页;《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当然,国家虽然被定义为具有强制性功能和职能,但它也有非强制性功能和职能。这对马克思与韦伯的国家概念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国家刚好包括哪些机构。马克思对国家和社会其他成员间的联系的一些描述引发了一些问题,为了避免混淆这些问题,我将相对狭义地、合理地说明政府和私人权力之间的差别,以此来说明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局限性。由此,“国家”就可以与“政府”互换使用。出于其他目的,我们去追问比如对外关系委员会是否国家的一部分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有帮助。

关于存在统治阶级的三方面论述中的第一个方面是主张：在所讨论的社会框架中，政府以服务于一个社会集团或集团联合体的长期利益的方式行动，即使那些利益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不一致。然而这并不是说，政府从未做过有利于次要集团的事情，而且统治集团的损失由政府独自承担。实际上，如果不是故意的，那么政府行为的这个方面一定是处理默许问题或合作问题的措施——这些问题不是由政府引起的，而是由统治集团的立场导致的。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服务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满足镇压人民宪章运动时期社会剧变的需要。<sup>①</sup>但这不是说唤起劳动阶级的暴动行动所付出的代价总是高于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依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长远的投资使激起愤怒的干涉行为成为必要。

政府政策除了需要做出让步之外，它还将受到另一种次于统治集团的理想状态的情况的影响：政治领导们不如想象中那样聪明和博识。我们正在研究：在某个时期，鉴于那时的技术与知识的局限，并且鉴于当时的政治成功与行政技能和行政自律之间肯定没有极好地配合，政府行为的全部方针是否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就像统治集团所期待的那样。另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常常是一个无能的且反复无常的执政者。但是资产阶级需要在机构之外的某个人来进行镇压统治，而这个人显然要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的救助。从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看，这个人是最有效的。同样，罗斯福平衡预算的意图可能对所有社会集团都是一场灾难。如果这些意图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的无知，那么这些结果就不能挑战关于统治阶级的假设。尽管如此，在评价统治阶级的假设中，求助于人类弱点的做法不能滥用。如果所谓的错误意味着难以置信的愚蠢，或者意味着陷入了暗示利益相争的影响模式，那么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情况反映了政府行为具有的实现其他集团利益的独立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314页。

倾向,而这些其他集团并不包括被假定的统治阶级。

关于存在统治阶级的第二个方面的论述是关于政府行为与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利益之间的联系本质。如果这个集团是统治阶级,那么这种联系不是意外。在任何特定时期,各种明确的机制运行都是用来保持这种连接。而且除非政府之外的资源发生大的变动背离统治集团,否则如果旧的机制无法保持政府行为和统治集团的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那么新的社会机制将取代旧的机制。

这些机制的多样性和面对新情况置换的流动性,是马克思的统治阶级假说与共谋理论之间在形式上的最大差别。比如《法兰西内战》包含自大革命以来的一段法国政治史,在此期间政府基本形式的五个主要变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些变动是由于当环境发生变化并且社会发展的时候,资产阶级的需求指令发生了变化。<sup>①</sup>

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系统中存在着一些相当持久的机制(它们不是共谋的)。马克思强调,国债意味着任何反对资产阶级利益的急剧革命都将报之以财政混乱。<sup>②</sup> 如果政治家们不被资产阶级精确地掌控,那么大众媒体就被他们掌控。<sup>③</sup> 即使政治家们不是出身于资产阶级,那么工资、工作环境,以及主要政治领导人的生活方式使政治家们与资产阶级同化了。<sup>④</sup> 然而,对一个集团是否统治阶级的最终检验是,当旧的政治游戏规则不适合这个集团的利益时,是否有充足的资源使新的规则生效。路易·波拿巴的权力上升是马克思时代的一个主要例子。当代的例子可能是,当议会民主制不再适合矿主、银行家、制造商和大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时,智利政府实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机制改革。

毫无疑问,一些理论家也可能将这个集团标注为统治阶级,即

①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4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68页。

③ 同上,第53—54页。

④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使某个特定时期的统治集团没有能力使用资源来开始新的政治游戏规则。但是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提出统治阶级是否存在时的重要的实践动机将由此缺失,实践动机即努力检验“按照现有的发展道路前行”的限度,并以此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且在对这个词语的其他理解中,有利于统治阶级假说的经典假说将是无效的。统治阶级的假说常常是诱人的,它在回应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新挑战时,有能力为政府制度变革提供历史解释。最后,我们通过政治统治在相关的危机时期能保持其连贯性,来检验统治集团或集团联合体的统治范围,也许我们会使这个集团或联合体具有相对的独占性,并因此使它的集体利益相对明确。比如,如果当老派的政治领导人在危机时期停止为重要的额外的政府利益服务时,他们会被撤职,那么这种情况为假设政治家们本身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提供了基础。通常,我们通过观察集团利益严重冲突的危机时期来判断哪个集团占据统治地位。集团在这些冲突的情况下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能力,就能够说明正常时期的根本统治秩序。

最后,主张存在统治阶级的观点,与在政府行为和统治集团利益之间存在的联结强度有关。如果这种联结被下述行为终止,即政府鼓励的行为、保护的行为,或者政府无论怎样都会允许的行为,那么就不存在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统治只能由额外的政府资源的重大变化来终止,这种重大变化必须是由“离开现有的发展道路”带来的,因为这些道路可能是政府在回应社会不满时制定的。请以对比的方式设想一下19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权力图景。在这个构思中,政府把服务于大商业的利益作为各种政府机制的结果,并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身。但是选举人可能已经通过受政府保护的选举程度而改变了这种状况,而且在随后的数十年,他们做到了。如果19世纪初的政治直到今天还具有潜在的变革能力,那么人们就会错误地说大商业在政治上是统治阶级,而代议制国家是管理他们日常事务的委员会;或者国家是资本的战斗机器。这些词组都暗示了国家根据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利益积极地干预社会。然而,如果利益和政策之间的联结通过国家批准的程序而改变的

话,那么任何对政府的社会偏见从总体而言都是对社会统治的势力均衡的消极反映。正确的隐喻不是一台战争机器,而是一个气象风向标。

积极的偏见和消极的偏见之间的差别是统治阶级假说与多元论的甚至是最左派的说明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差别,大商业比其他利益集团更有权势。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多元论者都常对政府的政策方针有着同样的期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默许的利益特权是对少数人的反映,而它对多元论者来说则是对劳动的真实反映。但是多元论者反对那些支持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一种度量标准较多地服务于工人利益,并损害了大商业者的利益,那么当单独使用这个标准时,它作为较大的社会程序的一部分,是对非法暴力活动的战术逃避,或者是对最终履行这种度量标准的风险的战术逃避。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论证了:19世纪末期,部分北美工人的普遍破坏活动在改革进程中发挥了实质作用,比如普尔曼罢工、新奥林斯和匹兹堡总罢工以及南部的人民党党员起义。简言之,在没有说明用什么来打破社会利益与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统治阶级假说与多元论之间的经验主义争论。根据统治阶级假说具有的动力因素,它对改革以及对危机时期的政府行为做出了不同解释。

如果我已经正确地解释了统治阶级概念,那么马克思的统治阶级概念就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对社会利益的主张、稳定的机制以及变革技术。我对统治阶级概念的这种想法是无法从一个简单的定义或者从一个简单的检测中获得统一规定的。但是这种想法却可以在指导隐喻的层面上和在实践关注的层面上获得统一规定。

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他让我们通过个人之间的某种统治关系模式来理解特定的社会集团的关系,比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或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国家被看作是主要的强迫工具,用来在类似的情况下维护上层社会。当一个人考虑主人与奴隶之间甚至听起来都简单的关系时,这个关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精确地

类似于统治阶级概念的三个方面。奴隶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受到限制。他们会因为各种机制而受到限制,有时他们进行变革并且决不受到直接存在的致命武力的限制。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打破了那些镣铐(成千上万的北美奴隶逃跑),但是他们只有通过危险的非法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统治阶级概念就是这样复杂,它至少与之前引用的物理学家的概念一样——比如能量概念——紧密地与统一性隐喻相连。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统治阶级概念指出了社会进程的上述这些方面,它们与关于社会选择的一个特定问题最为相关:在何种意义上大多数人为了引起社会巨变,需要离开现有的发展道路,去做一些危险的、不被鼓励的、也许要受到惩罚的事情?假设你想引发社会巨变。在存在统治阶级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利益反对这种社会巨变,人们有理由持悲观主义态度看待所有构建于下述期望之上的战略:政府将容忍甚至也许会保护进行变革的决定性行动,直到行动取得胜利为止。比如,如果在大商业者是统治阶级或者类似的情况下,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理由悲观地看待通过下述途径引发社会巨变时的前景:依靠选举,依靠成为主要政党中的激进分子,依靠呼吁政治家们的良心或兴趣,或者依靠把骚乱活动限制在警察和法庭允许的方式中。政府将趋向于阻止这些牵涉大商业利益的努力。政府的阻止行为将以政府的系统机制为基础,而不仅仅是以现在的政治家和官僚主义者碰巧具有的愿望、资源和信仰为基础。如果我们开始创造基本的财富,那么政府往往以如果我们只在现有的道路中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做好准备去抵抗政府行为的方式把它们收回。

简言之,统治阶级的概念与选择政治激进主义的人的立场最为一致。统治阶级的概念就像玉的概念一样被实用主义地统一起来——玉的概念包括差异相当大的化学成分的纯度,这些纯度根据宝石商们的利益基本上是不可能互换的。当如此多的对马克思的学术性解释,低估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中如此周密的政治选择的重要性时,就难怪人们经常把他看作是缺少名副其实的政治理论家。

在这个分析中,认为存在统治阶级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主张变革:只有广泛分布的非法的破坏性行动,才能改变政府行为与某个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原有联系。当然,这种活动绝对是针对政治机构的统治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有良好组织的暴力活动,简言之,这种活动就是革命,就像这个术语通常被理解的那样。但是除了革命之外,人们还有其他的方法离开现有的发展道路,比如,破坏性的示威活动、鲁莽的罢工、犹太人叛乱和兵变。

为了将统治阶级的概念定义为一种社会分析的工具,关键的变革机制可能应该被广义地理解,以便所有这些实质的破坏行动可以为打破政府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原有联系服务。如果政府根据一个集团的利益行动——这种行动是由许多明确的社会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并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而且除非资源通过被禁止的、非政府的、疯狂的暴力行为所转移,否则政府将采取这种行动——那么人们有理由提起统治阶级,并且有理由应用马克思的隐喻。而且,即使人们不同意马克思的所有战略观点,政府权力概念也能使人们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统治的基本评价,这一点是有帮助的。美国数百万民众中的许多人——他们的答案是政府在为少数人的巨大利益服务——可能都至少有一个对统治阶级假说的非正式说明,然而几乎没有人一定要参加革命来结束这些利益统治。相反,学院政治学家除了对假说进行专门的革命说明之外,他们反对更宽泛的统治阶级假说。但是对假说的更宽泛的用法会把这个问题划分成若干问题,这有利于促进讨论。因此,从现在起我将采用这种更宽泛的用法。

就马克思特有的社会理论而言,我当然想要声明:这一宽泛的意义上,马克思将资产阶级视为统治阶级,有时他也把其他集团的联合体视为统治阶级。而且,他把这一点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情况,而不是落后的标志或者是回应特殊的危机时期的标



志：“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sup>①</sup>然而，如果将这个统治阶级论题归结于马克思并终结于马克思，那么它将会误导人们。我将大略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马克思非常具体地知道通常用什么来破坏政府行为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原有联系，就我在本节的开端处提到的意义而言，就是用革命来破坏原有联系。当然，在革命是必要的这一规律之外可能存在着例外情况，比如一个不受欢迎的资本主义政权被经历了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达大国包围的情况。但是这些例外情况是基本的革命理论中的反常现象，它们可以通过救助于那些使革命必然发生的典型社会机制和这些机制对现有的特殊状况的影响而得到辩解。而且，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对于变革在经济上和科技上都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而不仅仅对改变落后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这些落后社会由顽固的且刻板的前资本主义集团统治。

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中，存在着下述争议：马克思或者持有较温和的论题，即通过普遍的破坏行动而离开现有的发展道路是至关重要的；或者持较强硬的论题，即广泛的、良好组织的政治暴力行动对变革普通的甚至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该正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含义的这种争论了。

马克思致力于强硬的论题（而且他更有把握致力于较温和的论题），这一点不会令某些非学者们感到惊讶——这些非学者对于马克思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宣言》。在那里，马克思相当明确地提出革命一般来说是必要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的统治。”<sup>①</sup>

对革命的这种强调贯穿于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时期的著作中,它重复在那些非常自信的声明中。比如: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sup>②</sup>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sup>③</sup>

……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sup>④</sup>

虽然有这些清晰、普遍的变革的革命声明,但是仍存在由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提出的有影响的解释。根据这一解

---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③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人民出版社,第194—195页。

④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37页。

释,马克思既反对强硬的革命问题又反对我所勾勒的稍微温和的革命问题,但马克思却赞同“运用于他整个著作”中的另一个变革概念。<sup>①</sup>对艾维尼里而言,虽然马克思因为想变革社会的基本结构而最终成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从为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变革奠定基础这个普通意义上说,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个革命者:

在马克思思想的前后联系中,革命决不是为了达到目标而使用物质力量的暴力行动来战胜物质力量。建立在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基础之上的革命观将最终以手段取代目的……马克思将权力作为不同的政治手段来使用,他承认变革条件(而且意识作为变革条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尚未成熟。然而在权力没有通过不同的政治结构加以运用的地方,权力多半是过剩的,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本身通过内部变革的辩证法已经跟上了正在实现的发展趋势。由此,社会行动的目标在没有求助于物质力量的威胁的情况下得以实现。一个人通过说明物质力量对马克思而言不是失败的就是被证明是过剩的,就能够概括出马克思的立场。<sup>②</sup>

当马克思认为工业工人有时求助于革命时,这只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错误。<sup>③</sup>在那里,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通过增加合股公司和工人合作社而创造出经济变化的手段,同时它通过制定普遍选举权而创造出充分的政治手段,以便使社会统治的部分形式发展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第 III 卷第 27 章)中对合股公司的出现的描述是“他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及其向社会化生产体系的内部变化

① 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剑桥,1968,第217页。

② 同上,第217—218页。

③ 同上,第220页。

的最广泛的描述”<sup>①</sup>。“……合作运动就像股份公司那样向马克思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sup>②</sup>“马克思预想了通过普遍选举权,革命将在较发达的国家发生……因为他将普遍选举权看作是解决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的办法。”<sup>③</sup>

艾维尼里认为革命策略对马克思而言并不总是错的。这些革命策略或许适用于“拥有强烈的专制传统、人数众多的唯命是从的农民和工业发展较晚的国家”中“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地方。<sup>④</sup>我们还不清楚艾维尼里的马克思如何能承认这些例外情况,因为“马克思断定:在内在的经济方面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去努力创造革命的政治条件,这种只在政治上的革命注定是失败的”<sup>⑤</sup>。艾维尼里当时提出:在相对落后国家中发生的工人领导的革命,能反映出经济发达国家的革命进程;为了取得成功,革命必须很快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加以巩固。<sup>⑥</sup>后来,艾维尼里提出,对在相对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认同,存在于马克思基本思想的张力之中:“这种历史相对论可能是马克思思想中最令人失望的因素。”<sup>⑦</sup>无论如何,艾维尼里的马克思反对广泛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甚至是非法的破坏活动,因为这些多余的破坏活动充其量是在发达国家中违背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的常规说明,而且最多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向马克思的一般性观点提出解释性挑战的需要。

这种非革命观点作为对马克思整个著作中的观点的解释,不能保留我在一开始就引用的清楚且普遍的革命声明。在艾维尼里的书中,这种观点通过完全片面的解读而得到辩护。

① 梭罗莫·艾维尼里(Shlomo Avineri):《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思想》,剑桥,1968,第177页。

② 同上,第180页。

③ 同上,第218页。

④ 同上,第220页。

⑤ 同上,第194页。

⑥ 同上,第167页。

⑦ 同上,第220页。

为了公平起见,我主要引用对艾维尼里本人的观点来说重要的著作。在艾维尼里对这些著作的评论中,当他将适度的战术建议提升为普遍原则时,他向来忽视那些清楚的且普遍的对革命必要性的主张。因此,当艾维尼里将《宣言》看作是马克思的变革概念的重要指南时(尤其参见第204—208页),他忽略了关于“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段落,这个段落有利于详细检验十项措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些措施将是“相当广泛地适用于”1848年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本人对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的战术建议的相关作用的评价: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被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①

简言之,首先这十项措施并不重要,而且它们应该根据从政治革命中吸取的积极教训进行更激进的修正。

同样,艾维尼里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看作是反映了马克思对政治权力与社会境况之间的联系的看法。② 他甚至一字不差地提出了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的号召。但是这个号召

①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页。

② 艾维尼里(Avineri):《社会政治思想》,第193—194页;同时参见第139页。

被注解成一个温和的声明：“实践通过人的行动来改变现状。这种改变也可以通过人的社交性和其他导向性来实现。”<sup>①</sup>刺刀的使用是其他导向性的，也可能是社交性的，但这肯定是在非常严谨而扩展的意义上来说的。至于在1850年9月15日的流放会议上的声明，艾维尼里将这一声明从相对含混性中拯救出来，使其成为证明马克思具有反起义倾向的证据。但这样做意味着忽视了对进行“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的需要的积极参考，并且将这种忽视上升为原则。下述是明智的且有限的战术提醒：面对1848—1849年的革命失败，开始一种新的注定失败的努力去直接夺取政权，这种做法是愚蠢的。

当然，许多人普遍声称他们是凶猛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却一直都在忠告人们在战术上要适当，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从里到外都在反对革命。艾维尼里的书最具学术性地表达了一个普通观点：马克思在他的实践中不是一个革命者。这个观点特别鲜活地表达在艾维尼里下面的评价中：“1848年马克思的立场。尽管他看到这一年的政治巨变是一个创造社会主义革命局势的机会，但是他一直反对所有武装革命的激进尝试”<sup>②</sup>。当然，马克思的确批判过起义和起义计划，而且有时警告那些注定会失败的冒险行动，特别是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的致命失败之后。但是马克思作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他的大量辩护的要点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嘲笑，因为他们的斗争局限于词句中；提醒人们注意那些能够带来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武装力量的关键作用；提出要追随工人领导的起义的道路（当然是深思熟虑且充分准备的方式）。下面是典型的例子：

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

① 艾维尼里(Avineri)：《社会政治思想》，第139页。

② 同上，第194页。

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sup>①</sup>

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sup>②</sup>

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sup>③</sup>

我有权认为这些例子是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在5月19日的报刊中编辑了普鲁士政府关于报纸停止发行的命令。他对报纸“趋势”的摘要贯穿于整个报刊,这个摘要占据了报刊的前两段,在社论中一字不差地被引用,并且以声称六月起义是报刊的核心作为结束。马克思的革命行动也没有局限于对远方革命的赞扬。他在1848年12月号号召用特殊的武器装备武装起来的民兵组织为穷人而战,而且他开始鼓动人们为拒绝交税而进行斗争,这使他随后被捕。<sup>④</sup>

艾维尼里的书可能是近来最有影响的反对革命解释的论证,同时利希海姆(Lichtheim)和摩尔提出了对非革命论的更加合理的说

① 《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3页。

② 《反革命的新同盟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6页。

③ 《“新莱茵报”被勒令停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2页;艾维尼里(Avineri)将六月起义作为“巴黎雅各宾—布朗基派暴乱”而不予理会,见他书中的第194页。

④ 参见《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8—119页;《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5页。

明。他们接受了《宣言》的天真的读者所了解的内容,即马克思曾经将革命看作是社会变革中的基本的且正常的一部分过程。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回答他一生之中的工人起义的失败、工会运动的增加、西欧大部分地区公民权的扩大,以及他自己的社会理论化的深化的时候,他就已经转到非革命的战略中来了。更精确地说,摩尔利用社会主义变革的非革命观点来说明大概自《资本论》时期以来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的”趋势,同时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于全部的、骤然的、革命的变化有一种“乌托邦”的偏好。<sup>①</sup>对于利希海姆而言,如果从未有人宣布:“如果马克思从来没有清楚地批判在《宣言》中被奉为神圣的雅各宾派,那么他在实践中就不会让它阻碍他。那些引领第一国际的不确定的步伐,并且在巴黎公社遇难之后继承它的遗志的重实效的理论家们,最终成长起来而放弃1848年的人”,那么关键的变革就已经完成了。<sup>②</sup>他们勾勒出马克思成熟的且科学的观点中的标准革命机制,在这个勾勒中利希海姆强调工会活动<sup>③</sup>,而摩尔强调扩大“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合作协会”<sup>④</sup>。

这种解释具有注重四五十年代早期文本中的清楚的证据的优点。马克思后期著作的情况如何?在马克思后期的理论陈述中并没有对革命论题釜底抽薪,他提出了比1848年更全面的关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的基本原理。的确如此,特别表现在法国政治史中的大部分理论章节中,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非革命理论的辩护者们倾向于消除新闻界的革命标语——这些标语表达了同志友谊和个人崇拜。一个人将期望那些综合的且经过思考的段落,然后让它们提供所需要的非革命的矫正方法。)马克思在后期对法国政治历史的反思中强调资产阶级使用残余力量的能力,即当他们通过游戏的选举规则失去了统治地位后,

① 参见摩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与列宁》,第222页、第226页、第233页。

② 利希海姆(Lichtheim):《马克思主义》,伦敦,1965,第129页。

③ 同上,第128页。

④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与列宁》,第226页。



他们会为更具压制性的政体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这就是对《宣言》中没有回答的问题的必要回答，“为什么在现代代议制国家中，工人们不断地选择两种罪恶中最轻的那个，但却不能取胜？”在晚期的政治著作中，马克思不再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成熟的结果，所以他提出僵化和镇压是法国经济发展的结果：

现代工业进程发展、拓宽，强化了资本和劳动的阶级对立，与此同步的是国家权力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角色，它是资本战胜劳动的国家权力，是为奴役而组织起来的公共力量，是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一场标志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sup>①</sup>

当我们假定对马克思而言这不是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趋势时，马克思当然否定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最终地、和平地屈服于普遍选举权（这种权利常常获胜，然后在法国丧失并被路易·波拿巴随意操纵）、工会、工人合作社或股份合作公司发展的内在逻辑。

同样，马克思临终前的主要著作——《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中的政治理论如果非说不可的话，它攻击了那些要求主要通过选举和其他国家保护的变革机制来变革社会的纲领。

……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理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

<sup>①</sup> 参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sup>①</sup>

利希海姆与摩尔进行立论的文本基础是马克思从1870年到1880年作的简短评论，在这些评论中马克思承认工人政府通过在英国、荷兰或美国的选举可能会获得权力。这些评论形成于为大众杂志所写的文章中、接受记者的访谈中、和亨利·海因德曼(Henry Hyndman)的交流中——海因德曼是一位有影响的英国工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政治家。马克思把避免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员遭受增多的迫害作为己任，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了这些评论。实际上，有几个评论是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接受审判时为自己辩护的陈词：如果革命爆发，那么它是因为暴力的统治阶级攻击了通情达理的工人们。<sup>②</sup>

尽管如此，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解释将使这些严格且精确表达的陈述与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中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的论证达成一致。恩格斯在1886年《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了对这种一致性的解决办法。

……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314页。

② 马克思被无罪释放，而且陪审团主席对他的精彩演说表示祝贺。但普鲁士政府用尽各种办法把马克思流放了。

“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sup>①</sup>

我们对阿连德(Allende)时期的智利依然记忆犹新,因此对我们而言恩格斯的意思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他的意思对于那些经历过路易·波拿巴的胜利或者巴黎公社的失败的那些读者来说一定是清楚的。对于有纲领的运动来说,其中一件事就是要威胁主要的社会集团以赢得选举,另一件事是变革社会。如果变革像社会主义的创立那样激动人心,那么国内战争的胜利就是必需的。这一点可以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结束之后的政治评论。但是简短的战略反思却表明了另外的情况。一场将实践活动局限于选举的兴奋感的工人运动,在敌方拥有大量物质和专业军事家的情况下是无法镇压一个“维护奴隶制的叛乱”的。智利和19世纪法国的例子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深刻的但却不令人信服的证据。所有证据中最深刻的是西方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按人数分配的最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分别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史。

马克思自己对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回答使这个战略思考更加明确而且更加肯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中,马克思描述了德国的革命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工人们能够预料到在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会被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出卖。马克思提出的建议为工人们在最终被出卖之前展开独立的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sup>②</sup>

<sup>①</sup> 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sup>②</sup> 参见《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总之,马克思成熟的政治理论中的主要观点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对结束资产阶级统治是必要的。社会主义选举获胜的可能性被证明是相对次要的时间问题。如马克思所看到的,变革社会的道路包括劝告和组织国家之外的战斗力量加入到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选举获胜可能会偶然先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它绝不能取代阶级斗争。当然,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由时间问题带来的困惑,那么我们把这种情况概括为“革命的必要性”就不会严重地误导人们。

我因为两个原因而强调了马克思的革命方面。这个革命方面是人们对马克思的意图进行集中争论的主题。它代表了我努力去抽象并且应用的统治阶级概念的动态方面。在其他背景下,平等地对待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方面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将是重要的。如果民主程序不是他的基本变革机制,那么他就把普遍的选举权看作是重要的收获,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争得民主”,<sup>①</sup>而且将革命的鲜血视为只有在合理期望取得巨大收获时才去承担的巨大负担。尽管如此,人们对普遍的非非法对抗活动和破坏活动的需要一定会成为下述论题的一部分:统治阶级是存在的。否则,马克思概念的独特贡献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失。我大概会在下一章——在我把马克思的政治权力概念应用于今天的政治理论中时——展开讨论。

## 检 验 性

当马克思的假说被搞得易变而且抽象时,人们便开始担心这些假说已经被耗尽其材了。我们如何检验存在统治阶级这个论题?与检验每个有趣的理论陈述的方法一样,我们可以将这个论题与最有影响的现有论敌进行比较,看看哪个更适合解释事件的过程。这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不仅对历史假说或社会假说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对作为事件过程的实验或天文观察也是正确的。

既然统治阶级假说典型地描绘了持久的社会系统,那么人们对长期模式的呼吁似乎会成为主要的经验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必然会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确立论敌观点的可行性或者不可行性上发挥作用。如果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利益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社会变革总是落后于暴力的且有策划的镇压,那么这种情况通过统治阶级假说很容易得到解释,但它不能通过说明选举是调整利益冲突的唯一重要的竞技场而得到解释。尽管如此,对特殊历史时期的研究在这里在所难免。统治阶级假说及其最权威的论敌观点都是因果关系假说,而不是对现行社会模式的预言。当一个假说可能比其他假说更适合一个总体模式时,如果这个假说还伴有关于人们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做出反应的适当的辅助性假说,那么就会有几个假说适合这个模式,至少情况大抵如此。例如,在刚刚描述过的模式中,暴力行动可能只发挥打破道德惯性并将问题置于公共议程中的作用。人们对这些辅助性调整进行了最令人满意的检验,这些检验把社会学公正地移入历史领域中,并在每个充分的细节上研究实际的变革时期,以便人们能够知道哪种辅助性的假说最符合事实。

为了能够涉及主要的普遍假说——统治阶级存在的假说——我们必须根据公平的比较规则来选择明确的历史时期。人们在证实历史解释时获得的一个明确胜利能够强有力地支持前一种假说,并防止后一种假说获胜——在后一种假说中论敌们声称前一种假设最有可能失败。因此,如果1880年的美国看上去像一个由大商业担当统治阶级的社会,那么这并不是很重要。有谁曾经否认过这一点呢?重要的是,如果新交易改革被最佳地解释为: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做出的让步是由某些不打算做出让步的政治领导人做出的,而且这些领导人甚至会在对资产阶级来说物有所值的时候采取镇压措施。因为新交易被认为是工人对国家产生直接影响的例子,或者(二者选其一)是深化的道德意识对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的例子。当马克思主义者试着将新交易的整个过程解释为统治阶级对

危机时期的回应时,他们论证了比如他们能为高压政治时期提供最好的说明之类的问题——这些高压政治时期举例来说包括弗林特(Flint)镇压了1937年的罢工、罗斯福在《租借法案》时期监禁了三位共产党领导人。如果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社会计划——这个计划在镇压罢工和其他不祥的动荡局面之前被制定——就已经具有了他后来的提案意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后来的提案意义,而且“第一笔新交易”中的相对保守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案例。

当然,在这些比较中,一般的假说会利用那些过去常用来解释资料的背景原则来与资料进行较量。比如,一个政策的变化是否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长期利益,这个问题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不是毫无争议的。当然,不能仅仅通过阅读资料来理解:工业工会主义的保护和合作对1937年以后的资产阶级来说是最好的策略。一个人能够要求最多的是,最终的解释性假设能被所有争论者共享,并能保持相对的公平性。如果资料在经过了共有原则的解释之后被认为是有利于其中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就得到了确证。但是一个选择所特有的解释性原则被用于反对另一个选择,那么讨论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无法得到确证。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当依据下述假设——英美关系影响了在帝国主义内部竞争背景下的共同利益——来解释罗斯福的声明时,反驳非马克思主义者对《租借法案》所做的说明就是不公平的。

这种比较的做法可能最终支持折中主义的结论,这一结论使大量的论敌假说同样被证明是对的。但是,这个结论也可能会提出一个论敌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它说明了假说只能通过零散的解释性比较来得到检验。而且达尔文的进化论成功了。

## 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中,近来最重要的关于政治权力性质

的争论是所谓的“结构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之间的方法冲突。既然统治阶级概念的复杂性越来越清楚,那么“结构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可以被看作是由它们共有的过于简单化的处事方式造成的。这个争论是那些令人沮丧的诸多争论中的一个。在这个争论中每一方都大体是正确的,但是当一方批评另一方时却以错误的理由作为根据。

之前,我试图说明马克思的统治阶级概念是通过某些主要的隐喻和对政治选择的某些问题的关注而被统一起来。结构主义者和工具主义者都同意寻找另一种简明性,并强调应该将研究对象纳入特殊的统治阶级。两种方法都描述了维持社会统治的机制,它们的描述都是基本的描述。两种方法的不同意见在于对机制种类的看法——双方对此都进行了硕果累累的研究。非常粗略地讲,结构主义者认为机制是整个制度系统的相互作用,工具主义者则认为机制是典型职业的形成。不管人们选择了哪一种机制,这种简明性实际上都是错位的。每一种方法都易使研究者失去关键证据,并且使研究者在探讨那些因马克思的政治理论而变得重要的问题时失去解释选项。

结构主义者们研究制度和意识形态系统——通过这些系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履行它调整和维持在所谈论的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普兰查斯(Poulantzas)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和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都是这一传统的核心著作。普兰查斯对国家官僚机构提供的不同功能的描述和阿尔都塞对公立学校系统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核心方面的讨论,是因为在普遍的投票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时期的意识形态需要,这些是结构主义风格的典型方案。相反,工具主义者们试图研究工作情况、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模式,以及个体的影响的来源——这些都使政府官员倾向于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行动。米立庞德(Milliband)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被广泛用来概括这种方法。在官僚机构的较高级别中和内阁席位中确立资产阶级成员的优势是典型的工具主义方案。本应加以补充的工具主义标志

在这里可能会对人们有些误导。结构主义者们当然对变革的过程感兴趣,他们的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国智慧史的结晶,特别是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与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的人类学之间的可观察到的相似之处的结晶。工具主义者们从他们的批判中获得标志。

两种方法都超出了人们的兴趣,因为每种方法都被认为是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根据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对人与人之间的影响机制的广泛关注,几乎不能使社会科学家从资产阶级统治的重要问题中转移视线,而且最糟糕的是这种广泛关注使社会科学家们感到困惑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问题。这种指责通常带有谴责的具体形式——工具主义研究“最终没有导致对能够决定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分布以及这些阶级之间的矛盾的主观坐标的研究,但是却导致了对以个体行动者的行为动机为基础的竞争解释的研究”<sup>①</sup>。工具主义者指责结构主义者飞行于抽象之中,在那里马克思政治理论的本质方面丢失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被认为是忽略了“经验有效性(或无效性)的重要性”,<sup>②</sup>而且过于强调一般社会结构的约束性的决定性作用,并忽略了短暂的社会形式、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比如它们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策略的影响。

一般的指责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是因为这个指责从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而不是因为既定的具体原因看问题。被工具主义者重点描述的影响网络是歪曲的。这是因为准确描述特定时期的政府行为与商业利益之间的连接网络不能充分地代表政治中商业统治的程度(至少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所缺失的是对统治措施变动情况的评价和对统治阶级对不在其影响范围内的资源的流通能力的评价,结果是如果旧的影响模式不能就此作出评价,那么新的模式

<sup>①</sup>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与拉尔夫·米立庞德(Ralph Milliband)进行交流时所写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载于《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Robin Blackburn编辑),纽约,1973,第243页。

<sup>②</sup> 米立庞德:同上,第256页。



就会产生。卡尔·马克思和西奥多·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描述世纪之交的美国的影晌机制。他们对下述问题意见不一：诚实选举、信任上升，以及政府高层梯队中的贿赂情况下降将改变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社会偏见。在没有研究变革道路上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能够发生什么的情况下，马克思假说的独特性就丢失了。这些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能够发生什么的问题，不能通过描绘现有的影响网络而得到解决。同样道理，结构主义的优点在于引导我们去关注新制度表现出的为旧社会统治功能服务的方式。

另一方面，结构主义者指责工具主义者迷恋于个体的心理动机，这一指责相当离谱。被工具主义者过分强调的影响机制可能包括客观环境和联合起来的利益——即使这两个方面是工具主义者为维持系统而采取行动或确立信仰的那些原因，这两个方面也不能向工具主义的代表们说明他们行动或信仰的原因。比如，有一种说法是政治家们受到由大量媒体支持的客观兴趣的引导，这种说法并不需要读懂政治家们的想法就可以确定：当政治家们宣称按原则办事时，他们在说谎。（我将在下一章的末尾进一步探讨这些差别。）

如果说工具主义者们过于关心暂时性和具体性，那么结构主义者们则在极端的抽象性上行事。在这一意义上，对结构主义者的权威指责是正确的。但是这不是真的，因为在权威的指责中，无论结构主义做什么，它在原则上都与经验资料无关。通过制度来识别被服务的利益，这种识别通常是经验主义大量争论的问题。结构主义者们不是没有意识到制度的变化——这些制度服务于基本的社会功能。事实上，解释这个变化的能力是结构主义方法优越于工具主义方法之所在。

结构主义的缺陷更确切地说是：它对整个制度功能的过分强调导致了它对特殊资料和解释选项的忽略——当对关键问题进行研究时，这些资料和选项是极其重要的。更特别的是，结构主义对影响模式的忽略意味着它丧失了关于阶级利益性质的假说的证据，这是结构主义者们本身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另外，它对制度中的工作情况和典型职业的疏忽会丢失那些用来解决下述问题的关键手段：

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方向上政府为回应挑战而进行变革？什么是结构主义的主要解释优势？

要判定政府政策是否客观地服务于社会集团利益，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美国，如果没有上千位也有上百位经济学专家孤立地、激烈地辩论大商业利益指示了哪种政策。而且，政策与利益之间的适应问题在关于是否存在统治阶级的争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一些人来说，印度支那战争是一个重要例子，它说明了根据大商业的国际需要的统治政策。对另一些人来说，从这些国际需要的角度来看，战争是如此的荒谬，以至于为了解决这些利益问题，社会科学家需要所有他们能收集到的证据。而且，特别是在涉及长期模式的地方，人们对影响机制的间接讨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米立庞德的下述观点一定会被涉及：像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样的集团——这些集团受控于古老的东方公司，并且对国际事务具有一种冷静的、专业的和长远的眼光——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像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这样的辅助性集团进行了下述详细的策略讨论：带有攻击性的反入侵策略对维护美国在不发达国家的统治是必要的。如果这些集团位于影响网络的中心，那么这种情况将支持下述论点：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独立的冷战意识形态——经常横冲直撞地指导美国外交政策。而且如果统治阶级假说适合美国，那么这个观点就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经济需要而进行的更加直接的结构主义讨论也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们假设直接的结构主义讨论在这里总是让人信服，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是结构主义者的，而是天真的想法。对社会利益的描述取决于整个社会科学的辅助性讨论。

对马克思主义者自身而言，某些利益问题对工具主义的机制定位很敏感，它们常常具有决定性。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相信资产阶级利益与政府行为之间的配合在短期内是完美的。（或者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是完美的。最终，资产阶级没有获胜的余地。）人们对于短期配合说的最多的是，制度与影响机制几乎实现了配合，而且

其他可行的安排不能作为一种原则创造出更好的配合。从资产阶级角度来看,在既定时期内的政府政策是否合理——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开放的且关键的问题。因此,里根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不是一个暂时的侥幸——这个政策在遭遇空前挑战的时代中反映了某派大商业的利益,或是反映了大商业的整体利益——这是一个激烈讨论的主题。讨论所达成的观点以及所形成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些答案来决定。随着1980年的选举,何种影响机制发生了变化(如果有的话)——比如是东方公司被击败了,还是右翼人民党党员获得了实质的权势——这个问题显然与谁的利益被满足有关。

另一方面,工具主义对个人情况的描述,甚至更直接地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变革或者变革失败的解释有关。当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利益明显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这些制度中的利益占有者的身份可能不是资产阶级,并且可能是相当不明确的。目标、同盟,以及对立操纵着政治进程,它们仍被认为是由这些身份和联合利益来决定。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一个资本主义公司中,如果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管理者们根据他们的工作情况和客观利益被提拔,而无产阶级根据另一种情况被提拔,并且许多白领工人从几个方向上被立刻提拔。在一些集团中——这些集团的地位变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解释至关重要——许多集团是由它们在政治系统本身中的地位来定义的,比如士兵、国家公务员和政党参与者。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人们通常错误地强调职业的作用、工作情况和担任职务的人所特有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强调这些从业者所供职的机构应当满足的社会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些工具主义者们的关注点对于解释下述情况是必要的:政府机制的大规模变革,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理论的关键方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

请考虑,比如,什么是解释20世纪政治变革——纳粹集权——最重要的问题。在《巨兽》(*Behemoth*)中,诺伊曼(*Neumann*)解释道:纳粹党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需要带有侵略性

的民族主义和压迫性统治,并且他们将真正的大众请求作为在经济大萧条情况下进行全球扩张和劳工训练的基础。不论这个解释是否最终有效,它都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解释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理论都应该公正地对待这种解释的权力。<sup>①</sup> 诺伊曼为了支持和发展自己的解释,他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考虑到魏玛社会民主党的权力,大商业如何能如此地控制德国的政治现实? 如果资产阶级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组织者不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资产阶级常用钱和选举来支持这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 因为纳粹党党员攻击大商业,所以人们应当如何将他们视为大商业的代表? 诺伊曼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具主义者对影响和个人利益的说明,即对典型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通常与那些普通成员形成鲜明的对比)的职业、利益和观点的描述;大商业对魏玛司法部和官僚机构的影响;希特勒和他的集团与大商业、司法部和军队(与普通纳粹党党员形成鲜明的对比)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传统保守派政治家们的职业、观点和局限性。事实上,对职业、影响、利益和观点的这些说明,是《巨兽》的相关部分的主要思想。这些说明被用来回应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异议,不仅仅是出于辩护的需要。诺伊曼描述了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在回答政府机构变化的核心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社会民主

<sup>①</sup> 参见弗朗兹·诺伊曼(Franz Neumann)的《巨兽》(*Behemoth*) (纽约,1994;第1版发表于1924年),特别是历史“导论”。鲁珀然特·帕尔姆·杜德(Rupert Palme Dutt)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革命》(纽约,1936)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说明的其他重要证据和细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共谋的推测。诺伊曼对与此相反的观点的大量研究,一直以来都支持他所论证的权力标志。由此大卫·斯商恩鲍姆(David Schoenbaum)在《希特勒的社会革命》(纽约,1966)中想说明纳粹改革了魏玛的社会安排,还提供了大量的统计资料来肯定纳粹德国全方位地深入发展了魏玛的财富、收入和生产特征。威廉·塞瑞德·艾伦(William Sheridan Allen)在《纳粹集权》(芝加哥,1965)中常责备反纳粹人士,因为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温和领导,而且他提出大量证据证明在与纳粹斗争时温和领导的无用。在理查德·汉穆勒顿(Richard Hamilton)对近期选举的研究中,他将诺伊曼和帕尔姆·杜德看作是难以相信的共谋理论家,并且他强调:与权威的假说相比——纳粹的胜利是中下层阶级叛乱的结果——集权的资产阶级才是纳粹的主要支持者。

党人不能控制德国的国际扩张或者有效地反对扩张主义？为什么当总统、银行业和重工业在他们各自的阵营中平分秋色的时候，保守派的民族主义者不能控制局势？诺伊曼的答案通常是趋势均衡——这种均衡以从业者在结构中的适当位置为特征。但是，对这个结构的所有大量描述都使这种均衡毫无必要。如果将诺伊曼的一个观点放入“非常”粗略的大纲中，那么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若能够很好地进行增选，它就不会用实质权力和冒失行为来满足纳粹集权；而且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若不能充分地进行增选，它就不会有利于控制带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这些情况都不能从对当代制度的性质和功能的所有一般性说明中推断出来。

如果工具主义忽略了机制的流动性，那么结构主义忽略了变革本身的变化。结构主义者低估了由形势、利益和资源产生的影响——这三者在大量的制度描述中没有被涉及，然而这些额外的制度细节可能在政治结构变化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工具主义者们关注个人情况的原则与结构主义者关注制度功能的原则，都会使人忽略变革的基本来源。

### 一个名副其实的问题

就像在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社会中存在统治阶级的论点似乎是可理解的。18世纪英国的统治阶级是大地主、大商人和制造商的联合体，这是可理解的甚至是可行的。所以美国存在统治阶级，这一点至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正确的理解，就是错误的理解）。而且，一个社会集团能通过全部三个维度来接近统治阶级的身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商业是今天美国的统治阶级，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是我首先要倡导人们去研究的程度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测量政治权力分配是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在这些测量中，不同集团在何种程度上是统治阶级——这个程度问题应该是一个准绳。

最后，我们能够研究这个含有三个部分的问题中的某一个单独

部分,即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在下一章的讨论过程中,我将提出各种原因——理论原因和实践原因——来研究整个尚待剖析的问题。但是这些部分也有各自的重要性。我在后来讨论中得到的一个结果是:现在在经验主义政治理论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政治权力问题都不研究这三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没有一个政治权力问题能够说清楚政府行为与社会利益的相关问题。如果影响的机制问题被完全提出,那么它将以一种忽略的方式被提出:忽略了为改变环境而进行的机制调整;而且,由这个问题中的第三部分问题提出的好战、镇压和防御问题往往易被人们忽略。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是相当复杂且常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它是存在于大量研究框架中的核心问题,这些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解释。举例来说,比如马克思对19世纪法国历史的解释;诺伊曼对20世纪德国历史的解释;希尔(Hill)对英国内战的解释;吉诺维斯(Genovese)对美国内战的解释;鲍尔斯(Bowles)和金迪斯(Gintis)对美国教育系统的解释;列宁、希法亭(Hilferding)和霍布森(Hobson)对帝国主义以及一战背景的解释;威廉姆斯(Williams)对美国外交历史的解释;最近对于20世纪美国种族主义的持续的解释<sup>①</sup>;以及对越南战争作为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的当前解释<sup>②</sup>。我不武断地认为这些解释是有效的,但是它们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而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如下观点:某个社会集团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或者已经在很大范围内和很高程度上接近统治阶级。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为什么这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在进行社会学解释中如此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它的解释权,就像在我间接提到的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实践意义,即它能判断一场变革是否需要脱离由政府保护的体制来采取行动。

<sup>①</sup> 参见比如罗伯特·谢瑞(Robert Cherry)的《种族主义经济理论》和迈克尔·理奇(Michael Reich)的《种族主义经济》,载于《政治经济中的问题:一个城市的视角》(David Gordon 编辑)第2版,莱克星顿-马萨诸塞州,1977。

<sup>②</sup> 参见比如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帝国主义时代》,伍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不追问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我们就无法对下述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行动主义者离开现有的发展道路能走多远?

今天在美国存在的某个集团被认为接近于统治阶级的身份,这一点对于我后面的讨论是重要的,至少它具有一些合理性。通过这个很容易闪烁其词的观点,我只想说明:关于统治阶级的某种假说或者接近于统治阶级身份的某种假设,应该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提炼而不是彻底地放弃。毕竟,对于当今美国和类似社会的分析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核心。如果美国不存在任何接近于统治阶级身份的合理候选集团,那么忽略统治阶级概念将是一个合理的节约措施。无论如何,为了说明起见,我需要用假设统治阶级存在的详细例子来说明随后的讨论,即讨论人们对不同权力问题的混淆怎样遮蔽了统治阶级的存在问题。

我认为,在美国至少有一个集团是接近于统治阶级身份的候选者,即其财富对于大公司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在这些公司和主要的社团法律公司中的高级执行官很典型地受控于他们的职位,他们为这些最富有的极少数人实现共同目标。出于目前的需要,他们全都可以被看作是同一个集团中的一部分,我称这个集团为“大商业”。无论经理与公司的主要所有者进行共同生活(我认为高估了)的内部动力有多么重要——尽管他们有可能分裂——他们的实际利益的基本一致对于研究政治权力来说才是重要的事实。

大量事实表明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下可能性:大商业可能接近于我所定义的统治阶级身份。在美国,所有消费单位中只有0.2%的人拥有2/3的公司工业股票。<sup>①</sup>0.5%的人拥有全部私人财产的1/4。<sup>②</sup>十名首富获得的金钱收入比穷人总量的一半还多。<sup>③</sup>所有公

① 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当今谁统治美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1页。

② 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中间阶级的神话》,纽约,1972,第121页。

③ 同上,第8页。

司中 0.1% 的人拥有公司全部财产的 60%。<sup>①</sup> 同时,政府要员的职业和需要使这种经济资源的集中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参议院竞选常耗费数百万美元,但不是为了提名总统人选。媒体由三家电视网络龙头控制,每一家都大约市值 20 亿美元。国家政治领导人有着与大商业者们相似的收入和生活方式。主要官僚机构中的领袖们典型地属于资产阶级的成员。在多姆霍夫(Domhoff)1967 年的研究中,他描述了从那时起就一直持续的模式。在 1932 年与 1967 年之间,十三位国防部长或战争部长中有八位被列入傲慢的资产阶级权威手册即社会名册中;同样,八位国家部长中有五位被列入其中,他们包括三位社团律师和华尔街银行的一个股东。<sup>②</sup> 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政府与整个大商业之间的主要分歧将导致急剧的经济困难,这些分歧或者通过影响政府实现相对无通货膨胀的信用机会来制造经济困难,或者通过商业不满对投资和失业产生的影响来制造经济困难。请注意,这些将政府行为与资产阶级利益相连的机制中没有一个机制需要这两者的共谋——在这个共谋中,政治家们不真诚地呼吁普遍利益,并在背后秘密地支持着大商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如果影响机制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通常立足于大商业是统治阶级的假说,那么变革现实的社会模式也一样立足于此。自二战以来,美国和平地且成功地实施了国家政策的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几乎总是由那些受到大商业正式资助的集团发起的。比如,对外关系理事会、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像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城市土地协会和三边委员会这样特殊的集团。美国改善大量劳动工人生活状

<sup>①</sup> 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合著:《资本主义美国中的学校教育》,纽约,1976,第 60 页。他们在此书的第三章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财富和收入的基本分配在 20 世纪的美国没有改变。盖布里尔·考尔科(Gabriel Kolko)的《美国的财富与权力》(纽约,1962)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仍然在许多方面对经济资源不平等进行了最明确的调查研究。


<sup>②</sup> 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当今谁统治美国?》,沈泽芬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40—147 页。



况的改革时期,几乎总是在相应的非法暴力活动爆发之后才开始,这些暴力活动包括城市工人起义和19世纪90年代小佃农的起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普遍罢工、停止罢工进行商讨以及激烈的劳资双方对峙;20世纪60年代犹太人区叛乱。如果改革是一种回应,那么镇压也是一种回应,这种镇压包括19世纪90年代使用国家护卫队来支持克兰(Klan)和品克腾斯(Pinkertons);威尔逊的红色恐吓行动(Wilson's Red Scare);罗斯福将共产党领导人逮捕入狱;杜鲁门领导战后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警察和国家护卫队的暴力行动。

这些事实毫无偏颇地说明了大商业是统治阶级。在我以前描述过的公平比较的过程中,人们需要考虑选择哪个假说来说明这些事实,然后通过观察论敌如何充分地说明特定历史时期的详细特征来筛选论敌们的解释结构。尽管如此,这些事实使下述情况变得危险且轻率:人们忽略了大商业接近于统治阶级身份的可能性。公正地说,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具体经验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选项。人们对于政治权力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使人们研究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变得困难——使社会科学变得枯竭而不是澄清社会科学。

还存在其他的统治阶级候选者,比如控制主要的商业公司、国家政治和军队的稳定的三头统治集团。虽然我专注于对大商业统治的选择,但我并不是故意要消解其他选择。人们应该对下述情况十分清楚:大商业接近于统治阶级身份的假说被遮蔽了,这种遮蔽方式与遮蔽其他统治阶级假说的方式一致。虽然我只强调了这些选择中的一个,但是这些讨论的目标是为了说明:统治阶级假说的广义范畴总体来说已经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被人们忽略了。



## 第四章 政治理论中的权力问题

“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尽管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非常正确，但是它仍隐埋于今天的政治研究中。政治科学家们确实在追问政治权力存在于哪里。而且（马克思的一个不朽的遗产）他们不预设真正的权力存在于政府要员中。虽然他们赋予“政治权力存在于哪里？”这个问题以内涵，但这个内涵对于下述问题并没有发挥很大的启发作用：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这一点不仅仅对多元论的主流学者和与这些学者结盟的结构功能主义者来说是真的，对大多数反对者来说也是真的。

### 多元论及其反对者

许多理论家将政治权力问题看作是：“在何种程度上，不同的人在面对与其利益相对抗的利益时能够从政府中立刻就获得他们想要的？这种情况涉及特殊的问题。”对于多元论者来说，得到你想

要的在这里意味着:通过投入时间或金钱来影响政治程序,从而使你获得你实际投票产生的结果——这个投票结果要么是字面意义上,要么是象征性的。巴查赫(Bachrach)和巴热兹(Baratz)在对多元论进行的有影响的批判中,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对得到你想要的不同理解,即如果适当的其他选择被安排在议事日程中,那么你可能会获得投票结果。然而,他们不愿意过于背离由多元论者支持的状况:人们在清清楚楚地做着选择。如果你投票给其他选择,那么这个选择的存在就成了你权力的代金券,即使你的选择依次受你的信息和喜好支配。<sup>①</sup> 来自包括史蒂文·卢科斯(Steven Lukes)在内的左派的批评提出了:评估权力的真实基础应该是根据充足的信息和未被扭曲的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sup>②</sup> 卢科斯和其他人以真实爱好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这种差别为基础,将政治权力问题视为:如果不同的人拥有的信息是最有效的,而且如果他们对自身需要的洞察力是清楚的,那么政府是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根据这些对政治权力问题的任何一种理解,达尔在《谁在统治?》中的基本论点都可以转变成为公认的真理。虽然政治权力的不同基础有差别且不平等地分散着,但是政治权力分散于整个社会。<sup>③</sup> 就像达尔在当时使用的术语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生活在多头

---

① “假设……在现有状况中出现了全体默认。在这种情况下去判断一致意见是真实达成的,还是通过不做任何决定来强迫达成的,这一判断是否可能?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超出了政治分析家的研究范围,而且可能只能由哲学家进行充分地分析。”巴查赫(Bachrach)和巴热兹(Baratz)合著:《权力与贫困》,纽约,1970,第49页。

② 参见史蒂文·卢科斯(Steven Lukes):《权力》,伦敦,1974,第23—24页。

③ 参见比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谁在统治?》(纽约,1961),第288页的摘要。

政治的时代。<sup>①</sup>尤其是,主要的商业人士不能总是获得他们投票时想要的结果;如果他们想要的那些选择在议事日程上,那么他们就能获得他们投票时想要的结果;如果他们都非常有见地而且很理性,那么他们也能获得这一结果。

只要统治阶级的存在被涉及,那么这种解决政治权力问题的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就都不重要。当然,如果没有统治阶级就会存在多头政治。但是多头政治的存在即使是可能的,那么它也是从关于我们社会的合理的统治阶级假说中推论出来的结果。

一般来说,一个统治阶级的最好安排是:政府承担起调节工作来使统治阶级在特殊问题中的短期利益与它在稳定和默认状态下的长期利益相适应。大商业可能有单独的短期利益,如果这个利益是蝇头微利,那么我就不会发表演讲来支持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这里(如果不是在智利或南美),要是我现在反对大商业的长期利益就会招来警察的制止。这种叫嚷一文不值。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正常时期,人们调整短期获利以适应稳定的长期利益的最佳状况是:政治领导人被选举,但他们不总是大商业人士。在这样一种政治框架中,最有效的统治阶级安排是商业人士通常在现有条件下鼓动那些更加有利于商业的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了政府领导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当典型的大商业人士说他终身都是共和党人,并且宣布如果

---

① 因此,在罗伯特·A. 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中,“多元民主(大众统治)”是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控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广泛的,但决不是平等分享的”。(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随后,在官方的定义中以及在实践中,这个概念的用法发生了变化:从对权力关系的描述转变成对政府机构的描述。在《多元民主》(纽约,1971,参见第2—9页)和《革命之后?》(纽黑文,1970,参见第78页)中,“多元民主”被定义为具有选举系统的政府,它包括广泛投票和竞选公职。在“多元民主”较早地用法中,人们公开地并适当地问道:印度、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是否是多元民主。在后一种用法中,它们显然是多元民主。然而官方的多元民主一直被当作是多元民主,好像它想要满足那些由真正的多元民主满足的社会需要和道德要求。随后我将提出这种转变征兆着下述趋势:将多元民主论者在20世纪60年代明确辩护的关于权力的主张,转变成20世纪70年代的不固定的、非辩护性的、但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假说。

民主党消失他将感到震惊的时候,他承认在制度利益与问题不断的喜好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

如果大商业是统治阶级,那么这种政治分工通常至少满足三种重要要求。(类似的因素将在类似的说明中被提到,在这些说明中其他统治集团也被涉及。)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果大多数人相信选举是一种平衡手段,它能够平衡那些由于经济力量明显集中于最大型的公司而造成的对社会的显著影响,那么这种信念是实现稳定的极其重要的来源。但是,如果典型的总统选举使美国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与普选中的首席行政官进行竞选的话,那么这种信任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其次,大商业在平时被分割成相互竞争的许多派别,这些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受到政府政策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东部权势集团与南部边缘集团之间的竞争;洛克菲勒与摩根的利益之争;制造商与大规模经销商以及大农场主三者之间的竞争,这些都是历史事例。如果大商业的共同利益没有被淹没在派别竞争中,那么大商业集团中的各派就不会面临着政治领导权由敌对集团中的积极分子亲自掌握的风险——这一点是可取的。(相应地,一位总统——比如尼克松——如果过于倾向竞争的一方或另一方,就会给稳定带来重大威胁。)最后,虽然主要的商业人士相当老练地判断出什么样的集团政策有利于他们的公司,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很好地判断大多数人的态度,而且他们很可能就此来回应政府政策或者民意代表。这些政治领域中的错误可能带来社会混乱的沉重代价。然而,一位典型的大商业代表人物的职业生涯与地位并不能使这个人获得他所需要的政治才能。于是就需要让下述这些人运用政治领导权:在不同的政治生涯中获得成功的人;奉行“政治是一种天职”的职业政治家们——他们在韦伯配制的一个强大的、扩张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处方中是主要成分。假设这种官方领导权由一些职业政治家们拥有——这些职业政治家对不满与混乱造成的真实的社会代价特别敏感——那么商业领导们将自由地提倡那些比他们的长期利益所允许的政策更明显有利于商业的政策。比如,1973年当经济发展委员会号召从实质上取消工人阶

级中的年青人的文科教育时,政府如果即刻执行这个号召将会造成普遍的不满,因此这个号召几乎不值得保留。纵观全局,这个提议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倡议——它最终在职业政治家们的领导下在适当的时期内实现了。<sup>①</sup>

商业领导者与政治领袖之间的劳动分工将使商业人士失去许多选票。毕竟,在这个系统中商业人士的投票往往低估了他们自身对整个社会的默认与合作的需要的意义。而且,特殊的公司或大商业中各派别的政治利益有时会与整个大商业的利益背离。人们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投票,其获胜或失利的结果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并不取决于确定的议事日程或错误的信息。所以,许多社会集团中的人通过逐个计算投票票数,常常会“从政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而且按照对这句话的权威解释——不仅仅是多元论者的解释——这些人也常常一无所获。因为存在着统治阶级——政府根据这个阶级的长期利益的需要采取行动——所以多头政治是存在的。

“在何种程度上人们能从政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不明朗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个问题没有区分政府对于社会利益的两种回应。政府可能只在一种情况下回应一个集团中的人们的利益,即在另一个集团需要这些人的合作、默认或服从的情况下作出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常回应苏联政治局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可能回应了一个集团的利益而没有考虑它的这种回应对其他集团也很有价值。“在何种程度存在统治阶级?”这个问题与下述问题有关:政府仅仅依照第一个方面,还是也依照第二个方面来照顾统治集团以外的利益。尽管存在着对上述三种不同理

<sup>①</sup> 《当今谁统治美国?》,圣莫尼卡,1978(中文版:沈泽芬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威廉·多姆霍夫再次分析了由达尔(Dahl)所做的纽黑文市资料,这个分析是一种极其详细的并且具有说服力的说明,它说明了商业巨头们在改变主要政策时具有的主动性与政界要员和媒体首脑们具有的敏感性及才能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尔发现大商业在官方论坛中对处于争论的问题常常失去他们的投票权,多姆霍夫没有反驳达尔的这个发现。然而凡是阅读多姆霍夫的书的人都会承认一种非共谋类型的真正统治,这种统治支持了这种多元民主。

解的十分激烈的派别之争,但是“在何种程度上人们能从政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这个问题没有针对关于“获得你想要的”这两个基础作出区别。

人们需要理顺政府回应行为的两个基础,这种需要是解答下述问题的一个原因:为什么政治理论家们有必要成为政治学的和社会学的历史学家,并在人们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诸多解释中做出选择?区别两个基础的一种方法是:观察当政府创立或改变了能够影响所谓的统治阶级以外的集团利益的制度时,政府做了什么。在发生这种政治变革的危机时期,处于竞争中的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会相对尖锐。政府行动方针的选择将会提升或挫败一个集团的利益,这种影响程度虽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与较太平的时期相比要更加清楚。政治操作中的惯性或者起码的明智之举几乎不能合理地解释有统治权的政治领导人的有效选择。当面对新挑战时,危机时期的政治变革会符合统治集团的变革需要吗?或者从哪个集团的立场出发,统治集团会主张不必要的、也许是危险的让步?政府的这两种回应行为通常要通过这种对历史的争论才得以区分。关于大商业是美国的统治阶级的这个观点暗示了:比如,美国联邦工会保护组织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时期选择上,都是减少非法组织的好战性和不可预知性的最好办法,而且它不会暗中破坏劳动纪律;60年代的福利计划严格说来是为了应付城市的动荡局面,而不是为了满足城市的这种需要;美国的福利开销近来转向国际开销,这种转向反映了美国公司拥有的遍及全球的权力面临着新的挑战,而不是人们对美国的早期改革自发产生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如果是否存在统治阶级这一问题,与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的相当常见的并且有条理的争论相分离,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无法得到回答。

当资产阶级机构中的拥护者宣布或描述如何实际应对当前的危机时期时——这种应对与人们对稳定时期的通常反映形成对比——他们常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因为他们强调政府包容不满状况的职能。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休格斯(Hughes)在决定支持《国家劳动关系法案》时,将这一法案的首要的任务描绘

成应对动乱局面：“我们被要求闭上眼睛去对待国家生活的普通情况……当有必要保护州际间的商业不会受到因工业战争而带来的社会瘫痪的影响的时候，工业劳动关系建立起一个国会可能无法进入的禁区，这种情况要如何来维持？”<sup>①</sup>更何况近来在《关于三边委员会的民主统治的报告》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作为一名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休格斯一样无罪的反马克思主义作家，他认为有必要让政府颠倒或否定公众意见的倾向性。他的这个观点一直完好无缺地持续到70年代，它支持让美国的福利花销和社会服务的花销多于国防花销、并且让民主的扩大高于对权威的崇拜的观点。

防务转变(Defense Shift)是对40年代来自苏联的外部威胁的反应……福利转变(Welfare Shift)是对60年代内部民主浪潮的反应，前者主要是国家精英领导的产生，后者则主要是大众期望与群体需求的结果。……一个缺少权威、又肩负着国内具体计划的政府，只要没什么社会动乱的危机，就没有什么资格将那些在对付外交政策问题和防务方面必须所做的牺牲强加在本国人民头上。70年代初期，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与外交政策和国防有关的重大计划的开支同任何一项用于国内计划的开支相比都更加不得人心。……一个内在本质是优秀的价值观，没有必要去达到最佳状态。当这个价值观增大到最大值时，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的增长潜在地存在着一些吸引人的限制。政治民主的无限扩大也潜在地存在着一些合乎需要的限制。<sup>②</sup>

<sup>①</sup> 《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对抗琼斯与乐富林钢铁公司》，载于《最高法院报告人57》，1937，第626页。

<sup>②</sup>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迈克尔·克罗齐(Michel Crozier)和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合著：《民主的危机》，纽约，1975(中文版：马殿军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第94页、第102页)。“转变福利”的存在是用大量调查数据证实的。



由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主动组织起来的三边委员会因为包含了未来的卡特政府中的所有杰出成员而著名。

除了结合人们在考虑愿望和利益时的两个非常不同的基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能说明:为什么“谁从政府中获得了他想要的?”这个问题无法弄清楚统治阶级是否存在。它无法赋予某种差异性以充分的意义——这些差异性产生于特定类型的政治制度,它们被用来满足人们合理的、有见地的政治偏好的需要。在议会民主中,一位主要的商业人士常常会支持一种标准,但如果人们立刻采用这种标准将是不可行的或者将造成无法接受的混乱。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这位商业人士的投票无法反映他的真实利益,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有人操纵了议事日程或偏好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不带任何观点地说,对可行性和默认的考虑不是他的工作而是政治系统的工作。如果《劳资关系法案》在1945年通过,并且没有发生劳工的不满和工会中的共产主义运动,那么其结果对大商业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在这种变革付诸行动之前如果不去镇压它们,同样是灾难性的。

总之,我已经检验的政治权力问题被局限于一定范围,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关心政治的。政府的不同职能是要为适当有效并且和平相处的社会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个稳定的结构。因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必然与合作、默认以及服从有关,所以由多元论者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批判不能告诉我们政府在为谁服务。它们不能辨别政府主要关注的利益与政府为调和问题而发生的利益之间的差别,也不能辨别投票失败是反映了缺少权力还是反映了政府维持社会权力的不同作用。

我的观点是要辨别不同的问题,而不是消除任何一个问题。有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指示人们要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不同的人从政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那些从事政治选举的人们——他们游说议员(包括最善意的“公民们的游说”)或者他们只是试图说服有势力的人按照某种道德和动机行事——应该想要知道有权势的人在哪里,并且会发现他们已经最佳地引导了人们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同样,关于谁得到了他想要的这一问题是社会批判的一个核心问题,它追问了哪些人应为我们所遭遇的社会混乱状况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在这种道德判断的背景下,讨论总统们和将军们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那么这可能是跑题的甚至是误导的。但是这些不是建立在合理的政治研究基础上唯一的政治关注点。某个人即使知道了在何种程度上不同的人从政府中获得他们想要的,这也不能帮助他弄清楚在何种程度上人们会因为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而一定要积极地抵制政府。因此,关于政治权力问题包括政府对利益的影响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双关语。就这些政治权力问题本身而言,它们追问政府行为是否承担着人民利益的某种联系。此外,人们在政治中的利益——从一个背景到另一个背景——将规定人们应该追问哪个权力问题。

看来似乎是不公平地对待了巴查赫、巴热兹、卢科斯以及对多元论的其他批判,因为我忽略了他们对运用权力控制其他人的强调。因此在定义权力时,巴查赫和巴热兹提出:如果B按照A的意愿行事,而且当B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不用担心A会剥夺他的一些东西,那么权力关系就存在于A和B之间。<sup>①</sup>卢科斯说,他的权力观可以概括为“我通过说明——当A以与B的利益相反的方式影响B时,A使用了控制B的权力——来给权力概念下定义”。<sup>②</sup>不同权力定义产生的首要原因在于权力概念是通过对统治关系的描述而被提出的,而在这些描述中,上述这些著作与达尔的《谁在统治?》以及其他多元论者的经典著作有着不同的论调。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问“政治权力存在于哪里?”,那么这些差异性更多的是在表现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在衡量权力的分配时,多元论者总是承认:权力意味在面对他人的反对时,你总能获得你想要的。这些理论家的重大区别与被控制的议事日程、信息和偏好的作用有关。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差别拉近了对多元政治问题的评价

① 巴查赫和巴热兹合著:《权力与贫困》,第24页。

② 卢科斯:《权力》,第34页。

和对存在统治阶级的程度的评价之间的差距。

当更多的左翼多元论者如此关注统治现象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告诉我们统治阶级是不存在的?答案再一次是,他们的权力概念在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即使我们知道了不同的 A 是否运用权力控制不同的 B,我们也很难知道权力是否由政治制度的运行来决定。在巴查赫、巴热兹、卢科斯三者的共同概念中,只要商业人士在面对罢工威胁时做出让步,那么蓝领工人就运用权力控制了商业人士。除非我们知道政府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的作用,否则这一情况将不会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政治权力的信息。当然我们也能问:谁最有权来控制政治领导者,是商业人士还是蓝领工人?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想知道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必然会被误导。如果大商业是统治阶级,那么人们将会预计出政治家们的利益和商业人士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实际上,我将最终证明这种一致性在心理学上对于合理的统治阶级假说是必要的。因此,如果利益冲突导致了关于权力的实际例子,那么依据巴查赫、巴热兹、卢科斯三者的共同概念,这种利益冲突将是罕见的而且通常仅仅反映了个别政治家的傲慢自大与僵化刻板。另一方面,如果大商业是统治阶级,那么政治领导者被工人们的反叛行动或者反叛行动的新一轮威胁唤醒去参加令人不快的或危险的行动就是一件相当普通的事情。考虑到政治家的个人利益,他们优越的生活过程将被打乱。如果我们把适合一对一的相互作用的统治概念扩展到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研究中,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大商业是统治阶级的情况下,工人们拥有比银行家更多的权力来控制政府。

卢科斯坚持,“定位权力的……观点是去确定在行动中产生的对后果进行负责的责任或者确定某位被指定的代表的不作为的责任”<sup>①</sup>。对于确定个人责任的类似担心,有时好像支持巴查赫和巴热兹的坚决主张:确定的议事日程比直率的争论更重要,它是权力

<sup>①</sup> 卢科斯:《权力》,第56页。

的一个基础。毫无疑问,这是定位权力时可能会有的一种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可以通过追问——谁在被反对的情况下获得了他想要的——而得到最好的支持。我希望我已经说明了:这个观点既不是全部理论化的观点,也不是关于权力定位的所有重要的战略讨论的观点。

## 多元论的命运

多元论者相信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或者少数联合起来的社会集团能够统治美国政府。政府权力在他们的观点中更加分散。这是多元论者试图解决的实质问题。我已经证明了:如果对这个实质问题的研究受到了多元论者推荐的普遍政治权力概念的限制,那么就必须回避这个问题,尽管多元论者不同意我的观点。

许多政治理论家现在相信与多元论的这种讨论是考古学的。在他们看来,多元论已经过时了。依照这种判断,大多数人受到一些多元论者的左倾观点的影响,特别是罗伯特·达尔的影响——他是60年代最有说服力的多元论者之一,而且他的著作被最广泛地阅读。大多数人也受到主流政治科学家们的当前倾向的影响——这些政治科学家们倾向于分析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民主的失败,并常常认为这些失败是由于人们歪曲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造成的。因此,对政治权力问题的不恰当理解将导致对多元论毫无道理的偏好,这种危险状况可能看上去与现在的关注点无关。

事实上,如果非说不可的话,多元论在现在比在20年前更不易改变。在60年代早期,多元论者至少被迫去使他们的方法清晰化,并整理他们对政治权力分配的信念的论证。现在,他们对于政治权力广泛分配的信念更易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设想,成为一种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保守的、自由的甚至是左翼的选择都是先进的,并且都存在争议。如果主流政治科学家们在捍卫一个多元论的政治程序时很少提升多元论的政治权力概念,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假定了一个多元论的观点但却没有依据它。马克思的

153

政治理论与此相反,它澄清了以多元论为特征的实质观点的持续存在。(同时,对作为一种理论的多元论本质的更具体的说明,将使下述问题变得更加清楚:在单方面强调“在何种程度上人们从政府中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实质性争论使人们感到困惑或者被人们忽略掉了?)

在多元论作为一种清楚的理论并且是被清楚地加以辩护的理论的鼎盛时期,辩护者们将争论中的一般问题视为一种主张:政府政策是广泛分布的资源体系对政府官员产生影响的结果,它与那些没有完全受限于这些影响的政府官员的偏好和才能相互影响。每一种政治资源并没有被平均地分配。但是不同种类的政治资源由不同的集团控制,而且对一种资源的垄断最多使一个集团控制一些领域的政府政策。特别是,财富的集中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全体投票使集团成员的势力成为大多数并不富有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源。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的分配常常给政治领导者相当多的机会去成功地发起对政策的支持,否则这些政策就不会作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被提出。当然,政治领导者可能根据他们的特殊情况、个人兴趣或个人风格发挥了更加消极的作用。<sup>①</sup>

在这个广泛的框架内,重要的变化是可能的,它特别要依照两个维度。首先,人们可能对在不同资源中存在的不平等的程度和道德意义做出不同的评价。其次,政治领导者在何种程度上消极地反映了不同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应该这样做——人们对这些程度问题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一个人能够设想出一个持有下述观点的极端保守的多元论:从总体上看,能够决定政治影响的大量资源在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太大区别;存在的不平等并没有压迫道德问题,主要的政治特征消极地反映了处于竞争中的集团间的势力均衡;而且这些政治特征应该反映这些。如果非说不可的话,认为多元论过时的观点反映了一个事实:现在几乎没有学院理论家致力于这种极端保守的说明。

<sup>①</sup> 参见比如达尔在《谁在统治?》中的摘要陈述,第228页。

然而,以这种说明来鉴定多元论,从历史而论是不准确的,从理论而论是误导的。这种多元论的一致意见从来没有达成过。举例来说,在《谁在统治?》中,多元论政府观有六点正式说明,比如第二点,“几乎没有人期望这些资源[例如,政治资源]不平等地被分配”<sup>①</sup>。达尔绝不会天真到假设纽黑文市的每个公民都拥有一捆政治资源,这一捆资源与纽黑文第一银行的董事会主席拥有的政治资源同样重要。只有通过全体投票的中间环节,集团成员才能平衡财富资源。虽然达尔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但他当然不会对因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提出的道德问题感到自鸣得意。最后,《谁在统治?》不但没有庆祝“利益集团政治”,反而描述了持有更消极的政见的塞拉菲诺(Celentano)市长是如何被具有进取心和自主性的李(Lee)市长取代的。李市长被塑造成这样一位领导人物:他实质上迷恋于道德对城市复兴的重要性,并且敏感地意识到政治势力的分配,但却把这些政治生活和事实表达为要为更大的政治远见服务。

比历史准确性更重要的是:人们如果遗忘了面向多元论开放的选择权,那么就意味着人们忽略了多元论的持续性,因为多元论为进行关于美国政治的重要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国家的、非辩护的背景。多元论的根深蒂固可以通过两本书来阐明,这两本书过去常常被用来作为主要著作去支持多元论过时论的观点,它们是达尔的《革命之后?》和西奥多·洛威(Theodore Lowi)的《自由主义的终结》。

在《革命之后?》中,达尔承认在美国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政治上有效的资源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而且他倡议要对它们重新进行分配。达尔认识到了大公司雇员的无权状况,并号召要由雇员们在内部控制集团政策,同时雇员们要结合外面控制,即遵从于更平等的政治权力分配的政府部门,对集团政策采取的适当的外部控制。在这里,没有任何观点与60年代初的多元论不一致。当然,这里也没

<sup>①</sup> 参见比如达尔在《谁在统治?》中的摘要陈述,第228页。

有任何观点与下述假说不一致：大商业就像一个统治阶级。这些观点之间的区别存在于达尔对他所推荐的变革如何才能发生的构思。

在这里，多元论者的假设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最好的办法能够对有效的政治权力进行激进地重新分配，这个办法据说是：通过全体投票来进行社会变革，这种情况率先在欧洲国家发生了。<sup>①</sup>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不会对非选举因素——比如在欧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罢工、停止罢工进行商讨、暴力的或非法的示威活动以及反抗行动——的作用进行讨论。关于重新分配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的证据受到下述事实的限制：收入（不是财富）在美国的分配比在英国、挪威和其他发达国家更不平等。<sup>②</sup> 工业公司要想实行被推荐的民主，就必须剥夺现有的商业领导者的大部分经济权力，但是我们被告知“尽管左派的多愁善感者可能会发现人们的思想太不一致以至于无法容忍，但是对于所有意义深远的国内经济公司的改造来说，工人们和工会在当前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障碍”<sup>③</sup>。引用的这个证据是一项研究，它为在英国富有的工人中流行的引导人们消费并以家庭为核心的观念辩解。

批评《革命之后？》这本书未能汇集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关于能够推行变革的权力关系的根本观点，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这本书在公然地推测观点。我的观点更确切说是：关于美国政治权力的普通观点是被预设的，它没有经过实质性的讨论。这与九年前在《谁在统治？》中被明确声明并加以辩护的观点一样。

许多书籍中写道，二战以来美国政府的失败是因为用利益集团政治代替了总统领导，而这种总统领导的基础在于：对共同利益的道德呼吁、对社会地位的充分界定、统一的官僚机构的产生。洛威的《自由主义的终结》是这些书中有影响的典型著作。这本书看上去常常是对多元论的一种有力批判。“利益集团多元论”这个恶棍

① 达尔：《革命之后？》，第105—110页。

② 同上，第112页，注释1。

③ 同上，第134页。

常被说成是将多元论从政治理论转变成意识形态的结果。<sup>①</sup> 据说美国政治在二战前没有遵照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如果现在的失败没有被及时更正的话，那么美国政治也不会遵照它——既然如此，多元论理论的持续有效性似乎就遭到了质疑。

“利益集团自由主义”与真正的多元论理论间的连接实际上充其量是浅薄的。洛威的理想化的总统与《谁在统治？》中的理查德·李市长没有太大区别，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更重要的是，洛威在书中讨论的主要策略是依据对多元主义理论的有效性的假设，就像多元论确实曾经有效过一样。

《自由主义的终结》的总论题很不明显。在政治声明中，约翰逊(Johnson)和尼克松(Nixon)据说是利益集团多元论的典型人物，他们伪装虔诚地对共同利益进行道德呼吁，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恶心。洛威从一个政治领域进入另一个政治领域，他采用了如下策略来说明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仍是胜利的：他指出了利益集团在推行政府目标时的失败，比如贫困的急剧缩减以及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仍然有效。他描述了政府机构和类似政府机构的迅速增长，这些机构常与特殊的利益集团联系，它们或者由利益集团的代表正式控制，或者为利益集团应该更直接地参与政府事务辩护。这种职权的分散被说成是对一直不能实现国家目标的最好解释。

从最好的解释中得到的这个结论，对科学来说是必要的。实际上，它们可能是科学结论的一个基本形式。但是在这种讨论中，相关的其他选择的考虑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相关的其他选择是：除了组织形式之外，基本的美国政府政策不成比例地倾向于为集团利益服务，虽然这些集团利益与实现政府目标相冲突。这本又冗长又详细的书并没有对任何一个政策领域进行讨论，而这种其他选择应该在这个领域中被考虑。实际上，洛威假定了集团成员们的选举力量能够保证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获胜，如果我们不能获胜，那么这是因为政治家和投票者等等都被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误

<sup>①</sup> 西奥多·洛威(Theodore Lowi):《自由主义的终结》，纽约，1979，第36页。



导了。这种对多元论思想的有力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攻击,在多元论的理论框架中完全发挥了作用。

## 统治阶级和权力集团

我已经指出:对多元论的许多批判都认为多元论过于强调逐个问题地记录人们在特殊政策讨论中的成功或失败。这一点当然不能被说成是多元论的主要学术选择——这些学术选择包括亨特、米尔斯和多姆霍夫对权力结构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政治权力的基本问题首先与社会安排有关,而与个人的权力无关:“使某些社会集团对政府施加过多影响的机制是什么,特别是那些非正式的相互作用的模式是什么?”对存在这种机制的声明是关于存在统治阶级的部分论题。然而,在何种程度上一个集团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也要依靠其他问题来解答,这些其他问题与这个集团的利益性质有关,并且与这个集团为应对危机而指导社会变革有关。对影响机制最详细的描述可能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虽然权力结构主义者对精英论的厌恶常常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他们没有详细地研究过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利益是否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冲突。毫无疑问,亨特的亚特兰大商人和多姆霍夫的银行家以及集团律师都会承认他们对政府产生了过多的影响。但他们却宣称这是合理的并且符合公众利益,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知识、责任以及管理能力。你可以通读亨特的《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和多姆霍夫的《当今谁统治美国?》,但却不能找到证据来赞成或反对这种来自行政餐厅的观点。

此外,我们对影响机制的了解并不能使我们知道在互相依存的集团中的权力秩序。大商业人士对政府的影响反映了他们对政府的基本控制吗?或者这种影响是大商业人士被迫向政治家们的自主权支付的一种献礼吗?虽然这个问题有时好像只是一个将权力结构理论家与多元论者分开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是存在于权力结构框架内的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对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相对权

力的确定,并不取决于对互相影响的网络的描述,而是取决于下述研究:当网络被损伤或者被破坏时会发生什么,谁会赢、谁会输。大商业的权力解释了曾经成功的政治家们的失败、一个完整的政治方式的过时、甚至是一套政治制度代替了另一套,在这个意义上大商业有权控制政治的建立并且接近于统治阶级的身份。在大商业者们的本性上,他们为了调动那些没有用在正常影响模式中的资源,而努力改变政治人员、政治行为方式和政治制度。显然,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有许多影响渠道可以使大商业人士从商业进入政府。那些与大商业步调不一致的政治领导者们的不幸命运——伊利诺伊州的阿尔杰德(Altgeld)政府和南加利福尼亚的人民党(Populist)政府——说明了依然有相当大的商业力量在控制政府。在这些时期中,商业资源被使用的程度与那些在正常影响网络内的资源的使用程度不同(例如,对新资源的管辖更专制),而且有时被使用的种类也不同(例如,民众被组织起来攻击政治家)。

同样,我们对实际影响网络的研究不会告诉我们政府行为与精英集团之间的联系有多么紧密。因为在任何一个既定的时期,这都是一个关于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还涉及了下述问题:政府行为与精英集团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会被那些合法的可行的激进主义行为破坏掉,还是至少会得到政府的允许。无论这种观点是多么的凌乱和妄加推测,人们都可以要求对变革策略进行深入讨论以检验这些观点。假设我们知道所要了解的一切:精英社会俱乐部、会议、研究小组、商业巨头与政府要员之间不断的内部交换,以及由权力结构研究提出的所有其他机制。那么,通过提倡选举那些很少有利于商业的候选人的策略——无论这个策略在哪里实现——我们可能仍不知道事情会有多大改观。政府的官僚机构以及媒体如何能应对以这些方式取得的罕见的成功?一旦参选者当选,那么他(她)将在何种程度上对以商业人士的不满为基础的经济混乱局面做出让步?如果非说不可的话,商业团体在何种程度上会发动强暴的右翼集团或者支持军事接管,甚至推翻议会席位中保守的政治家?当我们追问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而不是研究

当前的影响模式的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在克利夫兰的库辛尼奇(Kucinich)竞选失败可能略微显示了这些问题间的差距,而智利的突然行动强烈地显示了这一差距。

## 功能主义和社会利益

在经验主义政治理论中,保留下来的最主要的政治权力观点是明确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比如,在伊斯顿(Easton)的著作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在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对市民文化的许多分析中蕴含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这里,政府被假定为解释和调整不同特殊利益的一种手段,来寻求在稳定和效率中的共同利益。实际上,政治权力研究成了一种对实现这种共同目标的有利情况和不利情况的研究。处于竞争中的功能选择——根据这种功能选择,政府行为模式被最佳地解释成它是由于保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功能所致——实际上没有经过讨论就遭到冷遇了。因此,在《市民文化》中,当墨西哥人与意大利人对调查问卷的回答显示了他们与政治程序的脱离时,这种脱离本身虽然不符合客观的政治事实,但是它却被认为是存在于有效民主中的主要障碍。<sup>①</sup>

有趣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多元论应该是两个独立的研究政治权力的路径,在两者坚固的思维同盟中——它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范例——甚至温和的折中主义理论家也不能自觉地在两个范例间穿梭往返。因为在理论上,这两种方法中的每一种方法的路径和研究手段的特点都从根本上有所区别,这种差别非常像两个交战派别间的差别,比如新古典主义与机构主义进行经济学研究的路径间的差别,或者经济人类学的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两翼之间的差别。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研究制度和价值系统,它使用各种调查并且将大范围的推测理论化来讨论如何去接近或远离理想状态——在这

<sup>①</sup>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合著:《市民文化》,波士顿,1965,第3—7页、第368—379页。

种理想状态中,每一个次要系统都为保持整体稳定而服务。多元论理论研究政治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政治行动的过程,它通过逐个检验每个问题的结果来描绘出这些过程,而这种描述通常被限定在某个特殊城市的某些年代。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不存在长期均衡的理想状态,甚至不存在具有某种持久模式的理想状态。结构功能主义者和多元主义理论家的思维特点是他们都倾向于不去认真考虑下述情况:一个非常稳定的并且有效的政治系统至少在它还是议会民主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政治系统中的游戏规则的破坏行为所具有的可能的合理性。如果这种可能性消失了,那么两个关于政治权力的性质问题就会留下来:“游戏中谁赢了,谁输了?”(多元论)“什么使游戏稳定且有效?”(结构功能主义)因此,当值得考虑的政治策略被限定在选举领域中时,值得考虑的理论问题也随之受限。

### 方法论的束缚

当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没有包括“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这个问题时,它将误导人们去认为这个问题仅仅是被忽略了。然而,尽管在今天的美国可能存在着某种类似统治阶级的东西,但这种可能性被认为是太遥不可及所以不值得研究。这种对可能性的普遍消除并不违背科学,但它对科学来说却是必要的。对现实的研究总是依靠消除一些遥不可及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特殊的消除还为时过早,因它以偏颇的研究方法和狭隘的动机概念为基础。

首先,有一种趋势是:人们预先假设了不存在统治阶级,然后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权力。如果一个人忘了应该回避问题,那么他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进行研究会使统治阶级假说看上去完全不可行,这一点不足为奇。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多元论者提议:通过确定人们在官方论坛议事日程中的问题进行争论时如何能够经常获得他们想要的,来衡量政治权力。因此在《谁在统治?》中的主要的经验主义讨论中,达尔通过检验纽黑文市关于城市复兴的官方决定来衡量“影响的分配”。被考虑的问题基本上是那些由市民行动委员会经

过商议反映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是个顾问团体，它由政府官员和商业人士组成，包括“大的公共事业单位、制造公司、银行和其他商业的领导人”。权力通过确定“哪些个人……最常发起那些最终被采纳的建议，或者最常否决其他的建议”而被衡量。当以这种方式去衡量权力时，其结果是对市长和从事城市发展的行政官员的统治的一种辩护，相比之下当以这种方式去衡量经济要员时，其结果据说是击败了“经济集团幕后黑手”的假说。<sup>①</sup>

事实上，那些假设用官方论坛中的成败来衡量权力的研究者，不能击败关于存在统治阶级的假说。他只能通过选择这种衡量来假定这个假说是个谬论。因为如果大商业是统治阶级的话，那么像达尔这样的经验调查结果（与他的解释不同）将是一个人所期望的。一个人将希望那些威胁大商业的政治法案不在官方论坛上进行讨论。在达尔对城市发展部门最高长官的一次采访中——这个部门被期望去支配“经济权贵”——被采访者解释了对各种提议进行认真考虑的标准：“……我们需要财政、工业、公众事业和银行力量的支持。如果他们支持它，那么其他人都将支持它……但是，换句话说，在我看来一群热情的人们并不会在城市复兴问题上走得太远。据我所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城市复兴，那就是发动社会上最有权力的人。”<sup>②</sup>在另一方面，官方论坛可能为检测可以被大商业容忍的各种观点的可行性和大众认同性的基础服务。在这些范围内，政治领导者、最高管理者，以及那些对可行性和认同性问题最敏感的人，都最常拥有决定权。

163 一个刻板的方法论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掩盖政府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韦伯基本上偏好于用主观原因而不是客观利益来解释行动，根据他的解释，统治阶级假说易被等同于难以让人相信的共谋理论。政治家们告诉我们：他们平等地致力于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诉诸政治家们这样做的原因来解释他们的行动，那么

① 参见达尔：《谁在统治？》，第122—126页。

② 引自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斯塔莫尼卡，1978，第111页。

统治阶级假说将指出他们在说谎,并且指出他们掩盖了隐藏在背后的阶级承诺或者彻底的贿赂关系,而被他们掩盖的这些东西才是他们行动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政治家和主要商业人士的行为在统治阶级的方法论中,被最好地理解为他们受客观利益的指导,而直率地说,这些利益可能与他们意识到的原因存在分歧。下述评论不会使人感到任何困惑:一位典型的核能工程师在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用的专业人士时是有着某种客观利益的,这一利益使他相当真诚地为核能车间的安全辩护,甚至在他知道有比核能车间更好的选择的时候他也依然如此。似乎不用再秘密地宣称:成功的美国政治家的客观利益使他们鼓励大商业的不同利益,甚至在他们真诚地呼吁共同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依然如此。<sup>①</sup>

包括权力结构研究在内的各种讨论和研究将致力于从心理学上去说明:当成功的政治家真诚声称要致力于所有人的利益时,他的典型的人生经历和职位如何能使他接受大商业利益的指挥。在对政治成功的一般叙述中反映出的一些重要因素是:需要对大型竞选活动花费并且需要媒体的支持;商业和公共事务管理部门拥有共同的高层领导;这些领导者与普通院校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由这种政治成功鼓励并且提供的与众不同的非劳动阶级生活方式。公司的主管人员和政治家们不是这场戏剧中的唯一演员。下述这些人物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会领导者对竞选活动的基金施加了影响,报纸编辑对新闻覆盖范围施加了影响。学术界也是如此,他们营造了一个能言善辩的氛围来讨论:12小时工作日,或者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对越南吴庭艳(Diem)政权的维护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政治家在工会、报纸和大学中获得权威的趋势也需要被研究。此外,好战的联合起来的当地居民被例行公事地接管并被纳入托管制中,这至少与公共事业委员会的立法结构一样是一个重要的政治

<sup>①</sup>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解释》,载于《科学哲学》,1978,第45页,我在里面详细讨论了这种机制及其在功能解释中的作用。

## 更好的权力理论

事实。最后,可能更应该注意下述明显的事实:挑战大商业将使政治领导者面临巨大的危险。政府依靠银行和类似的信用机构。当商业人士们对未来意志消沉时,就可能有上百万人失业。由于这些事实,一位政治首脑通常不能控制严重损害大商业利益的大规模运动——这位首脑不是这场大规模运动的自觉的革命领导者。

我们如何确定主要的政治特征是受这种利益的影响,而不是受政治家们真诚表达的民主承诺的影响?我们通过观察政治家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和他们做出选择时的背景资料,来和他们一起解决利益问题和原则问题,就像和其他人一起解决一样。假设二战以来的美国总统明白事理而不至于认为美国对吴庭艳、礼萨·巴列维(Reza Pahlevi)和索摩查斯(Somozas)的支持将有利于民主。假设这种支持确实符合肯尼迪的财政大臣的简要发言:“当我说不发达国家是我们最重要的投资谋略时,我是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发言的。”<sup>①</sup>这个发言虽然只是部分例证,但是它却说明了:政治领导人的利益在于为大商业的社会利益服务,并且这些领导者的利益统治着美国的政治生活。

如果社会哲学真的有助于社会科学,那么它不应该仅仅分析混乱状态,而应该提出新的指导。统治阶级问题如何被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确提出了新的策略和关注点。如果政治理论家认真地对待在何种程度上存在统治阶级的问题,那么他们一定要把对政治结构的描述与对历史变化的解释结合起来。他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混乱与镇压在所有西方民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们都常常是实现有益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过程。他们必须意识到在他们所做的衡量和解释背后存在的据实假设,他们的这种意识不是为了寻求人们对脱离了据实假设的某种方法的妄想,而

<sup>①</sup> C. 道格拉斯·狄龙(C. Douglas Dillon)1958年5月6日写于《国家公报》。

是为了在需要对论敌假说进行比较时不会回避问题。总之,如果政治理论与存在统治阶级的程度有关,那么它就具有更多的历史性,就更能意识到非选举性冲突的作用,而很少轻易去结束人们因为方法论的原因而对根本理论进行的争论。

如果统治阶级概念仅仅抓住了某些重要现象——这些现象被政治权力的其他标准忽略了——那么这种权力研究范围的扩大是绰绰有余的。另外,可能会有更加明确的收获,这个收获在于: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说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并且被更多的人接受。在美国和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存在着统治阶级——这种观点至少近似于真实。读者将不再疑惑地去推测:我认为存在统治阶级,而且它就是大商业。我希望我所描述的事实和我所引用的详尽研究能使这种推测可行。然而,当杰出的和有见识的理论家偶尔地面对关于在美国是否存在统治阶级的问题时,虽然这些事情与研究并不深奥,但是他们会通过歪曲解释来回避问题。统治阶级假说被认为是暗示了一种日常的并且普遍的政治干预,“在每一个公众活动的主要领域中存在着经济统治集团之手”<sup>①</sup>。或者,这个假说被说成是需要一种自觉的“共谋在……从官员到策略……不满”<sup>②</sup>。或者,这个假说被交付给一堆零散的不可检验的信念声明“形而上学不是经验的”<sup>③</sup>。我希望前一章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能使下述观点更清晰:如果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以这些方式来评价的话,那么当前的一个重要选择是不可检验的。

最后,更好地理解统治阶级思想将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回避实际问题。在美国,每次主要的改革运动都会发生人们抛开政治选举并且打破表达意愿的合法形式的情况。在鲜活的记忆中的那些战术包括:停止罢工并使用暴力排除破坏罢工的人,工会通过使用这个战术而获胜;非法的示威活动、许多真实的动乱,以及公民权利运动

① 达尔:《谁在统治?》,第70页。

② 洛威:《自由主义的终结》,第225页。


③ 参见尼尔森·波尔斯比(Nelson Polsby),《社团权力与政治理论》,纽黑文,1963,第23页。



的犹太人区起义,特别地促进了公民权利法案制定的伯明翰犹太人区起义;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参战和反抗。现在,许多人非常关心战争和将要来临的世界战争的威胁,而且也关心巨大的并且还在增长的贫富差距、白种人与非白种人之间的差距。过去人们想要抛开选举并且打破正统的愿望,对于关心上述问题的人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模式吗?这个问题不易以一种详细的并且深思的方式来回答。学生们说60年代模式的抗议已经过时了,这好像在说样式是个问题。他们的长辈们常毫无疑问地接受:因为支持麦克乔治·邦迪(Mc George Bundy)、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以及其他东方权势集团中的神圣人物成为反对战争与贫困运动的领导者而获得的利益。当然,如果人们的关心变成绝望,那么人们也可能得出轻率的且不分皂白的结论来支持暴力行动,就像60年代的气象地下组织一样离奇。简而言之但不是很准确地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需要详细地并且在战略上讨论:除了帮助自由的民主主义政治家获选之外,我们是否还要去做事情并且我们以什么方式去做事情。在这些讨论中,统治阶级概念是一个基本的工具。

**第三部分**  
**历 史**





## 第五章 生产力与生产力变革

### 导 论

人们对于马克思的意图所进行的主要争论中,最激烈的是关于他的一般历史理论的争论,争论的内容是在“马克思提出的基本经济变化的一般理论是什么?”中的特殊论题。显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部分是其余全部理论的基础。对马克思而言,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以及可敬的思想氛围都有它们基本的特征,它们具有这些特征是因为要为维持某些经济关系服务,马克思称这些经济关系为“生产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些关系会有它们的基本特征,以及为什么它们总是变化的,答案尚不清楚。

在解释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最有影响的解释使马克思成为一位技术决定论者。依此种解释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将历史看作是关于社会安排如何适应技术进程、提升工具和技术生产能力的记事。首先,生产关系的发展被解释为最终是由于要通过改进技术

来追求更多的物质商品。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但是他们不能提供任何决定性的批判或者任何可行的其他选择。通常,反对者们赋予阶级斗争以更大的作用,这超出了经济决定论者所允许的程度。但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解释马克思一生都在关注的事情——生产力发展决定社会变革方向,更糟的是,那些对占优势的解解释持反对意见的人常把马克思的理论稀释成一份老生常谈的稀汤,大意是说技术影响变革,而且如果人们不吃东西就不能进行大量思考。马克思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实践当然比上述观点更有特色,并且他的普遍评论也更加有趣。

对技术决定论的争论是本书的两个宽泛论题的核心,这两个论题是:马克思理论中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关系。技术决定论者的解释是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的许多读物中最合理的,它使政治次要于经济。它受到实证主义假说的激励,直到最近才在分析哲学中占据优势,我大概将会对此进行讨论。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著作阻碍了将重大的理论片段与具体的、详细的和富有启发性的叙述相结合,所以对马克思的历史解释就需要——在最大程度上的分析哲学的风格——它的概念的资源丰富性、清晰性以及细节的容涵性。

反驳了人们对像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样复杂的问题的看法,就意味着反驳了对这个复杂问题的最好说明;并且如果一般的方法是有效的,那么这种说明就最有可能是正确的。在这一章的前半部分,我将构建一种最可辩解的技术决定论,并且证明这个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相去甚远。

然后我将做出其他选择,在这个选择中,我把国内经济变化看作是“生产方式解释”的基础,它的产生(无论事实上它何时发生)是由整个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合作形式以及生产物质商品的技术——自我变化的趋势造成的。由于生产方式性质的原因,最初使一种生产方式特有的生产关系得以保持的发展进程,最终将生产出这种生产关系的衰落。这种变化不需要克服任何物质生产的障碍,

它可能以合作形式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便提高一个最初处于次要地位的集团的生产力,并且它会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开始阻碍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去激发这些集团反对旧的生产关系。但是在这种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中,这种变化可能全部都在生产关系内部发生。旧的生产关系固有的控制模式可能使下述情况不可避免:最初并不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将获得权力并渴望推翻旧的关系。生产方式理论与技术决定论的一个区别在于,它符合马克思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实践。暂且不论马克思的解释,这个理论与技术决定论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可辩护的历史理论。

即使马克思的若干历史解释都需要比较广义的说明,他的一些普通陈述也存在着一种稍微狭义的理论,这是不可否认的。依据这种狭义的说明,激进的国内经济变革通常是我所描述的两个过程中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即依靠一个次要集团来获得机会去提高生产力,而这个次要集团是由将要阻碍那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关系来确定的。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狭义的理论中,因为生产力的增长并不主要以自发地推动技术进步为基础,所以马克思仍不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生产力的提高通常是因为合作形式变化了,而不是因为新技术。而且,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必成为一种用来发展技术的最富有成效的制度。

出于方便考虑,我将首先讨论更加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然后来说明为什么只有扩大这个理论才能顺应文本的协调性。这个理论将证明:在科学史中,用来鉴定理论的标准方法能使更宽泛的理论成为马克思的本质理论。简言之,在马克思的本质理论中,生产力的提高在内部变化的过程中不起主要作用。马克思有时倾向于非本质的狭义理论,在这个狭义理论中生产的提高仍不占有特殊的首要地位,并且生产的提高缺少由技术决定论确定的技术特征。

在技术决定论与生产方式理论之间进行选择,这个赌注是高昂的。在政治学中,生产方式理论扩大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同时为革命提供了基本原理以作为激进变革的必要基础。在最抽象的方法论领域中,生产方式理论要求并且有助于证明:违背直到近来

才在科学哲学中崭露头角的解释概念和证实概念是正确的。我将通过以下方式推论本书：一个说明，即说明本书的观点排除了那种有利于技术决定论的生产方式解释；一个描述，即描述了其他的概念和证实概念；一个建议，即从更权威的方法论中推论出的政治结果如何能够有助于解释从休谟到今人的理论诉求，我将对这个问题提出建议。

## 作为技术决定论者的马克思

许多技术决定论者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人类学家雷兹利·怀特(Leslie White)主张：制度的全面发展应以类似于扩大“人均每年使用的能量总数”这种方式发展。<sup>①</sup> 在他的理论中，政治与文化制度虽然能够非常直接地调节生产需要，但是它们并不优先于社会生产关系。而且，在性质上、结构上发生的变革，或者比较迅速发生的变革并不发挥特殊的作用。

哪个具体的技术决定论能够成为马克思的理论？一位技术决定论者注解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著)中的一个著名段落，这个注解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段落中，马克思说人们的

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②</sup>

更明确地说，这种适合与支持都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情

① 雷兹利·怀特：《文化的进化》，纽约，1959，第368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况下。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①</sup>

马克思所作的其他论述提出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特别表现在他在19世纪40年代反对蒲鲁东时所提出的辩证法。同时,序言中的段落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的每个权威的系统说明——从世纪之交的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到科恩的近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都不断地返回到对这个段落的建构中(我没有引用这个段落的所有重要句子)。但是,这种返回的习惯使我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怀疑。这个段落是简短的自传体描述的一部分,它写在一个适度引导的句子之后:“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我想起另外一位一流理论家,他的总体理论常常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别人对他的一个简短陈述的严谨解读而被重构。尽管这个陈述源于这位理论家的一本书中序言部分的自传体描述,但是他很高兴地同意了不印刷这本书,并用新的著作代替它。尽管如此,技术决定论的核心文本仍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为数不多的详细而全面的表述,而且这个表述听起来确实很像一个技术决定论理论的系统表述。为了清楚和公平起见,我将通过找到对这个段落的最佳解读来构建最具辩护力的技术决定论解释,同时在这个解读中我将以技术决定论的方式解释关键术语。

在技术决定论中,“生产力”被最好地解释为工具、技术和知

<sup>①</sup>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识,人类依靠它们将物质制成有用之物,但工具、技术和知识却遇到了另外两种限定。生产力必须成为克服武力障碍的一种手段,来消除由其他人的反抗造成的障碍。依此理解,枪被解释为在过去常常用来打鹿,现在成了一种生产力,而不再是过去常常用于征占领地的枪。一个工头成为一个生产力是因为他知道如何切割金属薄板,而不是因为他知道如何维持劳动纪律。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需要这种限定,因为生产力被要求成为自主的技术因素,这个技术因素排除了其他方式而从整体上解释社会和政治进程中的基本变革。很明显,社会统治关系和政治统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他人的控制手段的发展,而且那些被要求用技术因素加以解释的冲突也决定了这个发展。

同样,最具辩护力的技术解释一定要排除在生产力的范围之外,马克思称这种生产力的范围为“合作方式”,科恩则对此使用了简洁的并且唤人回忆的短语“劳动关系”:从事生产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个定义排除了对人或生产工具的控制。同时,生产力必须被加以限制,否则认为生产力是变革的自发性基础的观点将会歪曲明显的史实,而且会歪曲马克思显然看到的史实。劳动关系发生变化就是由于有了新的统治关系。举例来说:比如法老控制下的劳动组、中世纪在统治者领地上的苦役们的劳动合作,以及在资本主义的前工业社会阶段中分散在“生产”系统中的手工业劳动。而且,劳动关系的变化模式几乎不包括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方法的发展,但是如果这些新方法是技术进步的要求,那么这些变化模式就应该有这些新方法。实质上,所有的劳动关系都已经被描述在古埃及坟墓中的墙壁上了。

在序言中,“生产关系……的总和”被说成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制度的基础。许多其他理论也提到这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财产关系中找到了一个合法表达;生产力通常在生产关系中运转;生产关系可能阻碍生产力;人们在社会革命时代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生产关系。为了发挥这些作用,生产关系被最好地建构成控制人、劳动力、原材料的关系,或者被建构成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

力。人们在生产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决定了他们属于哪个阶级。比如,如果一些人控制生产力并在与其他人达成的劳动力买卖合同期内使用这些生产力,同时这些其他人因不能对生产力或原材料进行实质性的支配而要出卖劳动力,那么前者是资本家,后者是无产者。

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者们通过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截然分开的方式,能够追求极度诱人的目标,即接近于马克思去描述普遍的经验规律,在这一描述中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的整个理论被以一种非循环的方式加以说明。虽然我将论证人们必须要放弃这个目标,但是尽管这个目标远离了马克思的大部分具体历史解释,它仍为人们坚持技术决定论对马克思总体观点的解释提供了一个重要动机。

在序言中,生产关系网络被说成是当它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发展变革。在解释这种关于束缚的比喻时,任何具有辩护力的技术决定论都不得不违背人们对序言严格精确地解读。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sup>①</sup>”。如果我们将这句话作为马克思的严谨而确定的观点,那么只有当生产关系使所有生产力都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才束缚生产力。坚持这种束缚的历史理论就必须否认下述情况:比如,只要封建制度允许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曾经被推翻过。这种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暗示恰好是保守的:直到资本主义没有任何能力去发展生产力时,它才会改变;这种理论对封建制度的暗示在历史上是荒谬的,就如马克思充分意识到的那样。这种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暗示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竞争总是激励技术进步的观点相悖,也与马克思是一位社会主义者的事实相悖。<sup>②</sup>

马克思偏激的陈述在其政治背景中被理解为一种夸张。这种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②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页)。

夸张反映出他对蒲鲁东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的抨击,因为这些人对工业发展的研究只是去谴责这一发展,而没有现实地考虑现代工人所要求的物质需要。一个更适度的束缚标准是可行的,它更接近于马克思的实践。依这种解释,当其他某个生产关系网络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个生产关系网络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遵照科恩的用法,我将借用马克思在序言中的简明标志来说明整个生产关系网络,即“经济结构”。技术决定论者对序言的具有辩护力的解读,应当把这种集束缚、比喻和夸张于一身的主张理解成下述主张:只要一个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就只有这个经济结构能够持续存在。当生产力在一个新的经济结构中更有成效地发展时,即使生产力在旧的结构中仍以某种程度在发展着,那么这个旧的结构也依然会灭亡。

马克思可能没有建议人们去解释经济结构中的每一个变化,直至最小的细节变化。在序言中,马克思关心整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形式”的消失和新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形式”的出现。从封建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经历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在这里是马克思的论题,因为生产力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突出的。一个不全面的目标——只在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中解释变革——使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合理。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个统计上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需要表现出基本类型的经济所具有的特征,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举例来说,马克思知道在16世纪的英国和早期罗马帝国中的大多数生产者都是小自耕农,<sup>①</sup>但是马克思却将各个经济都看作是在类型上存在根本区别的。

幸运的是,马克思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清楚且着重地陈述了关于根本区别的标准。“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

<sup>①</sup>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5—466页、第485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

剩余劳动的形式。”<sup>①</sup>马克思将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看作是从直接的生产者中榨取剩余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在统计数字上最普遍地存在于整个生产中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这样做是因为类型学是被解释对象的一部分。经济类型的最根本变化能够解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变化,而且马克思把对剩余的控制看作是对后者而言最重要的并且是唯一具有决定性的东西。一旦根据榨取剩余的方式区分了经济结构,那么奥古斯都(Augustus)的罗马帝国和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英国在马克思的所有解释中,都会存在着在类型上的根本不同。在前者,剩余主要是通过对奴隶的所有权来榨取;在后者,剩余主要是通过对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统治来榨取。

最有托词地把马克思解释成为一位技术决定论者,是通过使用某些关键术语——这些术语以我描述过的方式被理解——浮皮潦草地处理序言中的著名段落实现的。技术决定论者的总体观点是:社会结构的进化是通过技术变革而实现的,而技术变革是为了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技术决定论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种类型,它必须以将工具、技术和生产能力置于首位的方式来回答三个问题: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用什么可以解释这个经济结构(以及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主要特征?什么引起了生产力自身的最重要的变化?什么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变革时间与方向?如果人们合理地利用序言中的段落,就会使技术决定论者的答案屈从于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首先,一个稳定的经济结构是这个经济结构的基本类型,因为考虑到即将实现的生产力,这个类型最佳地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发展。其次,生产力能够发生最重要的变革主要是由于人类致力于去实现那些与统治其他人的愿望不相关的变革:克服物质短缺的愿望与能力。因此,经济结构类型的基本变化的原因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且生产关系引起了商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也可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变化,反之亦然,但是前者的变化程度比后者的程度更大。科恩常将这种首要性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环境优先性相比较,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传统地理解为:环境的变化对物种的变化产生了主要影响,但却不是反之亦然,尽管后者明显对前者产生一些影响,就像我们在每个海狸水坝里亲眼见到的那样。同样,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中,经济结构及其伴随情况对生产力产生了某些影响(否则经济结构及其伴随情况就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增长),但是生产力发生最根本的变革的原因在于:生产力自身在人们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时扩大了。第三,暂且不论外部影响,新的生产力的诞生造成了主要的社会不稳定性,它使一个新的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成为提高生产力的更好手段。社会不稳定将持续下去,直到建立起最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新的经济结构。

这三个概括性声明当然是历史的总论,这个历史总论将技术置于真正的首位,并且这个历史总论通过序言和其他文本被学者们强有力地提出。科恩的评论巧妙地概括了这个理论,“生产力根据经济结构促进发展的能力来选择它们”<sup>①</sup>。事实上,在关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大量著作中,我所辩护的技术决定论与科恩在他的富有启发性的书中提出的技术决定论最接近。我希望在一些论点上,特别是在定义“束缚”方面以及在辨别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方面,我们对马克思所做的说明是改进的。然而这两个说明是非常相似的。实际上,我在本章前半部分的根本讨论是:与科恩的解释类似的解释是最好的技术决定论解释;同时,与科恩所做的解释不相类似的解释是一个合理的解释。科恩的严谨的读者们将从脚注中回想起他勉强接受“技术决定论者”的称号,因为这个短语可能会提出“就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讲就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言,……不是任凭人们可能做什么”,而是“因为可预见到作为理性的人必定去做什么”。<sup>②</sup>但是,如我将很快讨论的,这种技术宿命论

①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文版第192页。

② 同上,中文版第177页,脚注2。

与我所描述的技术决定论存在着天壤之别。<sup>①</sup>

## 赌注是高昂的

我将设法发展某种技术决定论,即如果一般方法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技术决定论最有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解释。当然其他技术决定论也是有效的,比如普列汉诺夫倾向于对“束缚”进行严谨而精确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只要旧的社会安排允许生产力的增长,那么一个社会就不能从一个基本类型转变为另一个基本类型。依据这些理由,普列汉诺夫向其他人谴责布尔什维克过早地号召社会主义革命。<sup>②</sup> 我已经指出这种解释是不可辩护的,而且这种解释对技术决定论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威廉姆·肖(William Shaw)在他近期的一本书《马克思的历史理论》<sup>③</sup>中进行了技术决定论解释,这一解释将劳动关系被包含在生产力之中。虽然,后一种选择本身是诱人的(实际上我赞同这一选择),但是我将设法说明这一选择破坏了下述方案: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描述为它要适应生产力在根本上的自主发展。有些人将马克思解释成一位研究经济崩溃的理论家,对于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来说,结构变化与有效的技术使用之间存在着相当直接的联系。社会基本类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自发地感觉到一个破碎的经济系统的明显无效性和其他经济系统的生产优越性,而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却

182

<sup>①</sup> 本章中在很大程度上暗含了我与科恩的讨论,这些讨论在我的短评《生产力及生产力变革》(载于《哲学评论》,1980,第90页)中清楚地与科恩的著作相连。

<sup>②</sup> 普列汉诺夫关于他的解释的经典陈述是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文版:博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778页)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在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中普列汉诺夫一派所持的观点。

<sup>③</sup>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斯坦福,1978(中文版: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83 发挥着次要作用。<sup>①</sup>然而,就像我在谈论我所选择的技术决定论时强调的那样,马克思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与统治阶级的身份联合在一起,这些优势似乎会通过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崩溃来实现社会基本类型的变化。当然,如果技术决定论所做的解释没有承诺具体的变化模式,那么它就更加具有可辩护性。

重要的是,有一种技术决定论解释没有使马克思成为一个技术宿命论者,这种解释从现在起将成为我的任务。这种技术决定论不是站在一种非人道的、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立场上,即不管人们怎样思考或渴望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情况决定了未来的社会发展都是一样的。人们所思考的和所想要的——包括他们在政治、宗教以及合理劝说的影响下所思考的和所想要的——可能决定性地确定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历史变革是因为人们有这些思想与愿望,而不是因为尽管人们有这些思想与愿望。但是思想与愿望发生变化的

---

<sup>①</sup> 这个崩溃理论最起码在恩格斯的一些晚期著作被强烈地提出。比如,这个理论是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本质解释,在这本书中像下述这样的段落典型地说明了唯物主义历史概念:“在危机中……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0—751页,第753页恩格斯的粗体部分)。在这本书的尾声,恩格斯提出这种模式是“我们把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的缩影。利希海姆(Lichtheim)在《马克思主义》中对马克思的成熟观点进行了说明,他的说明将这种模式与经济自然反应以及最终发生的经济混乱联系起来。“工人阶级的活动提供了唯一准绳,通过这一准绳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被测量。实际上,这意味着特征和政治行动都不得受控于可靠的工人领袖们自发形成的抱负与信念”(第128页)。这些自发的抱负与信念大概倾向于因经济危机而产生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经济危机中“每个革命系统……都将危机激化,因此依靠大富豪的积累和技术知识资金的追加投入,这个系统储备了新的且更加严峻的危机要素”(第193页)。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纽约,1970)第11章中,斯威齐(Sweezy)勾勒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崩溃理论的争辩史,这个争辩史是由伯恩施坦(Bernstein)在其著作中率先提出崩溃解释而引发的。

决定性特征被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比如,稳定时期的正统思想被归因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些制度从维持经济结构的功能中获得它们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经济结构则最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处于社会革命时期的人们的心理状态起因于:因经济结构而产生的需要和限制与这些稳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个经济结构与受它束缚的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张力与这些稳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生产力的首要性正如科恩常设置的那样,在解释顺序中具有逻辑优先性,即处于“解释的首位”。

似乎我所描述的技术决定论善于闪烁其词,并且它非常乐于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以至于某个将历史理论归结于马克思的人一定会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诡辩。事实上,当同情马克思的人判断这种最可辩护的技术决定论的时候,赌注对于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高昂的。

首先,技术决定论决定性地影响着人们在进行历史解释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包括对确定历史学家在从事不同研究时应该耗时多少的研究,也包括对界定什么是成功的以及什么是不成功的解释,什么是完整的以及什么是不完整的解释所做的评价。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中,生产关系就是这种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因为它们根据现有的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它们会因为无法适应新技术的问世而改变自身。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中,对于要设法解释最基本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新的安排如何能成为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安排?”变革如何影响不同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同的阶级都拥有什么权力,这些问题虽然在理解变革如何发生时是决定性的,但是在理解变革为什么会发生时却是次要的。那些赞同马克思的历史学家,对是否要优先考虑技术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人们对马克思的解释引发了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对技术优先考虑的观点为政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许多技术落后的国家,比如安哥拉、坦桑尼亚、阿富汗,它们的政权号召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技术现代化的政策而不是去建立社会主义,这样做的根据在于技术现



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开端。技术决定论对于这些呼吁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技术决定论者对生产力的强调也令人痛心地为这些国家——如南非和约旦——提供了暗示,在这些国家中尽管存在着贫困、堕落和镇压,资本主义却仍旧迅速地提高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社会主义将消除许多不幸,也不见得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在提高物质生产力方面就会做得更好。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对马克思所做的解释暗示了目前在这些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为社会主义而战。“资本主义在这里还没过时”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提出的,并受到了莫斯科和北京的引导。

185

另外,革命的理论基础在技术决定论中的地位与它在我所描述的选择中的地位大相径庭。的确,一个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者可以自由地说:能够稳定经济结构的政治上层建筑将总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对实现基本变革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很难弄清楚:他或她提出的关于技术首要性的普遍理论的理论基础,如何能包括这种总体评价的理论基础。如果非说不可的话,一个认为变革要以全人类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观点,将建议人们通过选择革命来获得生产效率,在这场革命中社会变革依靠呼吁所有阶级共同的物质愿望而实现(事实上,这种求助于过时理论的策略在今天的欧洲共产党中司空见惯)。因此,如果马克思确实相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暴力活动是必要的,那么这种相信容易与他的总体历史理论的核心相分离。这种分离的情况就像牛顿的光粒子理论与他的力学和加速度的法则形成对比,就像达尔文关于遗传机制的半-拉马克模式(semi-Lamarckian)的观点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形成对比。另一方面,用来解释生产方式的普通例子其实就是用来说明革命必要性的普通例子。

最好的那种技术决定论,为人们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进行相当保守的讨论提供了前提——当我说明这一点的时候,我的本意既不比这一点多也不比这一点少。在任何一种明智的技术决定论中,关于束缚是否会发生的问题将会存在争议,而且在束缚与基本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的时间滞后性问题不能被准确而普遍地下定

义。原则上,倾向于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认为南非的产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增加更多,或者坦桑尼亚的技术已经先进到足以产生束缚。在后一种情况中,他或她可能会补充:西欧和北美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它们早在若干年里至少与当今的坦桑尼亚一样技术发达,但是它们却在这些年里受到地方的和短暂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的阻碍。同样,当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所谓的革命需要时,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可能会认为对产出更多产品的新经济结构的呼吁永远都不足以有效地用暴力推翻原有的多余的统治阶级。科恩本人认为资产阶级将从不正当地分配原有社会中的物质利益和权力中获益更多。<sup>①</sup>

在所有这些例证中,技术决定论仍然把其特有的论证重任压在某些人的身上——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的当代主要争论中持有更加激进的立场。同样道理,技术决定论能够结合更加具体的前提来为更加保守的立场提供其特有的论据。这就是为什么在上百万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看来,对马克思的技术和历史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相比之下,生产方式解释对这些争论中的保守派没有益处。统治阶级的堡垒是保守派受到激发的前提之一,这个堡垒如此之深以至于革命就必须成为一种需要。在对这种更加广义的解释中,对生产力的这种束缚不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尽管这种束缚在狭义解释中发挥着实质性作用,但是它却强调某些生产关系的扩大意味着生产力发生了最重要的变革。同时,这种解释是在这一层次的生产关系上展开的:即,从所谓的“不发达国家”的现有特征和未来的发展潜能来看,这个国家的生产已经很发达了;与此同时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普遍变革,甚至在生产设备相对陈旧的时候,生产关系也不再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孤立的、以维持生计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当说尽了一切与做尽了一切的时候,由对马克思的其他解释导致的这些结果难道不正是马克思热衷的方面吗?为什么历史学家

<sup>①</sup>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文版第233页。

或者激进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与马克思的研究者们形成对照——都关心马克思的总体历史理论的解释？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很好地思考。马克思的理论需要经验的辩护，并且引文与注解都不能构成这种辩护，然而有着坏习惯的辩护者们却背道而驰。同时，人们在解释中发生的争论，的确可以在探求社会学的理解中发挥合理作用。

一个理论就这样通过它所支持的解释所具有的优越性而得到证实。然而，有的人可能信心十足地认为由于研究人员们确信解释是成功的，所以这些研究人员受到这种信念的引导，但是这个人却不能确定这些研究人员的哪种理论信念能够带来这些成果，而反过来这些成果又能证实这个理论信念。许多生物学家欣赏达尔文在解释关于分类学、物种分布和古生物学的论据时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们不能肯定如何去定义《物种起源》中的本质理论。这种定义包括达尔文对遗传机制的说明吗？关于蜕变是通过逐渐与最初类型相分离来完成的论题，是本质性的还是可有可无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的生物进化的要素，而不是达尔文热衷的问题。或者，举一个更类似于马克思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确定一个理论家的真正意图会在哪里——对弗洛伊德的最令人信服的成果来说，什么理论是本质性的？有一种清晰的隐喻指导着弗洛伊德及新一代最富创造力的精神分析学家们，这是对无法清楚表达的本能力量的一种隐喻，它表达了本能力量在人的生存与控制中受到自我的驾驭与压抑。但是这个隐喻表达出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确含义了吗？而且不管怎样，这种驾驭与压抑模式是他们以此来获得主要成果的理论吗？或者，他们是否说明了：个体发展是由于婴儿时期的创造力以及这个个体对以爱、恨、恐惧为基础的情感问题的解决，而这种创造力与解决实际上始于出生的那一刻？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部分对精神分析理论是本质的吗？或者，这个情结是否反映出在一个文化背景中和在某种临床理解中的特别醒目的因素？当这些问题以弗洛伊德的热衷程度被提出时，它们已经成为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科学争论的一部分。

马克思的解释能够而且应当具有相同的科学关系。一些研究者立足于相对的理论中立而接受了下述观点：马克思对英国出现资本主义的解释和对现代法国政治史中的主要变革的解释；恩格斯对改革的起源的勾勒；列宁对 19 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和即将到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释；希尔(Hill)与阿尔汉格爾斯基(Arkhangelski)对英国内战的说明；希尔顿(Hilton)对英国农奴制衰败的解释；或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编纂史的其他具体成果。这些理论中的某个部分似乎做出了这些解释并且从这些解释中获得支持。那么这个部分理论是什么？人们对马克思的意图的争论，从这部分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贡献中获得了科学的重要性。因为这部分理论与马克思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实践紧密相连，并且与生产方式的解释密切相关，特别是它确定了经过充分证实的马克思的总体历史思想的核心所在。

### ● 马克思不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 ●

这种主流解释是错误的。当马克思书写历史时，他坚持不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拥有的三条特殊原则。在马克思所解释的历史中，经济结构因为能够提供最大化的生产力，所以不能持续存在。生产力不能自主发展，而且生产力的变革从狭义的技术意义上来看——这个狭义的技术意义排除了劳动关系——不是引发整个社会变革的根本来源。

我们的讨论如果始于下述观点将是十分便利的：生产力的发展大体而论是自发的，它伴随着最终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经济进程和政治进程的根本变革，而且这种由生产力引发的变革要远远大于其他方式的变革。每个人都将《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历史部分看作是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的实践范例。在那里，马克思描述了英国的封建制是如何首先被资本主义取代的。这个史实历经了三个世纪，经济结构经历了从一种基本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关键阶段。在所有这些关键阶段

中,经济结构及其产生的商业进程与政治进程都发挥着独立的作用,它们决定性地影响着所有重要的生产力变革。

一个旧的封建贵族被“大规模的封建战争消灭了”,取代旧贵族的是在与这个旧王朝相竞争的新王朝中支持商业的封建新贵族。<sup>①</sup> 随着新贵族的重权在握,大地主们通过盘剥佃户并使农民放弃绵羊牧场来回应欧洲大陆对羊毛的需求。<sup>②</sup> 这种变革的发生不是因为它能使农业更有效。因为相当传统的群牧方式只是使地主获利更丰,而源于新世界的黄金引发了长期的通货膨胀,它提高了农业价格并降低了相对富裕的农民的实际租金,这些农民有着长期租约并受到法权保护,由此他们成为有进取心的资本主义农场主。<sup>③</sup> 在制造业,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sup>④</sup>

富有的商人从这种掠夺中获利,他们使用新的财政资源去建立制造业公司,并且常雇佣那些来自于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乡下的绝望的难民们。由于一些非技术性的原因,商人们庞大的金融后盾对于制造业的出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建立新型公司来服务于新的市场是存在着商业危险的。在大多数生产部门中,许多靠薪生活的工人需要被公司雇佣以保持企业家们垂涎三尺的、在每个工人得到了至少能维持工人生计的工资之后的总剩余。<sup>⑤</sup>

这些阶段不是马克思所言的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整个记事,但

①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812—813页。

④ 同上,第819页。

⑤ 同上,第351页、第358页。

它们是最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兴起最终包括了生产力的实质性增长,这些增长是通过土地所有者的合并以及工厂系统的规模经济来实现的。广义上说,这些是生产力的变革与进步,但是这些变革不是自主的。在解释这个例子中的生产力变革时,商业进程和政治进程至少和那些想通过技术进步来克服物质匮乏的愿望一样重要。

实际上,技术决定论的情况甚至比这更糟。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工厂和大型农场中的新的劳动关系不是一种可以被技术决定论作为生产力进行计算的东西。生产力在所需的狭义意义上,在马克思用来解释基本经济变化例证中并不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即使一种更广义的解释能够以某种方式与技术决定论调和,那么事实仍然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做的说明中,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趋势不是自发的。

无论我们在何时审视马克思的经济学史,生产关系及其产生的过程都在我们解释最重要的生产力变革时发挥着根本的、独立的作用。至多存在着一种均衡的相互作用,科恩对此进行了鲜明的概括与反驳:“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曲折的‘辩证法’留下了余地,因为哪一方面也不优先”<sup>①</sup>。马克思对狭义“技术”意义上的技术变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他说明了人们在工业革命时期对机械设备的依赖。在这个说明中,马克思几乎同等地强调了机器生产的更高效率以及机器生产给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利益,比如机器生产作为一种手段可以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并通过破坏对娴熟的技术工人有利的商谈来灌输劳动纪律。<sup>②</sup>对提高产量的工具的寻求和对技术的追求,在实现工具和技术本身的划时代变革中明显发挥了次要作用。由此,马克思讨论了具体的并且相互依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起源,而这些社会分工对生产工具的发展产生

①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中文版第166页。

②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474页、第476—477页。

了最根本的影响。在马克思对这些社会分工的讨论中,他提出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与其说是人们追求生产率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小组间的联系与交易的结果。<sup>①</sup> 对近古时期(中世纪末期——译者)的技术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由贵族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兴起产生的影响——被马克思描述成:通过征服而实现的扩张对国内产生的影响,商业的增长,运用金钱的权力去“消融”传统社会关系。<sup>②</sup>

当我们从生产力如何变革的问题转向生产力如何形成稳定的经济结构的问题时,技术决定论与马克思之间的冲突声震耳欲聋。根据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一个经济结构有它的基本类型是因为这个类型最好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反,马克思将奴隶制和封建制描绘成某种结构,即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顾其他可行的结构——至少是有益的结构——而将他们的力量用来维护现有结构。马克思通常把封建贵族描写成:当封建制正值兴旺时,“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sup>③</sup>的迂腐的经济观念就是名声在外地挥金如土,他们束缚了技术发展。<sup>④</sup> 同样,古代社会中因为身为主人的贵族对技术不屑一顾,并且这迎合了他们的奴隶不愿从事新式且复杂的工作的心态,所以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业是倒退的。<sup>⑤</sup> 在这两种社会安排中,实际的劳动集中于“农业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sup>⑥</sup>。

①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127页、第384—385页。

②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第493—495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页。

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页。

④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503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786页。

⑤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

⑥ 同上,第371页。

技术决定论认为如果农夫们和工匠们摆脱了封建的或拥有奴隶的贵族,那么生产力将被弱化,封建制和奴隶制就都不会持久。马克思的评论的全部主旨则与此相反,他认为因为农夫们与工匠们缺少推翻贵族统治阶级的手段(首先是遍及广泛区域的联合与训练),所以封建制和奴隶制都会持续下去。实际上,马克思将封建制和奴隶制看作是军事胜利,而不是在他们原始状态下的生产力,“假如把人本身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了奴隶制和农奴制”<sup>①</sup>。

对马克思做出的技术决定论解释所特有的第三个观点是:基本的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生产力的变革造成的。相应地,有人人会希望马克思在说明封建制如何变得不稳定并且让位于资本主义的时候,能频繁地描述生产力的变革。我在先前对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基本类型的转变的勾勒中,的确提到广义术语的生产力变革,依据这个术语,工厂中的手工劳动组织和大规模从事单一生产的农场中的农业劳动组织本身就是生产力。但是技术决定论需要那种排除了劳动关系的狭义用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著作总是坚定地、长期地并且明确地否认:这种狭义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力

<sup>①</sup>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不可否认,封建的且拥有奴隶的最高统治者通过迫使劳动者们更努力地工作,可能会提高实际的产量。但是技术进步的程度不应该由生产力的总产量来衡量,而应由在雇佣劳动达到最高效时的人均每小时的可能产量来衡量。当一个成功的罢工降低了劳动的速度时,这个工厂的技术不会变得落后。不管怎么样,尽管技术决定论者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以获得本领去强迫人们转向技术进步方面,但是他们别无选择。马克思将技术决定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局限,因为技术决定论妨碍了很多人去选择休闲或更有趣味地研究如何增加物质产量。劳动者们能够而且将经常集体决定缩短工作时间或使工作变得更加有趣,即使物质生产会因为放弃这种做法而增长得更快,那么这些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参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的“工作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355页;和《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页。)如果劳动的强制性强度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那么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在此一定会反对他本人对于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说明。



变革是促进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

当马克思描述那些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生产变革时,他几乎全部涉及了某些劳动关系的扩展并且涉及了在他的说明中不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变革。许多相互依赖的、具有多项专长的手工业者们汇集一处从事的“制造业”生产,这种生产取代了小型的、独立的、专业化的工场手工业者们的生产。在大片土地上从事单一种植的农业,取代了小型的在家庭小块土地上种植不同农作物的农业。但是,技术变革几乎没有被提及。实际上,马克思对于技术变革——而不是劳动关系的变革——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的总体描述显然是反对技术的。他在《资本论》中写道:

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sup>①</sup>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概括了从封建社会生产物品的方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物品的方式的变革,这个概括对商业活动如何引起劳动关系的变革进行了描述: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sup>②</sup>

马克思的确在反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随后受到的束缚引发了基本的社会变革。然而如果生产力被等同于技术,那么当马克思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页。

<sup>②</sup>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书写历史的时候,他将强烈反对这个原则。除非马克思有化解矛盾的神通,否则他一定是在广义上使用了“生产力”这个短语。

对“生产力”的狭义技术论解释不但不适合马克思的历史实践,而且在马克思明确将合作方式归类于生产力的段落中,这种技术论解释还与这些段落严重冲突。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级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sup>①</sup>

马克思也把“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称作生产力。<sup>②</sup>《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几乎是与序言同时期的作品,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提到了劳动组,“单个人的力量的联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sup>③</sup>;提到了“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sup>④</sup>“社会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sup>⑤</sup>。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3页。

② 同上,第38页。

③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

④ 同上,第83页。

⑤ 同上,第210页。

本身必然是集体力”<sup>①</sup>。事实上,马克思用两章长篇来分析合作形式,并一再地将它们描述为生产力。<sup>②</sup>

马克思的著作在行动主义者中的威信,使“生产力”的定义问题具有了划时代的政治价值。如果只变革劳动关系而不创新技术,并且这个变革可能成为生产力消解原有经济结构的手段,那么马克思的普遍理论就不能提出:技术进步是使一个政权从科技落后地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而且它甚至是一个有效手段。

当逐步展开我本人提出的技术决定论解释时,我将采用广义上理解的“生产力”。只要活动、工具和原料的存在本身不需要那些用来控制人或物的权利和权力,那么这些生产力就由活动、工具和原料构成——商品通过这三者被制造出来并且具有了可用性。这个概念符合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基本因素”的描述——他在《资本论》中写道:“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③</sup>

## 一个新的词汇

对我提出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来说,采用对“生产力”的更加广义的技术理解是必要的。同时,放弃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历史的“生产关系”。搞清技术决定论错在哪里,这个问题既不会产生太多异议也没有必要。但是通过这个问题来理解我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会让人感到我的解释更忠实于马克思的著作并成为理解历史与政治的更得力的工具。

“生产关系”完全不能通过将生产关系与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对人、劳动力或生产力的控制关系等同起来而定义。我们必须要为存在个性化差异的生产关系提出一些标准,否则我们将以下述谬论而

①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及后面的内容。通常,power与force都可以用来翻译德语的“力量”。

② 参见比如,同上,第366页、第370页、第371页及后面的内容;第424页、第428页。

③ 同上,第202页。

告终：资本家、控制炼油厂的资本家、控制冰淇淋工厂的资本家都将处于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并且（由此而来）他们都处于不同的阶级中。

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者试图构建一个个性化标准，但这个标准却没有涉及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商业进程（与技术进程形成对照），以及社会集团对历史变化的影响。这项构建任务受到实证主义假说的驱使，我将在第七章对此进行长篇论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必须建立在下述情况的基础上，即在原则上，由于人们对政治和文化制度的主要特征、大规模商业进程的性质，以及基本社会变革的力度，这三者的先前情况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知识，所以它们能够被描述。如果我们根据以前的现象使生产关系个性化，那么我们对生产关系的鉴定就不能为下述观点提供独立的基础：即认为这些现象一定是相似的。唯一保留下来的用于辨别不同生产关系的工具是：受某个人控制的不同物体之间的差别，排除了由上层建筑提供的控制手段和控制结果。然而，把汽车资本家、石油资本家、冰淇淋资本家划归于不同阶级将会导致差别过多，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不得不采用绝对宽泛和抽象的范畴作为界限，比如土地、人类、劳动力和物质生产手段，来表达由这些物体生产出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差别。

原则上，这个过程并不令人满意。生产关系可以通过辨别它们的对象来加以区别，比如与控制某个人的一生相比，暂时控制劳动力的使用是一个可以用来区别无产阶级与奴隶的特征。但是如果对象上的这些差异可以成为判断差异的特征，那么为什么汽车资本家与石油资本家之间的这些差异就不能成为判断两者差异的特征？技术决定论的理论框架不能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普遍原理。（请注意，如果技术是首位的，那么石油和汽车的差异看上去会更加显著，最起码它们从表面上看是显著的。）而且，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者在实践中所依靠的抽象差异的与历史无关的界限，看上去疑似税收来源与“生产因素”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会计学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同时这种差异还伴有某种通常

理解,即奴隶主的收入来自于对人的控制,这个收入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过时的。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中最权威的短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导言和《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三位一体的总公式”(土地、劳动与资本),通过最透彻地分析这种范畴的界限而强烈地反对应用它,并且这一反对席卷了经济学史。

我所做出的选择比较注重上层建筑现象,而这种注重会以各种方式去影响生产关系的个体化。因为生产关系与其他社会特征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是完全符合技术决定论者的实践的,所以在这里区分相互作用的不同程度、整体主义的不同程度是重要的。不管怎样,围绕这些相互作用展开的争论常常充斥着模糊的指责:要么是不够辩证,要么是以形而上学取代了科学。

有的人相信类型上的差别在解释政治、文化、商业和历史现象时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最低程度的相互作用中建构了一个关于生产关系的某种类型学。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会辩证地看待这个程度,而且他们的观点非常一致。如果技术决定论者认为自身的较为庞大的分类学——技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用来解释最重要的现象的最好工具,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在对马克思的实践所进行的描述中,当马克思将某些生产关系个性化时,尽管较高级别的相互作用与技术决定论者的个性化风格相冲突,但是我将强调这些较高级别的相互作用。在这些事例中,人们如果不提及控制的手段或结果——包括政治手段或结果——那么就不能充分而明确地描述出马克思所依赖的差别。因此,两种不同等级的整体主义可能在此有所区别。在一些事例中,有的人能够描述出正在讨论的关系的特征,并把这一特征从其他所有特征中挑选出来,而没有涉及相对的上层建筑现象。然而这个人却不能描述出: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能够导致这个关系所特有的伴随情况的任何核心因素。因此一个人能挑选出某种关系,这个关系将“亚洲的生产方式”描述成对灌溉系统的控制关系,而且最闻名遐迩的技术决定论者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已经照此行事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本人涉及了一个不同的特征,这个特征

包括在核心官僚机构和分散的村落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财产偶尔能说明其他重要特征,但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定义将无法描述出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这就像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多的教育是在家庭之外进行的;或者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另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烈性酒被大量消费。所有的而且只能是正在讨论的对象被挑选出来,但是它们的本质属性却无法被描述出来。最后,在最高程度的相互作用中,恰恰没有任何描述可以挑选出正在讨论的那种关系,即没有涉及不同的控制手段与控制结果的那种关系。比如,我将证明在没有涉及统治的政治手段的情况下,封建领主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区分的。

通常来说,实证主义使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羞于循环理论,他们有时通过定义他们偶尔叙述的各种现象来连接理论。我希望对马克思的历史类型学的下述部分研究能搞清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并且这种忽略造成了科学中非恶意循环理论的种类与使用。

除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之外,他最重要的而且最有特色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他的封建领主制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概念描述了封建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马克思把“封建生产方式的过渡”定位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正值英国发生内战并且以联邦作为分水岭。<sup>①</sup>如果社会关系的定义与受控物体的固定界限有关,那么这个封建制的晚期就是一个悖论。直到1600年,劳役制——领主们控制着佃户们固定的一部分劳动——在英国已经消失了大约两个世纪,即使以货代款的租金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2页。同样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9页;《资产阶级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7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253页。

现金租金所取代。只有在我们考虑了用来维护统治的政治手段、统治者们的商业目标和推动变革的阶级形势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一种由生产决定的经济——这种生产是在长期租约下的生产,在独立车间中的生产,或者为迎合商人需要而进行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简而言之,我们拥有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怪兽,即没有封建领主的封建制度。

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步骤是:首先,他从非常广义的意义上来定义封建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社会关系;然后,根据能够决定榨取被统治者剩余程度的力量,并且根据被统治者通过限制这种力量的有效性来实现自我保存的能力,将封建制度与这一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并且很清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sup>①</sup>

如同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在封建领主制这个概念中,如果某个人通过相对直接地运用军事和政治权力,而不是通过剥夺市场的有利条件,来榨取直接的生产者的剩余,同时又让其他的生产者控制自己的生产力,那么他或她就是一个封建领主。因此,16世纪的租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0—891页。

约条款反映了乡绅们对农村的政治统治,而不是纯粹的经济优势;在制造业中,由王室批准并且具有行会优先权的垄断者们的利益生产出了大多数剩余。对马克思而言,尽管特殊的控制手段可能是封建领主制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商业实力和商业目标上的差异,依然使封建晚期的社会情况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况区别开来。当农民们拥有自己的工具并且有终身的或者是很长时期的租约的时候,大多数农民在面对这些对原有条款进行传统更新的举措时都不会随意地出卖“他们的”土地。而作为领主的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威望与个人的奢华生活感兴趣,对通过竞争进行商业扩张不感兴趣。最后,马克思强调晚期封建领主社会的不同变革趋势,这些趋势与表面的类似情况相比,是更真实的资本主义轮廓。比如,大商人将雇佣手艺人仅仅当作是对剩余基金进行投资的另一个计划,他们明显区别于那些想成为企业家的雄心勃勃的手艺人。后者不能依靠垄断的有利条件和政治特权,但却接受了额外的有助于扩大部分生产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扶植;前者的商业活动则相反,他们“不能自动促成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推翻,而宁可倾向于维护或保留这个生产方式来作为它自身的前提”<sup>①</sup>。

简言之,马克思通过参考政治手段、商业目标以及动力作用来描述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他避免了关于没有封建领主的封建制范畴的无稽之谈。而且,马克思借以辨别事物的特征是从详细地研究特殊的历史进程中获得的,而不是从某个关于抽象的生产因素的固定界限中获得的,尽管这个界限也是从反思普遍的生产过程而来的。

对封建领主制的定义是一个特别使人印象深刻而且重要的例子,这既是因为对马克思理论而言,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记事是如此重要,又是因为断言某些国家是封建制的或半封建制的,对于论证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时机还未成熟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2页。参见在注释37的前面引入的文章,在这个段落中提出的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的其他来源。



然而还存在另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马克思对封建领主制概念的用法同样受到整个社会背景的控制,而生产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内战前美国南部的庄园主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追求利润,所以马克思把他们看作是一类资本家。<sup>①</sup>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因为社会巨变限制了罗马的平民拥有一个无组织的、寄生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是一个从根本上有别于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sup>②</sup>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从相对孤立而自足的村落中生产的剩余,被高度机动的并且广泛分布的官僚机构榨取,这些官僚机构支配着那些用来保证使生产可以稳定而有效地进行的调整功能。在这里,如果生产关系的定义能够不涉及政治统治,那么官僚机构就会驻足于经济结构之外,并且我们会为马克思主义造出另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怪兽: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却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相反,在下述特殊类型的社会中,马克思明确地将生产关系等同于某种政治关系:

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sup>③</sup>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及后面的内容。《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9—340页,马克思在其中写道:“……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

<sup>②</sup> 马克思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sup>③</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页。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被认为是生产关系的东西,一定是通过对实际社会中的稳定与变革进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而被发现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能够进行解释的框架的原因之一,这是通过恩格斯的话“不是教条,而是方法”<sup>①</sup>来理解,而不是用马克思本人嘲笑的话语“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来理解。<sup>②</sup>

生产关系是对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劳动力或人的控制关系。然而,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可以根据生产关系的目标、控制手段,或者实施控制的方法而个性化。哪种差异可以定义特殊的生产关系,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哪些差异在解释随后的激进变革(我将很快沿着这条线路描述),以及稳定的制度形成(制度的形成,“这些制度主要是用来稳定这些生产关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主张生产关系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商业发展进程的基础的观点,就是在主张在后者领域中的稳定与变革要通过前者的方式从根本上加以解释。但是这些解释中所描述的各种生产关系的差异性不能预先地加以定义。

许多批评马克思的人认为,如果对生产关系的鉴定不可避免地要依靠那些关于生产关系与所谓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假说,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倒向了循环理论。比如,普莱曼兹(Plamenetz)和阿克顿(Acton)认为,这种循环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是如此的明显而醒目,以至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适合进行进一步的经验检验。<sup>③</sup>事实上,通过解释而连接起来的现象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定义而连接起来,这就是最有趣的科学理论。由此,从道

① 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致桑巴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② 马克思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③ J. P. 普莱曼兹(J. P. Plamenetz):《德国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伦敦,1954年),第2章第1部分;H. B. 阿克顿(H. B. Acton):《时代幻想》(伦敦,1955年),第164页及后面的若干页内容。

尔顿(Dalton)时代开始的化学革命取决于真正的化合物与纯粹混合物之间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预示了道尔顿的部分原子理论。真正的化学本质只有通过分子中的原子的重新排列才能产生,这是道尔顿在判别真正的化学创造过程时所需的方法。道尔顿的化学理论以一个假说为基础,即基本物质以固定的、简单的数字比例结合成新物质;而传统化学的拥护者的理论基础则在于相互亲和力理论,他们强调不同的过程无法显示出固定的比例——这个固定比例总被人们看作是通过合成而产生新的化学本质。道尔顿的理论通常仅仅依靠宣布被制造出来的是纯粹的混合物而不是真正的新的化学本质来回答问题。没有任何普遍的方法可以说明混合物与化学本质之间的差异,而且就像传统化学的拥护者所描绘的那样,这种差异也不能预示化学原子观。那种认为真正的合成物与混合物之间的差异能够以理论中立的方式被描述的想法,不过是小学课本中让人放心的虚幻故事。并不是所有的(道尔顿的)混合物都是不稳定的,或者都可以通过化学手段进行分离,许多溶液和合金就是反例,它们对道尔顿的化学理论是致命一击。<sup>①</sup>

道尔顿的化学理论以这种自助的方式使其主题个性化,所以道尔顿的许多观点听起来似乎都是可检验的假说,但是它们却都不能被检验,而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这些观点可以通过对整个理论进行评价而被检验。盐溶液不是合成物,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同样道理,还有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即使论敌理论违背了固定比例规律,化学合成的原子理论也允许这些论敌理论与它具有相同的观测值与解释。在许多例子中将合成物与混合物做比较是可行的,所以道尔顿的化学在没有循环理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被证明是对的。有许多固定的化合比例,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意并且人们大声疾呼要求解释它们,但只有新化学理论才能解释它们。所有人都渐

<sup>①</sup> 参见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211页;艾瑞·伊迪(Aaron Ihde):《现代化学发展》,纽约,1964,第98页及后面的内容中,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著名的且勇于创新的化学家贝托雷(Berthollet)对明确的比例规律进行的最执着的攻击。

渐地开始发现:道尔顿的理论框架可以用来最合理地解释气体的活动方式和传导性的某些规律。有一些案例使道尔顿与别人处于争论中,道尔顿认为这些案例仅仅是混合物,他的论敌则认为是真正的合成物,然而这些例子与道尔顿的化学理论所开创的领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同样,可能在一些案例中,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用不着去检验一个可能看来存在争议的观点。也可能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古代中国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的观点是个恰当的案例。在一些案例中,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所做的说明——我将很快对此加以详细说明——中处于首要位置,然而由于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有时会根据政治统治手段使经济结构个性化,所以在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非经济的变化过程却是首要的。尽管如此,从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历史时期进入到另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通常对论敌在目前所做的不同解释有利。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以通过这些比较手段被检验,而不会因为展现了循环理论被消除,因为这一循环理论只能是潜在地而不会真正地使所有比较都行不通。

当技术决定论者通过严格地分析生产关系与政治进程之间的差异来回应人们对循环理论的消解时,他们接受了本来应该加以抵制的共同的方法论前提。这里与别处相同,技术决定论与先验的反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个实证主义方法论中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希望我已经说明了:对生产关系的处理结果为解释马克思奠定了不恰当的基础,也为以合理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解释历史奠定了不恰当的基础。半信半疑的读者会对“生产关系”产生很不全面的理解,而且他们会在下述解释中发现对技术决定论的选择。

## 生产方式解释

在一张人们熟悉的照片中的马克思,是一位庄重的从事实践的历史学家,但是由于他卷入了政治的漩流之中,所以他的普遍理论与他的历史洞察力相去甚远。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那

么我们现在就有理由接受人们对马克思的令人不快的事例所进行的论断。但是两种可供选择的解释都是有效的,它们都使马克思的理论陈述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历史解释一致。我在本节论述的第一部分理论将适合于马克思全部的一般理论陈述,并且几乎适合马克思的全部具体解释。在我论述的这一部分理论中,经济结构具有非常偶然的独立性,同时生产力的增长仍是内部变革的基础。这一部分理论显然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历史总体理论。我将在下一节论述第二部分理论,这部分理论适合于马克思所有具体解释,并且如果这部分理论没有完全涵盖马克思所有具体解释的话,那么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几乎适合于马克思的所有一般陈述。第二部分理论扩充了第一部分理论,而且在第二部分理论中生产力的增长不是变革的唯一内部来源。这部分理论是在马克思书写历史时引导他参与实践的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急剧的社会变革都最终以生产方式、活动、设施与关系、物质与社会为基础,而正是这些要素生产出了物质商品。生产方式由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力、我提出的更加广义的生产力(比如劳动关系)和生产关系组成。虽然这个生产方式在技术决定论中不发挥根本作用,但是生产方式的概念却被运用于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普遍陈述中,这个陈述包括《序言》中的一个著名段落:“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是首要的,这些特征依据人们做出的解释而定,或者依据一个稳定社会的特征而定,或者依据变革的发生和趋势而定。对于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言,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是首要的;对社会变革而言,生产力(非常广义的生产力)是首要的。

在很大程度上,相对稳定的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通过马克思

称之为“统治阶级”的需要与权力而获得解释。<sup>①</sup> 这个统治阶级是经济结构中的集团,它控制生产力而且主要控制那些直接参与生产的人的剩余产品。因为统治阶级统治着剩余,所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制度都用来维持这种经济结构,最起码也要有利于这个统治阶级。<sup>②</sup> 我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分析了这种统治的政治方面。出于目前考虑,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应该是同等重要的,而且许多差异——诸如稳定机制和共谋之间的差异、客观利益与主观原因之间的差异——都有助于澄清前者的统治方面,并都可应用在这两者身上。

这种用来解释一个稳定社会的特征的框架,引发了关于社会变革的迫切问题,而这个问题对像马克思这样的革命者来说则更加迫切。如果一个社会由一个集合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统治阶级进行统治,那么社会内部的变化过程如何能将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变成以另外一个阶级的统治为标志的另一种类型的经济结构?

对于这个变革问题来说,生产力是首要的。马克思与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在他之后的列宁,以及一直以来从事实践的科学家们一样,都将首要性看作是所提的问题有关的。

当人们想控制更多的物质商品时,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结构可

① 我的解释将针对那些已经出现阶级分划的社会。技术决定论显然不适合用来说明马克思对于前阶级社会的讨论。马克思在这一讨论中强调变革的两个来源,它们都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社会集团间的征战与轮流坐庄。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516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56页及后面的内容,第384页及后面的内容。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了若干个对统治阶级统治的简要描述;比如,“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页)。“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0页)。

能允许他们使用新型生产力,或者大量使用旧的生产力,这种变革机会可能会使人无法预料革命结果。尽管在这种允许的情况下,传统的生产力仍然可能受到束缚,因为旧的经济结构仍束缚了对传统生产力的有效使用,或者束缚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而新的生产力则不会受到束缚。比如,17世纪的英国企业家充分意识到,被要求用于大规模的单一种植的农业或者用来建造工厂的大笔固定投资,可能会遇到下述风险——因为王室青睐某些东西而将它们批准为皇家专用,这使得投资变得一文不值——因此,这种风险阻碍了他们的投资。当生产力的这些束缚发展到某种程度时就会被打破,而同时一个崭新的、更适宜的经济结构会根据质或量的因素——通常两者兼而有之——建立起来。在量的方面,可能会发生:新的生产力在新的经济结构中非常多产,从而使控制新结构的阶级为实现获得更好福利的普遍愿望,成功地组织起革命来反对统治阶级。在质的方面,可能会发生:新的生产力,特别是新的劳动关系,赋予非统治阶级以新的力量去夺取对剩余的控制,而完全不考虑社会产品在规模上的潜在增长。马克思在他对社会主义如何获胜的说明中,基本上同等地强调了质的因素与量的因素。发达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断加重的工业萧条和与日俱增的暴力战争,都限制了社会运用那些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生产力为人民提供物质福利。同时,由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产生的大规模的联合、纪律与调整,也第一次赋予了工人们夺取和控制生产力的能力。比如,在对社会主义胜利的经典描述中,即《共产党宣言》<sup>①</sup>和《资本论》<sup>②</sup>中,质与量这两个因素都被强调了。马克思在说明资产阶级的产生时强调量的因素,这些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但却需要与更大的集团建立联系,并向这个更大的集团承诺要破除封建制对生产的禁锢以提高福利。马克思描述了贵族统治是如何依靠大量农民在征战、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sup>②</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0页。

殖民和贸易这些传统手段中所具有的战略优势而兴盛起来的,在这一描述中马克思强调质的因素。

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中的典型成员想要改善他们的福利、提高他们的权力并获得更多机会,这种改善既是全面的又与统治阶级有关。然而,当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生产力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时,这些束缚也限制了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这个阶级的身份由这些生产力的发展来确定——在旧的经济结构中进行改善的可能性。如我们所看到的,生产力的变革导致了这种束缚,而这个变革同时又赋予了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以新的力量去变革社会,去攻击用来维持旧的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去建立一个由这个阶级控制的、新的、非束缚的经济结构。既然这个变革过程需要克服对新的生产力的束缚,那么新社会要比旧社会更加多产。总之,如果变革的发生来自于内部变化过程,那么当生产力以下述这种方式发展时,变革就会发生:(a)旧的经济结构阻碍了对生产力更有效的使用,从而为进行经济结构变革提供了一个新动机;并且(b)阶级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能够建立起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并在这个阶级的统治下,新经济结构更好地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

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我把我刚描述的解释称作“生产方式解释”。之前,我通过描述技术决定论者对稳定与变革问题的特殊回答,总结了技术决定论者的解释,这些关于稳定与变革的问题如下:什么可以解释一个稳定社会的主要特征?什么引起了最重要的生产力变革?什么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基本变革?生产方式解释与技术决定论解释之间的区别反映在它们给出的不同答案上。

根据生产方式解释,一个稳定社会的特征可能通过统治阶级的经济统治来加以解释。这与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在本质上相当一致,但实际上被技术决定论所包含。技术决定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这是生产方式解释所缺乏的。没有人认为稳定的经济结构要比其他经济结构更适合提高生产力。至少与已经被确立的经济结构一样多产的其他经济结构,会因为由那些精通物质生产的人的阶级



地位导致的无能而被排除。这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制与奴隶制的观点。比如就生产力而言,由农民和贵族统治的经济结构,至少与封建的经济结构一样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人们要求用在庞大地域中持续的团结和遵守集体纪律来打破由封建领主们用其掌控的剩余锻造的镣铐。让农民们忠诚于他们的家庭与村社的这种社会关系,是不可能出现所需的阶级团结的。<sup>①</sup>

根据技术决定论的解释,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主要被解释为是由于人类自觉地、普遍地想利用技术来克服自然的贫乏。生产方式解释没有提出在下述两种解释中哪个是首要的:根据生产方式解释对“生产力”的广义用法做出的解释,或者根据技术决定论特有的“生产力”的狭义用法做出的解释。马克思对生产力的主要变革的所有具体讨论,都要使用被生产方式解释所允许的辩证法,即在生产力变革与非派生的社会变化过程之间曲折的辩证法。而且,既然生产方式解释不能使人们发展技术的普遍倾向成为社会变革的理由,那么它就要考虑到经济结构有可能会产生出阻止生产力实质增长的权力和态度。这种可能性在马克思对古印度与古中国的说明中实现了。<sup>②</sup>

在技术决定论的解释中,生产力——以相对狭义的技术方式定义的生产力——的变革引发了激进的社会变革。社会革命末期将以一个社会的成立而宣告结束,而这个社会考虑的是新的生产力能够最理想地提高产量。在生产方式解释中,生产力的变革引起了社会变革。但是生产力以更加广义的方式被定义而且它包括了劳动关系。马克思对社会变革的例证——他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讨

<sup>①</sup>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页;《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2页;《资本论》第1卷,第24章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833页。

<sup>②</sup> 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页;《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第386页。

论——需要这种广义的理解。而且，新社会克服了对生产力的束缚，它将比旧社会多产，所以新社会不需要最理想化地提高产量。以阶级地位的历史差别为基础的权力差别可能会排除其他社会选择，尽管这些其他社会选择与被确立的社会选择至少一样多产，这就是马克思在讨论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暗示的可能性。

将马克思的总体历史观与他的几乎所有的具体历史说明结合起来，以这种方式进行解释当然比将两者分开取其一种的方式更可取。我已经讨论过生产方式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是更优越的，而且它比技术决定论解释更适合马克思的若干一般说明，而且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其他说明。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历史理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变革理论作了最重要的总结，并以此句作为开始：“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sup>①</sup>毫无争议的是，“市民社会”在这里意指社会生产关系。在开端部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力的偶然伴侣而不是作为生产力的仆人被提出。

在马克思平静地停止印刷《序言》的同时，他鼓励而且常常监督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共产党宣言》的再发行。宣言中关于历史的普遍说明强调了社会的生产部分，但并没有将技术置于首位。这些说明被概括成一句话，这句话引入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描述：“所有迄今为止存在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创作《资本论》。这部著作包括了他对社会性质的普遍说明，也包括了吸引非技术决定论者来理解的变革，比如：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页。

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sup>①</sup>

马克思所作的普遍说明好像支持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序言》在这些说明中是最重要的,而且它高度代表了其他说明。在说明《序言》如何能符合生产方式解释的过程中,我希望我能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方法,以便使他们能借助这些方法来考虑《哲学的贫困》、1846年致安年科夫(Annenkov)的信,及其他著作中的类似段落。

212 《序言》中的大部分内容对这两种解释都明显符合,但有两个句子确实抵制了生产方式解释。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逐字理解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不属于生产方式解释,然而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也不能成为马克思考虑过的判断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或者封建制在它灭亡的那一刻不是没有能力去推动技术进步。这个句子以及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的类似句子,一定都对下述观点——只要社会形式不阻止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就是可建立的;并且一旦发生对生产力的束缚时,它就会受到威胁——进行了适合于两种解释的陈述,而且这个观点简直就是两种解释的一部分。

马克思以这句话作为他的历史观摘要的开端:“在人类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他们进入……生产关系,这一关系符合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的一定阶段。”科恩在他的书中恰好也这样注解到:这个

<sup>①</sup>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1—892页。同样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4页,以及在《剩余价值论》(实际上是《资本论》第4卷)卷1中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的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页。

强有力的说明使生产力具有了某种首要性。这个首要性无疑是在上下文联系中提出的,而后文中并没有与其相反的关于生产力符合生产关系的说明。但是,这种首要性一定会成为被技术决定论者的解释所要求的那种首要性吗?

对马克思的现有解释中,存在着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某种特殊事物。尽管社会基本的内部变革总是在开始时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种特殊事物总是束缚着生产力将基本的内部变革提到日程上来。人们非常有理由通过声明经济结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来概括这个特殊事物。

从因果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来思考,人们会发现没有普遍现象能够证明生产力符合经济结构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生产方式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经济结构选择生产力与生产力选择经济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更精确地说,虽然马克思的总体理论使这种可能性悬而未决,但是这种可能性在马克思所作的具体说明中实现了。同时,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总是像生产力受到束缚的现象一样直接而简单。因此,在工业革命中,阶级斗争相当直接地促成了雇主们对工业技术的采用。但更司空见惯的是,经济结构对生产力形式的影响是间接的,这一影响要通过由经济结构产生的商业进程与政治进程进行调解。比如,新的商业需要和商业机会、新的竞争压力,这些都是因为要追求由旧的经济结构决定的利益而产生的,并且这些都会导致生产力的变革。欧洲大陆羊毛市场的发展和富农们对高涨的食品价格和高涨的固定租金的剥削都是恰当的例子。另一方面,在说明生产力符合经济结构时遇到的更大的障碍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技术决定论并不完全是错的。当然在许多重要的例子中,生产力的变革确实是因为使用了人类关于如何克服自然匮乏的知识。因为经济结构对生产力产生影响的记事非常混杂,所以对生产力符合经济结构的声明不是一个恰当的总结。

马克思关于经济结构符合生产力的说明是关于经济结构变革的具体情况的一个摘要,但不是对最终发生的偶然影响所具有的均衡状况的评价。即使任何一个决定生产力的机制都不像束缚生产

力的机制那样直接和普遍,那么下述判断也是正确的:生产力的基本变革的性质被解释为由经济结构和变化过程决定——而这一经济结构和变化过程是由生产力的基本变革产生的——这与经济结构变革的性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一样;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一个稳定的经济结构对于多产的生产力发展来说可能很不理想。

## 一个更宽泛的观点

关于生产方式解释的上述说明,旨在说明马克思关于历史变化的所有普遍陈述,以及他对具体历史阶段所做的近乎全部的解释。然而,马克思提出一些具体解释来提议一个更广义的历史观,在这个历史观中,被宽泛定义的生产力的增长不是基本变革的唯一内部来源。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实际上是马克思为《资本论》所作的笔记——有一个特别清楚的关于马克思的这种具体解释的例子,同时这部手稿对变革的机制类型还有相当全面的描述,而这个描述为马克思的这些解释提供了基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检验了罗马从以独立家庭农业为特征的早期社会向以尖锐的阶级分化为特征的晚期社会的转变。<sup>①</sup> 马克思推测:较早的经济结构要通过保证其长期的破坏活动来维持自身。当人口增长时,新的家庭会因为征服和殖民带来的土地、奴隶和贡品而得到农田。比较富裕的农民控制着军队并管理公共资源,而这个扩张的过程使他们的权力扩大。富裕的农民更好地转向对商品作物的培植,他们也特别受益于由领土扩张带来的贸易增长,他们通过使用他们对土地、奴隶及政治工具的日积月累的控制权,而逐渐成为一个大规模的不包括地主在内的新的统治阶级。如果其他农民没有彻底被剥夺的话,他们将成为受这些富裕的农民剥削的佃户。因此,马克思断定,“旧共

<sup>①</sup> 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第493—495页、第506页。

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存会向对立面转化”。<sup>①</sup>

《序言》和其他几个关于历史的普遍说明,使经济结构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成为变革的基础。但是在这个对古代变革所做的解释中,在较早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矛盾本身就足以带来变革。而且,较早的经济结构通过下述变化过程得以维持:这个变化过程最终会消灭这个经济结构,但它没有触及生产力变革,甚至是广义上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实际的变革过程与通过产量的增加而带来的变革过程,在前一个变革过程中,维持那些依靠征服来经营农业的家庭被证明是自我毁灭性的。马克思在先前引用过的评论——关于旧的共同体如何在转向对立面时保存自身的评论——的后面补充道:

如果人们认为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生产率能通过发展生产力等得到提高(这个生产率准确地说是所有传统农业中最低的),那么新的秩序将包括劳动的联合,每天花费在农业上的大部分时间等等,并因此再次中止共同体的旧的经济条件。

生产力的增长是可以想象的,但在这里不太可能会成为基本经济变革的另一个来源。

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的推测需要一个比《序言》中的观点更宽泛的观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革仍以生产方式为基础,而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仍然是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手段。因为整个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个变化过程——逐渐地使一个社会集团拥有能力和愿望去摧毁这个生产方式,并创立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所以基本的内部变化仍然发展。但是这个自我毁灭的变化过程可能采用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比如在《序言》中提到的,生产力可能增长到它们受

<sup>①</sup> 参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到束缚为止。还有另一种形式,即经济结构可能会通过控制人与生产力——这些人和生产力能够逐渐地使一个集团积聚权力去重建社会——的权力关系来维持自身。因为这些权力关系(例如,非奴隶者们集体控制着为获取新土地和奴隶而采取的手段——这些土地与奴隶都是家庭经营农业所需要的)本身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所以一个经济结构如果发生了变革,那是因为它与自身相矛盾,也与生产力相矛盾。我称这种历史观为较宽泛的生产方式解释。

尽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古罗马时期阶级分划的讨论是在这方面讨论中唯一清楚而详细的,但是其他几个段落为了改变更加宽泛的历史观所具有的特征,也求助于这些阶级分化的方法。最早的文章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古罗马的一个简短讨论<sup>①</sup>——实际上这个评论是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文章的高度凝缩的说明。几年后,《共产党宣言》探讨了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源在于封建经济结构本身所固有的最终自我毁灭的矛盾。逃亡的农奴形成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基础,这些资产阶级与君主们在国际贸易与殖民扩张中联合起来,从而资产阶级强大到能够统治与改造社会。<sup>②</sup>

在整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长篇的、自我克制的讨论(大概是第482—51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主要阐述了下述观点:全部社会生产关系可能规定了包括这些关系本身的变革在内的社会变革的方向。马克思至少在三个章节中用普通语句阐述了这种可能性:这些生产关系最终可能是自我改造的。<sup>③</sup>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及后面的内容;同样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1—72页。

③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页、第493页,以及之前引用过的第494页中的评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经济变革的一些关键时期的解释,求助于在控制生产的最初模式中存在的由生产本身进行决定的趋势,因此这种解释暗示了更加广义的生产方式解释。资本主义制造业最开始以资本家控制厂房和原材料,而工人控制工具和技术知识的模式为特征。这种模式产生了阶级斗争,在这一阶级斗争中资本家被迫使用他们对剩余财产的垄断去建立一个新的工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工人们使用了被资本家控制得几乎没有技术知识含量的机器,所以他们在旧的劳动交易中拥有的有利条件被剥夺了。<sup>①</sup> 同样,马克思推测了控制模式的自我改变可能引起了阶级分划。一个无阶级社会被分成许多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进行贸易往来;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导致了它们日益依赖于以交易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而不依赖于用来维持生存的农业和小规模的实物交易,所以这个无阶级社会可能会需要阶级划分。<sup>②</sup>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阶段的描述,暗示了封建经济结构的自我毁灭的趋势:“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sup>③</sup> 守旧的贵族统治的乏味的自我毁灭和庞大的王室家族中重商主义者的出现,都不是产量增长的结果。它们的产生是因为封建经济结构本身固有的发动国内战争的趋势,而且在这个经济结构中对剩余的榨取,主要依靠独立的家族组织拥有的军事力量从受统治的土地和农民那里榨取。

在某种意义上,比较狭义的理论决不会成为马克思历史观的本质核心。有一个观点认为产量增加是变革的唯一基本内部来源,这种观点的基本原理在于只有产量增加和产生束缚才能充当推翻统治阶级的内部基础。而马克思对这种情况的所有实际讨论,都反对在生产方式之外,比如在独立的文化创新中或在军事

①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3—477页。

② 同上,第156页及后面的内容;第384页及后面的内容。

③ 同上,第786页。



胜利中,去寻找变革的基本来源。<sup>①</sup> 马克思从未立论去反对经济结构从长远来看可能内在地具有自我毁灭性。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最初阐明这种可能性时,他是要捍卫它。无论马克思本人的结论有时会是什么,他的论证逻辑并不要求生产力的首要地位。

## 马克思的模式和马克思的背景

在更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和更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中,哪个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事实上,更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当马克思做出了一个似乎只适合更广义的理論的解释时,尽管这个解释显然与比较狭义的解释冲突,但他愿意采用这个解释。实际上,至少在一个段落中,<sup>②</sup>马克思承认:如果一个解释需要求助于经济结构具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而另一个解释需要求助于即将到来的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前一个解释要好于后一个解释。同时,比较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明确的历史总理论,因为马克思对历史性质的最普遍的说明使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变革的基础。

尽管马克思在实践中自由地抛弃了相对狭义的模式,但是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对马克思的影响有助于解释马克思明确地求助于这个模式。一个是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他引导马克思的观点走向成熟的一条道路是:马克思最初致力于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变化理论,特别是历史变化理论,随后马克思根据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序言》中的段落包括了对历史的有口皆碑的勾勒,这个段落实际上就是对这个途径的描述。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通常包括对至关重要的论点所做的鲜明摘要。参见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56页(在文化变革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后面的内容(在军事征服方面)。

<sup>②</sup>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

史哲学最简单地转化成唯物主义理论,而这一转化支持了比较狭义的生产方式模式,而不是广义的生产方式模式。对黑格尔来说,就如制度所体现的那样,人们实现并失去了世界历史的意义,然后他们又阻止了通过沉思来努力获得自由这个理想的实现。马克思代之以“人们通过生产为克服自然匮乏而奋斗的实现”,这为更狭义的模式或者为技术决定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黑格尔轻松地做出生产力解释,但是这个解释一旦被转变成唯物主义解释,那么如果稍有把握地说,这种轻松就将使我们怀疑马克思的生产力解释。虽然马克思因为黑格尔强调内部矛盾是变革的来源而在自己的著作中到处赞扬黑格尔,但是马克思警告我们要根据他的实践来解释他的理论,而不能通过接受人们对黑格尔谈话方式的“胡思乱想”来解释他的理论,这一警告特别体现在《资本论》中。<sup>①</sup>而且,马克思的历史观走向成熟的其他途径都具有独立的意义,并且都在《序言》的自传中被间接提到,这与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转变之作中提到的途径一样:作为一名揭发丑闻的记者的政治活动;对来自于法国革命和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的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最后,在科学历史与文化历史中,再没有比提出形式上的新方法更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这个新方法来源于伟大的前人并由今人提出,而且这位提出者的思想要比这些形式间接表明理论更加背离前人的成果。举例来说,19世纪的场论使用了机械模式;牛顿提出了几何学的微积分;爱因斯坦最初保留了截然分开的空间与时间,这些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者们使用传统模式去构建他们对新领域的描述。

其次,如恩格斯在后来的传记评论中注解的那样,马克思的政治活动常常指示人们要特别重视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个生产力的作用不能通过无关紧要的理论关注来获得。19世纪40年代,左派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者要么根本不考虑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要么轻视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马克思致力于将他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的余生中,欧洲工人运动有着最深远的影响。直言不讳地说,这场运动中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建立由独立生产者组成的平等主义和权力分散的社会。在与这些人的论战中,马克思必然要强调现代生产力的作用。比如,他必须使人们相信现代工人的物质需要不能在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国中得到满足,因为这个理想国不适合现代工业技术;尽管小生产者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但技术使他们注定要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工人运动应该利用工业化积极的和革命的方面,而不是仅仅谴责工业化的代价。由此,当马克思抨击蒲鲁东提出的作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基础的历史推测时,就难怪他的论述会近乎于自我嘲讽:“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①</sup>

最后,马克思勉强在理论上放弃了一个不会在实践中约束他的模式,他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致力于概括出一个关于变革的普遍原则。这个原则是一个假设,即假设社会发展总是以进步为必要条件,至少是某些有限的进步。比较狭义的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总是促进生产的进步,所以它需要把社会发展与生产进步等同起来。比较广义的理论则不需要这种等同,因为一个被自我产生的矛盾毁灭的经济结构不需要产生一个更多产的社会。从罗马帝国到封建制度的转变可能会为这种没有带来生产进步的自我毁灭提供一个真实的例子。

马克思在《序言》的自传体评论中暗示了将社会发展与生产进步等同起来的做法是极其富有成效的。这种做法指导了马克思时代大多数最好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可能在当时非常理性地勉强采用一个新的变革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生产进步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因为马克思使用了非常广义的生产力概念,所以他可能非常希望:那些似乎背离了比较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解释,能够在进一

<sup>①</sup>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步的分析中与这个生产力概念相一致。如果两者不一致的话,那么那些总是指引着马克思的理论兴趣的工人运动中的政治问题就不会使下述事情变得迫切:实现马克思的上述希望,或者在广义的理论  
与狭义的理论之间做选择。

相比之下,在20世纪后期,社会发展与生产进步的等同性在顶级的社会科学中不再是最重要的临时假设。同时,政治背景也发生了改变,至少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中,那些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反对现在为社会主义而战,他们常说的观点是“生产力还不成熟”。这个观点如果在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中被提出,那么它所具有的合理性要少于在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中的合理性。根据比较广义的理论观点,甚至在资本主义不阻止生产力发展的地方,也可能产生拥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权力的工人阶级。总之,马克思在两种理论之间一直举棋不定的原因不再是好的借口。



## 一些异议

在本书的余下部分,我将用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广义生产方式解释来讨论两个最大的问题:如何能说明如此庞大而普遍的历史理论是正确的,甚至只是暂时性地说明这一点?那些不适合使用科学哲学的标准解释模式和证实模式的理论的含义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要面对一些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很小,小到至少可以以铺垫的方式扼要地加以解答,但是它们却是重要的,并足以澄清我所解释的马克思的基本历史理论:这种理论是那种赋予结构本身以活力的令人难以信服的历史理论吗?它是否过于关注权力关系以至于无法成为唯物主义理论?它是否过于含糊不清以至于不能名副其实?它是否过于闪烁其词以以至于是虚假的?对内部原因来说什么是约束力?

整体论。在陈述生产方式理论时(从现在起,我将用这个短语

来表达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我接近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阐述。在经济结构的内部变化中,变化过程最初保持了结构的基本类型,但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性质而最终导致了基本结构的变化。这种理论似乎过于强调结构,因为它不仅强调许多合理的结构解释中的标准整体论,而且还强调一种极端整体论,在这种极端整体论中结构将自身的各个部分玩弄于股掌之间。

我想通过一个结构解释提出一个理论:通过描述大量的结构特征来解释现象,而不是通过一系列使结构要素得以相互作用的个别原因来解释现象。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结构的因果关系实现于结构要素间适当的偶然的相互作用,那么整体论就不是极端的。因此,诺伊曼对纳粹集权的解释要求助于巨大的社会利益和大范围的社会境况的影响。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那么就会有许许多多其他个别的偶然因素系列能够满足:比如如果兴登堡(Hindenburg)没有过分相信他控制希特勒的能力,那么纳粹可能会从其他途径获得权力。然而,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人们的客观利益能够塑造他们的行为,那么我们至少可能会猜测到在某个个别偶然因素系列中人们的反应会受到他们的个体心理的控制,而这个偶然因素系列不能将诺伊曼描述的社会状况与他试图解释的政治结果联系起来。<sup>①</sup>

通过比较,许多读者都会发现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是超历史的。在极端的整体论中,我们有理由认为大量的个别原因没有存在于它们应该存在的地方,即把结构特征与应该由这些特征加以解释的现象联系起来的地方。在黑格尔那里,当人们使自由的理念更加理性和具体,进而达到极致状态时,这使得另一些人群起呼应并将黑格尔的著作抬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既然后者常常不充分或不恰当地与他们的世界历史的前辈们进行文化联系,那么我们就常常有理由相信没有适当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将结构特征与现象联

<sup>①</sup> 参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解释》,载于《科学哲学》,1978年第45期,第402—414页。在这篇文章中我更加具体地说明了解释与原因描述之间的区别,并且谈到了由其他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情,以此来表达一种必然性。

系起来。一个作为自由理念在历史中发展的结构特征,在通过这些结构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实现这个结构的地方,将结构要素控制于股掌间。

如果历史的和心理学的知识以其他方式支持了技术决定论,那么它就不是超历史的。个人的行为机制将渴望更有效的生产,并且当其他人的权力阻碍了这种生产增长时,个人行为就会受挫。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理论如同黑格尔的理论那样更像是超历史的。特别是,如果某些经济结构的所谓自我毁灭的趋势没有简述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即当人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要群起而战的时候,结构就崩溃了,那么这个趋势听起来就像是来自外部指导人们行为的结构特征。

对极端整体论的担忧可以通过侧重于心理学的方式来阐述生产方式理论而得到充分解决,在这种侧重于心理学的方式中,心理学被认为既包括人们行动的原因,又包括指导人们行动的客观利益,这种方式已经在第四章被描述。在某个时代的特定时期,人们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劳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人们有权使用的生产力所具有的性质,所有这些都既影响着他们的资源,也影响着他们使用资源时的优先权。这同下述观点一样并不神秘:在一个大部分工作都要由家庭成员来完成的社会中,这些家庭成员从前人那里继承了用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因此许多人把对家庭的忠诚置于首位。生产方式理论将内部变革归结为由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引起的资源与优先权的联合,以及由这些联合导致的行动。最初,资源与优先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旧的生产结构。否则,就不会有所提到的经济结构。最终,资源和优先权模式的兴起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崩溃。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模式也许总是包括一系列中间环节,人们在这些环节中的某个环节受到最初的资源和优先权的指导来采取行动,以便在生产方式中确定新的位置,从而获得新的资源和优先权。正如马克思在谈论工人运动时所说的,这些

人通过他们的行动“将环境和人加以改造”<sup>①</sup>。

因为受到经济上自私自利思想支配的行为会导致新的经济上自私自利的思想,所以生产方式解释能回答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反驳——这个反驳可能被称为“韦伯的挑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通过一个最不完整的并且最可疑的叙事史,颇具洞察力地反对人们以经济生活现象为基础来解释经济生活变化的全部努力。韦伯指出:经济结构并不都与控制经济行为的唯一一套基本优先权相联系,比如说经济结构还与人们尽可能实现高效的愿望相联系。确切地说,不同的经济结构与不同的优先权联系起来——这些优先权阻止人们破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模式。特别是,封建社会受一种传统主义经济观的统治,在这种经济观中人们彼此保护的习俗联系被赋予了很高的优先权,而且一旦确立了合乎习俗的生活标准,那么经济目标就实现了。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企业家们不得不破除这种传统主义经济观,他们调整雇佣与价格来适应市场、利润最大化以及资本积累的需要。只有在那时,现代社会才能出现,而传统主义则随之崩溃。总体而言,人们必须用一种新的经济观来建立新的经济结构,但经济结构的内部变革如何能最终归结于经济活动本身呢?

即使韦伯本人的传统主义记事——它消解于少数宗教“名人”的超凡魅力和他们的追随者的宗教焦虑中——不能很好地解释变革,前述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技术决定论不能抵制韦伯对于经济特权决定社会的洞察,但是生产方式解释却可以抵制韦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史中,马克思常提到变化过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一系列经济特权激发了人们的行动,而人们的行动又带来了能够产生新的经济特权的新形势。请考虑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取代了人们在传统上强调的经济生活中彼此保护的习俗联系。在以玫瑰战争告终的封建战争之前,人们控制其他人的劳动力是有重要意义的,尽管其他人对许多生计手段拥有传

<sup>①</sup>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统权力,但是人们并没有仅仅为了商业利益而终止其他人的传统权力。在封建战争中,统治土地和当地居民的军事力量的分散,导致了古老的封建领主家族相互残杀的冲突。主要的家族,即敌对的王室家族,出于传统的战术考虑,推举他们这一派中拥护商业的人成为贵族。首先,许多人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众多的劳动力,这些人生活由(传统的、城市的)商业特权决定,而不是由维持众多忠诚的跟随者生活的责任来决定。同时,与欧洲大陆进行的羊毛贸易的发展立足于相当传统的商业目标,并将另一个新要素加入到新贵族的境遇中:将自给农业转变为绵羊饲养,从而获得了创造巨额利润的机会。如果新贵族还是原来的贵族,那么他们就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如果他们仍保持着城市商人的身份,那么他们就有理由不赞成在远方发生的大规模驱逐事件;但是依当时的状况看,新的商业贵族剥夺了他们的佃户所拥有的一切,从而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因维持传统责任而获得的优先权。简言之,“在英国,特别是佛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来说,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sup>①</sup>。

在生产方式中的新定位真的产生出一系列新的优先权,而不再强调维持传统联系了吗?或者,那些拥有旧的优先权的人们,刚好被提供了一个毫无心理变化地进行剥削的新机会吗?原则上,只能以后一种方式来回应韦伯的挑战。有一种假设认为用来保护特定社会境况中的经济结构的经济观,可以在所有社会境况中引发保守行动,这种假设是不切实际的遐想。如果宗法尽可能地全面增加权力,那么旧的贵族中的传统主义成员可能彻底剥夺他们佃户的一切。毕竟,当理查德国王溺死他的侄子时,他并没有尊重宗法的传统责任。还有许多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真正的心理变化可能是由在生产方式中的新定位造成的,同时这些例子还包括可能即将发生的

<sup>①</sup>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6页。

事件。如果人们向前都铎王朝的商人提出用后一种可能性作为假设的例子,那么前都铎王朝的商人毫无疑问地会反对:为了获利而剥夺属于某个人的佃户的一切是令人厌恶的事情。为什么仅仅因为他或类似的人根据不同的优先权来采取行动,就假定他一定缺少道德自省?任何一个能够想象出道德品质败坏的人都能想象出以社会形势变化为基础的优先权的真正变化。当然,生产方式理论不会导致韦伯头脑中的谬误:韦伯赋予了埃及法老图坦卡蒙(Pharaoh Tutankhamen)与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同样的基本经济优先权,然而这两个人却都在各自的特权内拥有不同的可选选项。

为什么要假设内部的变化过程只能按照刚才描述过的方式由生产方式来决定呢?稍后,我将为生产方式举出一个详细的例子。就现在而言,重要的事实是最终的答案不与我们对人们如何行为的普遍信念相矛盾。非常粗略地说,我的论点是:因为意识形态是如此的顽固,而文化进程又不是变革的最终来源,并且社会力量在统治阶级之外过于分散,所以除非对社会力量的动员立足于一个新的社会发展进程,否则这种动员是无效的。从更多的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人们的主要利益有风险时,人们非常善于自欺欺人并欺骗其他人,而且当在冲突中使用武力时,协调、忍耐以及随机应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统治阶级的削弱需要通过其他社会进程来实现,而这些社会进程要建立在统治阶级最初允许的社会安排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生产方式作为这种社会进程的一个来源被保留下来。这个观点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它不借助于任何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的神秘事物。

唯物主义。当人们特别反对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政治的强调时,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常被说成是经济理论。实际上,“经济决定论”或者“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委婉说法。

如果生产方式解释是对的,那么像“经济决定论”这样的标榜一定是绝对误导的。马克思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政治现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基本的现象,它至少有三种方式。首先,经济结构可

能是稳定的,这不是因为决定它的阶级统治比其他统治更有效,而是因为社会集团的状况只赋予了统治阶级以政治统治的强迫能力。在封建制度中,封建领主实现统治不是因为缺少统治权的农民生产能力较低,而是因为封建领主和农民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使前者在使用权力时具有更加协调、灵活和集中的领导权。其次,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构这个观点总是根据不同的形式而且是不同的政治统治手段被个体化。古代中国官僚政治中的统治阶级就是一个例子,而马克思构思的封建领主阶级决定封建制度是另一个例子。最后,经济结构变革的主要阶段不仅存在于最终爆发的革命中,而且还存在于变革的起始阶段,这些主要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政治活动,在这些政治活动中那些潜在于权力关系中的矛盾呈现出来。在封建战争中,封建领主不是为了农业产量竞争,而是为了王室矛盾才互相残杀。

当马克思书写历史时,他通过所有这些方式,使政治进程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实际上,一个人可能希望即使生产方式理论家与传统历史学家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也会强调同样的事件。这正好是马克思的实践,它使那些通过经济决定论者所作的解释来了解马克思著作的读者们大吃一惊。

对经济决定论的限制,与恩格斯在他和马克思关于历史理论的信件中提到的极其明智的限制非常不同。在这些信件中,恩格斯明确了这个历史理论受到下述重要条件的影响:经济状况窘迫、事件发生的阶段、潜在原因的现实化。潜在的原因被认为能够解释最重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进程,这些原因通过这些制度和进程的最重要的特征来解释,而不是通过在某种程度上重要的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来解释。<sup>①</sup> 这些原因解释了为什么一种现象迟早都会在社会中发

<sup>①</sup> 参见比如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698页;以及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9—703页。在后一封信中,恩格斯精辟地说明了他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内容排除了明确的决定,因为社会分工在不同社会集团间分配了不同的社会功能、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而这些集团的相对影响不能被准确测量。

生,而不是不发生;这些原因不是要解释为什么现象刚好在它发生的时候发生,而在其他时间发生。<sup>①</sup> 潜在的原因可能并不直接发挥作用,而是利用它们依次解释的其他原因发挥作用。只要根据潜在的因素来解释宗教运动和军事胜利,它们就可能是必要的条件。<sup>②</sup> 如果经济决定论以这些方式被修改,那么这会使经济决定论整体情况好转,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问题是:最终的偶然因素无论确定何种权力,这些因素是否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对这个问题选择是理论无论提出何种辩解,它都不是马克思的。

如果马克思将他的历史观标榜为“经济的”,那么他更多的政治实践可能会成为他的理论与现实分裂的例子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马克思反复强调的题目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不管政治发挥什么作用,生产方式理论仍在若干维度中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首先,生产方式控制着变革进程,这个生产方式当然是物质生产方式,它包括:用来制造物质商品的工具和技术,人们生产物质商品过程中结成的合作关系,以及对工具、技术、土地、劳动力和从事物质商品生产的人们的控制关系。变革是由资源、优先权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构成的这种模式造成的,这些资源、优先权以及行动可以根据人们在这种完全的物质方式中的定位来被解释。另一方面,假设基本类型的变革是因为宗教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引发了宗教运动,并且是因为无法根据生产方式进行解释的宗教情感;或者假设基本的变革是因为某位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军事天才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并且军事进程在社会中迟早都会发生的这种改变是无法根据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来做出解释的。简言之,假设韦伯的加尔文(Calvin)或者卡莱尔(Carlyle)的拿破仑(Napoleon)都存在,那么就会存在与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反的例子。

其次,经济结构,即对物质生产中使用的资源的控制关系,在生

<sup>①</sup>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733页。

<sup>②</sup> 恩格斯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727页。

产方式理论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社会制度可以在某种逻辑顺序中被解释。一个新的经济结构被解释为是由生产方式中的矛盾所致。社会秩序的其余部分则通过说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如何从它们在稳定经济结构中的作用而获得它们的主要特征来被解释。马克思的任何一个简单摘要所暗示的两个易犯的错误,都会使这种解释策略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决定论”。在解释作为第二阶段的上层建筑时,一个人会自然而然地把真正大范围的上层建筑制度称为政治制度或文化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并不是说这情况也适用于较小范围的上层建筑制度。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和早期大英帝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是上层建筑制度。)由此,马克思的策略是通过非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安排来解释政治制度安排,至少在马克思最大的解释方案中是这样的。但是这样理解就遗忘了经济结构自身可能会包括我们自然而然称之为政治制度的东西(古代中国的官僚政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根据一种政治类型(封建制)的不同统治手段来定义经济结构。总之,一旦人们解释了经济结构,那么他们就要通过更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在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发挥的作用来暗示稳定的结构本身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

同时,解释所具有的逻辑顺序在这里可能被认为是按年代排列的,这导致政治与经济极度严格的分离。首先,新的经济结构从生产方式中显现出来。然后,在政治革命期间,新的经济结构通过适宜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得以巩固。在革命到来之前,旧的统治阶级掌控一切,并能够在敌方的政治和文化安排得到广泛传播而持续存在之前,识别并消灭敌方。所以(经济决定论者可能认为)在马克思最初的、比较基础的解释策略阶段,其主题一定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

事实上,这种时间排序不符合马克思的许多解释模式。新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必然依照它所固有的本性,从可以巩固其政权的政治进程中产生。马克思解释了征服封建统治阶级的背景,这个解释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无论怎样,统治阶级通过控制对剩余的榨取而实现了其统治,而且这种控制使经济结构类型发生变革,这种控制行为不仅在政治革命中得到巩固,而且它源于政治革命。在这些政

治革命中,处于优势的阶级与其他次要集团结盟去建立新的政体,然后发展它们。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英国内战和法国革命的看法。

在时间排序中,经济结构不具有优先性;而在解释的逻辑顺序中,经济结构具有优先性;这两者并不矛盾。当进化论生物学家们解释一个物种的非适应性特征时,比如人类(与龙虾相比)的鲜血是红色的,他们首先解释了处于联系中的适应性特征,比如他们回溯了脊椎动物传输氧气的血色素组织的来源。然后,他们提出非适应性特征与适应性特征存在着自然联系。然而,脊椎动物首先具有了血色素类型的血,然后这种血变成了红色,这个观点都不能由生物学家的观点推论出来。

我已经强调了唯物主义对变革的生产方式解释,它对稳定性的解释同样也是物质的。要想解释统治阶级的稳定统治,就要根据统治阶级自身在物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以及其他阶级的定位来解释。相比之下,假设统治阶级中的“天才家”被用来作为一种解释,或者某种顺从的宗教理想成为一种终极解释,那么这将名副其实地背离唯物主义的社会稳定观。

生产方式理论与那些包括马克思时代的许多思潮在内的论敌方法相比,显然是唯物主义的,并且在同等程度上它显然不是经济学理论。因为“经济决定论”这个短语常伴有经济和政治之间的比较,所以这深深地误导了人们。如果这个短语不再被讨论,或者像“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作为一个标准的错误解释的标志来被使用,那么它将会更好。

名副其实的理论。生产方式解释使一些人感到过于含糊而不能名副其实,这种情况对生产方式解释来说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这取决于马克思是否要在每一个严格意义上提出他的理论。他的确取笑那些“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的人。<sup>①</sup>恩格斯非常有代表性地说,唯物主义历史观

---

<sup>①</sup> 马克思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是唯物主义“理论”。

事实上,这些原文中关于“理论”使用的观点仍悬而未决。生产方式解释确实描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但同时,当马克思嘲笑历史哲学的万能钥匙时,他攻击了某种历史趋势,而生产方式解释并不为解释这种趋势提供一种模式。

为什么一旦说明了在生产方式解释中的术语,那么这种生产方式解释反倒可能被认为是含糊不清的?用于解释的不同术语与任何一个明智的历史理论应该具有一样不含糊的品质。这些术语通常和技术决定论中的术语一样精确,这些术语一旦被像科恩一样的明察秋毫的辩护加以说明时,它们就不会使读者感到极度含糊不清。含糊性在此可能是一种让人误解的标志,它指的是不同规律的含糊性,而不是不同观念的含糊性。

根据人们对一个理论应该做些什么的广泛共识,现代战争理论应该成为许多经验法则的一个来源,根据这些经验法则,某些现象就可以从先前发生的某些事情中推断出来。更准确地说,对所有人都接受的事实或者可以作为案例的事实所进行的陈述,一旦与理论相结合,那么法则在逻辑上就是必要的。

模式在这里是起源于牛顿理论的开普勒的行星运动法则,或者来源于气体分子理论的波义耳(Boyle)和查尔斯(Charles)的气体定律。在马克思的用语中,牛顿的理论才是一把真正的万能钥匙,去揭示天文秩序的经验法则。

生产方式解释不能完成这项工作。当一个人试着非要从生产方式解释中获得关于变革何时发生的经验法则时,这个人就会以类似的下列结论而告终:当生产方式引起了矛盾并且严重到足以产生变革时,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就发生了。但是这并不是经验法则,而是同语反复,就像说叔叔是个男人这条原理一样让人确信无疑。甚至狭义的生产方式理论更具体的情况也只能产生出这种同语反复:如果对生产力的束缚严重到足够使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具有推翻旧的经济结构的愿望和手段,那么经济结构将发生变革。没有任何其他术语比“足够带来结构变革更能说明足够”。

确实,把这种缺失说成是“含糊”会让人误解的。“热带栖息地有各种各样的物种”是非常含糊的标准,但却是生态学的经验准则。说它是含糊是因为有大量难以确定的情况:栖息地与亚热带相比不是热带的,物种的差异程度与非高度的差异程度相比不是高度的。刚才说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含糊的经验准则,而且它们压根就不是经验准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特征,即人们用指责“含糊”来回应的特征。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特征“只能”产生出与生态准则一样好的原则是对总的历史理论的指责。<sup>①</sup>

稍后,我将详细讨论实证主义的解释概念与证实概念,它们都支撑了作为经验法则的万能钥匙的理论观。我将考虑那些将马克思的历史说明纳入这种模式中的更深层次的努力。生产方式解释描述了一个具有大量思想的理论,这些思想与人们称之为一种理论所具有的大量思想同样多。如果生产方式解释没有被预先对实证主义的努力,即达尔文进化理论所压制,那么能理解这一点对当前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

进化理论没有提供经验法则去描述新物种产生的条件。如果一个人非要获得这条法则,那么这个人将以下述原则告终:当将选择性优势具有的特征与新的遗传物质联系起来,并且这些特征足可以形成一个种群时,这个种群充满了基因库;如果充足的新特征积聚起来,那么一个新的物种出现了。(这里我使用后达尔文主义术语,它能正确地唤起《物种起源》中的思想。)在这些原则中,“充足的”在前人那里意味着足以产生作为结果的变革。这些原则是纯粹的同语反复。关于过去的种群和环境的最佳知识不能克服这些障

<sup>①</sup> 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与生态准则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所有这些原则与“所有叔叔都是男人”之间的差别)。被指责具有模糊性的所有原则包含了对前面发生的或随后而来的情况的描述,这些原则被应用于一个又一个案例中,这些应用在善于表达的观察者中是有差别的。因为“热带的”的差别主要是由于相应的种类具有的内在本质。实际上,热带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事物。对于“如果条件足够充分,那么这将发生”的原则而言,差别主要是由人们在已有的不同信念的基础上对什么因素足以造成结果持有不同看法而造成的。



碍,特别是这些知识缺少对“充足的选择性优势”的非循环性说明。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选择性优势这一章得出结论,这一章完全由对事实之后的重构以及对优势特征的影响的实验性思考构成,它包括一段典型的公正的反对性声明:

这样的幻想,去使任何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占有优势,固然是好的,但是在任何一个事例中,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作。这应使我们想念,我们对于一切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实在无知;此种信念是必要的,同样是难以获得的。<sup>①</sup>

当构建数学模式时,现代种群遗传学家有时将数目加入选择性优势中,并用对牛顿准则的普遍观点来提炼公式。但是这些“准则”却是同语反复。

尽管如此,达尔文提出了一个真实的理论。他描述了当某种变化发生时,因果关系机制产生出这个变化。他描述了这种变化的情况,并且考虑和反驳了对物种变化程度、各种起作用的选择优势,以及这些优势在改变一个物种时的生效条件的其他说明。他反对争论对方关于现有的毫无疑问的资料来源的说明。这根本不需要制造出一把经验准则的万能钥匙。

当然,牛顿也列出了控制某些现象的因果关系机制的集合,按照他的想法,这些现象包括了质量和运动现象。一般来说,描述一个因果关系集合是科学理论该做的工作。有时,科学家们有理由相

<sup>①</sup>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巴尔的摩,1968(中文版: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2页)。因为最近的陈述基本上相同,所以参见理查德·C. 列万廷(Richard C. Lewontin):《进化改造的遗传基础》,纽约,1974,第42页、第236页。通过使用一些物种,特别是极其易受影响的果蝇,实验室中的人工选择对许多不完全明确的特征所产生的影响都可以进行清楚地断定。但是在别处,有限的人工选择的明显类似过程是相当不可靠的,这常使农学家们气馁(参见同上,第88页及后面的内容)。无论如何,当我们从人工控制转到自然安排时,预测进化过程的任务就延续到达尔文之后的一个世纪,但仍然相当没有希望去完成。列万廷在第234—239页和第266—267页讨论了一些相关困难。

信他们试图解释的现象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是由单一的因果关系因素造成的(参看牛顿的天体力学和万有引力),或者他们可能会全心全意地认为现象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的相对有效性受制于普遍的经验法则(参看后牛顿主义物理学中的多重力量)。在这些情况下,经验法则的万能钥匙可能由理论提供。但是需要解释的现象通常是由互补的因素产生的,这些因素的相对作用不能通过任何普遍准则得到解释。依达尔文的观点,遗传因素和变化因素都能达到平衡,这是真的;那么,对全部机制的描述可能不会形成任何能够使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从先前发生的条件中被推论出来的经验准则。当然,社会进化至少像生物进化一样复杂,所以生产方式理论恰恰是一个人所期望的适合社会进化这个主题的最科学的理论。

更困难的是,在这类理论类型中如何定位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主要变革原则是:“当束缚发生时,经济结构就富成效地变成最理想的经济结构。”没有合理的技术决定论能假定任何少量的束缚都会产生结构变革,或者假定可以用变革会立刻发生或变革的发生有一段可以用准确和普通的术语加以描述的时间间隔。所以,最低限度也要将典型的原则解释成一个模糊的经验准则,就像热带的物种准则要包括诸如“大体上”和“很快”这类模糊的术语一样。由此,就形成了模糊理论,但牛顿模式除外。这种理解仍要付出特殊的代价。只要用一些模糊的但没有涉及随后发生的结构变革的术语来描述适当强度的束缚,那么就有可能不会有任何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强度的束缚足以引起结构变革。所以回归于“准则”的同语反复并且使理论适应达尔文模式似乎是比较好的办法。

我将很快论证技术决定论不能合理地说明在两种理解中的任一理解中的内部结构变革。如果人们能够接受这个论证,那么关于应该采用哪种理解的问题将是毫无意义的。两种理解都应该被采用。然而,我也将论证对所有理论都将符合牛顿模式的期望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动机,去将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解释和一种历史理论。大体上,技术决定论者提倡的那种理论,是关于变革的模糊的经验

准则的一个发源地,是一把模糊的“万能钥匙”。对现在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技术决定论也需要模糊化,要么使它的概念模糊,要么使对变革何时发生的同语反复模糊。

证伪。像生产方式理论一样灵活的理论可能过于灵活,以至于不能对经验事实进行明确指导。换言之,它可能看上去不可证伪。如果当我们努力提炼能够说明变革何时发生的原则时,理论成了同语反复,那么这种担心就更加严重。

通常,对证伪的担心反映了关于检验性质的有影响力的普遍假设,我将稍后讨论这个假设。就现在而言,我将这种证伪看作是对某些策略的直接需要,这些策略能在原则上击败生产方式理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可能被作为论据的具体历史事实。

马克思声明当内部结构发生变革时,这一变革是由人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决定的。出于眼前的目的,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声明并不与大家公认的关于人们如何行动的普遍原则相矛盾。人们对证伪性的担心与这个声明可能会和具体历史事实相矛盾有关。

马克思的这种理论因为有人说明了论敌对内在机制的解释更符合事实而常被击败。考虑到公认的已有原则,真实的事实总体来说更像是依据某位论敌而定,而不是依据被击败的理论而定。这就是达尔文的论敌如何击败了拉马克的进化论和每个物种的个体创造理论。

然而,当我们寻找那些可能会推翻一个个别理论的检验方法时,这样的总体方法在实践中并不是非常有帮助的。每个理论都有它的问题,在一些个别的案例中,人们更希望论据资料能以论敌的假说为基础,比如,一个人根据今天的天文学,而不是根据某种古老的天文系统,能够预测到夜空不会变黑。(人们过高地预测了星光的亮度。)通常,一个人会假定今天的胜利仅仅反映了今天对相关事实或者辅助性理论的无知。(这就是为什么“证伪”术语本身过于单纯化的原因,同时这个术语还暗示了严格说来与事实发生的矛盾是致命的。)如果论敌的假说总体上更符合所有的论据资料,那么被提出挑战的这个假说就会被推翻,至少是暂时被推翻,情况的确如

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找出一个能平衡成功与失败的办法。假说具有的绝对普遍的优点,比如预言的准确性、范围、表层深度和丰富性,这些优点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我们需要一条总的规则去判别这些优点之间的协调情况,然而这样的原则还没有被提出。

幸运的是,当我们对个别假说是否会被击败感兴趣时,我们经常会利用由争论这个假说而形成的结构和历史:即所有争论方达成共识的关于现实倾向于怎样表现的假说,以及研究与论证的历史,这些研究与论证将某些具体的和存在争议的观点建成一个充分论证的假设的“发源地”。在眼前的例子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的说明显然是生产方式理论的发源地。因为它是马克思在这一理论化过程中的主要关注点,而且它激发了马克思的理论创新。最权威地推翻马克思理论所取得的胜利,首先是因为论敌们所具有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在于如果马克思的理论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对它最好的解释就最可能体现他的理论机制,而论敌们的解释在这些解释中占有优势。同时,马克思主要的关注点和最重要的观点,加之相关的对人类行为的共同信念,使马克思的假说最易遭到两种反驳的攻击。一方面,通常被当作内部结构变革的例子的那些时期,可能被比较好地解释成是由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的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人们可能被证明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变革机制所需要的方式活动。当这两种令人担忧的事情指向马克思理论的发源地的时候,无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细节问题是什么,韦伯的反马克思主义论点在阐明这种辩驳可能采取的形式方面是非常有用的。

如果用《经济与社会》以及《宗教社会学》来填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么这基本上就是韦伯的论敌解释。宗教改革是由于富有魅力的“宗教名家”(韦伯用语)个人回应了基督教中持久的宗教紧张局面;而最终由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来决定的资源和动机,却不能解释宗教改革中的社会情况的重要特征。在加尔文教派中,继任的数代按等级排序的人如果不相信那些比该教创立者提供的恩典标志更加明确和真实的恩典标志,那么他们就不会接受获救

预言的教义。他们仅仅根据宗教心理学来解释急需解决的事情,这个心理学也成为他们解决方案的最终根据:通过有条不紊的资本积累而获得的世俗成功是恩典的标志。禁欲主义新教的宗教改变,因为它为克服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实践与心理上的障碍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则。

韦伯的书作为一种历史学,完全缺乏《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丰富性与深度。马克思描述了各种社会进程,在这些进程中传统主义被压制,并与加尔文教派毫无关系,而且它在加尔文出生前就已经几经周折。韦伯从来没有详细思考过对他收集的事实的其他解释,这些其他解释首先是恩格斯将改革现象解释为由新生资产阶级的地位与利益的变化引起的意识形态的变化。<sup>①</sup>然而无论韦伯理论的具体缺陷是什么,他为一个人可能会成功地回答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如果马克思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能够相对轻松地说明下述情况,即变化过程在生产方式之外独立运转,并能产生基本的内部变革。

239 在别处,韦伯的论证采用了一种略有不同的模式,他富有洞察力地证实了某些关于人们倾向于采取的信仰与行动方式的假说,而这些倾向是马克思的机制所需要的。而且韦伯认为有清楚的论据能够说明这些倾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需要的程度。在此,普遍的心理学原理是主要的论题,而且那些至关重要的例子不会成为内部结构变革的例证。特别是,韦伯强调马克思的假设:从长远来看,与按照适应宗教的方式来改变经济活动相比,人们更易按照适应由生产方式导致的活动方式来改变宗教观。韦伯认为“它将满足我们的目的”会号召人们注意英国的北美殖民地的相反事实。在那里,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虽然加尔文南部由企业主们进行殖民统治,但只有在更多的北加尔文地区,特别是由神父们建立的殖民地,甚至包括在未开发的宾夕法尼亚州的经

<sup>①</sup> 参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0—361页。

济上仍旧原始的地区,①“唯利是图”才真正盛行。

韦伯的独特见解仍不十分令人信服。显然,这不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能使他反驳“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②,因为对文化影响和时间间隔的相关诉求是马克思解释框架中的标准。殖民者从资本主义国家中带来了他们拥有的这种资本主义心理学。为什么韦伯认为南部的烟草种植没有新英格兰的商店那么唯利是图,这一点还不清楚。未开发地区的经济回复到自给型农业的趋势,多是因为殖民巨头们的失望所致,然而这个趋势却被简而化之地忽略了。但是韦伯的总体策略是有着深刻见解并且是清晰的。原则上,人们会发现一种情况,即许多人受到在生产方式中的相同定位的影响,以只有依靠宗教差别才能加以解释的方式,去从事完全不同的经济活动。这种情况是对马克思理论实质性的反驳。实际上,将17世纪的英国看作是一个宗教心理学的实验室,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背道而驰。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人们的生活起步于圣书和宗教传统,他们怀着诚挚的宗教信仰,以明显不同的方式解释圣书中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宗教意义。人们转向宗教时具有的差异性相当符合他们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这种现象至少在霍布斯的《巨兽》(*Behemoth*)之前就已经有所记载。这些差异并不符合所有使人做出决定的其他类型的大规模变化。比如,农场工人特别狂热地唯救世主马首是瞻,甚至在那里还有冷静的带有英国圣公会教徒或长老教会员倾向的滔滔不绝的传教士。但某个地方可能会有与此相反的例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例子将对生产方式解释非常不利。

当然,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必要去批判那些韦伯已经批判过的理论,实际上,考虑到实际状况,最合理的那些经验主义异议是截然不同的。我将以变革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均衡状态为基础,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纽约,1958(中文版:彭强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8页、第49页)。

② 同上,第27页。

逐步描述这种异议。然而对实际资料的高度提炼使我对证伪性感到担心：能想象出经验主义观点会击败马克思的理论吗？最好的答案存在于对想象得到的数据的描述，这些数据如此清楚地不利于马克思的理论以至于能够击败马克思的理论；至少马克思的理论缺少同等的论据去使它的论敌失利。考虑到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着力点，两种韦伯模式恰如其分地制作了这种清楚的论据。通过窜改韦伯的例证，论点可以变得更加鲜明，窜改使这些例证排除掉生产方式理论，甚至更加绝对地排除掉这一理论。假设在马克思的记事开始之前比如说大约在1400年，北美地区就已经有英国殖民者安居了，并且所有殖民地中的安居者的社会背景都是相同的。然而，一些殖民地由来自于城市的移民统治，他们属于禁欲主义新教的地方教派。在各个殖民地中的典型的经济活动都不相同，其中少数殖民地变成了微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少数殖民地受到禁欲主义新教的影响，它们是未开发的殖民地与先进的生产方式隔绝。在这样一个记事中，北美提供了一个能够产生清楚的论据来反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实验室。如果真实的检验是不清晰的，那么这是因为真正的历史不是整齐有序的，而不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本身是无法证伪的。

内部还是外部。我已经将生产方式理论的主题描述为基本的内部变革，即由所讨论的社会中的内部因素造成的基本类型的变革。在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应该如何给内部和外部划界恰恰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序言》中的束缚模式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自我毁灭的再生产模式都是用来找出内在于转型社会中的变革的来源。马克思将他的变革模式与那些强调征服行动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对比，这个对比强烈地暗示了马克思要成为某种类型的内在论者。“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sup>①</sup>而且，当马克思主义者争论在经济不发达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

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对马克思的内在论的程度的评价就成为政治上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马克思的文本不能清晰地并且无矛盾地说明马克思如何区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以及这两种因素范围。当马克思确有兴致地阐明了他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含义时,人们很难从这些阐明中推断出关于基本社会变革中的外部因素作用的任何普通寓意。

给内部与外部划界看似简单。姑且不论神创历史,那些来自于一个社会之外的因素在原则上似乎会影响这个社会结构,这些因素看上去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地理上的外部因素,比如征服或文化影响,这些因素必然影响这个社会的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作用;另一个情况严格说来是在社会进程之外的因素,比如气候变迁和流行病,必然影响那些最终不是由社交中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产生的变革。对马克思的主要论题所下的定义即“严格的内部论者”作为我将要使用的术语,它把由两种外在因素中的任意一种因素引起的进程所产生的所有重大结构变化排除在生产方式模式之外。

实际上,我将专注于地理的外在情况,因为这既是马克思在有记载的历史时期中关心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论敌理论所强调的问题。同样,我将以下述问题为起点:什么应该被当作是内部的,以便能给生产方式模式的主题问题下定义?然后,我将考虑一个相关问题,即整体的历史变革在何种程度上对马克思而言是内部的?

就像马克思看到的那样,严格的内部论存在的问题是:它似乎不只是排除了历史中的一部分基本变革,而是排除历史中的所有变革。请考虑下述例子,这些例子已经在其他上下文中提到过。马克思对阶级分化如何能出现的说明,强调了由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产生的交换和随之产生的劳动分工。在解释古代的非奴隶者们之间严格的阶级分化时,征服进程和商业进程是主要的。封建制是由于入侵的日耳曼部落的征服而建立的。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说明包括内部贸易的增长,以及后来对非欧洲社会的征服与掠夺。在马克思看来,甚至社会主义的兴起也受到社会内部作用的影响。马克思在



《宣言》中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sup>①</sup>显然，畏缩的德国没有被要求去发展它的生产方式，英国和法国也同样被“立刻”建议用数月或不几年的时间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成熟资本主义的诸多方面被输出到德国（首先，一个小规模的但却是集中的并且政治上成熟的无产阶级在科隆这类的中心区已经出现），与此同时就德国的精英们自身而言，他们与英国和法国的精英们相比仍然维持着分散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古老的状态。总之，如果马克思提供给我们一个严格的内部基本变革理论，那么按照他的说法，他似乎提供给我们一个空白的理论。

严格内在论的最后问题，即社会主义首先在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是争论的热点问题，特别体现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那些回应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人之间的争论。对马克思内在论的某种较宽松的理解有助于使马克思对这种可能性的承认与他的总理论协调一致。而且这个理解澄清了马克思理论的内部论，即使它没有澄清，那么最终它也将完全有利于扩展内部范围。

说明是简单的，所以它常有益于假定在马克思的模式中，一个社会的领土范围与生产方式的范围相同，并且这一生产方式的进化决定着社会的变化。在我制定的生产方式公式中已经提出了这个简化的假设，即据说有这样一种情况，最初不利于保持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进程逐渐地破坏了这个经济结构，这种情况是由这一经济结构的生产方式性质决定的。但是，如果假设社会在强调生产方式的解释模式中一定是没有玻璃的单体窗子，那么这个假设就是一种民族主义迷信。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国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而在这一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结构在许多民族国家中得以稳定下来。这个系统中的一些社会与其他社会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决定性地影响这些社会。这种相互作用在原则上能

<sup>①</sup> 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被解释为最终建立在各个相互作用的社会中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毕竟,每个人仅以这种方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英国的兴盛与没落对南美产生的影响。因此生产方式理论最好能更加广义地加以理解。一个社会的变迁过程由包含它的生产方式决定这个生产方式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较大的生产方式包括在既定的地理联系中的地方联系以及由这些联系产生的相互作用。这恰恰是马克思在整个40年代中期的立论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使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具有了将要来临的可能性:

对于某一个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sup>①</sup>

实际上,相关的心照不宣的假说,即生产方式中的所有社会将具有相同的基本类型的经济结构,可能同时也被拔高了。可能会存在一个由地域清晰的、相互影响的许多社会组成的稳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这些影响受这些社会的生产方式控制,而且这些生产方式体现了根本不同的结构。这可能是马克思在讨论德国时的思想,因为他至多也就将德国看作是半封建的。一个类似的不同系统也在马克思的下述思想中得到暗示,即马克思认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意大利的中心几乎不能改变意大利周边的社会关系。<sup>②</sup> 无论如何,一个稳定的但却多样化的生产方式为生产方式模式敞开了一种可能性。自马克思以来,人类学家们充分研究了这样的系统,他们常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3页。同时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0—301页、第310—311页。

<sup>②</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3—84页。

常发现有必要将流动的田园主义者的社会或“鞭打和焚烧”的农民社会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这个系统还包括被这些人洗劫的更多土生土长的农场经营者们。<sup>①</sup>

当技术决定论和生产方式理论都被拓宽到包括多种社会系统时,这种拓宽在生产方式模式中却少之又少。如果变革的基本机制是束缚,那么社会内部因素将在基本机制之外存在,并且排除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即输出新技术。但是如果所有由生产方式导致的经济资源和优先权都是基本机制的一部分,那么对更大型的生产方式的认可本身就是对变革理论的最自然的理解。

这种内在论的扩展在地理学术语中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是不确定的。但是这种内在论似乎把马克思视之为重要的进程排除在结构范围之外。如果不同的社会是生产方式的一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相对稳定而持久,而且这些相互作用受到每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控制。换一种方式来看,下述观点完全是误导的:结构变革被归因于一种意外的相互作用,在这个偶然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革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结构大部分被毁坏了;这种对结构变革的解释被说成是建立在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解释。但是通常的观点认为欧洲帝国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对马克思说明资本主义在制造业的胜利是如此的重要,并且马克思的变革模式当然应该符合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说明。而且,只要马克思说明征服产生了作为封建制基础的希腊罗马式的贵族和日耳曼入侵,那么这些征服与先前稳定模式的最终形式相比,就更接近于一次性毁灭。马克思仍然声称他能够让他的历史理论与那些明显与这一理论相矛盾的征服事实协调一致。

---

<sup>①</sup> 埃蒙德·里奇(Edmund Leach):《缅甸高地的政治系统》(剑桥,1954)是个典型的研究,它研究了这样一个生产方式的结构和动力是如何只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的。(“生产方式”不是里奇的用语,但它就像先前定义的那样很适合作为表述。)另一个被充分研究的相互作用是苏丹的努尔人对丁卡人的袭击关系。参见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努尔人》(牛津,1940),第125—132页、第218—220页。

人们说明了社会内部矛盾只是看上去使结构变革有所差异,这个说明表明现在可能看上去严格的内在论似乎也得到了辩护。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征服问题的讨论中不时使用的战术,这部分讨论是一个非常丰富并且非常凌乱的段落,马克思在这里最广泛地辩护了他对内部的强调:

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已经不再有东西可以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Gemeinwesen]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sup>①</sup>

在上文中以及在《资本论》的类似段落中,马克思似乎认为征服没有产生任何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当然,征服是个普遍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征服的确将不同的人置于结构顶端的适当位置,但是征服没有影响到结构本身的进化。与此相反的现象则是由于混淆了征服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和征服对结构的影响而造成的。实际上,社会结构再现了征服之后的完好无损,就像中华帝国在满族入侵之后的完好无损一样,或者社会结构在其无论如何都要沿此发展的方向上发生变革。在这些评论中,后者一定是马克思对封建制变迁的想法。因为无论他如何质疑入侵者的影响,他都无疑将封建社会从根本上区别于罗马帝国的封建社会。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83页。这部分在内容在《资本论》第1卷中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99页。

不考虑入侵情况的假说充其量是一个不受支持的假说。而且仍不清楚的,是严格的内在论如何能够符合马克思的其他情况,而在这些其他情况中相互作用是主要的解释因素——这些因素能说明阶级社会的兴起,比如希腊和罗马的贵族统治的起源。但没有必要去更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因为马克思本人否认了他自己的假说,他的论述如下:“封建系统决不完全来自于德国,而是有它自身的起源,就征服者而言,他们来自实际征服过程中的军队中的军事组织,而且这只是在征服之后适当地通过被征服国家中的生产力的作用来进展到封建系统中。”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在征服过程中部分地依靠于入侵者的军事组织,而且因为他们本国的生产方式影响他们的军事组织,所以封建制部分地依靠于他们本国的生产方式。新的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对古老帝国的影响,那么就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

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的具体实践中去理解指导这个实践的抽象概念,这在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任何思想开放的读者都会把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解释看作是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内部来解释变革,即使与外部现象的相互作用也被包含其中并且违背了严格的内在论。通过考虑为什么这些特殊解释会很自然地被视为内部的,我们可以适当地广泛理解马克思对内部的极度关注。

请考虑马克思对希腊罗马式贵族统治兴起的解释。在这里,在征服组织中的战略定位是最初富裕的家庭为什么会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的主要原因。既然这些家庭与家庭之外的人(被征服者)之间艰辛的相互作用是必需的,那么这就违背了严格的内在论。但是与偶然的相互影响的程度相比,在同一程度的解释中,整个征服进程建立在扩张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军事进程对于社会扩张是必要的,比如说早期罗马共和国再生产了它的经济结构,换言之,征服的进程是由于资源和优先权引起的,这两者可以根据在罗马共和国生产方式中的定位加以解释。马克思遵循着与此类似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生产方式必然要违背严格的内在

论,马克思在对野蛮的罗马征服者的侵略行为的解释中写道:“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糙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sup>①</sup>在此,鉴于稀少的资源和渺茫的创新可能性,征服再次被解释为再生产经济结构的必要手段。

即使生产方式之外的人们的抵抗——这些人最终屈服了——在因果关系上是必要的,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对希腊罗马式贵族统治的兴起的解释视为根据希腊罗马式的生产方式所做的解释。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所在社会具有的特殊特征和他们的反应在没有说出这种解释的情况下也是可行的。但是因为解释的需要而提到的所有变革或特性都不能描述出他们的必要作用,所以马克思只能依靠这种固定的不言而喻的道理,比如人们在退让自己的土地与自由之前通常都要进行战斗。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越出国界的人们发挥了必要作用,那么征服的进程也要用希腊罗马式的社会结构来解释,这种观点与下述观点一样自然而然:即使氧气的存在在因果关系上同样是必要的,火也是由于短路而引起的。(如果火在无人控制的宇宙飞船上发生,那么一个人可能会充分论证令人惊讶的氧气的存在。)我遵循上述的这种普通用法来说明当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不是内部的时候,解释因素就应该是内部的。

通常对马克思而言,如果变革过程被解释成是由正在讨论的社会中的社会系统引起的,那么这个变革过程是内部的。与系统之外的人或现象发生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与此同时这些决定性的相互影响不是由需要加以说明的外部变化或固有的异常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83页。短语“通常的交往形式”也暗示了传统的德国战争模式可能是个较大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部落们传统地生活着——的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即控制生产力的传统系统中的一部分。因为“交往形式”是马克思这个时期使用的经济结构短语。在这方面,他的德国部落将与里奇的克钦邦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类似。

性来决定。<sup>①</sup>

有时,在对历史理论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当变革被解释为是由另一个正在征服的国家的内部因素导致的,那么将这个变革称为内部变革将是十分有益的。传统的伊特鲁里亚社会的变革就是因为它的外部因素,但是如果对罗马扩张的内在论解释全面地解释了这场变革,那么这场变革就可以被纳入符合社会内部变革总理论的进程中。

最后,将先前的理解即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的相关系统没有必要局限于基本变革发生的领域,加入到这种扩大的内在论,其结果是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决定基本内部变革的观点是“内部”意义的。当然,主张变革在这一意义上是内部的,这种主张有时是有争议的,但是马克思的论敌解释常常共用这个假说。比如,韦伯是一位与马克思平分秋色的内在决定论者,他们两人的异议在于是否将生产方式置于首位。同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涉及基本变革时更加充分地使用了一个战术,即说明一个进程是外部的并且超出了生产方式模式的范围。通过说明生产方式模式的确出众地解释了各种基本变革,生产方式模式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以新的方式扩展的意义上,一系列威胁严格内在论的案例几乎全部都是内部变革的例子,但是只是大多数,而不是全部。特别是在马克思看来,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不同特征导致了变迁结果的结构,所以封建制的变迁是基本的但不是内部的。如果马克思只提出了“内部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那么就可以由此得出封建制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范围,但是马克思当然是提出了一个关于全部历史的构想。所以,必须要面对马克思理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在那些基本的变革不是内部的例子中(马克思承认它们存在),马克思对于生产方式的作用会说些什么?

<sup>①</sup> “至关重要的相互作用”意指对迟早要发生的结构变革进行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西班牙人在秘鲁发现了黄金,这个事件需要被解释。但是马克思可能认为发现黄金的时代导致了财富的输入,同时也导致了至关重要的后果,即资本主义迟早都会产生。这种财富输入是强者大规模征服弱者的通常结果。

再者,最好的策略是去重构从实践而来的理论。公认的基本的非内部变革的主要例子是封建制的兴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非内部进程的如下说明。<sup>①</sup> 罗马帝国的逐渐没落,是由罗马的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决定的,这里的内部是指在刚刚描述过的意义上的内部,而不是由在毁灭它的基础上崛起的社会形式决定的。处于统治地位的罗马贵族们的统治是通过周边社会精英们的征服与合作来维持的,他们以剥夺意大利中心的农业人口为根基。由于疆域扩张,他们在中心的剥削变本加厉,直到被剥削的人们无法承受来自帝国的重任。至于那些继承了罗马社会封建制度的人们,罗马帝国对他们的生产方式作出了双重贡献。一方面,罗马帝国的生产力比入侵者的生产力更多产、更协调,技术更发达。所以当“很快结束了攻取”的时候,入侵者本土的统治结构并不能统治罗马人。另一方面,皇帝的合作策略意味着罗马“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被政治事件所破坏”<sup>②</sup>。同样,罗马生产的许多方面在征服中非常容易消失,因为“仅仅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为基础”<sup>③</sup>。罗马的种植园农业和在周边的谷物栽培系统,以及将这个系统输入到中心,这些都是马克思肯定已经考虑过的情况。因此除了罗马的大规模军事胜利之外,没有任何日耳曼式的满族会出现,以便让一个新的王朝统治旧的系统。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比罗马更加权力分散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却比日耳曼部落更加协调和多产。

入侵者的生产方式以前面描述的方式而且当然是以有利于形成入侵军队的统治结构的方式解释了入侵者的侵略。直到最终结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页及后面的内容,第83页及后面的内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2—497页。

<sup>②</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3页。

<sup>③</sup> 同上。



果产生为止,日耳曼的入侵者既对军事结构做出贡献,又对他们本土的经济结构做出贡献。或者确切地说,这两者都影响了最终结果。

冲突的紧张局势和罗马的凯旋造就了一个由分离的但却相似的社会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土生土长的农业生产者受到擅长调动和协调物质力量的封建领主的盘剥。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最初是相当平均主义的,这种交往方式来源于日耳曼的生产方式,但却受控于人与人之间的义务责任、等级分层,以及征服机构对剥削任务的适应。

这个说明几乎同我简略的摘要一样粗略地符合文本,<sup>①</sup>但它绝不是马克思对历史所做的解释的范例。不过这个范例倒是有助于说明马克思如何设法使内部因素必然处于首位,甚至当变革的过程从总体来看不是内部的时候,每个团体对各个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出的决定性贡献,都要受到各自的生产方式的控制。换种方式来说,即使我们始终让一个社会处于被侵略和被他人打败的状态,那么其变革结果对于生产方式中的变化也是高度敏感的。一旦我们解释了最初的生产方式如何导致了相互影响的过程,那么解释最终结果的大部分工作就已经完成,但是只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在对封建领主关系的解释中,征服的军事命令将发挥独立作用。

252

马克思总的历史理论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最初维持一个经济结构的社会进程,因为生产方式的性质而打破了这个经济结构的时候,基本的内部变革就发生了。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论题,这样说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接近于一个将宇宙万物都内在于唯一的生产方式中的时代。我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个观点。在第一部分,我将把对它的辩护作为己任。第二部分是,当基本变革不是内部的时候,这个变革多数情况下被解释为自我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受各个社会自身的生产方式控制的相互作用的必然过程。对马克

<sup>①</sup> 同样,两个主要文本存在一些差别。《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强调本土的日耳曼模式。

思而言,这种非内部的基本变革的可能性是否超出了封建制的范围,这一点还不清楚。尽管如此,封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选择。

在给第二个选择下定义期间,我介绍了一个关于程度的模糊问题,即一个变革是否主要依靠生产方式加以解释的问题。在原则上,这个模糊性不能辨别一个解释是否如此的从根本上依赖外部的相互影响,以至于马克思的理论仅仅因为这一点而必须把这个解释排除掉。实际上,论敌的理论通常是清晰的,尤其是在封建制的兴起方面。

就一个清晰的论敌理论而言,请考虑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对于封建制起源的说明。<sup>①</sup>在他的解释中,早期封建制是真正的黑暗时代的结果,这个时代经历一千年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农民、工匠、商人迫于这种压力都迫切依靠军事将领来寻求庇护,但结果是武士们成为统治者。武士们的相互关系受军事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组织和意识形态适应他们与凶暴的、不可预知的、彻底对立的敌人进行持续战争的生活。这种社会除了具有最低限度的农业、手工艺、运输和某些武器的生产能力之外,它的创造力对先前社会的特征相当不敏感。布洛赫通常求助于某种社会进程来描述所有不断遭到入侵又足以击退敌人的基本上不迁徙的社会。最终,由于对被入侵地区的统治与认识之外的一些原因,入侵停止了。早期封建的武士文化成为一种生活秩序并且仪式化,从而产生了正统的封建制。在此,解释的主要工作是探索各种辩护方式。生产方式不是结构变革的主要的最终决定因素。如果布洛赫是正确的,那么封建制兴起的主要原因就不是马克思假定的内部过程。

我已经设法使生产方式理论足够清晰,以便一个人可以清楚生产方式理论是如何被检验的。但是许多清晰的陈述是清晰的谬误,下一项任务是弄清如何举出一个例子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

---

<sup>①</sup> 参见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伦敦,1965(中文版: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 历史是那样的吗？

技术决定论通常是无心地导致了对马克思的崇拜论。如果对马克思的文本暗示了技术决定论的某种形式的论证最终是无效的,那么这些论证是广泛的并且是合理的,但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论证证明这样解释马克思是正确的。毫无疑问,人们总是想更高效地处理物质生产的性质,但是,没有一个普遍的理由能用来假设这个愿望总是强烈到足以破坏那些使生产效率降低的社会结构。当然,明显的反例在马克思那里比比皆是。罗马帝国、古中国、古印度和被欧洲殖民主义入侵的本土社会都在技术上抑制了社会形式的发展,但它们都历经数个世纪,甚至是一千年,而且有许多普遍的理由能够用来假设技术进步的动力不总是最重要的。人们可能想要更高效的生产丰富的生产结果,但是他们也避免死亡、折磨、入狱、社会责难、骚扰、羞耻以及其他许多违背现有社会秩序的成本。甚至当具体的保守机制不发挥作用时,潜在的革命创新总是在一开始就身处险境。革命创新为了达到普遍而深入就必须符合那些普遍地感受到自己被严重剥夺的人的需要,然而相对低的技术水平可能也大体上符合许多社会的需要。马克思非常热情地研究过古易洛魁人、亚洲人和斯拉夫人的社会重构,他把这些人描绘成这些人与他的父母一样,并没有对相对低效的技术感到不满意,但却对没有充裕的卫生间而感到不满,这在今天令我们困惑不已。

即使马克思的著作的确证明了生产效率的动力足以强大到实现变革,并以此来阻止社会结构发展到17世纪之后的社会结构,那么这些著作也不能最模糊地暗示下述观点:生产效率的动力非常广泛地遍及于历史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成熟的资本主义工资理论决定了这种论点。从马克思声称的平均来看,当资本主义只是给工人提供了生活必需品时,他指出那些成为必要的需要有一个历史因素,这个历史因素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

以及对工人与雇主之间差异的理解。<sup>①</sup> 马克思通过强调需要的历史相对性,将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对更发达的技术的需要是如何产生的?”而技术决定论对这个问题却最少有准备去回答。

鉴于现有的事实,生产方式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有理由更可能是基本正确的?除去事实所提供的所有反例,在证明一个理论是如此博大而且相当不可预测时可能存在原则问题。如果生产方式理论没有描述所有社会的内部变革机制的话,那么它就描述了所有阶级分化社会中的基本内部变革机制。显然,历史记录太不完整,所以无法用每一个具体到足以证实一个理论的例子为这个理论提供资料。但是什么例子可以作为所有基本内部变革的例子中的公平样本?而且,理论没有提供经验准则来说明普遍的变革会在某些普遍的情况下发生。一个理论除了依靠证实这些准则之外如何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事实上,我认为目前最好的赌注在于生产方式理论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将超出一本书的范围详细研究特殊的历史时期,并以此来为这个赌注举出例子。在这里,我将描述案例研究的作用,而且鉴于现有的历史争论的性质,我将提到一些特别重要的案例研究。由于需要提到一些在别处提出的案例研究,因此案例将不会是完整的,但是它应该足够完整到可以说明:即使生产方式理论非常普遍,并且没有产生任何能够预测变革的经验准则,而且还充满了关于“基本的”变革、“主要的”解释,以及“变革”迟早“发生”的闪烁其词,那么原则上证明生产方式理论的正确性也是不存在障碍的。没有理由把这个理论葬送到现代历史学家的坟墓中去,葬送到形而上学的信念领域中去。

---

<sup>①</sup> 参见《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页;《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页。

一个关于潜在机制的普遍理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一个层面是,必须要提出普遍因素来为假定这个理论总体而言的确是有效的提供理由(这些理由从来都不令人信服)。另一个层面是,这个理论需要被应用于具体的解释问题之中。这个理论必须被证明能够提供比现有的最好的论敌理论更充分的基础来解决这些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兼具这两个层面的优秀例子,这点正好与马克思的理论相似。一方面,达尔文求助于普遍因素和众所周知的现象,来使他赞成的机制产生物种变化,或者使其他机制不能产生物种变化。比如《物种起源》前两章主要表达了一个争论,即一个从普遍共识的信念到提出新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出现的总体观点的合理性的争论。由饲养者对驯养的植物和动物做出的人工选择产生了新的种类,并带有真正繁殖出来的不同特征。没有人能说明物种变化的差别问题要多于程度问题,所以新物种能够出现是因为物种挣扎着求得生存和繁衍的自然进程强行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这个合理的观点对于达尔文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促动了对恰到好处的短语“自然选择”的选择。<sup>①</sup>另一方面,达尔文说明了他的理论与论敌理论相比,为解释动物分类、地理分布状态和化石记录这些相当具体的事实奠定了更好的基础。而且,达尔文的理论像马克思理论一样有它的限制条件。达尔文没有说要描述一个肯定会发生物种变化的环境,即勾勒出一个当选择压力和变异因素“足够强大”时的非循环说明。决定性的思想是含糊的,它包括对一个物种的全部看法和自然选择本身的范围,达尔文认为这些仅仅是进化中的主要因素。<sup>②</sup>

① “在人类手里发生巨大作用的选择原理,能够应用于自然界吗?……既然对于人类有用的变异肯定发生过,那末在广大而复杂的生存斗争中,对于每一生物在某些方面有用的其他变异,难道在连续的许多世代过程中就不能发生吗?……我把这种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版:周建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4—95页)。

② 参见比如,同上第46页,承认关于遗传的下垂的耳朵已经进化到家畜完全不使用的程度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对生产方式理论的论证,取决于对统治阶级在何种程度上统治社会的合理评价。一旦直接生产者生产的未消耗掉的剩余产品由少数人控制,那么庞大的社会力量就发展了。物质优势加上随之而来的闲暇、机动性、协调以及用于合作的资源,这些都为下述情况奠定了基础:对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近似于独裁的统治。既然脑力劳动和思想工作要由那些摆脱了体力劳动去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促进发展,“甚至一位未来的哲学家不能靠空气而活”,那么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对思想的生产 and 宣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任何数量可观的人们来说,虽然统治阶级的确危及到一个人的生活,但是攻击统治阶级并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尽管如此,变革如何还能建立在内部进程的基础之上发生?思想的生产与批判似乎不能作为基本变革的最终来源而发挥作用。即使在思想上强制性地批判那些互相矛盾的、无理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也持续了数代人,甚至是历经千年。人们似乎容许当他们的信仰服务于基本利益的时候——包括在避免危险和毫无希望的抗议时的基本利益——他们的信仰与最好的论证和论据相悖。在政治层面上,不可避免的 error 和地方上的失败暂时延缓了统治机构的存在,但它们似乎并不足以产生激进的变革。统治阶级具有协调性、机动性,所以他们能保存力量并依靠熟知的社会动力和智力动力来成功地进行重组与反击,比如从斯巴达克起义到中世纪城市公社的星星之火,再到法国波旁王朝的扎克雷起义。在阶级分划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不满的基础。在解释变革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不满是如何被注入权力和推翻统治阶级的愿望中去的。当人们开诚布公地在政治上组织和动员革命力量时,如果这些组织和动员不能反映那些能够导致众望所归的变革的普遍进程,那么它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没有对社会进行这种普遍改造的情况下,在统治阶级组织起足够的人员去弥补他们具有的稳定的优势之前,统治阶级就能阻止处在萌芽期的变革运动。

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作为内部变革机制的一个来源而保留着。为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出物质基础的那些手段,在自然匮乏和人类反抗的压力下可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预期的结果、权力上的决定性变化和随之产生的新的需要。因为这些变革过程激进地改变了资源和利益,它们能生产出新的权力和需要,而雄辩和逻辑是无法生产出这些的。因为这些变革过程遍布于整个社会,所以它们能成为大规模的、协调的革命活动的基础。因为这些变革是由维持旧社会的手段带来的必然的并且不可预期的结果,所以统治阶级不会在萌芽阶段阻止它们。由生产方式导致的变化过程能给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以充分的灵活性、纪律和安全,从而为这个阶级提供机会去推翻统治阶级。简言之,虽然意识形态过于顽固,而且纯粹的政治进程太易于孤立,但生产方式是易改变的、普遍存在的,而且不可预见其破坏性结果。只有生产方式能配得上马克思对潜在的社会进程中的权力变化的赞美,“掘得好,老田鼠!”<sup>①</sup>

我已经描述了几种生产方式自我改变的方法,对此我将简单地补充:“生产方式会是别的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为了在生产方式内定位内部变革而提出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依靠在区别社会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的灵活性。如果控制手段和控制结果不能用来定义生产关系,那么更多的变革因素将在政治领域中是有效的而不是在生产方式中有效。控制人类反抗行为的有效措施在某种广泛的意义上总是政治的。然而这些手段被用于控制剩余产品,它们可能会最终自我改变。《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说明了非奴隶人群中的阶级分化的兴起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这里,从历史角度理解“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类型上的基本差别是无法选择的。

这个一般观点当然与达尔文的一般观点一样令人信服。求助

---

<sup>①</sup>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页。

于背景知识的信念只能使一个普遍声明似乎具有合理性。(达尔文那时候的遗传学知识不比任何人多,他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驯养者只专注于来自一系列永恒的基因型的某类项目。)所需要的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论证来确立普遍理论的优越性,从而为解释为什么实际的现象会在所讨论的学术范围内发生奠定基础。特别是,这些详细的论证应该证明由这个普遍理论支持的解释要好于目前最权威的论敌理论支持的解释,并且好于根据被评定过的资料来使用论敌们公认的原理进行解释。没有这些详细且具体的比较,一些论敌理论将总是保持正确,至少在那些认为这些理论的前提特别引人注目的研究者那里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除非更普遍的理论是有效的,否则具体的成功解释作为对正在讨论的历史阶段的单独说明将是意义深远的,但这个成功解释不能作为通常出现的理论机制的证据。

尤为重要的是,逐条地进行解释性比较的对象是标准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占据着根据论敌理论框架从事研究的人的头脑。如果新理论的辩护者总是过于偏离这些问题,那么将存在着他或她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巧合的危险。研究者们可能会反思下述事实:他或她所选择的问题碰巧因为特殊的原因而顺利地迎合了普遍理论;或者,在论敌理论框架内的理论家们,还没有把他们的才能运用到这个非标准的问题上。马克思用那些偏离了正常的道德或社会标准的理论来应对这些标准问题;这是他的科学力量的一个基础。它贯穿于《资本论》中,而且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对这部著作的竭尽全力,甚至作为马克思的策略来使工人运动转向政治斗争、外交事务,并克服民族与种族的对立。《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量内容是马克思在其时代所著述的重大的、标准的历史问题,即解释西欧由封建制转变为现代性社会。《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幅度的不稳定性和循环波动问题,这些问题是自1825年第一次工业大萧条以来的经济学的理论丑闻。《资本论》第三卷的大量内容涉及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利润理论的检验,这些理论反驳了为什么18世纪以来平均利润率长期下滑的问



题,这个问题也挑战了以往数代最精湛的经济学家的最好成果。同样,马克思的历史著作明显背离了政治兴趣,而且充满了这种通过比较加以检验的内容。因为当时政治历史研究的最急迫的任务已经变成了努力去解释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政治历史的不稳定性和频繁地出现异常现象,即要揭示在其他方面发生力量的细微变化的重要意义;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所有被看作是异常现象的事物的极力解释,说明对法国皇帝来说普通股票市场骗子们的兴起。

马克思这些著作的认识论作用在评价马克思的理论时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它在识别这些著作的真正含义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请考虑比如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按照通常的解释,因为这个趋势是内在固有的且是普遍的,这个趋势对马克思而言是重要的。所以马克思证实的机制和他试图去解释的趋势应该也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写照。(事实上,20世纪美国的利润率似乎在长期内相当稳定,而资本与劳动比率似乎并没有像马克思描述地那样增长。)根据对马克思总体论证逻辑的现有观点,马克思如此关心的趋势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现象。19世纪主要的研究者承认这个现象并试着加以解释:利润率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呈下降趋势,比如从18世纪一直持续到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认为他的利润理论将这种趋势与同时期的历史发展、以工业化为特征的不增长的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以及不断壮大的工会运动维持满足工人物质需要的社会劳动与满足资本家消费和再生产需要的社会劳动之间比率的能力结合起来,对这种趋势做出了出类拔萃的解释。马克思观点的重大意义不在于这个观点确立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趋势(与此相对照,比如说重复出现的工业危机对马克思来说是内在固有的),而在于利润总理论用这个趋势去解决一个标准的并且有异议的历史解释问题,从而使这个利润理论而得到认可。马克思在1868年4月3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了他在这个

方面取得的成功。<sup>①</sup> 他称利润总理论为“一个战胜了以往所有经济学驴桥定理的一个最重大的胜利”。马克思可能间接提到的唯一的标准问题是要去解释利润发展的趋势,这项任务挑战了里卡多(Ricardo)、马尔萨斯(Malthus)和许多其他学者的最卓越的成果。我已在前文描述了这个趋势。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那些占据了马克思的大部分理论研究工作的历史解释是基本有效的。除了教条主义者之外,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些解释在每个细节上都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主要历史解释具有的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一点是相当震撼人心的。一个与马克思的解释基本上相反的解释——马克思的解释对这一解释来说基本上是错误的——决不会战胜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解释。在某些历史研究的焦点问题上,比如,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19世纪法国的政治骚乱、英国内战的起源以及现代劳工运动的兴起,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历经了一个世纪的争论后,比任何一位论敌解释都更能成为标准的假说。

如果人们通过使用马克思的理论而获得的详细的解释性成果只是马克思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深信不疑地去怀疑这些成果。这个独属于马克思的成功将被最好地解释为由于一个人运用了尚不充分的理论而得到的对历史的明智认识。正如杰出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家 C. G. 亨普尔用他绝对关心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注解的那样:

偶尔地,对历史进行说明或加以解释的某个特殊流派的信徒们,在证据有利于他们的方法时,他们会举出一个由他们的派别代表做出的成功预测。但是……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历史“理论”的信徒可能会充分探索历史发展并可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尽管这些预测不能依靠他的理论术语实现,但是他却依然甚至用他的理论术语来表达。[这些是]冒充、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0—76页。

证实的例子……<sup>①</sup>

事实上,即使马克思主义编纂史通常不是一项令人敬佩的事业,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也是马克思以外的那些人取得各种解释性成果的基础,就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将引导一个人去期待的那样。一些重要的例证是恩格斯对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的看法,列宁和希法亭对19世纪帝国主义的看法,希尔和阿尔汉格爾斯基对英国内战的看法,希尔顿对中世纪阶级斗争的看法,德·圣克鲁瓦对罗马衰落的看法,梅拉索(Meillasoux)、特恩窝尔德(Thurnwald)和弗瑞德(Fried)对阶级社会兴起的看法。<sup>②</sup>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思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有时在从事一些马克思并没有尝试的必要研究。当人们为一个理论辩护时,不仅要看那些标准问题,而且还要看有利于论敌的例证,这一点是重要的。在这些例证中,如果论敌理论事实上是有效的,那么这个论敌理论将最有可能获得成功。在生产方式理论的例证中,宗教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这里,大规模意识形态变革似乎在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发生了,而且似乎激发了协调的、带有激进目标的危险活动。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是马克思的性格原因,他远远落后于恩格斯,恩格斯勾勒出了他在广义生产方式理论内对改革及其结果的引人入胜的说明。希尔对

① C. G. 亨普尔(C. G. Hempel):《历史普遍规律的功能》(最初发表于1940年),载于《科学解释方面》,纽约,1965,第239页。

② 在最近的作家中,参见,比如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640年英国革命》,伦敦,1940(中文版:舒贻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英国农奴制的衰落》,纽约,1972;G. E. M. 德·圣克鲁瓦(G. E. M. De Sainte Croix):《马克思与经典古代史》,载于《阿瑞塞莎》1975年第8期,第7—41页;克劳德·米拉绍克斯(Claude Meillasoux)的《检验关于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现象的解释》,载于《非洲研究丛书》,1960年第4期,第49—67页;R. 图恩瓦(R. Thurnwald):《原始公社的经济》,伦敦,1932;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政治社会的革命》,伦敦,1976。像大多数说英语的人一样,我只是从散见于希尔著作中的对阿尔汉格爾斯基(Arkhangelski)的贡献的强有力地描述而得知阿尔汉格爾斯基,但阿尔汉格爾斯基并没有被解释。

清教的研究延续了这项事业。<sup>①</sup> 同样,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完全是只言片语的。而且在马克思的这个讨论中,一个人将希望意识形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独立作用。近来学术界对中世纪社会变革的研究、对罗马帝国衰落的研究以及对阶级社会兴起的研究填补了这项空白。<sup>②</sup> 最后,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宣言》中的一个简单化的原则谬误,致使对生产方式解释的辩护变得复杂:资本主义趋向于民族和种族分化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后来的若干年鲜明地放弃了这个观点。在我先前引用的1870年的信中,马克思写道:“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

① 参见比如,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作的序言,和希尔的《清教徒主义与革命》,纽约,1968。最近,有些人赞同宗教的首要性超过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因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为其主要例证。如果马克思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那么这将是一个令人苦恼的例子,因为它对马克思理论所需要的心理学假说进行了反驳。因为人数众多的大多数伊朗人现在接受急剧减少的物质产量,而同样的发展状况在生产方式模式中几乎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反抗巴列维(Pahlavis)的数量最多的集团是由农民和手艺人组成的,他们被乡下的农工联合体的快速入侵、城市中的工业、和大规模的市场运营剥夺了一切,或者他们受到这些情况的威胁。许多人成为在大城市周围失业的或者未充分就业的潜在无产阶级。他们像马克思的农夫那样,即使他们的长期利益指向了应与以伊朗左翼为基础的产业工人结盟,但是短期利益又使他们回到了过去。(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680页)。毛拉(mullah)(译者注:毛拉是伊斯兰国家对学者等的敬称)的明确的拥护态度来自于集市商人,这些商人的兴趣明确地在于要返回到过去。因为所有组织起来的左翼集团在革命中都选择与霍梅尼(Khomeini)结盟,所以革命结果几乎不能揭示宗教复兴可以克服生产方式的影响的趋势。当今伊朗发展的社会趋势也不能由什叶伊斯兰主义(Shi'ism)的内在逻辑来规定。霍梅尼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是在什叶伊斯兰主义中最重要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沙里亚特马达里(Shariatmadari)。类似的思考请参见尼奇·克蒂(Nikki Keddie):《革命根基》,纽黑文,1981,第7章和第9章。

② 参见希尔顿·德·圣克鲁瓦、米拉绍克斯(Meillasoux)、图恩瓦、弗里德的著作,在注释32以及其他地方引用了这些著作。

秘密所在。”<sup>①</sup>在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讲演和宣言中，国际事务比如爱尔兰独立斗争、俄国人致力于统治欧洲大陆以及普法战争，这些都决定了工人运动的较重大的策略选择。尽管如此，一个详细地对国际对立和种族主义的唯物主义讨论还没有展开，然而这些对立可能看上去是变革的一个独立来源，这使得最近的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发达工业社会持续的种族主义理论特别重要。<sup>②</sup>

因为用生产方式理论进行详细的解释性研究，这些研究只能通过同样详细的论据加以评价，所以我将仅仅提出一个我希望感兴趣的读者能在评价生产方式理论时认真考虑的一个结论：尽管这个理论有一百多年的学术恶名，但是用这个理论做出的解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被非常好地保留下来，而且这个理论取得的成果颇丰；这些成果意义重大，并足以近似于总体理论中的真理，它们与论敌理论相比是好赌注。最初反对马克思总体理论的论敌理论，已经成了离奇的博物馆的陈列品，这一点当然是振奋人心的，而且它不是特别有争议的。历史是智慧战胜迷信的记事，或者说历史是英雄人物通过意志的力量重造社会的记事，这些在今天都不是重要的奏效的假说。

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的特殊思想在所有意义重大的程度上，在所有赞同马克思的研究者对于每一个主要历史问题的所有相当成功地详细研究中，并不发挥作用。当然这些研究中有许多与技术决定论的特殊思想相一致，想要说明这一点是易如反掌的

<sup>①</sup> 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9 日致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91 页，马克思的粗体部分。

<sup>②</sup> 国际对抗的重要性使列宁和希尔菲丁(Hilferding)的帝国主义著作成为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理论。最近，在广义生产方式框架中的种族主义著作中，迈克·里奇(Michael Reich)和罗伯特·切利(Robert Cherry)的著作特别见闻广博且清楚明确。参见切利《种族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和里奇的《种族主义经济学》，它们都收集在《政治经济中的问题》第 2 版(David Gordon 编辑)，莱克星顿-马萨诸塞州，1977；迈克·里奇的《种族不平等》(普林斯顿，1981)。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在《马克思关于国际主义与战争》(载于《哲学与公众事物》，1978 年第 7 期)中论述了马克思十分强调国际关系。

事情。被研究的变化过程被看作是手段,那些捍卫过时的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通过这些手段而被摧毁;在其他地方一定存在着对经济结构为什么过时,以及变化过程为什么会发生的终极技术解释。或者,所讨论的变化过程是由经济结构产生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是经济结构的最终来源或者经济结构消失的最终来源。或者,所回答的问题涉及了时间选择问题、短期现象或完全外在于技术决定论的相对小的特征。技术决定论的特殊特征能够以这种方式避免受相反例证的攻击,相反例证有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同样还有恩格斯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研究和马克思所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显而易见是非技术性的。(如果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那么恩格斯不断地指出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历史方法的缩影,这多么令人好奇!)<sup>①</sup>然而这种回避最终不攻自破。技术决定论的特殊思想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编纂史的经典成果毫不关心,而被证明避免了用这些经典成果对它的批判,所以这些思想既没有被这些经典成果破坏,也没有得到它们的支持。因此,应用于一系列具体的解释成果中的具有决定性的证明消失了。然而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在这些研究中却得到了应用和检验,尽管这种应用和检验有时在较大程度上而有时在较小程度上。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能对权力、资源、统治阶级的机动性进行相关评价,也能对下述模式进行相关评价,即管理物质生产的权力关系如何可以保证矛盾最终能够打破这些权力关系的模式。因为变革的最终来源不是那些根本不关心政治的并且使这些来源更加清楚的古典研究,也不“仅仅”是政治的或者仅仅与上层建筑有关。

另外,我提到的许多特殊研究的确打破了技术决定论。这一点可以通过马克思本人对古罗马、古印度和古中国的研究加以说明。这里有一些更新的例子,它们来源于前述引用的著作中。马克思提

<sup>①</sup> 参见恩格斯1885年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583页;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698页;以及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出处同上,第691—692页。

出：罗马帝国维持自身是通过剥削关系模式，而这一模式最终毁灭了它；剩余产品通过当地精英们的合作意愿和间接的规则，从意大利帝国之外的地方榨取；具有合作意愿的物质需求，以及在边境上绝不屈服并且好战的人们的存在，这些都要求不断扩张；这些发展进程的基础是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习惯于向核心贵族劳动人口自身（进口不能单独完成这项工作），以及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提供物质和人员装备；当国境扩大时，意大利的劳动人口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鉴于共同意愿的达成过程和间接的规则，次要的核心贵族的力量与合并所有的力量相比不能被扩大；经济结构就这样在它所造成的帝国重负中崩溃了。德·圣克鲁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同样，在希尔顿的著作中，权力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结构变化。黑死病造成了劳工短缺和新的国内动乱，这引发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摧毁了封建制的古典形式，使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变革的现实前景。最后一个例子，请思考图瓦恩对可能会导致阶级分化的手段的勾勒。（萨林斯[Sahlins]的玻利尼西亚人研究对这一论点做出了最振奋人心的经验论证。）<sup>①</sup>有些家族通过地点和传统特权控制了在家族团体间进行的交换，对于这些家族团体而言交换最初是一项少量的、偶发的事业。当交换的优势（不是依靠新技术取得的）导致了更多的专业化和相互依赖时，这些家族获得了物质上的卓越地位，并最终实现了以控制那些从交换产品中榨取的剩余为基础的阶级统治。

如果马克思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那么这将多么令人遗憾。我在最后两段中间接提到的研究，即那些赞同马克思的研究者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反对技术决定论并赞同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的例证。实际上，这些研究与马克思在他本人的著作中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这一假说的关系更加密切。即使马克思本人接受技术决定论，那么这些随后的发展也将证明：修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sup>①</sup>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玻利尼西亚社会分层的形成》，西雅图，1958。

的定义在事后看来是正确的。

德·圣克鲁瓦、希尔顿以及图瓦恩的假说在某种术语的意义上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假说和类似的研究加之一些经典的著作,比如列宁的《帝国主义》(中文版译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它们都是某种历史理论的例证,而这个历史理论可能的确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对《宣言》的意义的争论似乎对于那些读者——在回答真正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时,这些读者对答案做出选择——是如此的贫瘠。

即使文本没有使生产方式理论成为马克思本人的意图,那么定义一个科学理论的正常程序将使广义的生产方式解释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描绘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研究的主体理论时,我们通常逆向修订,并引用修订后的对革新者思想的成功改编。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化的唯一机制。的确如此,甚至达尔文本人也相信自然选择是唯一的主要机制,而拉马克认为成年期的用进废退所导致的遗传发挥着真正的但却是辅助的作用。在牛顿力学中,重力在远处发挥作用。的确如此,甚至牛顿本人也认为引力的吸引力必须由某个内在原因造成,而这个原因在远处不发生作用。马克思写作历史时的思想在后来被更加成功地加以应用,而这些应用都符合生产方式模式。根据后来成功发展这一思想而形成的下定义的标准做法,上述这些例证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最后,假设我的提议是错的,而且被研究的具体例证不能确证生产方式理论,并且有人能够证明内部基本变革不能以这种方式加以解释,那么即使这样,我已经举出的例证仍能支持某个肯定的判断,即马克思发现了在制造大规模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果机制。的确,政治历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哈林顿(Harrington)到基佐(Guizot),他们都认识到马克思所谓的阶级斗争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一个人在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才会遇到的情况是:系



统地、经验地合理解释阶级系列本身可能会如何变革的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生产方式理论能对一种控制现象界的因果机制进行有用的说明,这种说明与通过最重大发现所做的说明不相上下。当然,技术决定论也描述了变革机制、对生产的有利条件的研究,以及在坚固的社会结构中阻止它们进一步发展时遭遇到的失败。然而,这不是任何发现,而是启蒙运动对社会进步的普通看法。

## 外部,再次

我已经解释了基本内部变革如何在其发生时发生,并且在这一解释中描述了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的例子。然而马克思在承认非内部变革存在的同时,他又提出至少在封建制的情况下生产方式理论是对整个历史的基本变革的根本解释。出于讨论的缘故,而暂且允许基本的内部变革符合这个理论,但是为什么要假设控制内部变革的因素具有这种普遍的优先权?

269 辨别那些可能会使这些内部因素居于首要地位的大量主张是重要的,就一个稳定的阶级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而言,前述关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的论点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暗示了内部因素,即经济结构,在大多数例证中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布洛赫对封建制的说明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存在许多与其相反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个社会主要的持续性特征由重复的、剧烈的外部冲击来决定,而这些外部冲击来自于并没有融合成一个较大的生产方式的诸多社会。但是,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些例子是很不典型的,比如一些社会常常会因为遭受到由社会控制之外的力量所导致的重复的、剧烈的外部冲击而屈服。

其次,在与阶级分化的社会中发生的基本变革有关的地方,让内部解释具有某种统计上的首要地位是合理的,这里的“内部”是我常将其与马克思联系起来的广义的“内部”。基本变革通常都有一种内部解释,因为非内部的变革需要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同的社会相互作用,它们都对社会演化的结构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但它们并不以稳定和系统的方式相互作用——这种方式可能把它们合并到一个唯一的生产方式中。对于阶级社会的大部分历史而言,社会既比这个历史中的社会更加孤立,也比这个历史中的社会更加融合,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在于帝国实现了社会融合,并且帝国社会的内部动力导致了基本变革。对于像气候变化和疫病流行这样的非社会进程,阶级分化的社会似乎常常用自身具有的完整的基本结构来抵挡这些灾祸。

马克思肯定会认为内部在这前两种方式为首要的。然而,马克思尤其拒绝使用那些强调将征服作为最终解释性因素的方法,他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甚至当变革不是内部的时候,就像封建制的起因那样,变革也应该对相互影响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特征高度敏感。事实上这可能是对的,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来假定确实是这样。

请考虑下述情况:通过布洛赫对封建制兴起的说明而概括出的解释策略,使基本变革受相互作用的现象控制,而这些现象对相互作用的社会的内部结构相对迟钝。无论是对是错,布洛赫的独特解释不存在任何固有的难以置信的情况,而且它同马克思的解释一样不妄加推测。此外,暂且不论人们对封建制的争论,内部变革的生产方式理论原理无法运用到下述情况,即变革甚至不是在广义的内部发生。主要榨取剩余的阶级可能强大到足以阻止从属阶级对自身力量的有效动员,这使得榨取剩余的阶级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抵抗外部集团的侵犯。当然,对内部而言,总是存在着这种大量的优先权。在两个社会间的相互影响中较重要的一方具有的内部结构能够解释相互影响的性质和结构,但却不是反之亦然。如果我们曾经找到一本能够有效地并且彻底解释封建制兴起的书,那么它的第一章就应该包括对罗马帝国社会和重要的人侵团体社会的说明,但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的是,这些章节在整个这本书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更确切地称之为不假思索的猜想。马克思对于非内部变革的讨论是寥寥无几的、模糊不清的,并且是毫无号召力的自相矛盾。在前两种方式中内部所具有的首要性是马克思的主要关注点。

270



### 实证主义的阻碍

如果技术决定论远非马克思及其有洞见的追随者的理论与实践所能及,那么它为什么会是占优势地位的解释?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每个人都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这让他们很难接受。通过政治革命创立社会主义是重大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在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联合马克思主义者实现生产力现代化从而减少对重权在握者、技术上倒退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进出口企业家的依赖,这对民族主义商业人士、技术人员和官僚主义者有着巨大吸引力。而且,这种联合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捍卫技术决定论的基础。在这里,压力绝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人们并非不想避免物质上的苦难,这些苦难使在安哥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起义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化的企业家、支持民族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技术统治论者联合了起来。相反,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不过是铤而走险,甚至对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言也是如此。既然技术决定论对于说明这种不必要的冒险游刃有余,那么它在马克思的同情者中仍将留有一部分思想氛围。

技术决定论还有其他的证明方式。它描述了一种社会形势理论,在这种社会形势下,激进的社会变革总是发生而且在未来也必然发生。如果一个人像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那样相信社会主义将立刻提高物质生产的可能性,那么技术决定论的普遍理论就会指出资本主义将要灭亡,社会主义将要取而代之。这一附加说明使得对马克思的这种基本解释得以流行,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特点为此提供了帮助,当然,这一社会形势理论的基础以及马克思文本中是否存在这样的人,这些并没有予以考虑。

荒谬的是,技术决定论处于优势地位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绝对抽象性和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的解释概念和证实概念使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具有了科学假说的身份,但同时它也剥夺了生产方式理论的这种身份。

至关重要的方法论限制是极其普遍的并且也形成了广泛共识。在亨普尔和其他 20 世纪科学哲学家的著作中,对这些限制进行了最具体和最细致的说明,但是这些限制也见于休谟和穆勒对因果关系和实验结果的分析中,见于马赫(Mach)、基尔霍夫(Kirchoff)、彭加勒(Poincaré)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其他哲学科学家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中。

根据这种科学观,基本的方法论概念——比如解释、证实、简单性以及从一个对象领域归纳到另一个对象领域——都是逻辑形式关系。对每个概念的正确分析只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关,而且这个分析对任何时代的任何知识领域都有效。这个分析是一个合理的推理,它无需依靠任何带有更多的经验主义争议的信念。我将谈到作为“实证主义”的这一系列思想,因为它们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最有影响和最经久不衰

的遗产。<sup>①</sup>

273

本章以及本书的剩余部分将致力于解决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社会理论间的冲突。我将对这个冲突进行详细的事例研究,所以我的明确主题是实证主义和生产方式理论,而且我将它们归属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但是越来越使人清楚的是,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都存在冲突,而且实际上如果实证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说明之间的冲突采用了我将要描述的形式,那么它与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时所采用的方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实质性冲突。

比如,如果实证主义的限制是强加的,那么无法预言性地引入经验准则就将会剥夺生产方式理论的解释权。在这个历史理论中不存在预言性的历史规律,因为无法在总体上描述变革力量何时强大到足以克服稳定的力量。国家理论以同样的方式受到限制。因为无法在总体上描述资产阶级对高压统治的兴趣何时能战胜他们对默认的兴趣,所以国家理论不能成为指导政治行动的经验准则的一个来源。同样,马克思认为社会中的重要观念的发展是由歪曲真实的社会进程、制造真实的社会进程(比如无产阶级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与合理发现之间进行权衡造成的,而不存在任何可以确定力量均衡的普遍公式。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竞争的趋势有时会导致不稳定或停滞不前,这些趋势常与另外一些趋势达成平衡,这些另外的趋势也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它们也没有规律能使经济学家在总体上预测商业循环或长期停滞现象何时会产生。

实证主义对生产方式理论的另一个主要担心是,生产方式理论在迎合相反事实时过于灵活易变:如果承认生产方式理论是一种科

---

<sup>①</sup> 对逻辑形式的强调在原则上独立于对普遍性和先天性的强调。最近,一些科学哲学家利用这种独立性,以可能性理论为基础发展了对证实的普遍而先验的说明,而没有只考虑逻辑形式。我在此将忽略这些偏离,因为复杂性是巨大的。那些受到所谓的“贝叶斯”科学说明吸引的人可能想将这些说明与我将要描述的反实证主义选择同化。在《事实与方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即将到来的)中的解释与证实》中,我论证了贝叶斯(Bayesian)的方法基本上是由于与较早的实证主义科学说明相同的原因而失败。

学假说,那么最明显的荒唐事就是它总能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为自己做出辩护。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其他部分也具有这种方式的灵活性。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能够并且已经解决了经验难题,他们通过重新说明统治阶级的社会构成,将统治阶级看作是一个阶级联盟,或者是由一组集团组成的一个阶级,而不是单个的统一阶级,来解决经验难题。在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第二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成了较早时期的遗物,而在第三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则成了根据现成的经验模式提出的错误理论。在解释危机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能够并且已经将对国内压力的求助转向对外部因素的求助,并且又再次转回国内。

的确,有一种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技术决定论,将被证明符合实证主义模式。但我们也看到,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作为一种可检验的解释性假说的方法使它成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

在那些马克思的同情者中,对其社会理论是否与实证主义相冲突的问题也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认为有冲突的那些人从中得出了各种暗示,要么认为马克思遵循了与自然科学逻辑截然相反的社会逻辑(或者历史的或者人类的);要么认为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位科学家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实际上,我将论证所有关于马克思和实证主义的权威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些观点又都犯了严重错误。马克思和实证主义有冲突,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遵循一条与自然科学研究者不同的逻辑,反倒是实证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逻辑。在自然科学中解释形式和证明形式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并足以使人们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策略相类似的自然科学策略。这个策略是否能在现有的事例中发挥作用是一个经验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立法问题。

实证主义两个最重要的事业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一套命题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们何时能够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确定的一组数据何时能证实假说?”根据所谓的“覆盖率模式”来分析解释,并通过应用经验的普遍规律进行推论。解释提供了正确的陈述,这些陈述包括这些规律——可以用这些规律推演出其他陈述并

可以断言某些普遍的性质实现于某个时期或某个地点,或者在某个人或某个物上。也许演绎发生的高度可能性也应当被接受。也许仅仅给一个演绎的梗概就够了,只要知道完整的、正确的演绎确实存在,解释者也指出了如何去发现它。如果一个所谓的解释更进一步地背离了覆盖率模式,那么这个解释就是假解释,就不值得进行经验研究。<sup>①</sup>

就像解释是一种连接正确的前提和有待解释的现象的逻辑关系那样,证实与非证实被看作是连接假说与数据的逻辑关系。如果假说与数据有适当的衍推关系,那么假说就是可证实的。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衍推的内容在逻辑上与数据不符,那么这个假说就不能得到证实。但是衍推模式不能随便用于证实。比如,如果根据观察到的先前情况对观察到的真实结果进行随意的衍推来求得证实,那么鸟类观察者将不断地证实“月球是由松软干奶酪构成的并且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假说。然而,无论适当的逻辑模型是什么,它们都控制着每一个科学中的检验,而不管这个科学的主题是什么。在亨普尔的清清楚楚而权威的著作中,这个形式主义设想是相当明确的,但是它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论证支持:

事实上,要求经验证实的标准除了在特征上是客观的之外,还应该不去参考假说中的具体主题或者所讨论的证据中的主题,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一个人想以类似于用演绎逻辑来为推理结果的有效性提供纯粹形式上的标准的方式,建立纯粹形式上的证实标准,这个想法应该是可能的。<sup>②</sup>

根据这个科学概念,技术决定论就是潜在的部分科学,但是生产方式理论则不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赞同的历史理论应依据它

---

<sup>①</sup> 我已经省略了一些在上下文中必不可少的细节和精妙之处,但我希望在当前的上下文中没有省略它们。C. G. 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1940)(在他的《科学解释方面》中再版,纽约,1965)是说明这种解释模式的经典短篇。

<sup>②</sup> 《对证实逻辑的研究》(1945),同上,第10页。

解释历史变化的能力而被选择。原则上,根据实证主义模型,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可以做到这一点,它的假说能作为适当的覆盖律进行推理。比如,技术决定论根据一个关于生产关系在一个特殊时期阻碍生产力的陈述,就可以衍推出:一种基本类型的结构向另一种不同的但却最有利于生产的基本类型结构的转变将会随之发生。但是生产方式理论不具备这个功能,它只是主张去描述基本内部变革发生的机制和情况,它甚至不能勾勒出下述普遍状况——在这些普遍状况中,变革机制与稳定机制相比是非常强大的,并足以保证变革发生。所以,生产方式理论不会为根据先决条件对某个时期的变革进行覆盖律演绎提供前提。

生产方式理论可能看上去至少为一个不同形式的覆盖律推论提供素材。如果所有的内部基本变革都由生产方式矛盾引起,那么倘若一个内部的基本变革发生了,就能推论出生产方式矛盾先行于变革。通常,生产方式理论需要这样的模型。

问题是,它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某个属性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内被发现,这是实证主义解释的基本任务。在缺少一些难以置信的逆向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基本内部变化的发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先的生产方式会发生矛盾。但是即使上述事件解释的这种侧重点能够与实证主义方法分离,演绎的一致性也是失败的。生产方式的某个矛盾先于基本内部变化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每个历史理论都期望的。生产方式理论的特有原则是生产方式矛盾解释了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普遍的观点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个实证主义者来说,它意味着根据经验准则,在生产方式的某些普遍特征出现之后就会发生基本的内部变化。当我们试图定义这条准则时,我们的陈述却是重复的,就像我们在第六章开篇所见的那样。我们将这些陈述塞进覆盖律的形式中,而不是将它们放入对因果机制的描述中,那么这些陈述能够“告诉”我们,当生产方式的矛盾足够严重时,它们就会导致基本类型的变化。

就像生产方式理论不能满足实证主义的解释标准那样,依据实证主义叙述的证实标准来看,生产方式理论是非科学的。在后一个



标准中,技术决定论服从于检验,就像一个科学假说应该服从的那样,但生产方式理论则不然。原则上,我们能够发现经济结构开始阻碍生产的事例,并会提出疑问,基本经济变化是否会随后发生,如果技术决定论的回答是明确的“是”或“否”,那么我们会认为技术决定论不是被明确地支持就是被明确地反对。另一方面,甚至在允许模糊性的情况下,生产方式理论也没有正确的逻辑结构能够通过普遍认同的各种派生结论去检验蕴涵。

问题是生产方式理论已经嵌入其恰当的结构设计之中,理论家能够依靠这个结构设计通过解释来消除相反的数据,这些辩护战术采取的逻辑形式与那些最荒谬的理论派系所使用的逻辑形式一样。而且在实证主义方案中,对逻辑关系的非常普遍的描述一定能具体说明那些无法证实的假说。所以对于实证主义来说,如果生产方式理论被允许,那么所有事情都能被允许。

生产方式理论通过三种主要方式为那种在使理论与数据达成一致之后再进行调整的策略留有特殊余地。

1. 变革与稳定的平衡。当一个论敌举出下述事例时——一个生产方式产生了要推翻现状的愿望和力量,但变革却没有发生——生产方式理论家能论证变革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抗统治阶级统治的稳定力量。对于那些没有实证主义偏见的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有许多事例能使这种观点显得非常合理。但是在逻辑形式上,变革与稳定的平衡策略似乎与那些为极端谬误提供辩护的策略毫无区别。(“普鲁士赢得了普法战争,因为这适合德国的国家命运。”——“那么,当法国和英国已经统一的时候,德国为什么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小州组成的一个集体——国家命运不能变得足够强盛?)

2. 经济结构的内容。经济结构包括哪些内容,并且由此而来,生产方式在总体意义上和优先意义上都不是被决定的。在特定的形势下,被视作在生产方式之外并由生产方式加以解释的现象,能够被纳入生产方式的定义之中,这是确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控制手段或者控制结果。因此,尽管维特福格尔(Wittfogel)的水力

假说无法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说明,但是对此感到失望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能按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方式将这些政治制度纳入古代中国生产方式的定义中。此外,哪些理论修正是科学常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孤注一掷的策略,在这些问题上那些对科学哲学没有既定兴趣的研究者们常常达成共识。但是,在重新定义所有概念时这些选项的逻辑形式与对最过时的理论进行荒谬辩护的逻辑形式相同。(“鸡由蛋生,因为后者包含了鸡的生机。”——“对孕期的粗暴干预所导致的进化变化、物种突变、类似怪物的东西的出世是什么样的?”——“在这些特殊的例子中,生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综合体。”)

3. 基本经济变化。对生产方式理论的一个重要反驳在于:在至关重要的时期发生的经济变化过于微小以至于无法说明整个社会的基本变革应该发生。比如,与马克思确信古雅典社会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对照,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伯里克利时代和前古雅典时期奴隶只占雅典人口的少数部分。历史学家批判了马克思对于作为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在英国取得胜利的最晚时间的说明,他们指出直到1600年人们还在广泛使用依靠工资维持生计的手工劳动。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提出的最好回应是: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变革是一种特殊的变革,即一个新的经济集团出现了并开始统治经济剩余。但是什么能使一个集团统治经济剩余?姑且不论为不可比较的商品找到一个共同的测量标准这个问题,单纯从量上提出“控制大多数剩余”这个答案是不能回答该问题的。古雅典的大多数奴隶劳动和英国都铎王朝的工资劳动都由相当小规模农民和手工业者来控制,但这些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利益都不能形成统治制度。实际上,那些接纳马克思思想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把控制对剩余的榨取看作是多种维度的统一作用,同时他们强调这些维度在既定情况下能产生最为巨大的社会总力量。由一个阶级控制的相当多的资源、由典型成员控制的资源集中、由支配他人劳动成果而带来的闲暇、控制中的普遍的或战略的地理位置、对协调这种控制的多种选择,以及对所讨论的生产资源的控制权的轻松捍卫——所有这些因素在按照马

马克思的思考方式去评价某个阶级是否已经成为主要的剩余榨取者时都是重要的。M. I. 芬利(M. I. Finley)在《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吗?》中利用了这个多维性质去论证奴隶制是希腊社会的一个基本因素。控制着大量奴隶的大规模地主阶级的兴起,要比任何简单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比率变化重要得多。因为地主阶级的闲暇、协调、资源集中给予这些大地主以社会权力,这是小型农户望尘莫及的,同时前者控制的各种资源,这些资源与作为大商人进出口贸易财富基础的特许权相比,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sup>①</sup> 同样,对马克思而言,当王室法院中拥有大量地产的富豪们以及最终依靠他们的商人和行会成员们仍控制着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时候,资本主义自耕农的兴起仍然不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当然,没有任何普遍的预先的公式可以对经济统治的不同方面划分等级。如果只有协调是重要的,那么佛罗伦萨将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英国。当马克思主义者为基本的社会变革来源于基本的经济变革这个观点做辩护时,他们依靠的是灵活的经济变革概念,但是他们不能把这个概念缩减成一条用来规定特殊用法的规则。此外,一位哲学上天真的观察者通常并不苦恼。比如芬利能求助于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即美国南部在内战前控制着对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这产生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政治和文化;然而芬利同时又提醒我们,奴隶人口还不到奴隶国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一位实证主义者不得不对此感到苦恼,因为这种改变对经济统治的说明的做法类似于一种逻辑形式策略——依靠这个策略来对明显过时的理论加以辩护。(“如果一个重要特征历经数代而获得,那么它就会被遗传。因此,原始长颈鹿以伸长脖子的方式形成了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牛头犬出生时没有短耳朵?”——“脖子具有进化的意义,但耳朵没有。”)

<sup>①</sup> M. I. 芬利(M. I. Finley):《希腊文明是以奴隶劳动为基础吗?》参见第100页、第102页、第111页。当芬利的理论与马克思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并且这种关系发生变化时,他的理论结构既远离技术决定论又与广义的生产方式理论非常接近,同时他由我提出的灵活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学的方法说明了经济结构。

始终贯穿于本书的是,我一直在根据统治阶级的性质分析经济结构的基本类型,分析统治阶级,即那个“主要控制”着剩余价值的群体,那个“统治”榨取行为的群体。到现在,隐藏在那些术语背后的复杂性已经不重要了。无论基本类型中的经济变化在哪里发生,马克思的理论都将依据生产方式加以解释。一旦新的经济结构稳定下来,对剩余价值进行统治的不同方面将趋向于倾向同一个集团,因为统治阶级会通过消灭或者联合它的敌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sup>①</sup> 还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制要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个观点对马克思理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对这个观点的争论中,社会过渡时期的经济统治问题是复杂的,这个时期常成为争论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随之而来的灵活性似乎成了对实证主义者的讽刺。

由生产方式理论提出的检验问题,不仅仅是它的支持者在面对相反的证据时要能通过解释来消除这些证据。这在科学中总是发生,实证主义者了解这一点。总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被使用的仪器有缺陷、所测的样本有偏倚,或者观察报告有误导,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否定性发现将会遭到质疑。只要辩护者提出一个进一步的假说——这个假说独立于第一假说,又能反对所有有效数据——就会使这个否定性发现看上去相当幼稚。只要受到这种附加假说需要——它用蕴涵关系来反对总体数据——的拖延,测试就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实证主义的观点似乎看到了希望,<sup>②</sup>同时辩护策略也太过于常识化,又因为不合逻辑被排除在外了。

现在的麻烦是,他们并没有提供一个附加的假说用于测试来反

① 最终的结果将是:由占有生产力、土地、原材料和人而带来的大多数剩余将掌控在一个阶级手中。但是这不能使证实一个阶级是否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成为一个日常统计学问题。因为针对什么构成了“统治”这个问题的某种判断至少是必要的。因此,小股东在美国不属于统治阶级,即使他们拥有大多数股票。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巨额股份的极少的少数股东才能影响公司政策。

② 最后,它因为我将要描述的一些原因而失败了。蕴涵关系不足以描述那些对任何相当深刻的理论进行的检验。

对所有的数据。相反,基于生产方式理论的最初假说会根据实际情况被予以更新,以便它能更好地吻合已经公布的数据。有人指出在现有的特殊例子中,一个普遍假说所暗示的含义是通过剪裁来符合事实的。这种可能性成了那些用来形成假说本身的概念的组成部分,假说能诉诸足够重要的因素并剪裁经济结构的政治诸方面来适应解释模式的需要,而且自由地诉诸在分析统治阶级时经济统治的不同维度。如果这种修正和提炼总是被允许,那么最荒谬的假说也不可能被证伪。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在证实问题上什么是允许的以及什么是不允许的,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要通过对假说与数据之间的蕴涵关系的总体考虑来划定。似乎没有这样的规则可以将对生产方式理论的辩护与对混沌理论的辩护分隔开来。

在检验技术决定论时也存在一个问题。技术决定论的变化原则往往依赖于两个密切相关的模糊边界,即严重的束缚和随之而来的结构变化的开始。由于这两个边界的存在,技术决定论只能在精确的范围内被检验,在这一范围内,检验是可能的。一百年也许相对快了点,也许不尽然,但五百年并不算快。无论如何,这些模糊的区域——生产方式理论也存在这些区域——并不多见。有人也许会合理地利用技术决定论来描述更加精确的普遍规律,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深化这些规律。但是,对生产方式理论而言,理解越深入,它就越不像假说。

当然,马克思没有必要去面对那些自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人。但是同样的基本思想已经被休谟提出,被米尔斯以“父与子”的一种粗糙但有影响的方式提出,被自我描述为“实证主义者”的孔德在其具有物理学崇拜色彩的科学哲学中提出。在下面的一段引文中,马克思强调了的历史理论的两个特征,即如果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说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个特征将会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具科学性而被剔除:无法为预言性地引入普遍经验准则提供基础,以及在其历史理论的范畴体系来分析特定社会进程时需要真正的创造力。不过说马克思宣称自己在该段引文中反对实证主义,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时代错误。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有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①</sup>

### 实证主义的一个选择:解释

存在另外一种科学构思,它使生产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的假说,并值得进行经验研究。我对这个选择的描述将是粗略的,而且我的宣扬也有点武断。<sup>②</sup>但是我认为我能够说明,这种解释和证实的方法远比实证主义更接近于最好的研究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的方法论常识。如果是这样的话,生产方式理论对于许多人而

① 马克思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② 我在《事实与方法》中详细地展开了这种选择。

言都具有广泛的意义,这些人的兴趣严格说来不是历史而是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或者说他们的兴趣是解释与证实的一般性质。因为生产方式理论是一个由研究者历经数代才发展起来的解释框架,所以他们不得不抵制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限制的强有力的影响。

在实证主义中,基本的方法论关系是逻辑形式关系,它们对于所有时代所有领域都一样,不用依靠存在经验争议的原则就能证实。在这个方法中,任何明确的标准都足以告诉我们一个方法论关系(如果关系确实,那么数据证实假说,或者假说解释现象)对于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时代是否明确,适当的论点是否存在经验上的争议。由此,一套数据面对一个假说或者一个假说面对一个要被解释的现象的这种两人剧被多人物的复杂剧所取代,在后者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原则框架、敌对的假说以及可供选择的原因。

根据另外一个观点,解释是对内在充足原因的充分描述,这些充足原因使讨论中的现象在实际环境中发生。当然,许多实证主义者也说他们从事因果关系解释和制定充分的解释原则。两者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方法上,通过这些方法,“理由”和“充分描述”被加以分析,同时赋予了因果关系深度以不同的作用——我用短语“内在原因”来表示因果关系深度。

原因。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主张即一个事件发生然后另一个事件发生之外,还有一个陈述即一个事件引起另一个事件,这个陈述被用来表达一个普遍的预期,即前面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后面发生的事件跟随,所以致力于解释什么使事情发生的人一定最终致力于揭示覆盖律。这种关于“原因”的普遍定义被以各种方式详述、提炼和修正。近来,许多人试图用另外一些定义来代替它们,比如普遍性和优先性的定义,这些另外的定义依靠与事实相反的条件(“如果那个没有在这个之前发生,那么这个就不会发生”)或者条件的可能性。所有这些努力都遇到了基本的且持久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加以解决,就像今天的哲学问题一样只是接近于一

致意见。<sup>①</sup>

为什么要假定存在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非循环的且有效推理的“原因”概念？对因果关系事实来说，似乎更加正确的是让范畴覆盖各种过程，这个范畴对因果关系状况的覆盖权并不依靠符合这个定义来决定。原因集合的核心是各种使事物发生的过程——这些过程严格说来是通过最初的常识被人们认识——与推动引起物体位移不同，与引导某个人追求目标的愿望不同，与殴打引起疼痛或者疼痛使某人大哭不同。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原因系统都被修正。也许，旧的原因系统无法解释必有原因的现象，因此新的因素被补充进来。因为当旧的原因系统不能提供原因来解释人们一致同意其必有原因的事物时，即解释天体运动和自由落体的规律性时，引力吸引作为原因被补充进来。

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原因概念如果在科学上有名望，那么它一定是可以被分析的——以一种教科书定义某个生物物种的成员资格的方式，并通过对物种成员资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进行非循环的、令人大开眼界的普遍描述被分析。休谟的分析是填充这个处方的办法。在非实证主义的选择中，原因概念的较好模式是数字概念。没有人认为每个已知类型的数字——比如，有限的和无限的基数，有理数、实数、正数和负数，无穷小以及虚数——是具有适合普遍定义的优点的数字，更确切地说，概念的核心部分是最初常识的（非常不同的）数字，用于计数或测量的数字，因为新种类而被扩大

<sup>①</sup> 我将在随后描述出大多数覆盖律模式的反例，这也对休谟的分析不利。在现代关于休谟分析和覆盖律模式的争论中，迈克尔·斯科里文(Michael Scriven)的著作尤其具有影响。参见比如《历史中的原因，联系与条件》，载于《哲学分析和历史》(William Dray 编辑)，纽约，1966。对于反事实分析来说，一些最重要的反对问题来自于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提出的案例——他在首次提出这种说明的论文末尾处直率地讨论了这些案例。参见《因果关系》，载于《哲学杂志》，1973年第70期。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的《因果规律和有效策略》，载于《理性》，1979，第13页，这是一篇权威且有影响的讨论，它反对用充分分析因果关系概念来支持可能性概念的所有努力。关于所有三种方法的一系列问题，参见巴士·万·弗莱森(Bas Van Fraassen)的《科学图像》，牛津，1980，第5章。



的系统被认为有必要完成那些适合数字的任务。通过反思概念来解决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数字的问题,就是要在只有科学才能完成任务的地方用哲学反思代替科学。我认为同样的情况被说成是实证主义能被看作是原因的法则。

因果关系的方法已经更容易使人们将生产方式理论看作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的假说。即使生产方式理论不能产生覆盖律,如果它所联系的现象通过人们接受的因果联系系统中的项目被连接,那么它也可能作为真正解释的一个来源发挥作用。事实上,一方面是在生产方式中的定位,另一方面是资源和优先权,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每个人都视其为因果关系有时有效的连接。特别是,客观利益能够影响某个人的评价和信念,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就如我在第四章讲的进行防卫的原子核工程师的乏味故事。当马克思将写作历史的标准方法与“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关于自我描述与行动的真正原因之间的差距进行对比的时候,他强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方法的这一乏味方面。<sup>①</sup> 马克思在此对店主这一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马克思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论证了常见的各种原因(偏离了真正原因的客观利益)作为最重要的历史变革的基础,发挥着惊人的核心作用。同样的创新与乏味的混合发生在许多其他领域。比如,凯恩斯像每个经济创新者一样,求助于某种广泛共识的经济动机——在他的例子中,在艰难时期对流动资产的偏好和当销售前景令人沮丧时不愿投资去扩大生产能力——并说明这些动机以经济发展过程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在自然科学中,达尔文坚持不懈地依靠乏味的事实,即相同父母的后代存在差异一定有某种原因,这个原因在出生前就起作用了。

充分描述。即使用更加自由的因果关系观念,如果要求对原因的描述应该充分且这个要求被适当地理解,那么努力进行的解释只被允许作为科学理解。正如亨普尔坚持认为:对一个事件的原因的

<sup>①</sup>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页。

描述可能相当不足以去进行解释,否则某个人赢得了爱尔兰赌金,赢得的全部赌金将被解释为她购买了入场券。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存在一个这样充分的规则,在所有领域所有时代都有效并能有效推理:符合覆盖律模式。当然,对解释的尝试可能不充分但足以达到现有的目的,就像不纯的水有时对现有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纯了。但是科学家的确区分了两种解释,即充分简单的解释和在既定联系中的解释(“为什么在那个石盘中有葡萄状球菌菌落?”——“它莫名其妙地脏了。”)前一个充分概念不是由哲学家的发明而是由科学家的实践来暗示的,这个概念是一个用覆盖律加以说明的概念。

当我们看到充分的科学解释时,现实却大相径庭。强加在解释上的因果关系适当性模式广泛地改变着,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特别是,在实证主义最严格的地方存在着巨大的易变性,体现在实证主义的停滞规则描述了一个充分的解释在阐述原因时停滞的地方,而不再进一步详述能够使理由充分的现有环境的普遍特点。在现代疾病论中,比如对病症爆发原因的阐述足可以解释病症爆发,如果这个阐述描述了感染动因,即发病人群中的病症的正常原因。因此,当你的医生接受了咽喉知识培训,他或她或许有充分的因果关系洞察力去解释为什么你的咽喉痛。所有的证据排除了所有可能的原因而只留下葡萄状球菌感染。但是,尽管根据葡萄状球菌感染能够解释你的咽喉痛,他也无法总结出这一情势发生的一般条件。通常,咽喉中的葡萄状球菌并不产生病症。现在,也许是永远,免疫学都不能成熟地提出具有下述形式的经验普遍规律:在条件C下,当咽喉中发生了I类型的感染,那么咽喉痛就总是发生。

相对认可的现代疾病理论中的停滞规则,以多种方式松动了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人们对病症的充分解释的限制。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中,病症源于某些身体液体即体液的不平衡。理论家们相信他们能描述那些导致病理症状一定会产生的普遍环境,而且他们要求这种充分解释的确定性。有时在另一方面,进步还包括停滞原

则的不断严格化。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由事物的内在固有趋势所控制的运动受到“反对自然过程”的干涉活动的支配,就如同当一个孩子去击打一个泥块的一面时它落向地面。这个物理学除了能解释自然过程和证实打击之外,它不能解释所导致的运动轨迹。对17世纪的新物理学而言,这种尝试性的解释是没有解释。真正的解释是,对运动轨迹的原因的描述应当刚好使这个结果不可避免。<sup>①</sup>

恰当性标准要求的是要超越表面化,即被描述的原因应当真正存在,而且应当成为正在讨论的现象的原因,除此之外恰当性标准还应当要求什么?似乎不存在能使特殊现象成为例证的超级标准。确切地说,一个既定领域、既定时期的恰当标准是最有利于人们在那个领域、那个时期做出解释的标准。因此,在疾病理论中,如果在存在感染动因的情况下,研究者们没有被要求去鉴别产生病症的感染动因,那么科学将被延迟发展。如果研究者们被要求一直从事解释工作,直到他们能描述出使受感染的组织必定发展为病症的条件,那么科学也是被延迟发展的。为了消除这些策略上的考虑,比如仅仅注重实效的描述、反对真正的“逻辑的”适当性就是要创造一个恰当标准,这个标准是哲学方案的人工作品,是一个对那些从事正常意义上的解释工作的人来说不感兴趣的标准。如果不注重实效的恰当性概念前后毫无关联,那么就不存在这种概念了。

恰当性的方法对评价马克思历史理论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马克思常常因为机械论的傲慢——他所发现的类似物理学的规律使历史过程在原则上成为可预言的过程——而被批判。事实上,如果适合历史的停滞规则要求这一点,那么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将是不充分的。如果生产方式理论是充分的,那么这是因为支配从伽利略到量子理论的机械学的恰当性标准不适合历史研究。

<sup>①</sup> 因为物理学家的充分解释的标准发生了这种或那种更多的变化,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受到作为反科学发现的哲学分析的促动。参见托马斯·库恩的《必要的张力》中的“物理学发展的概念原因”,芝加哥,1977(中文版:范岱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0页)。

因果关系深度。马克思不认为对人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原因的描述足以解释他所关心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确如此。这有意地暗示了诸如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这样的机械论短语。但是,与其去思考我所谓的“机械论的傲慢”,不如去关注非个人主义解释,这种关注是某种要求的结果,即要求解释原因一定是根本的、持存的非实证主义的解释理论的要素。

如果一个原因没有被另一个更深的原因挫败,那么这个原因是根本的,以便“没有被压倒”将成为完全正确的但却令人厌恶的短语。现象Z的原因X被一个更深的原因Y挫败,且刚好发生在原因X仅仅是使Y导致Z的众多方法中的一个方法的情况下。更具体地说,这个挫败适合两个模式中的一个。首先,Z无论怎样都是因为Y才发生,因此,用一个相对无争议的例子开始我们的讨论,比如一个警察被报道说在某一天殴打黑人出租车司机。这并不能解释1960年的底特律犹太人区叛乱,即使这是发生叛乱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的确如此,如果潜在的紧张局势和受挫使某个小事件引发叛乱不可避免。同样,如果马克思对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说明是对的,那么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的错误和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策略上的才华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资产阶级的利益中会存在一个胜利的革命,即使这些利益是胜利的原因。如果查尔斯·斯图亚特更老谋深算,那么这场革命将仍会因为同样的社会力量而发生。

在挫败的第二个模式中,Y是X和Z的一个原因,Y就像X一样直接与Z联系,这剥夺了X的解释权,却有利于解释许多其他荒谬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因果关系描述的领域中意见大多一致的时候,他们将自身理论看作是提供了论敌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对纳粹集权的描述中,中产阶级的观念从传统的保守派向纳粹的大规模转变是一个重要原因。没有一个相信这种转变的人会宣称,就算没有这种支持,纳粹无论如何也都会取得权力。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转变依次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对

媒体及政治程序的控制。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当将“中产阶级反叛传统”作为一个原因时,集权就不能通过这个原因被解释。同样道理,当恩格斯和韦伯正确地将自己的理论视为提出了关于这个胜利的论敌解释时,他们都同意改革是资本主义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恩格斯的解释并没有刚好补充韦伯的解释。

注意,对因果关系肤浅性的批评不只是对不完全性的一种指责:“假定原因相同,结果在其他的境况中不会发生。”一旦覆盖律模式被抛弃,许多充分的解释就会具有这种不完全性的特征,没有适合于历史的恰当性标准能排除这种不完全性。确切地说,对因果关系深度的要求说明了覆盖律模式。设想,比如假设规律覆盖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与态度,关于引发底特律犹太区叛乱的事件和传言已经被描述得很充分,并足以使一个人预测这场叛乱的发生;或者设想英国内战的每一方的能力都通过下述细节被描述,即普遍的策略原则支配了清教徒的胜利。尽管如此,如果因果关系因素被更深度的因果关系挫败,那么蕴涵的现象可能就不能被解释。

把对马克思的争论归结为一方观点,那么就会存在毫无争议的解释,这个解释符合我刚刚描述过的优越于覆盖律模式的解释。从对相似原因进行筛选而进行诊断的大量例子中,我举出了一个例子,即医生对咽喉疼的解释。心理学解释在普遍原则的层面上也通常展示出话语的重复。一个历史学家可能能够将罗伯特·李在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解释为是因为他对谢尔曼大军进军至海边及里士满的失败而感到绝望。为了使问题简单,假定李将军妻子的信心肯定来自于她丈夫的信中有诸如此类的话。尽管如此,史学家不能假定军队领袖因为他们总是或者几乎总是投降的原因而对前景感到绝望。这对许多军队领袖来说不是真实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更加坚定的军队领袖只是一少部分人。甚至没有人能描述在适合李的情况下投降的普遍经验准则,未来心理学可能会有这样一条准则。但是历史学家的解释的恰当性不能依靠这条准则的存在——这条准则不及她对解释的描述能力。

理论同对特殊事件的解释一样,看上去更加符合因果关系的解

释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普遍理论被最好地理解为对因果机制的描述,这一机制使正在讨论的领域中的现象得以产生。因此达尔文进化论说明了自然选择如何产生物种变化,它是一个真正的理论。但是按照实证主义模式,进化论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因为选择性压力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是既过于宽松,又过于循环式的定义方法,以致不能产生经验的普遍覆盖律来可靠地推论规律或物种事件。同样,现代地质学将大陆板块、它们的漂移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描述成主要的地质形成的基础,这是个真正的理论,但是它的普遍性不足以符合覆盖模式。地质学谈到了单个的行星、地球,而关于其他行星表面的知识使地质学显得匮乏,同样,地质学家也不可能描述出支配所有行星表面特征的真正的普遍规律。

按照这种观点,正如达尔文生物学和板块构造学是真正的理论,是不同于覆盖律模式的真正的解释资源,生产方式理论也是如此。它描述了某种特定的社会变化的一般机制,而不是覆盖律模式框架下的经验普遍规律。在没有提供覆盖律的情况下,对特定现象的成功解释也许就会把它看作是该机制运作的结果。如此,生产方式理论也将发挥作用,它将成功地解释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 实证主义的一个选择:证实

这种解释方法的相对宽容性使它更加迫切要求发展出对应的反实证主义观点以便说明对假说的检验。另一构思的基本思想认为,检验是在偶然的背景原则框架中进行的原因比较过程。如果假说的数据在其收集和理论化的过程中必然地显示出它的真理性及其对立理论的基本谬误,那么它就能被现有数据所证实。因此,事实上,在每个科学杂志中的每个经验研究都容易被放入下述形式中:“这些是数据。这就是它们出现在我的假说中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它们无论怎样都会发生,它们是这个或那个过程的结果,符合我们的假说的谬误。这些是排除掉系列事件后的事实。”

在判断哪个说明是最好的过程中,实质性的背景原则不可避免地发挥作用,比如描述观察仪器如何产生数据的原则,尽管需要这种背景,但如果对假说的论证是公正的,即如果论证仅仅依靠那些所有论敌派系都开始接受的作为他们应用其自身假说的部分理论框架的原则,那么论证是充分的。关于对假说的当前的优越性的推论以及对假说可能接近于真理的推论,其有效性依靠讨论领域中的实际历史。在某些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中——比如17世纪以来的物理学,而不是占星术——存在着一种成功的模式,它只能在如下解说中被解释,即公正的因果关系比较(fair causal comparison)使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不断增加,由此,人们获得了最大规模现象的近似真理。

几乎每个人都同意比较的过程或其他类似的检验也就是优秀研究者检验假说的现实的实践。然而,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这个过程既反映了便利的事实,也反映了实践的局限性。如果科学推论中的所有前提都被阐述清楚,且如果科学家断言的与他们真正创建的一样多,那么证实将作为假说与数据之间的某种推论关系被揭示,并纯粹通过逻辑分析检验,在每个领域和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关于实证主义的流言很难说清这种关系是什么,特别是当理论必须与数据进行较量的时候。实证主义者想说明如果假说必须进行数据推论,并将其置于所观察到的最初条件中,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实才是可能的。否则,这种夸张的谬论比如“月亮是由松软干奶酪构成的并且所有的乌鸦都是黑色的”将被证实。但是在任何既定的时期内,非常令人尊敬的理论的大量扩展被人们接受并应用于解释工作中,即使这些理论像松软干奶酪的结合体一样对目前的经验推论可有可无。毕竟,牛顿定律要比开普勒定律、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以及潮汐表说得更多。然而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相对的观测原则都涵盖了牛顿所用的所有数据。没有一位实证主义者会在描述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中获得成功,即这个逻辑关系使理论具有了它应有的内涵,而使谬误仅仅具有了谬误所有的内涵。似乎不存在形式上的和综合的标准——这个标准与数据之间的距离近得足以

进行证实。<sup>①</sup>

这里有一些我刚刚描述的证实方法的更多细节。我希望这些细节能使它与实证主义的区分更加明显,它们使得证实更加适合特定的领域、特定的时间,更加依赖于背景原则和现实的历史进程。此外,这些细节应该使下述问题更清楚:在没有使明显荒谬或过时的思想倾泻而出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特有的灵活性是如何被允许的。

如果证实是假说与其对立理论的比较,那么实证主义的双重主体问题将被多重主体问题取代,前者是单一的假说面对数据,而后者则是在几个选项中选择最能吻合数据的假说。为了使比较更加现实,有关的对立假说一定不是全部可能的假说。至少对于相对重要的假说来说,不存在一个关于所有可能的对立假说的有用的有限界限。某个假说比所有可能的对立理论更与数据吻合,这只是表明,它以实证主义的方式与数据有一个正确的逻辑吻合关系。相反,在进行因果关系比较的证实理论中,假说与实际的现有对立假说相比较,对立假说当然包括实际应用的理论框架中暗含的未被公式化的假说。这种限制性非常适合我们谈论证实。牛顿物理学过去常常被证实。但是它绝不会比所有的未来对立理论更符合数据,也不会不如它们。假定17世纪的天文学家意识到了准确度的有限性,那么普遍的相对准确度至少也符合数据。当以一种放任方式进行比较时,对这种比较的需求要比实证主义用另一种也适合我们用法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更加急迫。如果从最有可能的对立假说来看现象很容易发生,那么从原本的假说来看,观察到的现象根据假说

① 在《理论与证据》(普林斯顿,1980)中,克拉克·格林穆尔(Clark Glymour)描述了推论策略,他认为推论策略要能够充分证实理论。但是这个被他称为“引导程度”的策略并不像他随意承认的那样包罗万象。比如,对类似巴耳末系列氢光谱的一些规律的推论,没有覆盖波尔(Bohr)和卢瑟福(Rutherford)对其原子模式的证实。他们所要求的双重检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同样,我认为能被说明的是:贝叶斯的策略仅仅适用于特殊例子,在这些例子中被研究的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结构被认为符合一个适当的统计学模式。否则,贝叶斯的理论至多是误导性地陈述了公平的因果关系比较过程,而这一比较过程却真正地构成了证实的基础。



中正常派生的结论所必然发生的事实是不能被证实的。因为对达尔文时代通用的物种学的所有说明都蕴涵了似乎存在许多不同物种,所以达尔文不能通过求助于这个推理来证实他的理论。这个推理几乎证明不了什么,如果不是在实证主义的范围内,我们也许还会说说它。

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论证能够说明为什么数据如其所有地蕴涵了假说的近似真理,而不是它的论敌的基本谬误,那么这个假说就可以被证实。这种论证需要更深层的前提,即前提不能被设立成推理而且不能只与逻辑形式问题有关。背景原则通常包括关于仪器和步骤的可靠性的经验信念。比如,对一个细菌说观点的标准选择被下述原则驳倒:某个实验步骤使污染物不可靠。通常的背景也包括建立起来的理论,通过这些理论,假说必定前后一致。(“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结果是由于普遍的宇宙辐射造成的。但是,由于下述原因,这种观点将违背能量守恒定律。”)

296 尽管背景原则并不都是有效推理,但是这些原则在现有争论的特殊的前后联系中是公正的,这是必要的。提出假说的人们不应该预先假定那些被一个论敌假说的拥护者们使用的背景原则是谬误。因此,伽利略的理论不公正地假定了在天文学家的观察中望远镜要优于肉眼;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包括了在遇到矛盾时宁愿有肉眼观察的原因,即使望远镜是地球上精良的观察手段。<sup>①</sup> 道尔顿在他的论证中不公正地假设了使对立理论更有效的过程不是真正的化合过程。幸运的是,在这些争论中存在着足够的共识背景使获胜的论点进一步得到发展。比如,在公正的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中,新科学依靠普通的肉眼光学,而且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是周期运动应该有一个一致的原因。

对当前对立理论的限制和共同的背景原则的需要,通过已知的与历史中的一个具体时期的具体领域有关的数据,使假说得以证

<sup>①</sup>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比照方法》(伦敦,1975)中提出了相关文本,第109—111页、第121—139页。

实。这种相关性可能看上去如此重大,以至于证实不能成为一个可能性真理的标志、一个仅仅处于临时优势的标志。有一些领域的确会是如此的不幸。当一个领域的历史是关于突然逆转的事件、连续的且不相关的时尚、或者历经数世纪的一直处于争议的对立理论的记事时,对这个领域的总模式的最好解释是:研究者们如此贫乏地掌握真理,以至于争论中的优势就是幸运与聪明的标志。(也许我们不该谈到这些领域的证实,也许科学的用法不是这样决定的。)其他领域在自身的历史中比较幸运。当我们看到物理学中的公正比较的竞争时,比方说,17世纪以来的物理学,或者18世纪以来的化学中的竞争时,我们看到了在解释预测和控制方面不断成功的模式(在这些例子中,三者兼具),这个模式只能依靠下述假设加以解释:公正的比较越来越可信赖地指向真理——在迟早都会发生的大规模现象的近似原因被关注的某一时刻之后,公正的比较相当可信。更准确地说,比如现代化学显而易见的成功是如何出现在下述领域中的,即在这一领域中,原子理论、化合价理论以及元素周期表的规律甚至不能近似于真理。任何对这一问题的说明都必须立足于那种只供哲学怀疑论者娱乐用的假说之上。这些假说——作为毕生的追求、思想统摄的说明,或者因果关系机制毫无缘故地在日常中消灭了——与基本常识的背景原则相矛盾,比如“一个假说的直接环境在其显而易见的且适度的方面,通常是它清楚地且明显地呈现出来的样子”,“事物通常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而且,考虑到我们经历的实际过程,常识原则明显优于那些对立原则。在每一个使解释能公正地被加以比较的维度中——这些维度包括多产性、博识性、准确的含义、解释性含混目标的缺失——常识原则更好地说明了我们的经验过程。(例如,为什么所有权威的说明都认为看见碰到桌子的视觉经验通常会令人想到疼痛,而看见远处有个桌子

的视觉经验则不会如此?)<sup>①</sup>简言之,我们的经验过程加之解释逻辑使某些常识的背景原则明显优于其对立面。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因果关系比较的某些计划,在坚持常识原则的那些人的职业生涯顺利展开的领域中,客观地导向了近似真理。真正的常识和历史偶然事件捍卫了科学推论,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认为推理反映的逻辑关系是充分的。

如果这是证实所具有的性质,那么生产方式理论就完全可能被证实。问题是对有效数据的最佳解释是否蕴涵了生产方式理论的近似真理而不是其对立理论的谬误。我之前描述的理论论据会让有利于一个或另一个论敌的公正的论点留存下来吗?使这个理论值得认真考虑的科学哲学,依旧维护非常可敬的令实证主义为难的理论。我们同样能够认为——我们也总是想这样认为——当牛顿物理学和道尔顿化学与数据的推论联系少之又少的时候,它们被加以证实。在没有特殊的因果关系机制的情况下,就一个例子中的重力和另一个例子中的原子以及它们的化合价而言,没有因果关系机制能够解释它们。

实证主义和马克思历史理论之间的主要矛盾最直接地涉及了非证实,而不是证实。似乎马克思的理论如此灵活以至它不能被证明为不成立。实际上,如果生产方式理论被作为一个科学假说而接受,那么它似乎就没有办法来击败那些显然荒谬的或过多的假说。

---

<sup>①</sup> 在对比中,当我们比较那些重要的科学假说时,每一个科学假说都有失败之处,而这正是它的论敌的成功之处。通常,一个维度的失败对其他人的成功来说是重要的。因此,一个相对深刻的机制理论,比如气分子理论,可能不如某个只能列出经验规律的论敌理论那样观察准确。因为更深的因素很难进行调查,所以即使这些因素的确存在,那么这些因素的拥护者们也会对它们产生致命错误。没有普遍的或推论的规则能平衡竞争中的优点,比如说,一方面是深度与丰富性,另一方面是观察的准确性。但有时共同的背景原则、常识的核心和一个领域的历史都能支持对一个特殊事例的判定。因为当我们推论:对在判定之后残余下来的不准确性的最佳解释很难估量这个理论描述了什么,而不是它描述的情况不存在。因为一个解释性优点的推理列表在这一层次上很少具有决定性,所以我们能够说当我们从基本常识转向争论的科学时,证实的逻辑只能较差地进行推理。

在此,存在着一个零散的辩护,它求助于受到普遍尊重的理论权威。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疾病的微生物理论也同样灵活。但是对证实的其他说明使我们前进了一步,并使我们公正地对待实证主义挑战中重要的少数真理。

对生产方式理论不成立的证明意味着某个对立理论为解释数据提供了优越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假说特有的灵活性既不使这种击败不可能,也不保证最终的击败会降为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信条。就如我在第六章的开端试图说明的那样,韦伯可以被证明是对的,以致马克思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就遇到了实证主义的挑战。但是实证主义者们怀疑同语反复的可靠性以及将普遍的范畴不可预知地应用于特殊事例中,这种怀疑是正确的。倘若所有其他方面都相同,如果辩护者们必须以这些方式来解释理论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对于解释来说是一个更加贫乏的来源。这些都是易使某个论敌占据优势的缺陷,但是这只是一个趋势。缺陷本身不是致命的。它们当然不是伪科学的必然标志。

当某个因素强大到足以克服用于补偿的因素时,某些现象出现了,这个理论与缺乏这种同语反复障碍的论敌理论相比是一个知识含量很少的假说。缺少同语反复障碍的对立理论如果是错的,那么它更容易被证伪。因此,如果两个假说都遇到了延长的且严格的检验,并且两者都同样好地符合事实,那么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少有障碍的对立假说更接近于真理。具有障碍的假说如果正确,那么毫无疑问,它必定更易符合数据。同样,如果一个理论通过富有创造力的再次阐述而被辩护,并把对“经济结构”(或者“选择优势”,或者“真正的化合物”)的鉴别转向符合新的事实或迎接挑战,那么这个理论就提出了一项重任。它更有可能使理论与数据结果间的符合来自于理论家们的创造性,而不是来自于优越的理论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到了牛顿的时代,人们就失去了对它的兴趣。本轮理论总是被补充进来,从而使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与天文观察相一致。在牛顿的综合中,一个人将期待假定在数据有效的情况下,人类的创造力能制造出这种控制。天体引力与地球引力之

间的差异没有阻止牛顿式的努力,即将行星运动、月亮运动、地球自由落体运动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机制,对此,也没有相应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来说明其原因。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同语反复的障碍和富有创造性的再次阐述的基础上,试图复兴诸如活力论、胚胎学或者国家命运理论之类的长期过时的理论是如此的荒谬。当然,理论能通过这些方式加以辩护。但是我们能证明理论与数据结果间的符合是作为创造力和顽强精神的作品而产生的,它独立于任何关于这个理论比它的对立理论更正确的假说。能够使旧理论得以复兴的是符合一个新例子,这种符合不能根据假设旧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而被轻易地加以解释。这就是还没有发生的复兴。

实证主义者认为,诉诸潜力和国家命运的考察并不是一种本质上荒谬的“虚假解释”。这当然是更合理的方法,因为在过去当这些理论最好地解释了各种特征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时,高智商的人们欣然接受了这些理论。同样,有效辩护与无效辩护之间的区别在此主要依靠时间的选择。如果一个障碍总是作为一个理论的一部分,且这个障碍要应对意料不到的挑战,那么成功的辩护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加以辩解。如果一个假说不是再阐述的作品,那么它的成功更可能是理论成功,而不仅仅是辩护者的诡计奏效的标志。因此,搞清楚下述问题是重要的,即要么是拉马克关于用进废退的相关事实的障碍,要么是马克思的封建概念,这两者之一正好最近专门回应了17个有效的反例,或者出现在理论家们的最初理解中。正如大多数尽责的实证主义者看到的那样,他们对假说与数据之间逻辑关系的强调使关于检验历史的这些问题毫无关系。

从逻辑的观点看,一个假说从给定的一组资料中接受到的支持的强度应该依赖于这个假说断言的是什么以及资料数据是什么。至于假说与资料数据谁先谁后的问题,作为一个纯粹

历史的事实,不应认为对假说的确证发生什么影响。<sup>①</sup>

否定进化理论是一个理论;假设理论修正的时间选择是不相关的;暗示了因为数以千计聪明的研究者们缺少基本的逻辑敏锐性,所以他们积极地推进虚假解释——上述这些都是关于实证主义的科学说明一定存在着某些错误的最清楚的表面证据。<sup>②</sup>

科学哲学使检验历史理论成为可能,它最好不要使这种检验变得容易。因为,特别是自马克思时代以来,与其对立的方法已经持续了数代。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中的这些异议的持续是因为非智力的原因,这种持续以那些科学哲学不需要揭示的社会进程和心理过程为基础。每个人都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方法的持续具有这个特点。如果非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慢慢衰落,那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将被证伪。就非马克思主义者这部分而言,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需要解释聪明且博学的同僚们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通过求助于痴心妄想、社会嫉妒或对世俗信仰的需要来做这项解释工作。那些认为没有任何基础能够用来选择对立方法的人,将这些方法看作是由研究者们不同的最初预感产生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或证明

① C. G. 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中文版:张华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② 对存在真正的生物进化论的否认,在卡·波普尔的著作中特别鲜明。“不存在进化规律,只存在植物和动物变化的历史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只存在它们发生改变的历史事实。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征的规律思想,是19世纪的典型错误,这些思想是由于人们普遍倾向于将变化归因于自然规律的作用而造成的,而这些自然规律的作用在传统上则被归因于上帝的作用。”[“预言与社会学中的预言”,载于《历史哲学》(Patrick Gardiner 编辑),纽约,1959,第280页]。同时参见卡·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29—134页。我认为许多人将这些陈述看作是异质的。我已经努力说明了这些陈述是实证主义的自然结果。我提出的关于虚假解释的例子,“经不起……客观的检验或意义重大的解释……作用”,取自于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科学解释方面》中的扉页短文,第432—433页,(所引用的短语在第433页)。

学的解释。

302 根据每个方法,成千上万的或数以百万的聪明的、见多识广的、有科学思想的人们被误导,并历经数代。无论被误导的是谁,他们为什么就难以看到他们方法上的错误所在?科学哲学能够使程度问题更加清楚,它说明了不一致的结构难以发现一致的意见。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思维障碍在于背景信念在检验假说中发挥的作用。在拟定和比较具体问题的答案时,研究者们就是这样依赖一个框架内的相当具体的原则,这些具体原则涉及现象如何被察觉,什么样的真理不能被违背,或者什么原因最有可能。即使在先前做出解释的最简单的事例中,即在诊断咽喉痛时,必须要应用一个框架内的充足的、具体的原则。比如,如果石盘中的培植容易被污染,或者如果细菌不会引起发炎,那么解释性的推论将是错误的。

背景原则能够依次被证明是正确的,直到整个历史领域以必要的常识视角进行审视。但是人们通常不合理地构建这些论证,去弄清这些论证是否能抵得住挑战或新证据。对流行病学家来说,不断地再次评估感染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引起症状是没有意义的。在假定的框架内,很难充分地描述或检测看似合理的假说,这比实证主义的提议要难得多。类似的经济原因在没有检验社会科学家们自身的理论框架的情况下经常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即使他们易于夸大这些经济原因的作用并过久地延期他们的自我检验。一位韦伯式的社会学家研究伊斯兰教阻止经济发展的趋势,他有满负荷的工作要去做,他要应用韦伯关于如何揭示教徒的行为来源、他们可能会怎样行动的原则,而不必反复使这些原则通过比较加以检验。

303 在理论框架内的这项工作听起来像库恩的常态科学,“成熟”的科学界的实践超越了思想学派之间的冲突,在科学革命间发挥作用。这种工作能够并且会继续下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当研究者们在对立的思想派别之间截然分开的时候也是可取的,就像社会科学的情况一样。要考虑这些在背景原则中常见的分裂。一些社会科学家假定人们行动和相信的原因确实通常都是他们行动和信仰的真正原因;一个与其相反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而且有些匪夷

所思,它需要特殊的论证。其他社会科学家认为客观利益正常且自然地形成人们的信仰和行为,甚至这些客观利益与人们诚实的自我描述不符。对一些人来说,如果能解释事件发生时的准确的时间选择,那么将有利于说明假说。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肤浅的常见标志。对于一些人来说,宗教因为与最重要的事情有关,所以必然对行为产生主要的影响。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宗教是如此的易受影响且与直接事物相分离,并容易适应非宗教事务。这些假设没有一个愚蠢的,它们都控制着人们对假说的选择和检验的艰辛进程。

如果不同的且相反的理论框架现在通行于见闻广博的研究者们,那么他们应当定期地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加以比较。我并不是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责任开脱,而只是想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自然地忽略这个责任。我所做的解释是双重的。首先,人们最初认为一个特殊的理论框架是最好的,它作为一个合理的经济学一直被应用,直到异常情况积聚起来,即许多事例中的证据提出了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极不可能发生的许多例外情况。在社会科学中,一个用作评估证据的广泛运用的理论框架通常会留存下来,因为它很少产生异常情况,即使如果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解读证据,那么它所支持的假说仍往往无法得到证实。带有宗教热情的大规模运动是韦伯的宗教心理学产生社会影响的基石,这些运动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者最终的解释性因素分离。导致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战的经济利益需要其他理论框架中离奇的暴力嗜杀的极端状况,在这些其他框架中难以合理计算这些状况。因为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倾向于自圆其说,对一个理论框架的轻率选择倾向于自我维护。同样,在发展和检验一个理论框架中的经验假说时的灵活性,不一定会有能力去比较用于定义理论框架的较高程度的假说。哲学家们相当善于后者,而对于前者则相形见绌。相反,在社会科学的一个理论框架中钻研的博学多识的研究者,通过公正的比较来捍卫他们的理论框架,这种做法是极其笨拙的。我在第四章描述过的对马克思政治理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

这对哲学而言是一种安慰。无论哲学家们在收集数据方面是



怎样的有限,他们关于说明的推论不是草率的就是回避了问题。他们有办法去减少强烈的但又无法证明的差异,即使他们不能终结这些差异。

## 实证主义和政治学

我在前文提到过,我对抵制生产方式理论的描述是奇怪的,甚至是荒谬的。绝对抽象的方法论约束似乎将这个奇怪的事情与相当不同的影响结合起来,并在经济上强迫政治因素。我将通过推测构成这种差异的基础的是一个真正的结合,来进行推理。

依据我对实证主义解释与证实的构思的广泛理解,这种构思将趋势描绘成多种多样的,这与下述情况一样:休谟(在他的理论建构性时期)、穆勒和孔德的经验主义;马赫、基尔霍夫(Kirchoff)、彭加勒以及同类的哲学科学家对说明科学理论仅仅是总结资料手段的努力;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欧地区发展起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团体在20世纪所处的学术地位;这些著述的学者都运用了一个假设,即因果关系、解释和证实都有一个普遍的分析,这个分析依靠逻辑形式关系,同样适用于研究的所有领域。他们都认为这种分析可用于排除某些不值得研究的主张和观点。通常一个学者会因为这些形式主义假设几乎没有从其他足智多谋的从事这些趋势研究的著述学者那里得到检验而受到打击。用先前引用的亨普尔的话来说,这些假设“似乎合理”,“有人觉得它应当可能”去发展关系到这些限制的哲学。(讽刺的是,一个警告被直接加于亨普尔的情感表达之前:“‘对证据的觉察’或对合理性的感觉”不能决定一个假说是否可以被接受)。<sup>①</sup>

我间接提到的几乎所有的著述者也都共有一个类似的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矛盾的普遍观点。他们对极端主义者所倾向的暴力与镇压感到惊骇。他们就是这样在他们对极端主义

<sup>①</sup> 亨普尔:《对证实逻辑的研究》,第9页。

原因的了解中,将这种极端主义看作是以人们错误建立的信念为基础的,这种信心不仅以不充分的证据为基础,而且以关于自然的基本观念和关于证据、原因或解释的范围的基本观念的混淆为基础。著述者们会因为经验而简单地认为这些极端主义者们有着错误的观念,这可能会是一项永无休止的工作,而且这项工作无论怎样都会使著述者们的争论具有附加的重要性和活力。有更多的著述说明各方极端主义者的全部思考方式都以混淆为基础,而实证主义假设是这项工作的一個工具。我推测这个工具作用是实证主义假设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并不全是推测,它符合这些趋势中的大多数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而且它符合这些人对方法论研究的实践观点的某些陈述。

几乎所有第一代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是中欧地区大学中的受围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sup>①</sup> 在一些有巨大影响的实证主义著述中,关于方法论的实践观点是明晰的。比如,在亨普尔的《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迫切要求排除社会科学中的假解释,并且被明确排除掉的假解释因为违背了实证主义的限制,而几乎都或者求助于以右翼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种族的、民族的或个体的领导者的命运,或者求助于以马克思主义为特征的根本的经济结构。<sup>②</sup>

甚至在对排除极端情况的承诺还不明确的地方,这个承诺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研究工作的影响也往往是强有力的。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的逻辑》(1934)涉及了认识论的最抽象的问题、物理科学的可能性问题与结构问题。然而根据他的自传,这本书反映了15年前在政治骚乱中达成的承诺。在波普尔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非常短暂的时期,他参与了由警察挑起事端的社会主义集会。

① 为了简明且生动地勾勒出逻辑实证主义的态度和诽谤,参见卡尔纳普(Carnap)的自述,载于《鲁道夫·卡尔纳普》(P. Schlipp 编辑),LaSalle III,1963。对社会民主规律的一个著名的例外情况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他的唯物主义和他对所有将理论与观察截然分离的批判,都倾向于摧毁实证主义的全盘计划。

② 参见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第234页、第237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42页。

“我……认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承担了惨案的部分责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题是虽然革命可以要求一些牺牲者，但资本主义要求的是比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更多的牺牲者……我现在扪心自问这种计算是否能永远被‘科学’扶持。”因为这个“剧变”，还因为对不久之后发生的爱因斯坦理论的对比观察，“所以，我在1919年底推论出科学态度是批判态度，它不寻求确证而是寻求决定性的检验；能反驳一个理论的检验是使这个理论永远无法成立的检验”。简言之，对破坏极端情况的承诺将激发波普尔特有的方法论，即使这个承诺没在后来的著作中变得明晰，比如在《开放的社会和它的敌人》以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sup>①</sup>

我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实证主义中提取的最后一个例子，即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些逻辑实证主义者没有论述关于政治、道德或社会科学问题。然而，卡尔纳普的自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哲学倾向和他在政治骚乱时期的地位。贯穿于他对其知识成果发展情况的说明的线索是，将方法论作为容许的基础来使用。这条线索描述了严格的范围，在这些范围内人们有理由宣布对事实的确信。那些看上去合理论证的原则上的明显差异，被认为是对不同语言或不同理论框架的非实质性的选择。卡尔纳普写道，当他适应他的朋友们在交谈中表达的“科学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的根本不同观点时，容许所获得的推动力首先呈现出来。<sup>②</sup> 在卡尔纳普自述的读者中，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他对问题的妥善处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

<sup>①</sup> 卡·波普尔的《自述》，《卡·波普尔的哲学》(P. Schlipp 编辑)，LaSalle III, 1963, 第25页，第29页。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回应波普尔对科学态度的看法时曾写到：“请考虑人们为了反对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的工作条件而举行罢工。他们应该说‘老板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只是一个临时的臆想，让我们取消罢工并救助于他的更好的本性。’在了解与臆想之间的差别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真正的影响”(《理论的“确证”》(最初发表于《卡·波普尔的哲学》)，载于《数学、物质和方法》(希拉里·普特南著)，剑桥，1975，第252页。

<sup>②</sup> 卡尔纳普(Carnap):《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用。但是当他描述维也纳学派共同的个人信条时,很明显这些信条附加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使准确的且普遍的容许原则成为科学哲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一切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都以有关世界的知识为前提,而科学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最好方法……”<sup>①</sup>

第一代或前二代世纪之交的实证主义由说德语的学会掌控,其会员的政治情况也极其辛酸。他们是四海为家的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在右翼民族主义情绪充斥的国立大学中教书,政府干预这些大学的日常管理,而此时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学之外的影响中逐渐壮大。在德国,政治压力尤其紧张。数十年的光景,反社会主义法使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教书成为非法活动。更多的人道主义学会似乎既被这种干预所扰乱,又对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的且反爱国主义的计划感到震惊。甚至在物理科学中,威廉二世时期德国的建立,包括万能的教育部,也试图利用某些成功来使物理学和生物学具有政治性。他们攻击机械论和原子论,说它们反映了粗鲁的英国个人主义,或者更糟的是说它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德国宪政不符。<sup>②</sup> 20世纪美国类型的道德共识——政治不应干预科学——根本不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观点,即右翼和左翼特有的信念就其本质而言是非科学的,是对道德共识的自我辩护的重要手段。

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科学家中,韦伯是标准的拥护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进行解释和检验的人。实际上,他对认同感、理想类型和价值观的作用的讨论,都是在努力说明实证主义原则能满足社会科学家的要求,即使那些原则最近出现在物理科学的分析中。对行动的认同感对社会科学是必要的,就像几乎所有与韦伯同时代的说德语的人假定的那样。它作为界定社会科学范围和界定假说范围的方法

<sup>①</sup> 卡尔纳普(Carnap):《卡尔纳普思想自述》,陈晓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sup>②</sup> 参见诺顿·怀斯(Norton Wise):《熵、原子论、德国社会知识分子史》,加州大学历史系,未出版的手稿。

是必要的,但它并不能作为证实社会科学和假说的手段。<sup>①</sup> 在所有科学中,证实是通过推论来自于普遍规律和初始条件的结果,并借用数据对这些结果加以比较而进行的。文化现象的特殊价值观念尽管是重要的,就像所有人坚持的那样,但它们却不同于对这些现象所做的解释。更确切地说,研究者虽然选择要回答的问题、要使用的结果,并根据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评价,但这些价值观念本身不能通过科学手段确立。<sup>②</sup> 一旦研究者选择了要解释的问题,因果关系解释就要力求包含经验覆盖律下的现象。<sup>③</sup> 考虑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这种覆盖律模式可能看上去在谴责社会科学的沉默或平凡。这种理想类型的方法通过利用大多数覆盖律的“如果—那么”的特性,避免了这种困境。一个人制定了准确的概念,并且这些概念能被同感地掌握并与这个人的价值观念相结合,通过使用这些概念和比较数据的过程,人们阐明了普遍规律。虽然这个普遍规律的适当性不会永远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是近似的,那么人们就可以推论出这个理想类型部分地解释了实际的历史进程。<sup>④</sup> 实际上,理想类型是覆盖律“解释性描述”的原材料,通过这些理想类型,实证主义模式与社会科学家们的特殊需要相符。<sup>⑤</sup>

韦伯通过精密的概念分析使这个方法论具有合理性。但是在他的方法论著作中的数以百计的篇章中,很难找到很多的实证主义

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与经济组织的理论》,纽约,1949,第96—97页,第99—100页。

② 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载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中文版:韩水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4页);《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伦理中立”的涵义》,出处同上,第3页;《文化科学的逻辑》,出处同上,第73页;《作为职业的科学》,载于《马克斯·韦伯》,纽约,1958,第146页。

③ 参见韦伯:《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载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中文版:韩水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9页);《社会与经济组织的理论》第99—100页。

④ 参见韦伯:《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载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中文版:韩水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50页);《社会与经济组织的理论》第96—100页。

⑤ 参见C. G. 亨普尔:《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类型学研究法》,载于《科学解释方面》。

论证,就像学生们常常抱怨的那样。有关因果关系解释和科学证实的实证主义概念,没有经过论证就被假定如此。对价值观过多侵扰实证主义概念的警告通过下述断言而得到辩护:没有“应该”的陈述来描述例证的情况;每个价值判断在面对观点上的差异时,比所有科学判断都更加难以确立。<sup>①</sup> 这些方法论著作在实质性的和令人信服的细节上谈到的内容,说明了指导社会学解释的实际迫切性,以及运用准确而普通的规律进行推论的结果,并通过在价值观自由的情况下比较数据来进行检验的迫切性。除非依据韦伯的标准无法检验或无法解释的观点被排除掉,或在学术论述中被严格地分隔开,否则有效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德国大学是不可能的。种族差异将使合作无法形成,国家干预将确保许多有帮助的研究被排挤。由于混淆了对实际观点的用词或评价的异议,研究者们将不断地彼此谈论过去,而无法将科学和价值观的关系与由理想类型提供的帮助达成一致。简言之,韦伯的实证主义被有意地用来回应“对较年轻的一代研究者来说,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的事实”——这些变化发生在许多人动情的承诺取向上。<sup>②</sup>

哲学史上一个标准的奇异事件是 19 世纪最好的德国哲学在短短数年间发生了转变,从形而上学系统的建构转变为对知识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的坚决主张。实际上,这个变化产生了关于哲学史的最盛行的笑话,即在德国正在产生的新哲学,却在英国的古代消逝,而在美国正在复兴为具有永久的生命力。这种对出现在说德语的大学中的社会状况的勾勒,提出了这个变化中的一个因素。一个将右翼和左翼的极端观点都排除在科学讨论之外的方法论,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才开始回答许多说德语的学校的深切要求。

① 我讨论了韦伯的论点和其他关于“社会科学中的理由与承诺”的价值自由,载于《哲学与公共事务》,1979 年第 8 期。

②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伦理中立”的涵义》,载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中文版:韩水法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同样参见《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出处同上,第 20—21 页;以及韦伯对《民族经济的生产力》的贡献,载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的成功》,1909。

最终,像休谟和穆勒这样的鼻祖,通过他们著作中的方法论明确地想要克服极端主义。比如对休谟而言,甚至“准确而深奥的”哲学的最坏结果——他所写的那种哲学——有着重要的实践观点。这些结果破坏了宗教狂热的来源并因此具有政治生命力。

然而,深奥抽象的哲学中的阴暗之所以遭到反对,不仅是因为它令人费力和疲惫,而且也由于它是不确定和错误的不可避免的根源,在这里确实存在着对于形而上学的重要部分的最公正、最近乎情理的反驳,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并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形而上学或者产生于人类虚荣心的无益的努力(这种虚荣心使人类钻进了我们的理解所完全不能达到的题目);或者产生于普遍迷信的伎俩(这种迷信由于不能以明晰的理由来保卫自己,使用纠缠难解的荆棘去掩盖和保护其自身的弱点)。这些强盗因为被赶出了旷野,他们便逃到森林,等待时机以袭击人心中每一条不设防的通道,并用宗教的恐怖和偏见去压服它最顽强的反对者,只要稍不留神,就会遭到压迫。许多人由于懦弱的愚昧,给敌人敞开了大门,并且恭顺谦卑地欣然接纳他们的敌人,把他们当作自己合法的君主。

但是,这就是哲学家应该停止这种研究,而听任迷信继续占领它的避难所的充足理由么?我们不是正应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并觉察到我们必须把战争引进到敌人的最秘密的藏身地么?<sup>①</sup>

休谟的政治短文,诸如“论原始契约”和他对大不列颠历史的描述,以及他在当时有名望的根基,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达到克服极端而实现适当性的努力。狂热者们回忆上个世纪的事情,那时的杀戮、老派的辉格党和保守党、雅格宾派,以及将政治诉求建立

<sup>①</sup> 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人类理智研究》第1章,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7页。

在宗教教义上的圣职人员,这些都是对和平、繁荣和文化的主要威胁。这些人一定被批露为不合理性的人,人类理性在原则上是无法实现的。于是不足为奇的是,休谟在其理论形成时期发现:他的朋友、学会中的同盟者和适度的圣职人员致力于使苏格兰摆脱雅格宾派的激情,并使苏格兰挣脱苏格兰教会原有警戒正在减弱的控制。<sup>①</sup>

那么我的推测是,实证主义的魅力重现有着其他的来源,其中一个政治来源:人们想取缔那些不值得进行经验研究的观点的愿望,断言了将带来混乱的政治文化后果的潜在原因。在这方面,实证主义是取缔极左或极右观点的一种手段,但它并未对这些观点加以详细批判。这只是一个推测而已,但它激发了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如果推测是有效的,它也不能暗示实证主义者有任何欺骗活动,不能暗示他们剪裁方法论的观点以适应政治需要。确切地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实证主义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的确吸引许多人,尽管实证主义存在着我先前描述的内在缺陷。这个推测也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用来对实证主义下定义的假设在没有被其他具有批判精神且足智多谋的研究者检验的情况下被人们所接受。当然,其他力量也同样发挥作用,既包括内在于哲学的传统,也包括在哲学之外产生的科学趋势。石里克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兴趣,赖兴巴赫在相对论方面的兴趣,休谟试图用牛顿模式改组哲学,这三种情况都为后者提供了重要例证。政治学假说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哲学传统是可用的,与许多解释有关的科学革命为什么是可能的,然而却只有一些假说影响了特定时代的最富创造力的哲学家。

我认为甚至哲学家们最初的研究也能说明:用方法论来消除极端观点的愿望,与所谓的要操纵人类的愿望相比,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并且这个愿望在实证主义、哈贝马斯、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中最流行的社会学分析中得到强调。对经验普遍规律和对推论检验所暗含的意义的探求,可能会支持对不可变更的事实

<sup>①</sup> 这是在 E. C. 莫斯纳(E. C. Mossner)的权威传记中再现的主题,载于《大卫·休谟的一生》,牛津,1970。



(目测天文学)的消极收集与解释,就像这种探求将进一步掌握情况那样。如果其他的探求工作所掌握到的情况被少有偏见地描述为努力去改善社会,那么这种掌握既不是实证主义特有的目标,也不是应该加以揭示的隐形目标。实证主义与大多数其他哲学相比更多见此种情况,它是宽容的、温和的人们从事探寻活动的前提,并怀疑激进的政治干涉。但实证主义的这样一种角色并不总是仁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可能充分地削弱了它反对纳粹的力量。休谟的主要敌人,沃伯顿牧师,热切地反对种族主义和奴隶贸易;而休谟则将温和地反对低效的奴隶制,与在他的时代罕见的关于黑人在生物学上处于劣等地位的推测结合起来。<sup>①</sup>当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受批评者的名字时,像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这样在学术上微不足道的人物被作为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加以批判,尽管如此,这仍具有重大意义并令人失望。

对马克思的解释最好是要既准确又实用。它应当为当前的研究、争论、改进描述出一个理论框架。先前,我曾尝试说明生产方式解释在经济学史和人类学中具有这样的生命力,而技术决定论则没有。通过明确实证主义在评价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人们对生产方式理论的讨论可能会使承诺多而成果少的事业——哲学的社会学史——具有生命力。

<sup>①</sup> 参见短文《论民族特性》,载于休谟的《休谟散文集》,查珀尔希尔,1942(中文版: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27页)。威利·魏尔默(Wylie Sypher)在《几内亚被俘的国王》(Chapel Hill, 1942)中确立了休谟的种族自卑问题在当时的特殊性。



## 索 引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f. 表示从此页码起之后的数页内容,

n 表示该页码中的注释)

阿克顿(Acton, H.) 202f.

阿多诺(Adorno, T.) 312

艾伦·德雷克(Allen, D.) 35—41, 73

艾伦·塞瑞德·威廉(Allen, W. S.) 135n

阿尔蒙德(Almond, G.) 103, 160

阿尔都塞(Althusser, L.) 129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20f., 219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8, 75, 76f., 81, 101, 268, 288

阿尔汉格尔斯基(Arkhangelski, S.) 188, 262

阿罗(Arrow, K.) 34

亚洲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198, 201f., 210, 253, 265

艾维尼里(Avineri, S.) 8n, 116—121

巴查赫(Bachrach, P.) 142, 143n, 150—152

巴枯宁(Bakunin, M.) 20, 21

- 巴热兹(Baratz, M.) 142, 143n, 150—152
- 贝叶斯的证实理论(Bayesian theories of confirmation) 272, 294
- 边沁(Bentham, J.) 33, 34, 35, 38, 76
- 伯恩施坦(Bernstein, E.) 182n
- 大商业(big business), 参见资产阶级(See bourgeoisie)
- 布洛赫(Bloch, M.) 252f., 268—270
- 路易·波拿巴(Bonaparte Louis Napoleon) 109, 110, 123, 125, 260
- 资产阶级(Bourgeoisie) 103n, 105f., 110, 115, 144f., 164, 208; 在美国(in United States) 111, 127, 138—140
- 鲍尔斯(Bowles, S.) 137, 139n
- 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ies) 182f.
- 布伦科特(Brenkert, G.) 56—58
- 布坎南(Buchanan, A.) 8n, 65—73
- 《资本论》(*Capital*) 11, 188—190, 194, 216f., 259f.
- 资本主义的起源(capitalism origins of) 188—190, 192f., 215f., 224f., 237—241
- 卡尔纳普(Carnap, R.) 305n, 306f.
- 卡特赖特(Cartwright, N.) 285n
- 因果关系比较(causal comparison) 292f., 295—298, 302—304
- 同样参见证实(See also confirmation)
- 因果关系深度(causal depth) 289—291
- 同样参见个人主义, 方法原因(See also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cal causation) 284—287, 289—291
- 性格(character) 64, 74—76
- 谢瑞(Cherry, R.) 137, 264n
- 智利(Chile) 110, 125, 160
- 《法兰西内战》(*Civil War in France*) 122f.
- 阶级(class) 9, 177, 195, 268
- 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 67, 132—134, 146f., 149
-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9, 126, 171, 268
- 科恩(Cohen, G.) 8n, 175, 176, 180f., 183, 186, 190, 212, 232
- 殖民主义(colonialism)
- 参见帝国主义(See imperialism)

巴黎公社(Commune Paris)15,64,67,94,125  
共产主义社会(communist society)22,34,38f.,57  
孔德(Comte, A.)282,304  
证实(confirmation)49f.,126—128,203f.,255f.,258f.,272,273f.,275,277,  
281f.,292—302

同样参见因果关系比较;证伪;科学理论(See also causal comparison; falsification; scientific theories)

征服(conquest)191,192,206n,214,230,241f.,245—249,269

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ies)105,106,109f.,139,163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reface),174—180,211—213

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08n,132f.,140

克罗齐(Croce, B.)27

达尔(Dahl, R.)102,143,146n,150,152—156,161f.,166

达尔文(Darwin, C.)180,185,187,233—235,236,255f.,258,267,287,292,300n

民主(democracy)19,23,38,55,126

德·圣克鲁瓦(De Sainte Croix, G.)262,263n,266f.

杜威(Dewey, J.)18

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40,59

狄龙(Dillon, C.)164

多姆霍夫(Domhoff, G. W.)102,138n,139,146n,157f.,162n

伊斯顿(Easton, D.)160,217

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3,8—10,78,227—231

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178,206,212f.,217,223,229,278;基本类型(basic types of)178f.,280f.

经济学(economics)5f.,33f.,60,72,197,259;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11,27,  
28,259—261,27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ighteenth Brumaire*)260,265

选举(elections)30f.,111,113,117f.,123—26,143n,144,150,153f.,155,157,  
159,161,166

同样参见民主,改革,革命(See also democracy; reform; revolution)

恩格斯(Engels, F. ) 36, 46, 81n, 105, 124f. , 182n, 188, 202, 219, 227f. , 238, 262, 265, 267, 290

平等(equality) 19f. , 96

同样参见不平等(See also inequality)

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E. ) 245n, 248n

进化论(evolution theory of), 参见达尔文(See Darwin C. )

解释的性质(explanation, nature of) 274f. , 284—292

同样参见虚假解释; 科学理论(See also pseudo-explanations; scientific theories)

外部因素(external factors) 241—253, 268—270

证伪(falsification) 236—241, 277, 281f. , 298—300

同样参见证实(See also confirmation)

法西斯主义(fascism) 55, 110, 130, 134—136, 159f.

同样参见纳粹主义(See also Nazism)

宿命论(fatalism) 181, 183

束缚(fettering) 177f. , 185f. , 207f.

封建制(feudalism) 189, 191, 192, 198—201, 209f. , 216f. , 224f. , 247—253, 266, 268—270

费尔巴哈(F Feuerbach, L. ) 218

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 P. ) 296n

芬利(Finley, M. ) 279f.

力量(force), 112, 120, 128, 140, 199f. , 226, 256

同样参见暴力(See also violence)

法国(France) 89f. , 105, 109, 123, 260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312f.

自由(freedom) 19, 23, 25, 26, 34, 38, 54—58, 126

自由骑士问题(free-rider problem) 63f. , 65—73, 94

弗洛伊德(Freud, S. ) 48, 79, 187

弗瑞德(Fried, M. ) 262, 263n

遗传的谬误(genetic fallacy) 48f.

吉诺维斯(Genovese, E. ) 137

- 德国侵略(Germanic invasions)246f. ,248 ,250f.  
 德国(Germany)125,135f. ,242f. ,244,307f. ,309f.  
 吉尔伯特(Gilbert, A. )264  
 吉尔摩尔(Gilmour, R. )103n  
 金迪斯(Gintis, H. )137,139n  
 格林穆尔(Glymour, C. )294  
 多种福祉(goods, diversity of)32,34f. ,41f. ,43,57,96;普遍的(general)52,54,56  
 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86,89,124f. ,188—190,198f. ,207,238—241,263,279f.  
 希腊(Greece)41f. ,44,53,278—280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Grundrisse*)213—216  
 基佐(Guizot, F. )268
- 哈贝马斯(Habermas, J. )312  
 哈米尔顿(Hamilton, R. )103n,135n  
 哈林顿(Harrington, J. )268  
 黑格尔(Hegel, G. W. F. )56,73,90,207,218,222  
 亨普尔(Hempel, C. G. )261,272,275,287,300n,304—306  
 希法亨(Hilferding, R. )137,262,264n  
 希尔(Hill, C. )137,188,262  
 希尔顿(Hilton, R. )137,188,262,263n,266  
 霍布森(Hobson, J. )137  
 整体论(holism)197f. ,221—223,258  
 休格斯(Hughes, C. E. )148  
 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16,30f. ,36f. ,38—40,58,61f. ,66,70,73—76  
 休谟(Hume, D. )17,73,272,282,284,304,310—312  
 亨特(Hunter, F. )102,157f.  
 亨廷顿(Huntington, S. )148
- 意识形态(ideology)45f. ,89,206,226,256f. ,258,273  
 伊迪(Ihde, A. )203n  
 帝国主义(Imperialism)36,245,263f. ,269

- 同样参见征服,印度支那战争(See also conquest; Indochina War)
- 收入(income)22,139
- 同样参见工资(See also wages)
- 个人主义方法(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cal)131,163,222,289f.
- 印度支那战争(Indochina War)132,164,166
- 工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 capitalism)69f.,190,216
- 不平等(inequality)21f.,154f.
-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60—62(伦理学 ethics),129—136(政治理论, political theory)
- 内部论(internalism),参见外部因素(See external factors)
-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89,124,263
- 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36,89,94,263f.
- 伊朗(Iran)262—263n
- 爱尔兰(Ireland)86,89,263
- 正义(justice)80f.,90—92,94
- 同样参见平等;道德;权利(See also equality; morality, rights)
- 康德(Kant, I.)58,75
- 克蒂(Keddie, N.)263n
- 凯恩斯(Keynes, J. M.)286f.
- 基尔霍夫(Kirchoff, G.)272,304
- 科尔柏格(Kohlberg, L.)94
- 考尔科(Kolko, G.)139n
- 库恩(Kuhn, T.)203n,288n,302
- 莱姆(Lamb, R.)103n
- 里奇(Leach, E.)245n,248n
- 列宁(Lenin, V. I.)137,181,188,207,262,264n,265,267
- 刘易斯(Lewis, D.)285n
- 列万廷(Lewontin, R.)234n
- 利希海姆(Lichtheim, G.)8n,122—125,182n
- 洛克(Locke, J.)85

- 洛威(Lowi, T. )155—157, 166  
卢科斯(Lukes, S. )143, 150—152
- 马赫(Mach, E. )272, 304  
马格多夫(Magdoff, H. )137n  
马尔萨斯(Malthus, T. )261  
市场(markets)21  
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228—230  
麦克莫奇(McMurtry, J. )8n  
梅拉索(Meillasoux, C. )262, 263n  
方法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参见个人主义, 方法的(See individualism, methodological)  
穆勒(Mill, J. S. )32, 34, 35, 37, 76, 272, 282, 304, 310  
米立庞德(Milliband, R. )130, 132  
米尔斯(Mills, C. W. )102, 157  
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8f. , 205, 228f. , 244, 257f.  
生产方式解释(mode of production interpretation)8f. , 172—174, 186, 205—217, 223, 256—258, 265, 267f. , 275—281, 286, 292  
摩尔(Moore, G. E. )54, 76  
斯坦利·摩尔(Moore, S. )8n, 88, 122—125  
道德(morality)17, 42, 57, 65f. , 67, 69, 71—73, 93—96; 历史(history of)47f.  
莫斯纳(Mossner, E. C. )311n
- 民族主义(nationalism)16, 37, 271  
纳粹主义(Nazism)134—136, 222, 290, 312  
诺伊曼(Neumann, F. )134, 137, 222  
纽拉特(Neurath, O. )305n  
尼采(Nietzsche, F. )16, 18, 76  
诺齐克(Nozick, R. )27
- 帕尔姆·杜德(Palme Dutt, R. )134n  
帕克(Parker, R. )139n  
哲学(philosophy)77f. ; 分析的(analytic)3f. , 7, 101



- 皮亚杰 (Piaget, J.) 94
- 普莱曼兹 (Plamenetz, J.) 202f.
- 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 G.) 175, 181
- 多元论 (pluralism) 102, 107, 111f., 142—144, 151, 152—157, 158, 161
- 彭加勒 (Poincaré H.) 272, 304
- 政治活动 (political activity) 9, 30f., 35, 39f., 42, 84f., 88—90, 113, 150, 257f.; 马克思的 (Marx's) 121, 124, 219
- 同样参见革命; 工人运动 (See also revolution; workers' movement)
- 政治权力 (political power) 104f., 136f., 142, 150—152
- 政治科学 (political science) 102—104, 160f., 165f.
- 政治家 (politicians) 106, 110f., 113, 134, 139, 145, 151, 153—155, 164
- 波尔斯比 (Polsby, N.) 166
- 波普尔 (Popper, K.) 301n, 306
-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4, 43, 196, 198, 204, 233, 272—274, 277, 284—286, 287, 294f., 299, 300f., 304—308, 311f. (以及第七章各处, and Chapter Seven, passim)
- 普兰查斯 (Poulantzas, N.) 129, 130n
- 权力结构 (power-structures) 102f., 157—160
- 预言 (prediction) 196, 232—235, 255f., 273, 283, 289, 291
- 生产力 (productive forces) 83, 175f., 194f.; 所谓的首位 (alleged primacy of), 180, 183, 188—195, 209f., 212f.
- 生产率 (productivity) 53f., 86, 184, 189—191, 192n, 209f., 212f.
- 新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 238, 240, 290
- 蒲鲁东 (Proudhon, P. J.) 20, 21, 81n, 85, 178, 212, 219
- 虚假解释 (pseudo-explanations) 300f., 305f.,
- 普特南 (Putnam, H.) 306n
- 种族主义 (racism) 166, 263f.
- 理性 (rationality) 15, 35, 44f., 51, 56, 59f., 61—63, 65, 71, 90
- 罗尔斯 (Rawls, J.) 17, 18, 24—26, 43n, 94
- 互惠 (reciprocity) 19, 31, 58f., 67
- 改革 (reform) 62, 106, 108, 112, 140, 166
- 同样参见选举; 革命 (See also elections; revolution)
- 理奇 (Reich, M.) 137, 264n

- 赖兴巴赫(Reichenbach, H.) 312
- 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 83, 171, 176f., 195—202, 258
- 宗教(religion) 229, 238—240, 262, 303
- 革命(revolution) 39f., 62f., 65f., 68, 72, 85, 114—126, 185f.
- 里卡多(Ricardo, D.) 261
- 权力(rights) 19, 22—30, 47
- 同样参见自由(See also freedom)
- 罗马(Rome) 214f., 220, 244, 247f., 250f., 253, 266, 283
- 罗斯福(Roosevelt, F. D.) 109, 127f., 140
- 卢梭(Rousseau, J. J.) 76, 94
- 统治阶级: 政治的(ruling class: political) 105—112, 114, 129, 136—138, 142, 144, 161; 经济结构中(in economic structure) 206, 226, 256f., 270, 279—281.
- 萨林斯(Sahlins, M.) 266
- 石里克(Schlick, M.) 312
- 斯商恩鲍姆(Schoenbaum, D.) 134n
- 科学理论性质(scientific theories, nature of), 43, 198, 232—236, 286f., 291f.; 根据(terms in) 82, 203f.; 解释(interpretation of) 187, 219, 267
- 斯科里文(Scriven, M.) 285n
- 利己主义(self-interest) 61, 63, 65—73, 93f.
- 肖(Shaw, W.) 8n, 181
- 奴隶制(slavery) 41, 112, 191f., 201, 209f., 214, 278—280
- 社会主义(socialism) 22, 34, 38f., 55, 58f., 95, 271
- 团结(solidarity) 68—73
- 同样参见性格; 阶级利益; 自由骑士问题; 互惠(See also character; class interest; free-rider problem; reciprocity)
- 自发性(spontaneity) 95
- 国家(state) 107—108n, 112
- 同样参见选举; 政治权力; 政治家; 统治阶级(See also elections; political power; politicians; ruling class)
- 停滞规则(stopping rules) 287—289
-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103, 160f.
-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129—136

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197f. ,229f. ,258

社会剩余(surplus ,social)179,206,256,279—281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11,28f. ,91

斯威齐(Sweez, P. )182n

魏尔默(Sypher, W. )313n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84,171—181,188,208—210,218(以及第五章各处,and Chapter Five,passim)235f. ,253f. ,262n,264f. ,268,271f. ,274,275,282

技术(technology)190—192,193

检验(testing),参见证实,证伪(See confirmation; falsification)

理论(theories),参见科学理论(See scientific theories)

特恩沃尔德(Thurnwald, R. )262,263n,266f.

工会(Trades unions)68f. ,70,71,122,148

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140,148f.

“真正的社会主义”(“True Socialism”)30,65

“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118,184,186,195,201,220,241,243,271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31—41,42,44f. ,53,54,60f.

乌托邦(Utopianism)15,21,57f. ,178,219

含糊性(vagueness)231—233,256,282

劳动价值论(value, labor theory of)91f.

万·弗莱森(van Fraasen, B. )285n

维巴(Verba, S. )103,160

暴力(violence),30,39f. ,61,90,108,115,126f. ,140,166

工资(wages)27—29,47n,64,90—92,254

同样参见收入(See also income)

瓦格纳(Wagner, A. )33

战争(war)166

同样参见征服;帝国主义;印度支那战争(See also conquest; imperialism; Indochi-

na War)

韦伯(Weber, M.) 15f., 18, 37, 107n, 145, 163, 224—226, 237—241, 290, 299, 302f., 308—310

福利程序(welfare programs) 147f.

雷兹利·怀特(White, L.) 174

威廉姆斯(Williams, W. A.) 137

魏特夫(Wittfogel, K.) 198, 278

伍德(Wood, A.) 8n, 27, 78—96

工人运动(workers' movement), 62f., 64f., 68—70, 112, 125, 166, 259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64f.; 历史(history of) 68—71

劳动关系(work relations) 176, 182, 186, 192—195

詹姆斯·怀特(Wright, J.) 103n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书的责任编辑陈晨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985 项目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谨表感谢！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可能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张 伟 书于沈阳家中  
2009 年 7 月 6 日